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包容性連帶：

無家者社福組織建立社會連帶的過程與阻礙

Inclusive Ties: The Processes and Barriers of Building  
Social Ties in a Homeless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

黃怡菁

Yi-Ching Huang

指導教授：黃克先博士

Advisor: Ke-Hsien Huang,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June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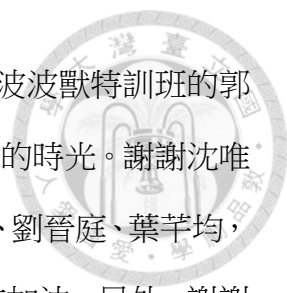
## 致謝



「不管是那時候還是現在，其實都一樣，只要真誠用心地對待，對方也能以真誠回應你，而等彼此都能真誠相待時，這段關係會更加深刻且長久。」這是人生百味工作者說過的話裡面我最喜歡的一句話。雖然就這本論文而言，它可能會推翻上述這句話的幻想，但作為我自己而不是個研究者，我願持續這樣相信著。對我而言，研究底層的珍貴之處便是看見在這個被他人貶斥的地方裡，人們是如何強韌地展現出生命與真誠。

這本論文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首先是田野裡每一個遇見的你們，謝謝大哥大姐們願意接納我，向我揭露你們生命裡的脆弱與不堪，同時也讓我看見你們如何以巧妙與靈活地姿態在權力間遊走。謝謝百味的所有工作者，在我提出寫論文的需求時，你們告訴我可以放寬心地寫，不需要避諱去寫這裡仍需要改進的地方，謝謝你們願意讓我參與內部的討論，並且相信我批判背後保有溫柔與善良。接下來我要感謝一路以來幫助我的老師們。謝謝黃克先老師的指導，在你身上學習到很多。你總是精準地講述、探討與反思學術概念，同時又保有字裡行間裡對田野與世界的溫柔。謝謝口試委員王增勇老師，願意擔任口委並且給予建議。謝謝口試委員吳宗昇老師願意擔任口委及您在 2020 年社會學年會上的建議，都讓我受益良多。謝謝陳東升老師一路以來的幫忙，我總是欽佩您能夠保持精銳的眼光與寬宏的心胸。您在論文計畫書考試給予的建議以及平日的教導，都讓我更加理解如何擔任一位好的研究者。謝謝劉仲恩老師在研究法課程給予的建議，以及日常的鼓勵與閒談都讓我放鬆不少。感謝謝國雄老師在高等質性課堂對我論文的提問與建議，您的教學使我在後續論文寫作上獲益良多。除此之外，也謝謝藍佩嘉老師、李宗榮老師、呂青湖老師。最後感謝中研院民族所的獎學金支持，以及鄭瑋寧老師的指導。

接下來要感謝身邊的同儕。謝謝 R09 的同學們，蔡恩亞、謝語謙、郭美好、Ash、



白初冉、馬映卿，感謝你們日常的支持以及在論文的討論。謝謝波波獸特訓班的郭旆君與鄭宇廉，我們都要畢業啦，相當懷念與你們一起討論論文的時光。謝謝沈唯甯、陳明宗在法國教會我的一切事物。謝謝論文寫作小組陳子萱、劉晉庭、葉芋均，雖然你們後來進入職場不能陪我去咖啡廳了，但是我愛你們工作加油。另外，謝謝強韌的生活支持網，林郁芳、黃思嘉、唐佐欣、郭羿廷、李明珊、王浩宇、林承慶、顏晟軒、廖俊翔、黃羽鴻、鄭琇文、趙振辰、謝達文、林博謙、蔡侑軒、鄭詠方，感謝你們在我的日常生活裡陪伴我，讓我有 **work-life balance** 的生活。謝謝系辦黃瑜焄、麗婷、蔡大哥的協助，謝謝信昌影印店的老闆、闆娘，祝福你們的女兒們永遠可愛健康。

最後，謝謝許博彥陪伴我整個研究所生涯。願意接住我所有脆弱、不堪與害怕，並且持續相信我、陪伴我度過眼前的難關，期待未來繼續一起學習與成長。謝謝爸爸媽媽哥哥，當我每次從房間寫完論文出來，都用豐富的食物和溫暖的擁抱迎接我，並且持續支持我在這條路上前進。謝謝 *Cigarettes After Sex* 的每一首歌、臺北我常駐的咖啡廳與拿鐵，謝謝還是走到這裡的我自己。

Ps. 好想要以謝辭來研究社會網絡，感覺很好玩。我真的很喜歡看謝辭，但真正寫的時候感覺好難喔。

## 中文摘要



過去有眾多貧窮者社會關係的研究，他們發現貧窮者脆弱危殆的社會關係會惡化他們不穩定的生活處境。那如果有一個空間致力於修復無家者的社會關係，他們的生活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重修舊好是一個無家者的服務據點，在 2019 年由社團法人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承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成立。這個空間藉由修復無家者的社會關係來改善他們生活的不穩定，本文欲檢視這種創新服務方式的成果。藉由兩年的田野觀察，本文回答「社會福利組織作為一個外力介入社會連帶的建立，如何影響無家者的社會關係？」

本文將重修舊好欲建立的社會連帶概念化成「包容性連帶」，它作為一種新的社會規範，期待（一）在制度上不排除任何人、（二）在互動上多元包容、尊重差異。作為一種可累積的社會資本，它預期達成（三）資源上的互助互惠。本文發現這個看似對無家者有益的社會連帶，卻不被無家者接受和採用。首先，包容性連帶作為一種社會規範，它企圖打造無家者群體相互依賴扶持的社會關係，但是這與無家者意識到「社會福利體制應訓練人自立」的想像有所不同，所以不願意建立這樣的連帶。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工作者會進行社福資格的篩選，因此他們需要與同儕競爭福利資源，而不是建立合作關係。其次，包容性連帶作為可累積的社會資本，它雖然提供無家者在組織內個人社會資本的提升，但是它在無家者離開組織後便難以維持，使他們在組織外無法藉由這些社會資本來建立更廣泛的社會支持網。總結而言，包容性連帶雖立意良善，但卻在建立的過程遭遇重重阻礙，以致無家者難以透過包容性連帶在組織外維持互助網絡。

關鍵字：無家者、社會連帶、社會包容、重修舊好、社會福利體制、包容性連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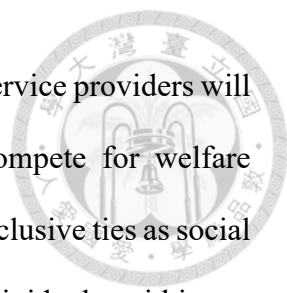
## 英文摘要

###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ragile and precari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on the unstable living conditions of individuals experiencing poverty. In light of th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arises: can dedicated spaces for repair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homeless contribute to an improvement in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In response to this question, "Recovery (重修舊好)," a homelessness service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2019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of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organization Do you a Flavor (人生百味).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center is to address the instability in the lives of the homeless by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obust social connect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assess the outcomes of this innovative service approach by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study based on two years of field observations. Specifically, it explores the type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t homeless individuals establish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is article conceptualizes the social ties that "Recovery" seeks to establish as "inclusive ties." Inclusive ties are defined as social norm that embody a set of principles, including (1) institutional inclusivity, which ensures that no one is excluded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2) the promotion of diverse inclusivity and respect for differences during interactions. As a form of social capital, inclusive ties aim to foster (3) mutual assistance and reciprocity in terms of resources. However,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inclusive ties, which may sound better and beneficial, is not accepted by the homeless. Firstly, inclusive ties as a social norm aims to create interdependence relation among the homeless community. However, this goes against the belief of homeless individuals who realize that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should train people to be self-reliant, so they 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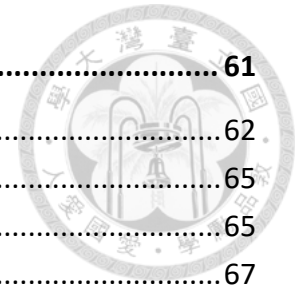
unwilling to establish such 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believe that service providers will screen their eligibility of social welfare, thus leading them to compete for welfare resources rather than foster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Secondly, inclusive ties as social capital, it enhances the personal social capital of homeless individuals within an organization. However, it becomes difficult to maintain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once they leave, which prevents them from establishing a broader social support network. In summary, although inclusive ties have good intentions, it encounters numerous obstacles during its establishment, making it challenging for homeless individuals to maintain reciprocity networks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Key words: homeless, social ties, inclusive society, social welfare, inclusive ties

#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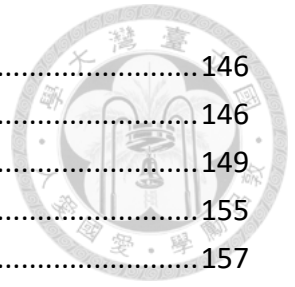
致謝.....	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目錄.....	VI
圖目錄.....	IX
表目錄.....	IX
<b>第一章、緒論.....</b>	<b>1</b>
第一節、前言與研究問題.....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4
(一) 無家者的社會世界.....	5
(二) 貧窮者的社會連帶：既緊密又脆弱的關係.....	8
(三) 組織對連帶的正面效果：連結的基礎建設、互助規範.....	12
(四) 組織對於社會連帶產生的限制：道德牽制、尊嚴弱化.....	14
(五) 小結.....	18
第三節、研究方法.....	20
(一) 田野地介紹.....	20
(二) 研究方法.....	23
(三) 研究對象.....	25
第四節、章節安排.....	27
<b>第二章、從生存到生活：重修舊好的社會制度背景.....</b>	<b>29</b>
第一節、無家者福利體制的演變.....	30
(一) 1991年-2010年：公部門無家者福利體制的演變.....	30
(二) 2010年以降：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	35
第二節、影響新型態無家議題工作的兩股力量.....	38
(一) 社會包容概念的興起.....	38
(二) 福利多元主義下的福利體制民營化.....	43
第三節、重修舊好.....	46
(一) 人生百味的成立.....	46
(二) 修復社會關係的空間.....	49
(三) 重修舊好方案內容.....	52
(四) 來到這裡的人.....	55
第四節、小結.....	59



<b>第三章、包容性連帶：重修舊好連帶的內涵</b> .....	<b>61</b>
第一節、    「建立」包容性連帶 .....	62
第二節、    包容性連帶作為一種新的社會規範 .....	65
(一)    創造制度性的不排斥 .....	65
(二)    發聲與賦權 .....	67
(三)    多元包容、尊重差異的互動方式 .....	70
第三節、    包容性連帶提供的經濟資源 .....	72
(一)    無家者間的社會連帶：小尺度的日常互助 .....	73
(二)    無家者與助人者的社會連帶：跨越專業的協助 .....	75
(三)    組織連帶：福利資源的入口 .....	77
第四節、    包容性連帶提供的社會與情緒支持 .....	80
(一)    從共煮中獲得尊嚴 .....	81
(二)    無家者間的羈絆 .....	84
(三)    工作者的關照 .....	89
第五節、小結 .....	92
<b>第四章、衝突、調適與回應：包容性連帶的阻礙</b> .....	<b>94</b>
第一節、    衝突 .....	95
(一)    重修舊好班會課：不守秩序的人們 .....	95
(二)    重修舊好班會課：精神狀態不佳的人們 .....	100
(三)    人生萬事屋：工作能力的較勁與排除 .....	105
第二節、    根本性矛盾 .....	111
(一)    形式邏輯的差異：社福體制與福利接收者想像的不同 .....	112
(二)    經驗實務的挑戰：福利資格的篩選 .....	115
第三節、    矛盾下行動者的策略 .....	120
(一)    調適 .....	120
(二)    抵抗策略 .....	123
(三)    工作者的反思 .....	127
第四節、    小結 .....	128
<b>第五章、限於組織之內：包容性連帶的效果</b> .....	<b>130</b>
第一節、    離開重修舊好的社會網絡圖像 .....	131
(一)    青伯：對養護機構來說仍然太健康的人 .....	131
(二)    大元：展開新的生活 .....	135
(三)    福福：重修舊好之外的大客廳 .....	137
第二節、    包容性連帶的範圍邊界 .....	139
(一)    難以在外維繫的包容性連帶 .....	140
(二)    新關係發展的困難：自立生活的阻礙 .....	142
(三)    社福組織作為一個社會資本豐富的節點 .....	144



第三節、	結果：包容性連帶的效果 .....	146
(一)	中老年男性：維持稍有餘韻的生活 .....	146
(二)	女性與精神狀況者：安全的避風港？ .....	149
(三)	年輕男性：非營利組織的游牧生活 .....	155
第四節、	小結.....	157
<b>第六章、結論：受限的包容性連帶 .....</b>	<b>159</b>	
第一節、	結論與討論.....	159
(一)	受限的包容性連帶.....	159
(二)	研究貢獻.....	162
(三)	例外之地與想像 .....	164
第二節、	研究限制.....	166
第三節、	政策與實務建議 .....	167
後記 .....		169
參考資料.....		173



## 圖目錄

圖表 一、重修舊好空間平面圖 .....	22
圖表 二、重修舊好空間實景 .....	22
圖表 三、田野期間人生百味組織架構 .....	23

## 表目錄

表格 一、研究對象之無家者列表 .....	26
表格 二、研究對象之工作者列表 .....	27
表格 三、人生百味專案列表 .....	49
表格 四、重修舊好專案列表 .....	55



## 第一章、緒論

重修舊好這四個字，我感覺很好。該修理的，就好（台）。雖然我書讀不高，小學畢業，五十五個，我都給我媽媽讀五十二名。出社會知道，讀書這麼重要，難怪大人都要拿條子打我。對我來講，這四個字，意思寫得很好。東西本來就是這樣，舊的東西，修理哩欸，就好了。這是我的感覺。我聽說是兩橙取的？這四個字對我意義蠻好。

### 一 無家者鍾姊

期待在這裡可以重建無家者的生活動力，也能重新建構起無家者與大眾的連結。我們相信「人生無法重來，但能維修。」或許這一次相處的結果可以有些不同。

### 一 社團法人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於官網對重修舊好的介紹

## 第一節、前言與研究問題

2019年社團法人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下稱人生百味）承接政府委託，成立「重修舊好」無家者工作培力站，起初類似庇護工場那樣，希望能夠培力無家者的工作能力，但是當你走進，並不會意識到這是一個「工作站」，倒比較像是一個社區活動空間。裡面有幾位大哥大姐趴在桌子上休息睡覺，抑或是盯著電視發呆，吧台區則有幾個工作者，耳裡會聽見洗烘衣機嗡嗡作響的聲音。這裡的工作方式並不像傳統的社會工作模式，最初成立時是一個對民眾開放的商店空間，而後漸漸發展出其他的業務。複雜多變的功能也使這個空間出現不同的代稱——商店、餐廳、據點、機構，大家還找不到一個精準的詞彙說明這裡應該要是哪一種空間。政府方認為這裡是一個工作培力站，它應該有明確的培力方案；無家者將這裡單純視為社福機構，是找社工求助的地方；工作者認為這裡是一個新型態的服務據點，以修復關係的方式服務無家者；大眾路過這裡，認為這裡是間餐廳。不同的想像匯集在這個空間內，也讓這裡承載著許多的期待，生長出各式各樣的



規則，蔓延出許多新的可能。不過對於在這裡生活的人而言，這裡就是「重修」，用什麼樣的稱呼來指涉這個空間，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重修舊好最初的空間裝潢就有特定的規劃，有別於傳統上的服務據點，最早簡餐店的預想讓這裡有著乾淨而明亮的燈光，類似臺北市隨處可見的咖啡廳那般有放鬆、慢步調的氛圍。空間配置上除了座位區外，也有吧台區、廚房區，並搭配幾個工作者的討論空間。壁櫃上展示著點亮機構販售的商品、大誌雜誌及貧窮議題的書籍。整個空間採用木質的傢俱，與大地色系的設計，而不像其他空間多用磨石子或灰白色系的地板搭配塑膠或鐵製傢俱，給人匆忙、凌亂的感覺。這樣的空間設計是為了達成修復關係的目的，讓人在忙碌生活之餘得以喘口氣，成為城市裡面乾淨、明亮的休息空間。

修復關係的初衷源自於人生百味對於貧窮議題的考察，他們發現無家者時常處在不穩定的關係裡，與親友之間的聯繫斷裂，與社會的薄弱連結。他們認為關係的不穩定使人失去生活動力、缺乏歸屬，是生活的不穩定的原因。他們希望這個空間能帶來三種關係的修復：首先是無家者與大眾的關係，無家者能與大眾對話，破除大眾對無家者的污名；第二種是無家者群體的關係，在這裡他們能找到同儕支持、獲得歸屬；第三種是人與自己的關係，能夠接納與包容自己的過去。同時，雖然不被歸類在這三種關係之內，但是這裡其實還有另外一種關係浮現，即是工作者與受助者的關係。人生百味工作者認為工作者與受助者應該要是水平的關係，而不是上對下的關係。因此他們在這個空間裡提倡平等、包容，希望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尊重。

修復關係是一種另類的社會工作方式。社會工作長期是以幫助個案獲得經濟功能與生存資源為主，鮮少有組織是以修復個案的社會關係為工作目的。臺灣無家者服務體制長期著重無家者經濟能力的復原，以脫離遊民（簡稱脫遊）為最終的工作目的，因此將福利資源聚集在就業培力，並期待無家者能夠藉由穩定工作而租屋。在既有的社會福利模式底下，修復個案的社會關係並沒有被納入工作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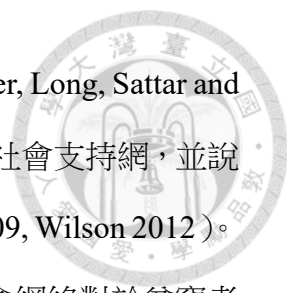
目內，也幾乎未被公部門單位提出。多數社會工作者對個案進行的陪伴工作，較像是為了達成原先工作目的而產生的工作手段，而非有意識地執行修復關係的任務。

特殊的工作方式讓重修舊好引來社會關注。他們在網路媒體與平台上受到媒體曝光，同時也有許多學生採訪。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與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遊專小組與社團法人芒草心慈善協會（下稱芒草心）合力，打造起中正萬華區的無家者服務網絡。此舉引來關注，大量的民眾捐款湧入。重修舊好並非是另類工作方式的孤軍，臺灣社會這幾年出現新型態的無家者服務組織，他們共同改變臺灣社會對待無家者的看法，並且推動原先慈善救濟路線的傳統宗教團體轉換對無家者的理解模式，以及讓政府在施政上更著重無家者本身的權益及意願。（黃克先、陳思樺、黃怡菁 2023）雖然這些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的成果受到肯定，曾被其他媒體或是工作團隊本身報導或是整理<sup>1</sup>，但是這樣的做法對於無家者的生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卻尚未有研究完整地檢視。

此外，修復關係若納入社會學的視角，不應該單純地作為一種社會工作方法檢視之。社會關係在社會學的討論裡可見社會連帶（social ties）的討論。底層貧窮者的社會連帶被認為是他們生存的資源，他們透過社會連帶交換物質資源、照顧行為、工作機會，獲得社會網絡內的社會支持與（Stack 1974, Wilson 1987; Edin and Lein 1997; Newman 1999; Domínguez and Watkins 2003; Smith 2005）。在美國社會的討論裡，隨著新自由主義式的社會福利政策越來越普及，國家預設窮人應該要為自己的生活負責，於是縮減社會福利支出，讓貧窮者的生活越來越艱鉅（Desmond 2012, Cooper 2014, Mazelis 2017）。在這樣的情況下，貧窮者原先的親屬社會網絡不再足以照應彼此的生活，而更大程度仰賴非親屬網絡。在其中，慈善組織所提供的社會網絡是底層人們建立起非親屬社會連帶的一個重要機制

---

<sup>1</sup> 參見葉靜倫（2019）在這裡重修舊好：打造無家者的共榮空間。多多益善。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626/3945473>；朱鳳治、吳其昌（2019）重修舊好食堂供街友安心用餐、盥洗。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43538>。



(Small 2009, Mazelis 2017, Watkins-Hayes 2013, Stretesky, Defeyter, Long, Sattar and Crilley 2020)。研究者將焦點轉向了貧窮者透過組織所建立起的社會支持網，並說明這樣的網絡是貧窮者免於社會孤立處境的重要因子 (Small 2009, Wilson 2012)。然而，社會網絡與貧窮間的關係卻相當複雜，至今沒有定論社會網絡對於貧窮者的生活究竟是助益還是不利 (Lubbers, Small and García 2020)。注意的是，重修舊好建立社會連帶的工作目的是一種工作者外來地介入，與其他研究描繪貧窮者自行地建立社會連帶有所不同。過去的討論往往忽略了組織內部的權力關係，將組織視為一種中性地中介存在。基於重修舊好刻意修復社會關係的目的，並且考量工作者與無家者間的權力關係之下，本文提問：**社會福利組織作為一個外力介入社會連帶的建立，如何影響無家者的社會關係？**在這個研究問題之下，本研究以重修舊好為田野地點，藉由下列四項子題來回答上述提問：

1. 為什麼重修舊好要介入無家者的社會連帶修復？如何修復？
2. 重修舊好建立的社會連帶是什麼？具有什麼樣的內涵？
3. 為什麼這個社會連帶的建立會遇到阻礙？行動者如何回應與調適？
4. 這個社會連帶對於無家者的實質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 第二節、文獻回顧

本研究嘗試透過重修舊好的案例，回答社福組織介入建立無家者的社會連帶會如何影響他們的社會關係。文獻回顧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以先前的研究說明無家者大致的樣貌；接下來三個部分，則是本文研究主題的討論——社會連帶。第二部分陳述貧窮處境的人使用與看待社會連帶的方式；第三部分，我將討論組織對於社會連帶的建立與維繫有什麼樣的效益；第四部分，我將討論組織對於社會連帶的建立與維持可能有什麼樣的風險。最後，第五部分則是綜合性地評述先前的文獻，並提出兩個貧窮者與社會連帶研究的不足之處。本文回顧的研究包含無家者、單親媽媽、貧窮家庭等社會底層，雖然貧窮者與無家者的性質並非完全相似，但是這些討論對無家者社會連帶的討論有可借鏡之處。



## （一）無家者的社會世界

無家者，或稱遊民，或稱街友，指涉的是一群居無定所的人。他們可能露宿街頭，也有可能居住在 24 小時營業場所，例如網咖、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2022 年全台灣列冊遊民為 2,910 人，其中台北市列冊遊民人數為 710 人，約佔全台遊民人數 24%。這個群體佔台灣總人數其實不多，主要集中於六都，以台北最多。雖然人數少但因為露宿在外，一舉一動都被攤在陽光下檢視，也時常成為輿論的對象。多數無家者靠著打零工過生活，平均月收入約一萬元以下（游淑真 2017）。他們無疑是經濟弱勢，但這群人的社會關係，也受到了他們的經濟情況、所處的社會環境所影響。對於無家者這個群體的不同稱呼，反應了社會大眾對於這個群體的理解。在公家單位的正式法規裡，稱這群人為「遊民」，指經常性宿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sup>2</sup>。這個稱呼是從 1950 年代《台灣省取締散兵遊民辦法》沿用至今（劉淑雲 2010），雖然當時的政治歷史背景已與現今差去甚遠，但是「遊」這個詞帶有的遊蕩意涵，依然存在社會大眾的腦海裡<sup>3</sup>。另一方面，新聞報導或是服務團體常見的稱呼是「街友」，這個詞是由創世基金會發起，希望能夠把這個群體當作睡在街上的朋友，而後這個詞彙漸漸通用，也成為相對於遊民更為中性的稱呼詞彙（見張獻忠 2016）。近年來對於這個群體稱呼的發展，則轉向使用「無家者」一詞。該稱呼是在服務無家者的芒草心於 2016 年出版「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之後，由英文 *homeless* 直譯而來。較晚近才出現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傾向使用這個稱呼來指涉這群露宿街頭，他們認為這樣的稱呼更是一種客觀事實的描述，能夠包容進更多樣的居住不穩定狀態，例如露宿街頭及夜宿營業場所、居住於庇護所或收容中心、居住於惡劣、過度擁擠的租屋或是自有空間（張獻忠 2016）。雖然後續也有一些作品對這樣的稱呼表達不支持的意見，

<sup>2</sup> 根據台北市遊民輔導安置條例第二條規定，遊民指經常性宿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

<sup>3</sup> 參見黃克先（2019）討論、孫詩萍（2021）憂防疫破口 議員建議街友先打疫苗，取自：台灣好新聞。文中內容摘錄「遊民四處遊蕩且缺乏防疫觀念，似乎是防疫的一大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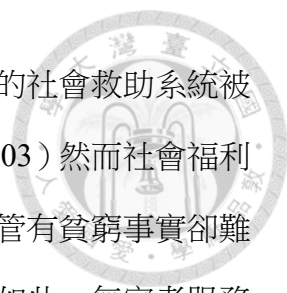
認為他們不是無家 (home) 而是無居所 (houseless) (見黃克先 2021a: 7 整理)。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也包含廣義的無家者，因此將使用「無家者」一詞。

社會世界 (social world) 由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意義闡述建構而成。生活在底層的貧窮者，因為其經濟、地區與其衍伸出的文化隔閡，造成他們看似與主流社會有著異樣的社會世界，而這樣的不同也讓他們背負著社會汙名。(Wilson 1987; Liebow 2009[1967]) 學者研究底層貧窮的重要任務，是了解他們的社會世界是在什麼樣的文化下被建構，進而理解他們因應貧困的策略，並且澄清他們身上因為異於主流而產生的汙名。(Small, Harding and Lament 2011; Edin and Kefalas 2005) 臺灣的無家者研究從 1995 年始，當時社會對於無家者的認識並不多，把他們當視為主流世界外的局外人，研究者的任務是初步描繪這群人的人口樣態並探究他們的成因，這樣的做法是仍隱含著將他們視為「需要被解決的」問題。(林萬億、陳東升 1995; 黃玫玲 1995; 陳自昌 1995) 但隨著對無家者更進一步的認識，研究轉向也開始重視無家者的主體性，漸漸不再將他們視為異類與他者，而是逐步建構起導致他們露宿狀態的社會結構與文化成因。意識到無家者是社會的一員，不是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這樣的改變也使人們認知到無家者的社會世界並不完全與主流社會區隔，而是在貧窮環境底下折射出另一種樣貌。奠基在過去近三十年的成果，無家者的社會世界可以從下列幾個面向得知：工作與福利身份、露宿生活策略、自我認同與主體性、社會關係。

首先，工作面向一直是早期研究無家者的焦點。這些研究試圖打破對無家者個人性成因的偏見，並提出以結構性觀點來看待無家者的經濟貧窮。對於貧窮的理解納入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讓貧窮者的解釋從個人病態性成因轉向結構性的產物。

(Brady 2019) 台灣無家者的貧窮是交織在經濟結構變遷與社會福利制度缺陷下的結果。無家者以男性為多，教育程度普遍低落，在過去多從事勞力密集的體力活，例如營造業、水電業等，而臺灣 1980 年代經濟結構轉型由勞力密集轉向技術密集產業後，這群低教育程度的男性既少有管道能夠重新學習就業技能，又缺乏相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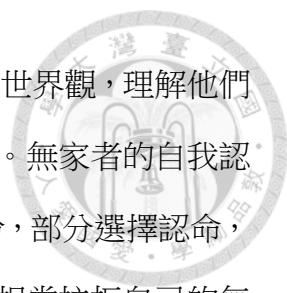




社會福利支持，成為經濟結構下的犧牲品（陳大衛 2000）。臺灣的社會救助系統被批評是殘補式的福利，僅有在家庭退位後才會出現。（高召恩 2003）然而社會福利資格有著牢固的家戶一體、照顧責任的預設，促使許多無家者儘管有貧窮事實卻難以獲得相對應的福利補助。（高召恩 2003；潘淑滿 2009）不僅如此，無家者服務體制以工作倫理為核心的意識型態，迫使無家者得從事低薪且不穩定的零工工作來維持應有的福利，以加倍耗損的方式在使用身體資本。（高召恩 2003；江睿之 2011）在無家者未脫離遊民身份下，遊民從事非典型勞動被視為不工作者，在正式工作與非正式工作的二元劃分之下，不只將遊民排除於勞動市場之外，更是將遊民排除於社會之外，視遊民為有問題者、社會異類，從而執行矯正規訓遊民重新回歸正常社會的輔導機制。（郭盈靖 2009）國家對於非典型勞動體制的忽視及缺法保障，也加深了無家者的貧窮處境。（郭盈靖 2009；陳大衛 2000；江睿之 2011；高召恩 2003）臺灣社會已經轉型成「公民社會」成員除了是「親屬人」之外，也是「公民人」。但是公民身份的取得，仍與「親屬人」緊密關聯，例如戶籍登記制度與身分證制度體現公民身份如何透過「家」來執行。即便到了工作場所，有「工作人」的身份，但是親屬仍在健保保費的制度中運作。（謝國雄 2010）此種家與工作交織在一起的公民身份，讓無家者無法擺脫掉家庭制度，以至於在福利體系裡窒礙難行。

其次，無家者的露宿生活圖像以他們的日常生活策略被勾勒出來。這些生存策略包含運用哪些策略找到免費的餐食、如何在街頭上找到合適的過夜地點，或是平常的休閒娛樂有哪些。（郭慧明 2004；許智偉 2004；戴伯芬 2014；黃克先 2021a）從這些日常生活的描繪之中，無家者的主體性漸漸浮現而出，研究者們也從這些生存策略裡去反思無家者受到的汙名與社會結構壓迫，看見主流社會如何在公共空間使用權利、工作倫理、休閒娛樂與消費上排除掉無家者。藉由生存策略的揭露，無家者不再存在大眾眼中的「異空間」，而就在人們生活世界的角落裡辛苦地存活著，只是受到主流生活方式的排除而隱形。

那麼在受到排除的狀態裡，無家者們又是如何認知自我？藉由研究他們的角




色、身份認同與自我概念間的相互作用，人們可以更貼近他們的世界觀，理解他們是如何維持自我的意義感受與尊嚴。(Snow and Anderson 1987)。無家者的自我認同在研究裡呈現二分的樣態，有些無家者會認同自己無家的身份，部分選擇認命，部分則是將這個選擇視為一種理性選擇；然，也有其他無家者是相當抗拒自己的無家身份，並且選擇掩蓋與抵抗。(吳秀琪 1995；Snow and Anderson 1987) 在二分的樣態之外，更常見的情況是無家者對於無家這個身份有著相當複雜的情感，行為與感受很有可能不一致。這是因為無家者的身份污名使得社會對於這個群體的認知帶著負面刻板印象的印象，然在實際生活內他們又形成相互依賴與協助的群體(黃克先 2019)。

最後，若要理解無家者的社會世界，他們如何與他人建構社會關係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他們的社會世界與無家者群體有著緊密互動，同時幫助網絡也是他們社會世界裡的一員。(黃克先 2021a) 過去研究也揭示無家者社會關係會影響他們的生存策略與自我認知(黃玫玲 1995；陳自昌 1995；吳秀琪 1995；郭慧明 2004)，而黃克先(2021a)則描繪了無家者豐而危殆的社會連帶，如何造成他們生活的不穩定。在接下來三個部分，我將進入本文討論的主題社會連帶，並討論其在貧窮者社會世界的意義。

## (二) 貧窮者的社會連帶：既緊密又脆弱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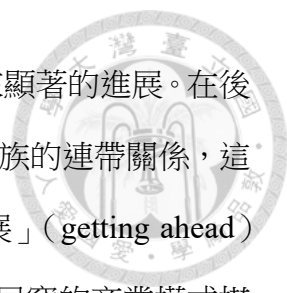
Emile Durkheim(1964[1893])提出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 或譯社會團結)的概念，去描述社會之中人與人間的關係。他認為現代社會的勞動分工的重要性不是為了提升人類的生產力，而是產生社會連帶。社會連帶讓個人得以鑲嵌於社會，遵守其道德意義與共同規範。在互動頻繁的現代社會之中，人與人透過社會連帶連結在一起，使個人受到社會的牽制。隨著學界對於社會連帶的關係有更多認識後，社會網絡研究成為研究社會連帶的主要學術社群。研究個人社會網絡的學者將社會連帶視為一種帶來資源的管道，重視個人如何經由這些連帶累積網絡內可動員的資源。研究群體社會網絡的學者，則是探討一個群體如何發展、維持與再生產該



群體的社會資本。(Lin 2001) 不過網絡學者傾向將社會連帶視為一種獲得「資本」的管道，而較少注意到關係的內涵 (content) 如何影響到人們交換的行為。(Chan 2009; Wellman and Wortley 1990; 吳宗昇 2011) 相對於網絡學者，以民族誌方式研究社會關係的作品，更強調這個關係的實質內涵為何，行動者以何種方式互動、有哪些規範等等。社會連帶的資本以及其內涵都實質地影響了行動者的社會關係，而且兩者間會相互影響。因此我認為在考慮社會連帶時，需要同時將社會連帶視為「可累積的社會資本」與「社會規範」。

在當代的討論裡，貧窮者失去與主流社會的連帶，處於社會孤立的情況(Wilson 1987)。生活在貧民窟的人們因為缺乏就業機會、經濟貧困而未能滿足主流社會對於工作、家庭倫理的要求，發展出一套適應這些價值觀的影子價值體系 (Liebow 2009[1967])。這樣的結果讓他們看起來失去與主流社會的連結，也更難以脫離貧困處境。為了生存，如何運用他們僅有的社會連帶以獲得資源便相當重要。這些社會連帶產生的社會資本是貧窮者獲得生存資源的方式( Stack 1974, Edin & Lein 1997, Newman 1999)。在 Stack (1974) 的經典研究中，樂觀地揭示貧窮者身邊的親屬網絡能帶給他們重大的生活支持。這些社會支持網絡提供他們賴以為生的資源，例如與親人、朋友借一點錢，或是委託親人好友在自己需要外出工作時，幫忙照顧小孩、打理家務。這個觀點也在後續研究獲得支持。Edin & Lein (1997) 訪談 400 位仰賴社福補助的母親，發現她們有將近兩成的生活開銷來自於網絡成員的協助。然而，雖然身邊的親友能夠幫助他們度過生活的難關，但。是救急不救窮，這樣的社會資本並沒有辦法幫他們脫離貧窮，相較之下非親屬、正式社會福利組織才有可能帶來不一樣的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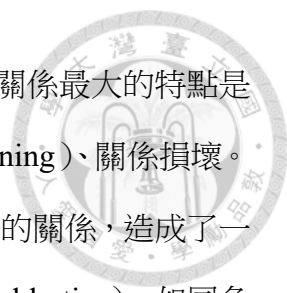
Dominguez & Watkins (2003) 將貧窮者的社會網絡區分成：以親屬、熟人為基礎的社會支持網絡、以朋友、同事或非親屬為基礎的社會支持網絡、社會福利機構的社會支持網絡。在親屬為基礎支持網絡中，人們同質性高、有高度的互信基礎，透過「度過」(getting by) 的機制協助對方，因為其能夠提供的資源與資訊，往往



於行動者自身擁有的資源與資訊差異不大，鮮少能夠替事務帶來顯著的進展。在後兩者支持網絡裡，群體間差異大，而且可能是跨職業、階級、種族的連帶關係，這樣的連帶能夠帶來更不一樣的資源與資訊，協助人們「取得進展」(getting ahead) 而非只是度過難關。Venkatesh (2006) 在他的都市民族誌中將貧民窟的商業模式描述成魚缸，說明這些商人就像是生活在同一個魚缸的魚群，仰賴外界給予的麵包屑生存，共享同個利基、彼此競爭，但是當大魚想要向外闖蕩時卻面臨失敗。該書的譬喻點出了貧窮者社會資本的困境，他們既互相仰賴彼此，卻因為未能成功地運用向外的連結，而被侷限在同樣的地區。

雖然上述的觀點有眾多民族誌材料支持，但是有研究者陸續提出相反的證據以挑戰前述貧窮者連帶的正向效果。這些研究說明貧窮者並無法從網絡中獲得資源受益，Smith (2005) 透過調查資料與 105 位低收入的非裔美國人訪談，說明底層黑人的並不是因為社會隔離才缺乏工作，而是其他人基於對貧窮者的污名及不信任、害怕損及自身聲譽、不理解貧窮者處境而不伸出援手。Offer (2012) 則是從貧窮者的角度出發，去理解網絡中互惠的壞處。他發現貧窮者的家人與自己的經濟處境相似，難以支援彼此的物質需求，僅能夠給予情感支持或是微小的經濟協助，而當貧窮者要向其他經濟情況比較好的親友求助時，有可能因為自身的羞恥感、無法回報的愧疚感而拒絕向外求助，因此限縮在原有的網絡之中。


這些相異的結果有可能是因為研究對象的不同、研究地區的福利制度背景不同，抑或是研究方法不同 (Lubbers, Small, Garcia 2020)，有研究者認為這是社會背景造成的結果，在新自由主義式的福利制度下，情況有可能會接近後者 (Desmond 2012, Cooper 2014)。Desmond (2012) 發現貧窮者在原先的親屬連帶受阻後，會轉往向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尋求協助。他的研究對象為遭到房屋驅離的人們，這些人睡在日型的庇護所 (day shelter)、露宿街頭、短期租屋等。他發現這些人會和他們在外認識的人們形成短暫緊密、隨即分離的關係。他們透過這種關係，將認識一兩天的朋友視為緊密的姐妹或兄弟，並相互協助提供食物、居住地、香菸、照顧小孩等，



彷彿取代了親屬關係的強連帶，成為生存下去的關鍵。但是這種關係最大的特點是迅速地崩解，可能在認識一個禮拜到兩個月之間，就會燃燒 (burning)、關係損壞。原因有許多，通常是因為競爭了某些資源，或是競爭了一些相似的關係，造成了一方的威脅而吵架、離去。他稱呼這樣的連帶為免洗連帶 (disposable ties)，如同免洗餐具，使用完即丟棄。貧窮者社會連帶的不穩定性，多肇因於他們的經濟處境及生活裡會遇到的風險，在相互競爭資源、競爭關係的過程裡，會讓建立起的關係迅速地崩解。後續學者將這樣的研究結果分類成貧窮者社會連帶中的選擇性團結 (selective solidarity)，緊密和脆弱的關係有可能並存。(Lubbers, Small, Garcia 2020)。

從臺灣的無家者研究裡，可以發現無家者的連帶同樣具有此種若即若離且不穩定的特質。首先，無家者的人際關係有幾種特色，如互動傾向隱藏過去痛苦經驗、人際交往中的自我孤立、缺乏社會支持 (黃玫玲 1995)。隱藏過去痛苦經驗，是基於無家者彼此理解「離家」的痛苦，因此不會特別訴說自己的經驗也不會揭人瘡疤。無家者因為過往的家庭因素、無家者身份連帶的污名，也使他們傾向不與過去的家人、朋友聯繫，進而缺乏親屬與朋友帶來的社會支持。另外，身處於犯罪率高的社區、對於街頭其他人的不信任、生存資源有限，使得他們偏好自保的孤立策略。然此種孤立僅是主觀上的認定，實際上他們共同生活在同一個空間、一起從事底層勞動，類似的經驗會讓他們成為「天涯同路人」，並發展出「遊民認同」(陳自昌 1995)，帶來彼此的相互支持 (吳瑾嫻 1999)，但是成為天涯淪落人也等於承認自己是社會失敗者，而帶來痛苦 (吳秀琪 1995)。

黃克先 (2021a) 將無家者的社會連帶稱之為「豐而危殆的連帶」，說明了一方面無家者們透過這些豐富的連帶，維持了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使用這些連帶又會讓他們感到丟臉，或是被牽連，或是感受到資源的較勁，因此而危殆。作者認為這個危殆有四個因素影響：其一，無家者的經濟匱乏處境，讓他們難以透過一般的社交來維繫關係。如同前述所說，一般關係預設的互惠機制，匱乏處境的無家者並沒有辦法達成這項義務，又或是對於這樣的互惠會有點不情願、精打細算，令他人感




受到不舒適。其二，露宿空間的不穩定性，讓他們認為街頭的關係並不會長久。因此，他們多半認為露宿街頭遇到的人，也僅僅只是生命的過客，自己很快就會離開露宿生活，自然也不會和這些人有長久的關聯。其三，連帶未在社會制度框架下進行，沒有任何規範去確保關係的建立與維持。相比一般在學校、公司等機構，街頭上的關係毫無規範、義務可言，自然也就少掉約束力。其四，無家者被賦予的社會汙名，也影響了無家者看待彼此之間的關係，偏向以負面的角度出發。他們會接收主流社會對於無家者疾病化、犯罪化或是性格缺陷等偏見，以此去評價他們身邊的無家者，並不願意與他們產生更深一層的關係。

從這些研究當中可以發現，底層弱勢人們的社會連帶性質與他們所處的環境有很大的關聯。無家者社會連帶的脆弱性，是因為他們生活在叢林法則的街頭，既需要運用社會連帶獲得生存下去的資源，又需要時時刻刻小心同樣生活危殆的同儕，會不會為了生存破壞關係的和平。同時，這些被污名化的群體，有可能內化社會對於這群人的刻板印象，進而鄙視同樣處境的人們，而不願意與他們發展長期穩定的關係。在這樣的特性之下，非營利組織的介入創造了一個新的環境，在這個相對優渥、經濟安全無虞的空間當中，帶來了建立支持性社會連帶的可能，卻也產生了新的規則要遵循。下述將分別說明，組織對於社會連帶建立帶來的正面與風險。

### （三） 組織對連帶的正面效果：連結的基礎建設、互助規範

上述的研究多是說明貧窮者、無家者在沒有規範的空間裡形塑出的連帶樣貌。而近年來對社會連帶的討論，漸漸將視角轉移到非營利組織、服務據點，看見一個具有正式制度與規劃的組織如何影響到人們社會連帶的建立。這些研究的服務對象，雖然未必是無家者或是居住不穩定的人們，但是這些研究也揭露了非營利組織可能著力的建立連帶層面，因此本文仍以這些研究作為一種取徑，去討論非營利組織對於建立連帶可能帶來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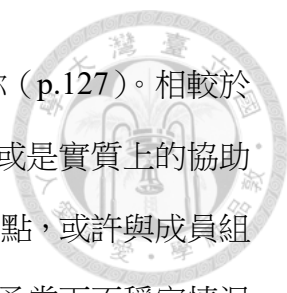
日常組織（*routine organizations*）可以提供人們創造與強化社會網絡的社會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Klinenberg 2018 from Lubbers et al. 2020）非營利機



構帶來組織與個人的連接型資本，機構作為中介者（broker）連接到機構外、社區外的資源與機會（Burt 1992）。Robert Chaskin 及團隊（2001）定義組織中間者（organizational brokers）為連結不同單位去完成當地社區的任務及建立社區能力的組織（Small 2006）。組織最重要的功能在於群體的整合與形成，例如組織協助成員建立起連帶、相互協助，形成社會支持網（Small 2009, Mazelis 2017, Watkins-Hayes 2013），這樣的社會支持網讓成員得以獲得物質資源、情感支持，並且將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們連結起來。

Small（2009）以社區的托育中心為例，這個托育中心透過機構舉辦的活動、訂定的規則，協助托育中心的母親們建立起跨越社會背景的社會連帶。最明顯的例子為，這個組織創設了家長會，讓母親們參與托育中心內事務的決策，創造參與感的同時，也讓成員們因為家長會而有了密切的接觸、聯繫，進而互助。托育中心也設有家長專線，要求母親們輪流接線，促使母親們必須要解決其他母親的問題、投入為整個群體付出，進而促進了跨階級成員之間的社會支持。除了舉辦活動之外，Small 還舉出空間本身如何作為一種促進連帶建立的機制。Small（2009）指出過去研未發現信任的程度，不僅與連帶的強度有所關聯，也與互動的頻率有關。他的研究指出這些母親在同一個實體空間反覆的出現，在接送孩子上下學的同時，無意間也看見了別的母親與她們孩子的相處方式、生活品味，因此對於其他母親也更加熟悉，並不會認為對方是純然的陌生人，願意信任對方、將自己的小孩託付給她們照顧。

另一個研究為 Mazelis（2017），相比 Small 案例裡組織是透過創造互動機會來建立社會連帶，她研究的服務貧窮者機構 KWRU，則是透過機構的文化促使社會連帶的形成。該機構由貧窮者自行組成，內部有很強的互助文化，彼此可以分享居住的空間、食物、資源，以協助其他成員度過居住不穩定的階段。她比較了參與機構與沒有參與機構的貧窮者，機構成員認為機構內的互惠並不是他人在拿你好處、只想要利用你請你協助，而是真的能夠幫助到對方。KWRU 將互惠納入機構的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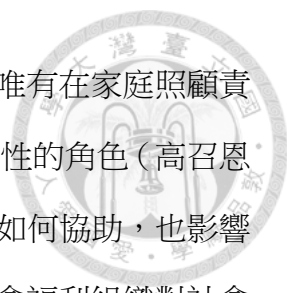
在規範之中，彼此都意識到哪一天需要協助時，他人也會協助你 (p.127)。相較於上述托育中心的案例，KWRU 成員間的互助，除了資源、資訊或是實質上的協助外，組織成員間建立起的連帶更大的特點是情感支持。這樣的特點，或許與成員組成有關，由於彼此都具有相同的經歷或社會處境，因此更能夠給予當下不穩定情況的建議。這也如同 Koch et al. (2020) 文中的受訪者說到的，在團體裡重要的並不是經濟面向受到多大的改善，而是在沮喪時給予鼓勵與支持 (p.816)。

組織本身作為資源的集中處，本就能夠給予成員許多的資源，這些非營利組織串連起社區內的其他托兒中心、教堂、醫療診所等，形成一個資訊流通的互助網絡，讓資源更快速且便利地流通。例如 Small (2009) 呈現了對於成員有益的資訊會透過佈告欄、活動、會議被傳遞，提供母親們更多元的資訊與資源，連接了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關聯，母親能夠從組織得到育兒資訊、服務、物質資源。臺灣的無家者研究中，也顯現非營利組織能夠提供物質資源 (王悅 2020；余慧玲 2019)。在住房優先 (housing first) 的浪潮之下，社福組織會先提供短中期的住所，並在這些住宿據點裡穩定無家者的身心狀況與工作狀態，進而以離開據點、租屋為最終目標。這些非營利組織的出現，不僅能提升貧窮者的公民意識、賦權貧窮者 (Satio 2012, Mazelis 2017)，也改變過去以公部門、國家為主的貧窮救助模式，彌補了國家角色的不足 (Marwell 2004)。非營利組織內的成員比起向外人求助，向組織內同樣處境的人求助較不會感受到尊嚴的喪失 (Koch et al. 2020)。而且組織透過培力、聚會、活動，讓成員認知到生活困難並不是尷尬的個人問題，而與整個社會結構有關，因此不需要為了自己的求助感到丟臉、不好意思。這些非營利組織的出現，也代表著公民團體的力量介入了原先對於都市貧窮議題的理解 (Satio 2012, Mazelis 2017)。

#### (四) 組織對於社會連帶產生的限制：道德牽制、尊嚴弱化

底層弱勢服務體系裡，「道德」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從巨觀的國家法律層次及社會意識形態來看，什麼樣的人符合社會福利的救助資格，到微觀的助人實作層次，什麼樣的人更容易受到協助。這些判准都牽涉到了當代理解貧窮的方式。臺灣無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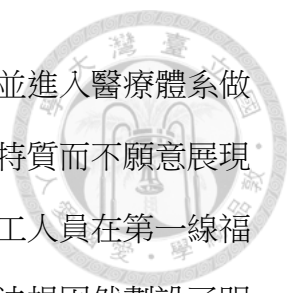




者社會福利救助體系的發展，一直隱含著家庭邏輯與工作倫理，唯有在家庭照顧責任及個人工作能力受損後，社會福利體系才會現身，並扮演殘補性的角色（高召恩 2003）。福利服務的道德判准不僅落實在工作者選擇誰來協助、如何協助，也影響到了接受服務者的自我認同及尊嚴。接下來，我們將分點說明社會福利組織對社會連帶可能產生的負面中介作用。其一，社會福利的實作造成有些人被社會福利體系排除。其二，組織成員內化救助體系的道德標準，阻礙群體互助的形成及降低了福利體系的效用。

首先，社福機構的救助很大程度仰賴社工人員的道德實作，這些實作使得組織與成員之間的連帶雖然存在，卻難以實質發揮效用。在社會連帶的研究裡，時常視社會連帶為均值的社會資源傳遞管道，彷彿社會連帶一但建立，必然會產生資源的交換與傳遞，社會連帶就如同暢行無阻的管道。然而從制度面著手的貧窮研究出發，便可以發現資源的傳遞會受到文化規範、意識形態所影響。尤其是看起來宛如機器、公平無私的社會福利制度，在社工人員的實務操作上卻帶有許多個人的判斷（洪伯勳 2016）。將組織視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的理解方式，易忽略組織是由其中的工作者組合起來的一個實體，而未注意到其中的多樣性。

Hasenfeld（2000）質疑 DiMaggio & Powell 鐵牢籠概念，他認為福利制度中的道德判准並不會在整個福利體系中上下一致，而應該考察這些道德標準的文化、政治與經濟的脈絡性，進而才能理解道德預設（moral assumption）被執行的方式。它將整個福利體系分為四層，分別是國家層次的利益團體、當地社區、組織與工作者個人，並發現單親媽媽的福利身份取得，在後兩個層級有執行人員可以操作的空間。Osborne（2019）著墨於後兩個層次的討論，他根據美國非營利組織兩年的田野經驗，發現為無家者設計的住房計畫（Opening Doors Plan），在資格篩選上很大程度仰賴非營利組織對於「合格」的無家者的判斷標準。有一些具備特質但是缺乏文件的個案（例如未經醫生診斷的精神疾病者），社工藉由協助個案取得文件，讓他們能獲得證明。另一些未具備特質也缺乏文件但是「有潛力者」（例如有輕微身心狀



況者、酒癮者)，社工則會希望他們在體制前展現脆弱的一面，並進入醫療體系做診斷，「成為」足夠脆弱的人。在這樣的工作方式下，因為陽剛特質而不願意展現脆弱一面的男性藍領工人，往往成為無法獲得計畫補助的人。社工人員在第一線福利判准上握有裁量權，自然就影響到了受助者獲得的資源多寡。法規固然劃設了明定的標準，但是更重要的是文化邏輯在其中如何運作，工作者如何動用這些文化邏輯，創造出可以吻合資格的受助者。


回到臺灣，在國家的法律政策上，無家者服務制度蘊含強烈的家庭責任與工作倫理，其中影響最深刻的兩個制度便是「戶籍制度」與「就業培力方案」。無論是無家者的處置方式或是福利身份的申請，戶籍是一個重要的依據。如果戶籍地在無家者的所在地，那社工人員便能夠替他們申請福利身份、領取中低收補助，能夠讓無家者的生活好過一些；如果戶籍地並不在無家者的所在地，那制度規範傾向於先將他送回戶籍所在地，再由當地政府進行後續的處理（高召恩 2003）。戶籍制度的運作邏輯一方面為人口控管，一方面為了落實家庭照顧責任。在國家政策的制度邏輯內，家庭是照顧個人的最小單位，因此家庭應該要避免讓一個人流落街頭。若家庭無法負擔起照顧責任，國家才會扮演起殘補式的角色，介入治理這樣的人口。女性因應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福利體系對女性無家者的預設是「沒有了當家的男人，女性必然弱勢」，因此在社會福利資源的取得上，需要回應較多的制度上的審視，卻也比較容易獲得資源（吳瑾嫻 1999；高召恩 2003）。且女性相對男性，有更多對於隱私、居住地的需求，因此容易住進收容所，有較高的脫遊機率（吳瑾嫻 1999）。另外一個制度邏輯是工作倫理。國家的法律邏輯上並不允許人能夠不工作、不表現想要生存的慾望，就能夠拿到福利身份。在整個無家者的處遇方式上，都相當鼓勵（或是強迫）無家者返回就業市場，藉由穩定工作賺取收入，重返租屋市場、脫離街頭（高召恩 2003；郭盈靖 2007）。讓無家者穩定就業、獲得收入、租屋脫離街頭，是無家者服務工作的常態途徑。這樣的道德判准既是以身體能力好壞、精神狀態作為評斷，也會牽涉到對於無家者性格的評價。在這樣的判準裡，較不具備工作能力

者、年老無法工作者，也成為社工眼裡更需要協助的人們，換言之是真正具有福利身份的人（郭慧明 2004；江睿之 2011）。

正因為上述的文化邏輯，使得社福體系的受助者雖然都與社工、組織有建立起連帶，但卻不一定能夠實質地從連帶中獲得資源。文化邏輯區別了道德上值得受助與較不值得受助的兩群人（Katz 2013; Hughes 2019），這樣的區分訴諸了道德邏輯，認為值得幫助的窮人應是那些身體具有殘缺、女性、老人、孩童等「弱勢者」，反之面臨失業、產業轉型等經濟型問題者，相對地不值得獲得福利身份。後者這群人，雖然不容易獲得福利身份，但卻被認為是容易協助的對象，福利單位替他們媒合就業機會，期待他們能夠快速地重返社會。這種實作上的反效果也被稱之為 **creaming practices**，實作人員傾向服務已經準備好就業的人，而以那些有就業障礙的人為代價（Soss et al 2011）。

其二，這些文化邏輯區別了道德上值得受助與較不值得受助的兩群人，而受助的人們也會內化這樣的價值觀，進行道德劃界，分隔出群體內值得受助的可憐人，以及不值得受助、應該靠自己生活的人。這樣的界線一方面將受助描繪成失能且有損尊嚴的行為，阻止了部分的人們尋求協助；一方面在群體之間有差異的獲得協助，也帶來了群體內部的分隔。Kissane（2012）透過「道德經濟」的概念，討論貧窮母親使用非營利組織資源時的考慮過程。她們劃定了一群濫用資源的人（儘管從未能指證是誰濫用了資源），以及沒有濫用資源的自己。她們並不會積極地去使用非營利組織的資源，因為她們認為要將非營利組織有限的資源，留給更需要的人。然而在她們認為緊急時刻要求助時，卻有遭到社工人員不協助的情形，她們認為是那些濫用資源的人用盡了資源，才讓社工人員無法協助她們。因為在非營利組織得到不被尊重的經驗，讓部分的母親遠離的非營利組織，而更難以受到福利體系的協助。


在臺灣無家者的服務現場，同樣有類似的行為與態度。社工與福利系統的資源，是無家者考慮是否接受福利體系加諸在自己身上限制的原因。有些無家者可以堅持骨氣不享受資源，但也可以陪著笑臉，贏得社工員的青睞（郭慧明 2004）。無家



者之間會以身體健康、工作狀態或是社會道德來區分彼此，有工作的無家者，相當自豪自己有工作能力可以養活自己，區隔出自己和身心狀態較差的人之間的差異。儘管認知他們是「身心狀況較差的人」，卻未必認可身體較弱的、無工作能力的人獲得福利資源的正當性(吳秀琪 1995)。其他文獻則是提到了社福從業人員透過收編貧窮者，來達到資源的有效分配，例如黃克先(2021b)提到，被收編的無家者常與社工面談並能拿到補助或資源，這種差別形成無家者間的人際衝突或嫌隙，拿不到的人視拿得到的人為攀附社工的小人或打小報告的線民，一些無家者認定是社工刻意刁難或自己不願討好社工導致。在這樣的分化之下，無家者彼此之間在資源爭奪下產生間隙，同時被鼓勵以自利而非互助的方式求生存，使得無家者難以形成一個團結穩定的群體。Headworth(2019)以美國福利機構體系調查個案的福利詐欺行為中發現，調查員會收編個案的人際網絡，以獲取個案日常生活中的資訊，來證實個案的福利詐欺行為。這些這樣的介入與收編的方式，破壞了原先強連帶網絡(如鄰居、朋友、家人)的忠誠性，或是加深了弱連帶(如地主、房東、老闆)與個案間的社經地位、道德分化。

## (五) 小結


在文獻回顧裡，我先回顧無家者的社會世界，並說明底層弱勢者的社會連帶有下列幾個特點：第一，他們的社會網絡並不大，而且網絡中的成員多是親屬或是相同社經地位的人們，這降低了他們對外連結的機會。第二，他們生活的環境讓他們對他人抱持著高度的不信任，這也影響到了他們與其他人建立連帶的想法，及他們使用社會連帶的方式。這樣的特徵彰顯了後續討論的重要性，即非營利組織的資源進駐對於他們生存而言是重要的，而研究者必須去檢視非營利組織的效果。我將非營利組織對無家者社會連帶的影響分成兩部分討論。首先是組織帶來的社會連帶正面效果，這些效果可以分為下列幾個：第一，組織協助成員建立起連帶、相互協助，形成成員間的社會網絡。第二，組織帶來的物質資源與資訊。第三，賦權貧窮者，倡議貧窮議題。不過上述的觀點採取將組織視為一個整體的理解方式，而未能



注意到非營利組織的救助很大程度仰賴社工人員的實作。社工人員未必會貫徹組織的規範與目標，而造成上述幾個效果未能完全執行。因此我接著討論組織帶來的社會連帶負面效果，例如機構工作者的社會福利實作造成有些人被社會福利體系排除，以及組織成員內化救助體系的道德標準，阻礙群體互助的形成及降低了福利體系的效用。非營利組織在協助成員建立起社會連帶，或是修補成員對於他人的信任感時，工作者並不是作為一個中立、理性的角色，而是有自身的價值觀判斷、實作策略，讓其變成一個複雜且動態的過程。

貧窮者的社會網絡雖然已經有豐富的討論與材料，但是組織如何影響貧窮者的社會網絡卻還沒有相對足夠的內容來分析與討論，尤其是在特定的社會福利政策底貧窮者的社會網絡會造成何種變化更未被檢視。重修舊好作為特殊的社會福利組織，它有意識地建立無家者的社會連帶，可能產生與先前研究相異的連帶結果。先前研究的田野地並不是刻意地建立貧窮者間的互助網絡，因此研究者可以觀察組織作為一個中立的橋樑如何創造與強化成員間的連結。然而，這樣的結果是否在特定的服務工作目的下產生變化，是本文欲探討的特殊性之一。

重修舊好的特殊性在於，它直接介入欲打造無家者的社會連帶，而組織可以直接塑造行動者的社會連帶嗎？它最後造成的結果是什麼？我認為透過本研究，可以突破先前研究兩點不足之處。其一，先前的研究沒有處理到「組織」形塑「關係內涵」的動態過程。既有研究將組織強化社會連帶視為給定的條件，未說明其中的過程、調適與衝突。先前的文獻似乎預設了人們進入到組織，便能夠從組織建立連帶。然而，行動者在組織內建立連帶的過程不應被假定成必然的狀態，納入權力關係的視角，應看見其中排除與容納的過程。其二，未能檢視組織連帶的效果範圍。組織連帶在脫離組織後是否仍然有效？這是一個尚未被檢驗的命題。換言之，若組織連帶在脫離組織後，未必能轉換成可用的個人社會連帶，那麼組織的中介功能將會大幅降低。若要協助貧窮者脫離貧窮狀態，密集設立社區內的組織將不會是唯一的工作，而應該探究如何讓這些連帶得以持續維持。



綜合上述，本文將採取與先前研究不同的分析視角，不欲將組織假定成中立客觀的機制，而將組織內的權力關係納入討論，看見社會連帶的建立過程、行動者的調適方式以及內在的衝突。本文認為討論社會連帶在組織內建立的機制與條件是重要的，它能夠促進我們對於貧窮者社會連帶建立過程與阻礙的認識。再者，本文欲討論組織連帶在組織外的效果，以檢視組織作為緩解社會孤立的方式能否有效達成目的。


### 第三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民族誌方法進行，我進入重修舊好並成為田野中的一員，了解田野中無家者與工作者的互動邏輯、場域中的社會關係。研究方法將分成個案選擇與研究方法兩個小節，分別介紹我為什麼選擇研究重修舊好以及我如何參與其中。

#### （一）田野地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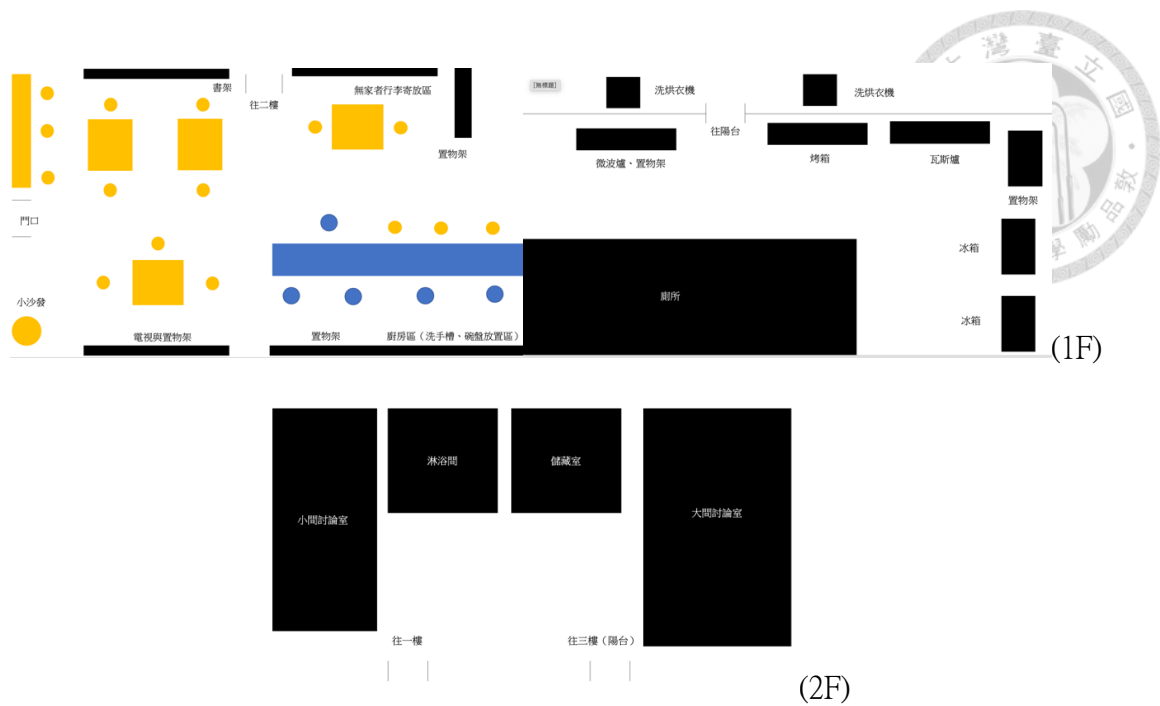
我選擇人生百味下重修舊好作為田野地，因為重修舊好是第一個欲處理人際關係的無家者服務空間，這個空間並不像其他機構是為了無家者的基本需求（例如短期據點、公共衛浴等）設立。重修舊好認為除了生存的基本需求之外，人際關係也是無家者生存的必要條件之一。這個觀點與我想要討論的社會連帶議題不謀而合，這樣的切入點在服務無家者的組織之中也相當獨特。工作者在這個空間開創了新的互動方式，讓無家者得以拋開過去的相處經驗，以新的角度重新認識彼此。

重修舊好是近年來新型態無家議題工作方式的其中一環。北部地區的無家者服務與倡議團體並不少，大概可以歸類為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公部門、公辦民營單位、慈善團體（基金會）與宗教團體幾個類型。而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相比其他團體，特殊之處有三。其一，對於貧窮與無家議題的認識，並不是以「可憐人」的角度切入，而是將他們視為立體化的個人，重視他們的主體性，並關注有哪些結構因素與社會條件，導致他們無家（黃克先 2019；江睿之 2011；許哲韡 2019）。其二，在直接服務之外，這些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也進行大量的倡議工作，透過



網路傳播、媒體合作或是實體活動、出版物等方式，讓社會大眾了解無家者的故事、他們所面臨到的困境與難題。同時，他們也更積極地嘗試其他的服務辦法，例如住宿據點、工作培力、創立社區空間、藝術創作等等。這些與過去慈善和宗教團體，以發放餐食、金錢、衣物、物資為主的服務方式有很大的不一樣，更重視如何讓無家者自立。其三，由於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主要著力的服務項目，需要耗費較多的人力與時間才能夠進行，他們的社工比相對較低，通常一位社工處理的個案數量不超過十位，相比於公部門的百位少了非常多。從公部門及公辦民營的據點、慈善與宗教團體到非營利組織，服務人數層層降低，也有可能經歷一系列的篩選，而進到了這些地方。

接下來我想補充重修舊好的一些概況。重修舊好曾服務的個案約有 70-80 位，但是實際上較深入服務，會至重修舊好休息、洗衣洗澡的個案約為 30-40 位。重修舊好大約有 16 個座位（見圖一），疫情前每日會有 10 到 14 位左右的無家者前來休息、等待洗澡、用餐等。疫情後因為室內空間的管制措施，改採排班制的方式每個時段約容納 12 位左右的無家者。最初這個據點是以女性無家者為主要的服務對象，個案來源是由工作者至街上外展、探訪為主，後來有些無家者自行前來求援，或是由其他單位轉介至此，慢慢形成現在的個案組合。在田野期間，重修舊好的無家者服務組成有些許的變動，尤其在疫情期間因為據點不開放休息（但仍開放洗衣洗澡烘衣等服務），漸漸有些無家者便不前來重修舊好，即便後來疫情好轉後重新開放空間，但有些無家者已經沒有了前來這裡的習慣。重修舊好提供無家者維持日常生活所需的服務外，也連結到人生百味的其他專案——「萬事屋」工作媒合專案、「百味家屋」短期據點方案。這些方案是人生百味在服務的過程裡，慢慢發現無家者的其他生活需求而主動開發，或是有外界資源前來邀請合作而被動開發。在這樣的發展之下，人生百味現逐漸有規模地開展出無家者不同面向、不同階段的服務。



圖表 一、重修舊好空間平面圖

(作者繪圖；藍色為工作者座位、黃色為無家者座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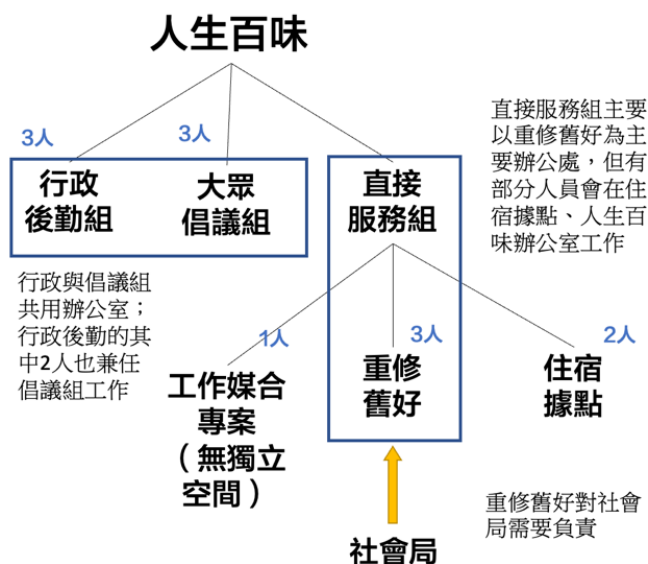
圖表 二、重修舊好空間實景

(圖片來源：羅靖茹攝)

在我的田野期間，人生百味總共有 12 正職工作者，並且每年都有 4 位實習生與數位志工。實習生會長期支援專案，志工則在活動現場才會出現。正職人員當中有 6 位工作者擔任直接服務組，從事直接服務工作因此會第一線面對到無家者。其中負責重修舊好的工作者有 3 位，負責短期據點的工作者有 2 位，負責工作媒



合專案有 1 位（見圖三）。雖然工作者看起來有不同主責的專案，但是工作者基本上是流通的，相互支援專案的進行，服務的個案也有可能同時出現在不同專案內。對於服務的個案而言，他們有認知到這些專案都屬於人生百味下的專案，且這些服務都從重修舊好開展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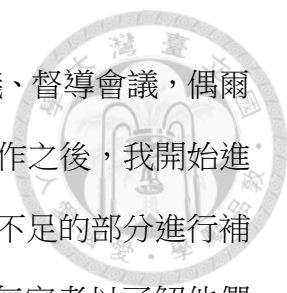


圖表 三、田野期間人生百味組織架構  
(作者繪圖)

## (二) 研究方法

我的田野期間從 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 2 月，總共 20 個月。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包含田野觀察與深度訪談。本研究關切的不僅是促使連帶建立的資源，還包含建立連帶的動態過程。連帶並不是一種靜態的存在，而是一種動態的關係，因此有可能歷經建立、維持，也有可能崩解、重組。如若單採用質性訪談的方式，所得到的資料將只是受訪者片面、回溯對於事情的理解，而可能忽略該社會情境下的其他因素，因此我採用兩種方法合併適用的方式進行。

首先，我在重修舊好進行為期約兩年的田野觀察。我的田野工作主要但不包括重修舊好的田野觀察、庶務協助、團體及社區活動支援，另外我也參與重修舊好的「萬事屋零工專案」陪伴無家者從事零工、和他們一起討論工作內容、訪談他們對



於零工工作的看法、一起出遊。我會參與重修舊好的工作者會議、督導會議，偶爾也會和工作者一同進行外展。其次，在 2022 年 2 月結束田野工作之後，我開始進行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分析。而在 2023 年 3 月，我針對研究材料不足的部分進行補充式的深度訪談。我訪談了三位離開或是曾經離開重修舊好的無家者以了解他們後續的生活狀況，這些訪談或在無家者的私人住處、當時的工作單位或是重修舊好進行訪談，訪談時間約一小時至兩小時不等。另外我也訪談台北市社會局社工科的科長，以了解北市府對於重修舊好空間的看法。

2020 年 5 月我以人生百味實習生的身份進入重修舊好。在實習生的面試時，我就已經向人生百味表明自己的研究目的，在田野期間也曾多次向無家者們說明我的來歷。在重修舊好的討論場合，我再次向所有出席的無家者說明我的研究身份與研究目的，並確實告訴他們我在重修舊好內的觀察都有可能成為我的研究材料，徵求他們的同意。在那次說明後，除了一位無家者明確表示不願意參與本研究之外，其他無家者都表示同意。身為實習生，我除了自己的田野工作之外，我也會配合實習專案，負責人生百味其他的專案內容。在這段期間，我每週約進行田野工作 10 個小時。在 2021 年 2 月後轉以專案合作為期兩個月的兼職人員，每週約有 16 小時至重修舊好排班，主要工作內容限縮至重修舊好與萬事屋零工專案兩者。最後，2021 年 4 月再改以志工的身份持續在人生百味。工作者將我認知為工作夥伴，且允許我參與更多工作者的內部會議，也會邀請我參與工作者的娛樂性聚會，並且鼓勵我參與我有興趣的專案。在 2021 年 5 月至 10 月，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暫停實體田野工作，改以線上的方式持續進行田野工作。2021 年 10 月疫情好轉後，再度重回田野工作。

本研究涉及的田野材料，包含我於重修舊好的田野觀察紀錄、陪伴無家者外出工作時的觀察紀錄、訪談無家者的訪談內容、參與重修舊好的會議紀錄及督導會議。這些田野材料部分是我當場撰寫，部分是當場進行簡單記錄、回家後在撰寫而成。本研究的田野紀錄材料，人名全數更換成匿名方式揭露。在田野的現場，我多數時



候選擇浸淫於當下所處的環境之中，例如我會協助重修舊好當下需要協助的事宜，我也會在工作者的內部會議發表想法。換言之，我並不是單純被動地觀察者，而是試著讓自己成為觀察現場中的一員。然而，為了確保在研究寫作時，能夠客體化我所得的研究材料，我會盡可能地將田野現場、會議當下的字字句句記錄下來，並且在事後重新分析，脫離田野當下的環境，改以相對客觀、有距離的方式重新理解田野所發生的事情。

### (三) 研究對象

我統整出田野期間頻繁出現的 33 位無家者作為主要的田野對象（見表一），其中 20 位為男性，13 位為女性。年紀從 20 多歲至 70 歲，平均約落在 45 歲左右，相較於生活在街頭的無家者，整體年紀偏輕。（李盈姿 2019）33 位無家者之中，女性無家者多有身心狀態不穩定的情況，或有經過醫學證明，或因為無家者本身不願意就醫而未能證實。在全部 33 位的無家者雖有 16 名無家者具有身心狀況，但這之中僅有 9 位領有福利補助（含身心障礙、中低收等）。在 33 位無家者之外，我也列出了田野中出現且在論文中出現的 10 位正職工作者、1 位督導以及 1 位實習生（見表二）。這些工作者同樣是我田野的研究對象。

	名稱	性別	年齡	身心狀態	居住地點	生存方式
1	木木	男	約 50	無	露宿	穩定零工、萬事屋
2	方哥	男	約 60	無	租屋	穩定零工、服務業
3	阿明	男	約 30	無	網咖、租屋	萬事屋、正職服務業→ 萬事屋、穩定零工
4	大元	男	約 30	無	據點、網咖、 租屋	萬事屋、正職服務業→ 萬事屋、穩定零工
5	小 K	男	約 20	無	露宿、網咖、 住宿據點	萬事屋→正職服務業 →無
6	眼鏡仔	男	約 30	無	住宿據點→ 租屋	萬事屋→約聘工作
7	力翔	男	約 30	無	據點	萬事屋→穩定零工
8	小包	男	約 40	無	網咖	萬事屋、零工

9	福福	男	約 40	無	露宿→租屋	家人救濟、零工
10	小黑	男	約 40	智能障礙	露宿→住宿 據點→租屋	零工、舉牌
11	藍弟	男	約 40	智能障礙	露宿→住宿 據點	福利補助金
12	均均	男	約 40	智能障礙	露宿→住宿 據點→租屋	零工、舉牌
13	阿岳	男	約 50	無	露宿	穩定零工
14	龍龍	男	約 70	認知障礙	露宿	福利補助金
15	青伯	男	約 60	認知障礙	露宿→租屋	福利補助金
16	小令	男	約 30	精神障礙	露宿	福利補助金、機構資源
17	程哥	男	約 50	疑似精神 狀況	露宿	零工
18	大光	男	約 50	無	露宿	零工
19	劉哥	男	約 50	無	露宿	不穩定零工
20	明仔	男	約 50	無	露宿	不穩定
21	合合	女	約 50	精神障礙	露宿（曾短 暫住過機 構）	零工
22	田田	女	約 50	精神障礙	露宿	以工代賑→無
23	梅姊	女	約 60	無	露宿	社區派工→無
24	秋秋	女	約 60	無	露宿	福利與存款維生
25	小花	女	約 50	疑似精神 狀況	露宿	靠物資維生
26	小欣	女	約 40	疑似精神 狀況	露宿	回收
27	鍾姊	女	約 60	疑似精神 狀況	露宿→租屋 →露宿	福利與存款維生
28	阿青	女	約 50	無	露宿→旅館	非典型勞動
29	境姊	女	約 60	無	露宿	福利與存款維生
30	凱蒂	女	約 40	疑似精神 狀況	露宿→租屋	零工
31	軒秀	女	約 50	精神障礙	露宿	社區派工、零工
32	大美	女	約 30	精神障礙	露宿	零工
33	簡姨	女	約 50	疑似精神 狀況	露宿	無

表格 一、研究對象之無家者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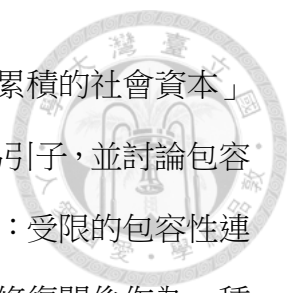


	名稱	性別	年齡	組別／職位
1	成茂	男	約 30	倡議、後勤
2	方琳	女	約 30	倡議、後勤
3	孟穎	女	約 25	倡議
4	卷卷	女	約 25	倡議
5	潘敏	女	約 25	直接服務
6	昱琪	女	約 25	直接服務
7	芷寧	女	約 25	直接服務
8	阿童	女	約 25	直接服務
9	雨橙	女	約 30	直接服務
10	照彥	男	約 30	直接服務
11	嘉宇	男	約 30	督導
12	天天	女	約 30	實習生

表格 二、研究對象之工作者列表

#### 第四節、章節安排

本文分為六個章節。第一章〈緒論〉提出我的研究問題「社會福利組織作為一個外力介入社會連帶的建立，如何影響無家者的社會關係？」，並且說明我採用的研究取徑以及研究方法，欲將重修舊好放置在貧窮者的組織連帶內討論，將社會連帶拆解成社會規範與社會資本兩個層面進行討論。第二章至第五章為正文分析。第二章〈從生存到生活：重修舊好的社會制度背景〉分析重修舊好是在何種社會制度背景下設立修復關係的社會工作目的，以及他們預計如何建立無家者的社會連帶。第三章〈包容性連帶：重修舊好連帶的內涵〉，我將重修舊好欲建立的社會連帶概念化為「包容性連帶」，並在本章定義其內涵，說明它建立何種社會規範以及帶來哪些資源。第四章〈衝突、調適與回應：包容性連帶的阻礙〉，本章以「社會規範」層面討論包容性連帶。將焦點轉向無家者，討論包容性連帶矛盾衝突之處，以及在這個衝突下，行動者如何調適與回應。本章說明了包容性連帶因為工作者與無家者對社會福利體制的功能、合格受助者的想像有所衝突，因此在包容性連帶建立上會



遇到阻礙。第五章〈限於機構之內：包容性連帶的效果〉以「可累積的社會資本」層面討論包容性連帶。該章以無家者離開重修舊好後的生活作為引子，並討論包容性連帶對於無家者的實質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第六章〈結論：受限的包容性連帶〉，我綜合性地闡述我對於研究問題的回答，並且說明我對於修復關係作為一種無家者社會工作目的的討論。



## 第二章、從生存到生活：重修舊好的社會制度背景

2021 年 5 月臺灣疫情爆發，突發的防疫規範升級，造成生活在街上的人們諸多不便。臺北市社會局遊民專責小組、萬華中正地區兩個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芒草心、人生百味以及其他在地商家迅速組成一個無家者疫情資源網，向群眾募資獲得資源，並透過每週二到三次發放物資、協助無家者施打疫苗，讓無家者受到疫情的衝擊力道降到最低（黃怡菁 2021）。這樣的措舉讓社會大眾見識到萬華地區非營利組織的協作能力，也呈現了臺北市無家者服務組織網絡已經成熟。

上述能夠掀起社會輿論、發揮社會影響力籌措資源的無家者服務網絡在 2010 年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成立後才逐漸形成。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的興起受到兩股力量的作用：其一是從進步的人權觀點發展出的創新無家者服務方法，新型態的無家者服務組織採用隱含社會包容、社區照顧、受助者主體意識提升等概念的工作方式，展開新型態的福利服務。這種社會工作方式以及看待社會弱勢者的視角，與近年來在全球化浪潮下多元文化、包容社會等概念的興起有關；其二是福利體系民營化的修正浪潮，在 1990 年代臺灣福利體系民營化之後，國家大幅度仰賴民間單位提供福利服務，奠基了非營利組織與公部門合作的福利體制基礎。而在 2010 年左右，臺灣福利運動建制化的過程開始遭受批評，包含過度講求效率以及關鍵績效指標的達成率，國家將福利服務責任推諉到民間團體等。這些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在福利體系民營化浪潮底下與公部門合作，但也企圖修正過往社會福利委外產生的問題。

本章將說明上述兩股力量，並鋪墊出重修舊好成立的制度背景，以回答「**為什麼重修舊好要介入無家者的社會連帶修復？如何修復？**」重修舊好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中出現，而這些制度力量雖然帶來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的可能，卻也回過頭造成了該福利方式的限制。本章以三個小節組成，以時間為軸線：第一節〈無家者福利體制的演變〉簡述臺灣無家者福利體制的演變；第二節〈影響新型態無家議題工作的兩股力量〉論述社會包容、福利民營化浪潮兩股社會制度性的力量如何支持新型



態無家議題工作，同時帶來限制；第三節〈重修舊好〉說明重修舊好的成立背景與工作方式並提供該組織的基本資訊。

## 第一節、 無家者福利體制的演變

藉由歷史性爬梳無家者福利體制的演變，我們能夠得知重修舊好修復關係的特殊性是在哪些體制演變下堆疊、演變而成。臺灣非營利部門歷經兩次的轉變，第一次轉型乃從解嚴前的慈善救濟為主的發展方向，轉變成解嚴後百家爭鳴的局面；第二次是 2000 年以降，臺灣非營利部門在組織運作上朝向更為制度化的建構過程（官有垣、杜承嶸 2011）。臺灣無家者福利體制與這兩次轉型的走向相符。在 2010 年以前臺灣無家者福利服務以公部門與宗教團體合作為主，而在 2010 年以後則出現制度化的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公部門始與這些組織合作，並形成當前主要的無家者服務網絡。本節將按照這個時序，分成 1990-2010 年以及 2010 年以後兩個階段來說明無家者服務網絡的變化。

### （一） 1991 年-2010 年：公部門無家者福利體制的演變

第一部分將說明 1991 年至 2010 年以公部門社會局為主要服務單位，宗教慈善團體作為民間協力單位的服務時期。這段時期從 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開始，無家者治理由警政轉為社政單位負責，至 2010 年臺北開始出現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sup>4</sup>。

1949 年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主要以 1950 年頒訂的《台灣省取締散兵遊民辦法》來管理遊民，由於這個時期臺灣仍是戰爭動亂的情況，國民黨政府制定散兵遊民辦法的目的是為了軍事取向、更有效管理在台人口，以及統整在台兵力。該項法令在 1968 年修正成為《臺灣省取締遊民辦法》，法律規定的遊民從五類人口變成四類，去除掉其中「流落在外之散逃官兵，未經通緝有案者」。1973 年臺北市訂定《臺北

---

<sup>4</sup> 這部分若涉及到法律條文與特定文獻，將以法律與文獻採用的「遊民」來稱呼無家者這個群體。






市取締遊民辦法》，為當時臺北市執行遊民業務法規依據。該條文所指稱的遊民不再以散兵遊民、逃兵為對象而是居無定所者。惟凡經通報或查證之遊民，警察單位會先行偵訊調查，查察有無犯罪行為，若確無犯罪情事且設籍北市或查無戶籍者，再送至遊民收容所（劉淑雲 2010）。

臺灣治理無家者的重大變革，起始於 1990 年代臺灣經濟環境的動盪時期，同時也是社會福利的黃金十年。自進入 1980 年代，臺灣的經濟、社會、政治及對中國大陸的關係均發生重大變化，臺灣經濟漸漸由管制與保護轉變為開放與自由化。1980 年代是臺灣產業結構變動最大的年代，勞力密集產業不再是產業的主流，而技術密集及資本密集產業逐漸取而代之（陳大衛 2000）。製造業全球分工帶來的產地移轉，具有「需求密集勞力、專注外銷、易製造污染、原料仰賴進口、設於都市發展地區」幾種特性的產業大量外移（徐正光 1991），關廠事件頻仍並移除了工作機會，「黑手變頭家」中小企業逐漸沒落，失業者必須自行尋求轉業出路，伴隨著大量的中年失業現象（許哲韡 2019）。因為經濟環境變化而產生的貧窮人口，成為國家需要推動社會福利的壓力。

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隨後 1992 年廢除了「違警罰法」以及「戶警合一」制度，警察治理遊民的正當性因此消除，遊民治理業務自 1991 年 10 月起正式交由社會局管理（劉淑雲 2010）。另一方面，社會福利制度黃金十年設立了許多社會福利法規，包含 1994 年《全民健康保險法》、1997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及《社會工作師法》立法、1998 年《社會救助法》修法，1999 年推動《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盈餘成為中央政府統籌分配的社會福利來源（許哲韡 2019）。臺北市政府在 1994 年實施《臺北市遊民輔導辦法》規定對於有工作能力或有工作意願的遊民，施予職業重建或工作輔導，並採取救助方式辦理。該法規更在 1999 年重新修訂，限縮遊民之定義，將原先所稱之行乞、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障礙者歸屬於個人身心狀況或匱乏狀態納入社會秩序維護法規範處理，而遊民指涉於街頭戶公共場所棲宿而有收容輔導之必要者（劉淑雲 2010）。從上述法令條文的修訂過程可見，



國家對於遊民之定義越來越清楚，將原先應屬於軍事方管理之散兵移除在法條外、身心障礙者另訂《身心障礙保護法》，並以《社會秩序維護法》規範。在 1997 年修正、2000 年公佈的《社會救助法》第 17 條中，確立了遊民的地方治理。該法條內容如下：

1. 警察機關發現無家可歸之遊民，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通知社政機關（單位）共同處理，並查明其身分及協助護送前往社會救助機構或社會福利機構安置輔導；其身分經查明者，立即通知其家屬。不願接受安置者，予以列冊並提供社會福利相關資訊。
2. 有關遊民之安置及輔導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潘淑滿（2009）認為，這是遊民福利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去中央化／分散化」的濫觴。即便《社會救助法》在 2010 年再次修正，增加「為強化遊民之安置及輔導功能，應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並結合警政、衛政、社政、民政、法務及勞政機關（單位），建立遊民安置輔導體系，並定期召開遊民輔導聯繫會報。」仍未出現中央統合的治理模式，導致無家者的社會福利出現邊緣化的情況，而且始終未能脫離社會福利範疇，改以居住問題、都市化的角度思考。

隨著 1997 年《社會救助法》的修訂，臺北市社會局對於轄內無家者的治理，有著近一步的發展。1997 年臺北市社工室於轄下萬華社會福利中心聘請了第一位專責遊民外展的約聘社工（許哲韡 2019）。這是首次政府單位正式將無家者納入其工作業務之中。2003 年 SARS 爆發之時，萬華地區成為重災區，和平醫院與仁濟醫院爆發院內感染，無家者更成為眾矢之的，被認為是病毒帶原者。因為一名女遊民感染 SARS，台北市政府規定所有的遊民要統一戴上口罩，甚至有人建議將所有遊民強制隔離，這是把單一個案普遍化為對整個群體的違反人權的措施（藍佩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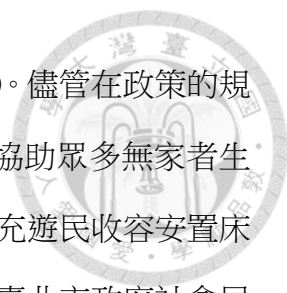
2003)。SARS 的事件大大地提高了無家者議題的曝光度，萬華社福中心將遊民外展社工增為兩人。

由於無家者的關注度提高，政府在無家者的服務上也有進展。2003 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藉由公益彩券盈餘，開始辦理「遊民工作暨生活重建輔導方案」。該方案從 2003 年開始辦理，持續至今，為無家者治理手段之中最核心的方案。遊民工作暨生活重建輔導方案包含四個層面：工作重建方案、生活重建方案、緊急紓困協助、遊民基本生命安全與清潔衛生服務（張獻忠 2009）。工作重建方案旨讓有工作能力則能回到就業市場，其服務項目包含就業準備金、工作初期交通薪資、租屋補助等等；生活重建方案則是針對中高齡、未能順利返回一般就業市場的無家者，提供生活扶助金、安置與收容服務、社區派工工作<sup>5</sup>；緊急紓困協助則包含冬天臨時避寒措施、疾病安置等；遊民基本生命安全與清潔衛生服務則像是盥洗服務站、盥洗用品、個人衣物等實物協助。這四個方案大抵符合政府安置遊民的三階段策略。政府的遊民安置輔導策略主要分為三階段，首先是緊急服務，重點在主動出擊外展，以維護遊民生存權利，提供短期庇護、食物、衣物、急難救助、醫療照顧、盥洗等。其次是過渡服務，重點在提供耗時更長的安置和處遇，以過渡至下一個階段，包括職業訓練和就業轉銜、申請福利身分、心理重建、協助克服藥酒癮問題的身心治療、法務或債務問題的處理等。最後是穩定服務，重點在穩定就業、復歸社區，包括提供永久住處、長期諮商等（黃克先 2021b）。

緊急紓困協助以及遊民基本生命安全與清潔衛生服務，屬於第一個服務階段，都是為了維持無家者的基本生活所需。工作重建與生活重建方案則包含了第二個及第三個階段。從後兩個方案的分流來看，有／無工作能力成為無家者服務的分類標準，隱涉無家者回歸社會的途徑是成為一個勞動力。在工業資本主義興起後，人被以勞動能力區分，身體健全、勞動能力良好的人被放入了工廠，身體障礙者、勞

---


<sup>5</sup> 社區派工是政府安排無家者至公部門主責空間打掃（如學校、政府部門辦公室、里長辦公室、公園、社區街道等），工作內容相較之下輕鬆、不需要耗費太多體力，適合中高齡或是身體功能不健全者。通常一日工作 4 小時，每日領取 500 元，每週工作 5 天。



動能力受損者則被放入了社福機構 (Oliver & Barnes 2021[2012])。儘管在政策的規範上隱含著勞動力的評判，遊民工作暨生活重建輔導方案仍舊協助眾多無家者生活上所需。2008 年推出「辦理遊民夜宿、活動服務方案」，為擴充遊民收容安置床位數與遊民外展服務量，社會局決定與民間單位合作。2009 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成立萬華社福中心遊民專責小組，編制 4 人，負責萬華區及中正區的遊民工作。公部門與慈善單位初期合作，機構包括基督教恩友中心、昌盛基金會、創世基金會、救世軍，恩友中心並配合開設避寒所，此項經費來源為公益彩券基金 (許哲韡 2019)。

1990 年代由於臺灣解嚴，對人民團體的管制鬆綁，臺灣開始出現風起雲湧的非營利組織浪潮。在解嚴之前，多數的非營利組織是宗教慈善團體，並以慈善救濟的方式投入臺灣民間社會，進行實務發放並提供住宿、餐食等服務，主要目的是讓無家者「生存」。由於臺灣對於無家者群體的社會福利關注較晚開始發展，以北市為例直到 2000 年以後臺北市政府才有遊民專責社工，因此在 1990 至 2010 年期間，北市服務無家者的非營利組織仍以宗教慈善團體為主。當時宗教團體的角色是為了提供公部門社會福利體系所無法供給之給付的補充者，同時作為慈善行為代理人，便有了運作空間。(許哲韡 2019) 這樣的合作模式與臺灣福利體制擴張有所關聯。九零年代台灣社會福利法案大幅翻新，政府主則應提供的福利服務項目大幅增加，雖然法令規範政府可自行辦理或委託辦理，各級政府多半選擇委託民間辦理的方式因應這波福利的擴張。(王增勇 2009) 相較於西方的福利民營化是為了提升福利體制效率與截至費用，臺灣福利體制的民營化是政府試圖極小化投入社會福利資源的手段，以解決社會福利需求增加但是政府量能不足之問題。(王增勇 2009；官有垣、杜承嶸 2011) 在無家者服務領域，受限於當時北市遊民社工員額不足，以及政府難以挪用公家單位空間作為遊民收容據點，因此協同具有宗教背景的民間單位以公辦民營的方式開設避寒所來處理遊民收容問題。(許哲韡 2019)

然而，慈善單位側重於緊急服務、短期庇護、急難救助、食物等第一階段之作



為，以確保無家者基本生命安全為主。潘淑滿（2009）提到當時比較積極參與提供服務的民間團體大都來自宗教團體（如：救世軍、撒瑪利亞、聖母聖心會或行德宮）。大多數民間團體對於遊民抱持著強烈負面印象，認為無家可歸都是導因於個人失敗與懶惰，所以大多數民間團體對於提供遊民服務的意願始終不高，使得地方政府一直無法達到培育民間團體及培力的目標。僅有這些宗教團體依憑著信仰觀念裡救濟他人的概念，以及宗教傳統上對於貧者的救濟服務，才有意願投入遊民夜宿方案。


## （二） 2010 年以降：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

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的出現，讓無家議題的工作方向從「生存」帶到了「生活」。在宗教慈善團體依舊視無家者為「需要幫助的可憐人」之下，臺灣社會對於無家者的看法未有激進的變革，甚至在 2011 年發生了議員在艋舺公園潑水的明顯違反人權之舉。從 2010 年代起，順應著臺灣解嚴後逐漸成熟的公民社會開始倡導人權的風氣，以及原先體制內遊民社工對公部門做法的不滿，臺灣社會開始出現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黃克先 2021b；黃克先等 2023）。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成立的當代漂泊協會與芒草心都是體制內社工在體制外成立的組織<sup>6</sup>，這樣的背景也讓後續這兩個組織仍與公部門有或深或淺的合作，也持續影響後續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與公部門的運作模式。當代漂泊協會雖主力以陳情抗議、倡議與政策監督推動議題，但仍在 2015 年申請政府多元就業補助案；芒草心則從 2014 年辦理的第一個專案——自立支援據點（提供無家者住宿服務）就申請臺北市社會局的經費。

這兩個協會雖然在無家議題著力的面向不同，當代漂泊以論述、倡議、抗爭為行動手段，芒草心以社工服務、軟性倡議為主，但是這兩個協會對於無家議題的認識都指向了社會制度面的不足。當代漂泊協會主要關注無家者的勞動權益，指出無家者所從事的非典型勞動薪資過低、工作缺乏保障，才在在導致他們陷入貧窮的困


---

<sup>6</sup> 當代漂泊協會由曾任職救世軍臺北街友服務中心的郭盈靖，與曾任職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的李宛臻成立；芒草心由當時擔任臺北市萬華社福中心遊民社工楊運生及遊民專責小組外展社工張獻忠發起。（許哲韡 2019）



境循環。他們在報導中說明「遊民問題絕對不能只看成是他們的個人問題，而應該理解為社會結構所造成。……國家應該建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讓國民不至於淪落到遊民的處境。我們一般人如果失業沒錢，一開始可能跟朋友借，再不然就是回家靠父母親人，但這群人（遊民）卻完全被排除在這些社會安全網之外」。芒草心協會則是從居住權益著手，一開始聯合東亞四個城市（臺北、首爾、大阪、香港）創立「東亞包容城市工作坊」，將無家者與居住議題扣連，並且結合實務工作與學術討論，希望能夠將各國無家者服務的經驗帶回台灣。芒草心與當代漂泊相同，都指出了社會制度面的不足，只是當代漂泊強烈指責國家應該要做出根本性的改變，才足以解決無家者遇到的困境；芒草心的成員多是公部門社工出身，意識到公部門角色的限制，認為民間團體的功能應該是輔助公部門的方案，因此並不像當代漂泊有如此鮮明的批判政府角色。民間團體看見了無家議題的社會結構層面，認知到即便是身體功能健全的無家者，也有可能是因為失業、產業轉型的勞動市場因素而流落街頭，並非過去所認知的個人惰性，因此服務對象並不侷限在政府認定之遊民，而是更廣義的無家者。在 2016 年芒草心策劃的《無家者》一書，提出「無家者」一詞來代稱英譯 **homeless**，涵括第一類露宿街頭或夜宿營業場所，第二類居住在庇護或收容中心，及第三類居住在惡劣且過度擁擠的租屋或自有空間者的人們，擴充了原先對於「遊民」即露宿街頭者的解釋。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間陸續有多個無家者服務組織出現。除了本文研究對象人生百味之外，另一個組織是「社團法人夢想城鄉營造協會」（下稱夢想城鄉）。夢想城鄉成立於 2014 年由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徐敏雄老師創立。徐敏雄老師從 2008 年便投入萬華社區大學，期間推動融入式課程行動研究，並於 2012 年正式以街友培力為核心的社區營造計畫（葉靜倫 2021）。夢想城鄉的方案雖然看似有高比例的就業取向——木工班、藝術創作班、打擊樂班、在地導覽與體驗活動等，但是其核心宗旨是以建立人與人間的連結為主軸。夢想城鄉的官網提到：



「貧窮」常常不是讓人失去生活動力或完全斷絕人際連結的原因，失去情感的依歸，且無法在失敗後找到家庭或社會的「容身之處」，才是促使一個人失去生活鬥志、流落街頭的主因。因此，要求一個覺得自己失敗的人「不要懶惰」、「應該要更努力」、「存多一點錢」是沒辦法讓人找回生存希望的。然而，當我們只以「經濟上的匱乏」來認識「經濟弱勢者」的需求時，很容易忽視挫折當前，「經濟弱勢者」跟我們是一樣的，在面對人生重大衝擊或失敗後，都需要一個可以展現脆弱但不會被捨棄的安身之處。「情感」和「自我認同」的獨立跟經濟條件一樣，更是「完整」一個人不可或缺的條件」。

在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出現後，公部門合作單位也出現了更多可能，並不像是前一階段僅有宗教慈善團體能擔任民間輔助角色。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切入無家議題的視角，也從宗教慈善團體的慈善救濟模式轉變為處理社會結構性問題，帶來的變革更貼近公部門單位解決無家問題的迫切渴望。2015 年後臺北市遊民服務的公家單位傾向與民間團體合作並開創新的服務方式，來因應柯文哲市府上任後欲達成的績效。根據許哲韡（2019），臺北市前遊專資深成員張獻忠在離職前認為體制內能夠做到的已經到頂了，無法有更多的空間，只能靠民間組織繼續強化。民間組織必須於公部門資源版圖之外造出不同的模式。對公部門而言，近年刻意連結民間組織以創造更多替代性就業機會、並促使民間組織之間、民間組織與社區之連結，就是因為包括遊專在內的社工亦感受到體制內的侷限。2014 年芒草心自立支援中心建立後，公部門也結合自立支援中心進行住宿等服務，2019 年重修舊好成為了台北市政府委推經營的培力站。儘管過去與宗教慈善單位合作的盥洗、供餐、住宿等服務據點猶存，但現今公部門與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的合作更為密切。這樣的變革在於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致力推廣社會工作者面對無家者另類的理解模式，例如每年培力遊民社會工作者的《無家者服務交流工作坊》近年多由新型態無家者

服務組織承辦，並推廣以「無家者」而非「遊民」角度來看待該族群，以及將無家者實務工作從基礎的生存、避寒等，帶動到多元就業方案、住宿與社會關係等內容。

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的出現，讓無家議題的工作方向從「生存」帶到了「生活」。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開始著手處理無家者出現的社會結構如公共空間的使用、居住權的倡導等，也轉換看待無家者的視角，從需要受助的可憐人變成立體並帶有主體性的個人。在這樣的視角轉換之下，多元多樣的無家者故事被呈現出來，促使社會開始思考應該如何納入這群人的生活需求。


## 第二節、 影響新型態無家議題工作的兩股力量

新型態無家議題工作的出現，雖有本土的制度原因，但是倡議人權風氣以及重視多元包容的價值是鑲嵌在更廣大的全球背景之下的結果。本節以社會包容與社福體制民營化兩個層面，說明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出現的社會背景。其一為社會包容的角度帶來看待貧窮者視角的改變，將貧窮議題從個人道德缺陷帶到了社會結構性問題。然而，社會包容的論點卻過度地強調就業穩定，並且形式化地強調各群體的平等，而忽略了社會關係的融合與實質權力的差異。其二，社會福利體制民營化的浪潮導致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承接公部門委託專案或是申請公部門經費補助，非營利組織與公部門之間合作、補充的關係，雖帶來新型態服務得以快速地出現在福利服務的市場，卻也導致非營利組織缺乏自主性等問題。

### （一） 社會包容概念的興起

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或譯社會融合、社會納入)是相對於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而生的概念，而這兩個概念多在歐陸使用，指涉社會福利制度應納入貧窮者的權利(Levitas 1998)，尤其是在社會經濟環境變動之下的新貧人口，即失業與工作能力無法應付產業變遷所需的原先白領勞動階級。(古允文 2014)這類政策基本意涵在於重新定義社會安全制度與就業及就業政策的關聯，並在1990年代左右被引入臺灣，而一系列的政策與方案包含「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公共服務擴大






就業計畫」、「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被採用以作為應對新貧的出現。(劉鶴群 2015)

另一方面，在美國的社會情境之下，WJ Wilson (1987) 則是採用社會孤立 (social isolation) 去指稱美國內城黑人的隔離狀況，他提出黑人在人口歷史演變、種族主義、工業化、家庭結構變遷等因素之下，遭到地理位置的孤立，進而形成文化上的隔離。在公共政策的解方之中，他強調的是就業市場的改革以及針對內城區黑人特定群體的福利措施 (1987: 156-164)。相較於歐陸的脈絡，美國的社會孤立更重視不同族群與文化背景的群體如何受到社會結構不均等的影響，並且重視社會連帶的建立。雖然兩個地區對於如何解決貧窮有著不同的理解，美國強調市場導向的處理方式，歐陸則強調採用社會福利保險制度來消除貧窮，但是社會排除、社會孤立等概念的出現，將過往貧窮等同於物質匱乏、個人道德缺陷的詮釋轉向將貧窮視為社會結構變遷下的結果。

社會排除是一種多面向而且會累加的動態過程，被排除的群體可能經歷了就業、教育、居住、社會關係、文化等面向的排除。(李易峻 2006；王永慈 2001；黃世鑫、林志鴻、林昭吟 2003)。面對社會排除的方式，是社會包容／融合，大致可以歸類為經濟性或非經濟性的取徑。其一，經濟性為以就業為核心的政策，這個觀點強調社會排除的根本是長期失業與就業不安定，在這兩種情況下出現物質的剝奪與社會關係的剝奪。(黃世鑫等 2003) 因此解決方法即是改善就業機會及增加就業保障。其他以公民權為核心的政策，雖然在意公民權行使不完全的群體 (如移民) 遭到的排除，但其融合方案仍以促進弱勢群體在具勞動資格的身分中而享有參與福利方案的權利。(李易峻 2006) 其二非經濟性為社會參與的融合，這個論點更關注非經濟性的排除，藉由包括工作、志願服務、社區性服務，進而提供社會參與的機會而降低社會排除的現象及促進社會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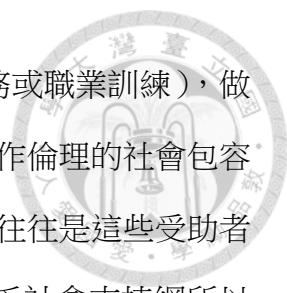
2000 年里斯本高峰會將貧窮與社會排除置於歐盟社會政策核心，並且提出四項政策目標以促進社會包容：一、促進參與就業，以及所有獲得資源、權利、物資與服務的管道。二、預防遭受排除風險。三、協助最脆弱族群。四、動員所有相關



的單位來克服排除問題。(Levitas et al. 2007, 引自古允文 2014) 而在臺灣 2012 年提出的「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社會福利政策綱領」, 以「邁向公平、包容與正義的新社會」作為口號, 並且對包容做出定義:「包容的新社會在於消除一切制度性的障礙, 保障所有國民參與社會的權利…」, 從中浮現**多元接納、尊重差異、減少社會排除**等核心要素。(古允文 2014) 比較兩者可以發現, 臺灣對於「社會包容」的定義經過轉化, 納入了多元族群權利的概念, 這與臺灣政府在 2009 年受到非營利組織的催促下, 將聯合國大會於 1966 年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俗稱兩公約) 內國法化有所關聯。兩公約強調不同背景的群體享有均等的公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而近年臺灣社會新移民人口的增長、多元家庭的出現, 也讓臺灣社會更重視多元群體的權利。

受到社會包容的論述影響, 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將貧窮的焦點轉向社會結構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權利不平等, 並提倡建立一個包容性的社會。這些組織在社會政策的推進與改革之外, 都強調社會關係的重要性。芒草心的自立支援據點藉由「住民大會」來建立住民間的關係; 人生百味的重修舊好據點成立目的也是為了修復無家者的社會關係; 夢想城鄉的脆弱畫室藉由藝術創作來整合貧困者的生命敘事, 並且藉著分享脆弱來建立愛與關懷的互助團體。社會關係對於這些團體而言, 是促成社會凝聚 (social cohesion)、社會融合 (social integration) 的方式, 他們認為無家者受到社會排除的原因是無法融入社區, 並因為道德污名而受到社會的排除, 因此藉由協助建立關係, 創造無家者得以融入社區的契機。同時, 他們認為社會包容的前提是相互理解,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尊重彼此差異、接納多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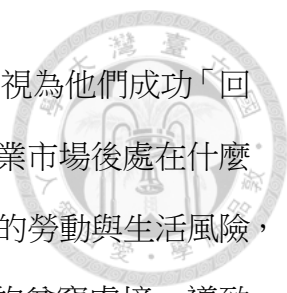
然而社會包容的執行並不徹底, 它持續保留舊有殘補式社會福利對社會福利接收者的想像, 產生下列兩者問題。首先, 社會包容過度強調藉由就業來減緩社會排除。無論是在歐陸或是台灣, 解決社會排除的政策多是經濟性方案, 尤其強調「就業」對於社會融入的重要性。然而這種「社會排除」的談法是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福利」重新定義為「工作福利」的過程, 傾向將福利接收者是否積極求職、是否接



受政府提供的就業機會、或積極性的勞動市場方案（如就業服務或職業訓練），做為繼續提供社會福利津貼的條件。（王增勇 2017）在此種強調工作倫理的社會包容政策底下，似乎將貧窮者推入就業方案內就了然無事。但其結果往往是這些受助者在從事工作沒有多久後又重回相同的貧窮狀態。有些是因為缺乏社會支持網所以在工作面臨挫折或困難時，沒有人協助所以離開工作；有些是因為被推入不穩定的非典型底層勞動當中，難以藉由這種勞動改善生活水平。

其二，社會包容卻可能淪為一種形式平等，而忽略內部多樣的權力關係。社會包容是將原先被排除在社會整體外的群體容納進來，不帶有社會控制的目的，在尊重中提供同等參與生活的機會。（Ratcliffe 2000: 171-172 轉引自李易峻 2006）但是在提供同等參與生活的機會之下，各群體所獲得的機會並不是同樣的機會，各群體的權力也不均等。弱勢群體很有可能是出於優勢團體的需求或利益而被整合進入社會整體，並非真實地被賦予主體性。（藍佩嘉 2019）Van Berkel（2002）區隔了排除／納入與整合／邊緣化兩組概念，並認為後者更涉及了權力不均等的討論。（轉引自李易峻 2006）因此，改善社會排除的作法不能只停留在「納入」式地協助穩定就業或是促進社區參與，而應該思考優勢者與弱勢者之間存在何種權力關係，這種關係有可能如何動態地造成弱勢者再次被排除，背後促成此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為何種社會條件。

綜合上述，雖然政府提倡「社會包容」並且推出相繼的社會福利改革綱領，但是在當今臺灣社會福利體系裡「工作倫理」的陰魂依舊未散。社會包容期待個體能夠被整合進入社會整體，而且應要被公平對待獲得實質均等的地位。但是在當前社福體制的想像裡，以個人的勞動身份來評斷弱勢群體是否成為社會整體的一部分，所謂「融合」只停留在就業層面，鮮少注意到他們在勞動市場以外的社會生活。而且個人也因為勞動身份而獲得程度不同的保障，正職穩定就業較能夠獲得完善地就業保障，非典型勞動則是收入不安定、工作臨時化且沒有未來可言。（Standing 2019[2011]）儘管這些勞動條件存在著明顯落差，但社福體制卻都將其視為一種成



功的整合。弱勢群體無論是穩定就業或是從事非典型勞動，都被視為他們成功「回歸社會」的一項結果，但這樣的想像卻沒有意識到他們被納入就業市場後處在什麼樣的社會位置。非典型勞動者因為缺乏就業安全保障，承擔較多的勞動與生活風險，而處在充滿不安全與不確定感的生活當中，更有可能惡化他們的貧窮處境，導致「越做越窮」的情況。(Shipler 2016[2004])

惡化的是，工作倫理主導的社會福利體制當中「個人化的社會生活想像」讓個人更不願意向外求助，信仰著「辛勤工作就會改善生活」。個人化的社會生活想像根深蒂固地認為人應該要「靠自己」、「刻苦耐勞」，過上獨立自主的生活。在這個想像裡頭，個體應該要努力工作不依賴其他人的幫忙。若是依賴他人的協助，則是「不獨立」的象徵，而這個不獨立會轉化成一種對個人能力的否定，並且連帶著在制度運作上剝奪個人的尊嚴與自主性(高召恩 2007; Mazelis 2017)，如福利體制安排窮人一系列的生活改善方案，如果不執行會被譴責為不努力或是失去社會福利資格。臺灣殘補式的社會救助體制僅有在家庭失能與個人無法勞動之後才會現身(許雅惠 2000; 施世駿、葉崇揚、古允文 2017)，而且接受社會救助往往被視為一件羞恥的事情。因此，臺灣社會認為社福體制救助者是「無能」與「不獨立」的個體，並不鼓勵個人仰賴社福體制來生活。而「個人化的社會生活想像」也讓個人的社會關係變得脆弱，因為個人不被允許向外協助與其他人建立友善的社會支持網。向外求助變成一種恥辱。當社會福利體制是以個人化的方式來想像個人應有的社會生活時，所謂的「包容」變成一種淪為表象的消極作為。因為無論是在文化、社會關係上的「包容」都需要建立在你個人成為一個「勞動者」之後才會發生。而且一旦在就業市場被納入之後，個體改善生活的方式就是賺錢、工作，以出賣勞動力來換取更好的經濟生活。所以當政府喊出「多元接納、尊重差異、減少社會排除」的同時，個體被納入的社會是個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強調勤奮努力勞動、不仰賴他人的「個人化社會」。



## (二) 福利多元主義下的福利體制民營化

在 1990 年代臺灣福利體系民營化之後，國家大幅度仰賴民間單位提供福利服務以解決政府服務量能不足、效率不佳等問題。台灣社會福利的民營化，依林萬億（2006）觀察社會服務輸送體系的說法，大體上從 1970 年代後期地方政府針對個案提供補助開始，隨後在 1980 年代、1990 年代、以及 2000 年之後至今，逐步發展出方案委託、公設民營和照顧服務產業化等四個模式。（王篤強、高迪理、吳秀照 2010）民營化分權下放、鼓勵並培植包含市場及民間在內的各種力量的方式，它一方面希望能夠提高社會福利服務供給效率、減輕政府相關財政負擔，一改過去集權中央所帶來的種種治理失靈的現象。再方面則期待經由尊重消費者主權以及喚起公民參與的精神，再度挽回過去諸如積極進取、自立自賴等等被福利國家所破壞的公民性格。（王篤強等 2010）

自 1990 年代起，臺灣無家者服務體制與民間團體合作來達成服務的完善。雖然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的出現解決了政府服務量能不足的問題，同時也帶來無家者福利服務的新變革，擴大了無家者的定義並看見了結構性的問題，但是福利體制的民營化依舊存在多個未解的問題。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帶來的變革是服務內容的創新以及看待無家者視角的轉動，但是在福利體制的位置仍未突破過往與公部門合作的角色，多以第三部門的角色出現來補充政府部門與市場部門的不足，而未能針對既有的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批判。

福利體制民營化的討論已久，批評如下：首先，福利體制的民營化最被詬病之處即是它成為國家推卸責任的藉口，國家並沒有實際地擴充福利體制的量能，抑或是建制完善的福利體制，而是藉由民營化外包的方式，將福利責任轉交給民間單位。（張晉芬 2001）福利體制民營化是在福利多元主義的浪潮下推進，期待國家不再作為單一的福利提供者，提供社會弱勢族群有彈性、高效率、低成本及高品質之福利服務。（卓春英 2017）然而，現今的福利民營化非但沒有隔絕掉國家提供福利服務產生的官僚自主性，而是仍以扶植與偏袒特定團體維持了官僚自主性（王篤強等

2010), 並且造成人力、財力不足且政治環境不穩定的福利供給體系。(卓春英 2017; 官有垣、杜承嶸 2011)

其次, 王增勇 (2009) 指出非營利組織仰賴公部門的資源挹注, 因此喪失了自主性。臺灣社會的捐款雖然在近十年內有了大幅度的增長 (公益責信協會 2021), 但是非營利組織仍有高比例仰賴公部門經費的支持。非營利組織爭取社會公益捐助的意義, 是為了獲得其組織生存所需的資源, 同時亦有維持與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平等關係、均衡互動的作用。(顧忠華 1999; 馮燕 2001) 反之, 若非營利組織未能從社會獲得足夠多的公益支持, 仰賴公部門經費來源則有可能喪失自主性, 包含因為拿取國家費用而難以擔任批判角色, 以及民營化制度造成社福組織不僅人力大量投入直接服務, 更使得政府得以收編民間組織既有的自主財源。(王增勇 2009)

其三, 公部門基於績效檢核的目的, 經費多以年度批核與發放, 並以量化指標作為檢視。新自由主義的福利服務強調效率與彈性, 開始重視服務方案的設計與評估, 使服務標的設定、要求更加明確。(陳燕楨 2011) 這種管理思維將社會福利的成果數字化, 公部門在指標檢核下要求數字的增長, 並且設定一套不具彈性的評鑑指標與服務流程, 要求社工流水線式地完成任務 (王增勇、徐沛璇 2019)。但是這樣的作法將會大量抹煞掉需要長時間才能看見服務成果的方案。長久下來, 非營利組織為了提供績效成果並獲取經費, 需選擇最能配合短期間方案的個案, 而非根據個案需要進行調整, 因而出現「尊重當事人選擇不接受服務因而結束服務」的結果。(黃克先 2021b) 這樣的社會福利方式未能實際地解決無家問題, 在政策成果上臺灣明顯比其他相鄰國家失效。(黃克先等 2023)

其四, 非營利組織承接公部門福利服務委託, 社會工作者約 75% 的工作項目集中在直接服務與行政項目之中, 剩下僅有約 10% 在公共關係、8% 在社區工作、7% 在社會立法與倡導。(鄭怡世、陳玟蓀 2013) 換言之, 臺灣社會工作者的倡議工作量能明顯不足。這樣的結果除了因為社會工作者需要應付大量的文書作業之



外，也與非營利組織財源過度仰賴公部門而無法進行批判有關。

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有看見上述的多項問題，尤其是第二項至第四項的內容，因此採用創新的服務方式、擴增社會公益捐款等手段來解決上述的問題。就以較為活躍的三個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芒草心、人生百味、夢想城鄉）為例，這三個組織開設了多元就業方案（無家者導覽員、無家者零工工作、無家者木工班），或成立注重住民討論交流的短期住宿據點，並輔以藝術創作課程、社會溝通倡議方案等。經由這些組織的作為，他們面對上述四項困境有了下列兩個突破：其一，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運用社會倡議帶入公眾捐款支持，拓開了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空間。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藉公眾捐款、群眾募資等方式作為本身部分經費來源，其餘需要固定大筆經費支持的就業與住宿項目則申請政府與企業補助。這些組織多有超過半數以上的經費來自於公眾捐款，因此提高了組織的自主性。即便公部門與企業無法提供經費支持，各組織仍有餘韻在銜接期尋找下一個經費來源，抑或是有時間規劃方案的收尾與轉接，不至於嘎然而止；其二，藉由方案經費分流，突破過往非營利組織難以倡議的困境。若細究這些組織的經費使用狀況，可以發現社會倡議、大眾溝通、組織後勤等財源幾乎是由公眾捐款支持，換言之這些工作項目並不會因為承接政府方案而產生「拿人手短」的問題。（王增勇 2009）

然而，公辦民營的性質仍舊帶來下列限制。其一，住宿與就業等直接服務工作仍高度仰賴公部門經費支持，因此非營利組織能發揮的依舊有限。這些組織的住宿與就業方案仍高度仰賴公部門與企業的固定經費支持，因此在住宿與就業方面這些組織能夠倡議的力度有限，並不如其他未領取公部門經費的組織有同樣的自主性。其二，住宿與就業等方案未能突破公部門與企業對「脫遊人數」的要求。就業與住宿方案具有濃厚的「脫遊」色彩，是最直觀吸引公部門與企業支持的計畫，同時這兩個方案也需要大量的經費，這樣特點導致這兩種方案的主要來源為公部門與企業。但是公部門與企業支持這兩種方案的目的，是為了看見他們投入的資金有著立即見效的成果，因此會以「脫遊人數」作為衡量指標。在這樣的評估之下，往



往強調快速地將無家者推入就業市場與租屋市場，而未能謹慎地建立無家者的支持網絡，並導致無家者時常在擔任正職或租屋沒多久後又重返街頭。

### 第三節、 重修舊好


重修舊好在上述的背景下出現。社會包容的概念讓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轉化看待無家者的視角，並使得政府部門願意嘗試嶄新的無家者社會工作方式。同時，福利體制的民營化也創造了制度的可能性，讓公部門以委外經營的方式交由非營利組織經營該空間。本節將回到人生百味與重修舊好本身，並說明在組織層次上他們為什麼要介入無家者的社會連帶建立，及如何達成這個工作目的。

#### (一) 人生百味的成立

2014 年三一八學運替臺灣社會帶來改變，這場由大專院校學生領銜的公民運動，讓社會看見青年世代的政治參與及社會改革的力量。在學運退場之際，領銜者以「遍地開花」作為口號，一方面緩解群眾對於退場的疑慮，一方面維持了這股社會改革的動能。人生百味，便是這遍地開花的一個案例。人生百味最初的專案——「石頭湯計畫」與「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源自於三一八運動場上對街頭的觀察。創辦人當時的上班地點就在立法院附近，本就從事社會議題相關工作的他們，下班後來到街頭關心這場社會運動。他們注意到發放給抗爭者的物資與便當，時常因為吃不完而丟掉，卻因為捐贈者發放給「抗爭者」的名目而不方便發放給其他人。關心食物正義的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食物浪費，希望能夠將資源發放給同樣有需要的人，在告知物資組後，他們將少數剩餘的物資帶到了艋舺公園發放，那也是他們第一次接觸無家者這個群體。在那次的經驗裡，他們發現無家者井然有序地排隊拿著便當，而且會替行動不方便的無家者提早預留幾份。這樣的行為與大眾對於無家者的刻板印象大不相同，也打破了他們原先的認知，讓他們開始注意到這群人，以及思考自己能替這個群體做些什麼。

三一八學運後帶動起的社會浪潮，鼓舞年輕人走入公民社會，以草根與貼近現






實社會的方式，串連起社會公民力量並帶動變革。與此同時，社會企業正在臺灣起步，在企業第二部門與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之外，嘗試以可循環的商業模式來倡議與推動社會弱勢的權益。人生百味的草創團隊當時受到社會企業的浪潮驅使，欲創立社會企業並提供貧窮者就業機會。一開始人生百味也發展「人生柑仔店」的街賣計畫，希望能夠開發商品、培力街賣者並形成一個商業模式。

在培力街賣者的過程裡，人生百味團隊藉由陪伴弱勢者並與他們互動來貼近弱勢者的生活。在自身文化與教育背景與弱勢者相差巨大的同時，工作者也在這樣的碰撞裡拓展自身對人的理解。「……他的生命跟我的交會很大的程度改變了我，改變了我對於人的敞開、對人的認識，你對於書的敞開、你對於知識的敞開的認識跟等等的，其實沒有那麼大的磨合，你還有自己一個適應的時刻，你跟自己對話的時候，可是你跟人很多時候就是真槍實彈地直接來的，對。所以，我覺得他在那段時間很大地就是敞開了我對於人的理解跟人的可能性。」工作者在與貧困弱勢者直接地互動過程中，對於貧困弱勢者的生命有了多面向的認識，並在後續持續透過倡議、陪伴的工作方式呈現弱勢者的主體性。

基於對於議題的核心認識，人生百味的一大工作要點便在於消除貧窮者受到的社會排除。從 2015 年至今，人生百味對於議題的觀點有著改變。團隊初起步的 2015 年，人生百味處理貧窮議題的觀點主要從「污名」出發，即這個社會對於弱勢者存在刻板印象、負面標籤，未能看見貧困者的生活經驗，一味責怪貧困者的個人特質（例如懶惰、骯髒、不工作等）。當時主要的專案計畫「石頭湯」，讓大眾發放餐食的同時，能夠與無家者有所接觸，藉由互動打破原先對貧困者的污名。2016 年的人生百味團隊，主要以「石頭湯計畫」與「人生柑仔店街賣計畫」為主，當時的團隊目標是社會企業，希望透過街賣發展出一套商業模式。不過在與無家者互動的過程之中，他們對助人者與受助者間的權力關係有著有別以往社會工作專業的詮釋：「重要的是，我並不是用一個上對下、「你很糟糕，我現在來救你」、或者是放煙火式、一次性的慈善行動。沒錯，此時此刻現下的你，確實需要更多的傾聽、



理解、甚至是物質的支持，協助你度過人生當中的低谷。」2017、2018 年起，人生百味團隊開始意識到既有的方案與無家者的關係過於初步，對於他們街頭生活以及制度的困境未能有足夠多的了解，而無法進一步推動無家者權利的進步。故他們開始積極地發展直接服務的專案，藉由社會工作拉近與無家者間的距離，並且從中收集倡議所需的材料。而在直接服務的過程裡，他們看見更多社會結構與制度的排除。人生百味曾經引用 1993 年歐洲政治白皮書的內容，點出貧窮者面臨三大排除：勞動市場排除、服務的排除、社會關係的排除。

團隊早期與貧困弱勢者相遇、互動的經驗，讓他們感受到即便貧窮者與主流社會大眾貌似有著相異的生活方式與文化，但是彼此仍舊有相同處且應能相互理解、尊重彼此。他們認為無家者受到的社會關係排除，是一種社會大眾誤會無家者生存方式產生的結果。因此，他們在上述三種排除裡更著墨「社會關係的排除」。這樣的焦點轉變，也與貧窮研究的關係轉向相合（黃克先 2021a）。

人生百味開始注意到「關係」為貧窮議題的本質，例如關係不穩定導致生活缺乏動力、飲酒賭博等行為也許是為了滿足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及交流。2018 年人生百味總結過去四年的行動，提出需要以「團結貧困」作為行動方向。這樣的目標轉向，也與 2017 年起「貧窮人的臺北」系列活動有關。該活動的幕後推手為時任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他長期投入第四世界運動，致力於貧困者的團結。「孫大川是窮學盟總顧問，由於身為原住民，曾面臨社會歧視的經驗，加上長期接觸「第四世界運動」，承接國際上對於貧窮議題的觀念，他說：「一個社會的改變，不能只靠熱情，不能夠只靠政治經濟社會的運動，必須有歷史的核心，沒有歷史的運動會非常淺碟，只有擁有共同的歷史，大家才能真正的團結。」<sup>7</sup>」第四世界運動根基於法國，旨在讓貧困者認識其他具有相同經驗者，能夠理解自己並不孤單，擺脫貧窮為個人問題的意識，強調平等的社會工作關係。自 2018 年起，人生百味大致的貧窮觀點、工作方式底定，以貧窮者的主體經驗出發，修復社會連帶以達成具包容性的

---

<sup>7</sup> 內容出自葛晶瑩（2019）。

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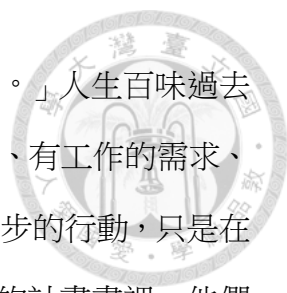
年份	專案	活動性質	主要對象
2014-2015	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	田野工作、平台創立	大眾倡議
2014-迄今	石頭湯	共同料理、食物分享	大眾倡議
2015-2018	人生柑仔店 街賣計畫	街賣者就業培力計畫	直接服務
2017-2018	街頭生存指南	書籍出版	大眾倡議
2017-迄今	貧窮人的臺北	展覽	大眾倡議
2018-2020	友善回收計畫	田野工作、出版、創新商業模式	大眾倡議、直接服務
2018-迄今	街頭尾牙	群眾募資、餐食發放	大眾倡議、直接服務
2018-2019	女性無家者	田野工作、訪談、文字出版	大眾倡議、直接服務
2018-2019	貧窮漫畫	圖文出版	大眾倡議
2018-迄今	寫寫字	無家者藝術創作課程	大眾倡議、直接服務
2019-迄今	溫石	石頭湯外縣市計畫	大眾倡議
2019-迄今	重修舊好	無家者服務據點	直接服務
2019-迄今	人生萬事屋	無家者零工就業媒合	直接服務
2020-迄今	百味家屋	無家者住宿計畫	直接服務

表格 三、人生百味專案列表

## (二) 修復社會關係的空間

2019 年重修舊好的成立，源自於臺北市政府順應活化空間的政策。在該政策的檢視之下，北市府欲將鄰近臺北車站附近的老舊宿舍翻新，作為臺北車站周圍無家者支持據點。由於該地的地目為市場，北市府原先希望將該空間打造成一個培力商店，來嘗試新的無家者服務方式。而在臺北市遊專小組的分享之下，人生百味得知了這個機會並投標，成為唯一的投標廠商。得標後人生百味經過與北市府的來回溝通，爭取到這個空間嘗試其他方案的機會，協商出作為培力商店以外的其他工作目的（如修復關係），進而成立了重修舊好。


重修舊好的副標是 a clean, well-light place，出自海明威《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



——「我總是不情願地關門。或許，有什麼人還需要這間咖啡店。」人生百味過去在與無家者接觸的過程裡，看見無家者在白天有「休息」的需求、有工作的需求、有交流的需求。在休息之後，他們才會有意願會再開始進行下一步的行動，只是在這個過程裡需要一個可以休息、復原的地方。重修舊好 2021 年的計畫書裡，他們強調與他人重建、維持連結，以及練習遵守社會道德與規範：

我們也看見許多人在沒有任何支持網絡及人際連結的狀態下，身心是如此破碎。因此，本會團隊認為「如何與人重建並維持好的連結」是個很重要的課題。……另外，我們觀察到服務對象若要在脫遊後能維持一個穩健的生活，狀態不再擺盪的話，會需要先累積一些資本，除了經濟上之資本外，也包含了能與他人建立並維持良好關係之能力，對於社會道德與規範有所理解及適應、獨立處理自身事務之能力等。而在去年試行之班會中，不僅是個大家彼此確認想法，也是個互相理解、傾聽的機會，基於對空間之歸屬與認同感，也希望此空間能永續經營下去，大家對於公共事務皆能踴躍發表意見，且彼此形成互相督促、扶持之關係……


從工作計畫書的內容來看，重修舊好將社會連帶（social ties）既視為一種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藉由學習社會道德與規範達到社會團結（solidarity）。這兩種對於社會連帶的認識，可以進一步解釋成關注社會資本的微觀層面（Nan 2002; Bert 1997）以及宏觀層面（Putnam 2000），前者認為個人可以透過社會關係網絡獲得政治與經濟資源並促成社會地位的提升，後者認為建立連帶後產生的社會資本，能夠使社會增加信任、促進社會團結與公民責任。無家者的社會資本若是得以提升，將有機會獲得工作的資訊及情感的支持。而若社會連帶被視為一種社會化的過程，它暗示的是原先無家者處於被排除的社會位置，因此才需要經由無家者與社會大眾的相互認識，提高社會的包容度，重新接納無家者回歸社會。這兩種概念在重修舊好的實務工作上未被區隔，而是被作為同等的論述被採用。



社會連帶在人生百味的語言裡，就是「人與人的關係」，而他們認為社會結構面向的排除，產生無家者與他人間的敵意關係，而這樣的關係會再次地惡化他們社會孤立處境。無家者與其他貧窮者相似，受到勞動市場的排除、社會關係的排除、地理位置的排除、體制上的排除等（Wilson 1987）。這些社會結構面的排除以及街頭生活的環境，讓他們產生了一種看似異於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與在地觀點，而讓他們成為主流社會的「他者」。（許華竿、孔健中、黃千嘉、劉育偉 2014；林徐達 2012）基於這樣的隔閡，無家者與大眾之間幾乎不存在互動與交流，社會上對於無家者的認識也充斥著負面印象。

因此，重修舊好欲修復三種社會關係來改善無家者的社會處境：第一種是人與自己的關係，能夠接納與包容自己的過去；第二種是人與無家者同儕的關係，包含找到社會支持、獲得歸屬；第三種是人與大眾的關係，主要是與大眾對話、破除大眾對無家者的污名、提高社會對於貧窮者的包容力。這三種關係分別是由內向外，由核心到最外圍的三個層次。對於工作者成茂而言，第一種人與自己的關係涉及到了主體性的建立，回溯到人生百味開始關注「關係」與「主體性」的契機——第四世界運動，該運動相當重視貧窮者的主體性，認為應該要團結貧窮者、打造由貧窮者主動發聲的社會改革。因為第四世界運動的根基，工作者成茂認為無家者在修復與其他人的關係的同時，也需要同時修復與自己的關係，主體性才能夠建立，也才能形成社群、向外發聲。這樣的觀點在社會弱勢者的運動裡相當普遍，身心障礙者需要克服心理障礙與污名，從自悲自憐提升為正面的自我印象，共同行動才能夠產生，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同志運動（R. Johnson 1999:35 轉引自何明修 2023）。在主體性建立的同時，第二種與同儕的關係也能夠改進，當他們不再採納負面的刻板印象來批評同儕，則有可能促進群體內的互助，進而改善第三種與社會的關係。

如果修復連帶成為人生百味的工作目標，那麼人生百味對於修復連帶後的社會願景又是什麼呢？人生百味的標語是——「創造一個不排除人的社會」。不排除人的社會對比著「社會排除」，人生百味致力於建立一個沒有人被排除的、包容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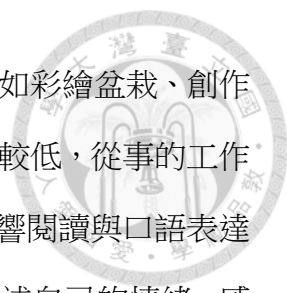


種多樣性的社會。人生百味工作者方琳提到，原先希望重修舊好是一個「例外的空間」，想要建立一個烏托邦，但是當發現這些人從這些烏托邦走出去之後，依舊得面對社會的不友善，才讓他們意識到不能只有例外空間的存在，而是需要這個社會都具有包容性，才能根本性地解決問題。當這個社會的包容性提高，整個社會面臨風險的耐受力便會提高（Aldrich 2018），全球經濟危機、家庭的突發狀況、交通事故、工商意外、大規模傳染病等，皆是一般人有可能面臨的風險，也都有可能讓一個人跌落正常社會軌道成為貧窮者或無家者。如果人與人之間的連帶增多，社會整體社會資本提高，就能夠織起更緊密的社會安全網。

### （三） 重修舊好方案內容

接下來將說明重修舊好細部的方案內容（見表四）。2019 與 2020 年的工作向度可分為個案服務、工作培力、團體工作與社區工作。這四個工作向度分別對應社會工作中三大傳統方法：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與社區工作。最初重修舊好的計畫書撰寫人員為社會工作專業背景，並且重修舊好也是由臺北市社會局委託，該局處習慣社會工作的語言，因此計畫書採用社會工作專業的分類方式來定位工作內容。這三種工作方式雖然可以對應到人生百味所預設的三種社會連帶（對自己、對同儕、對大眾），但是傳統的工作方式卻也限制了關係導向的社會工作型態，例如工作者在「個案服務」上，服務方式還是需要經由會談、開案、評估、系統登錄等步驟，工作成果的評估仍需要符合社會局預設的指標，以「結案人數」作為最終的檢核標準，而未能回歸到「與自己關係」的修復成果。

在團體工作上，「寫寫字工作坊」與「藝術創作療癒工作坊」是從 2019 年至 2021 年皆有的工作方案。這兩個方案皆訴諸無家者主體性的建立、無家者生活經驗的表達。在寫寫字工作坊主要以「文字」作為產出的形式，每次活動主持人會設定一個主題，例如臺北車站、行李、不好的習慣、家、信仰等，再藉由主題式的討論（例如：什麼時候第一次來到臺北車站？）、主題式的產出（畫出你心中的台北車站）以及主題句的產出（對我來說，我希望台北車站是一個\_\_\_\_\_的地方）



來進行。藝術創作療癒工作坊則是以「實物」作為主要產出，例如彩繪盆栽、創作小樹、泡泡畫、帆布袋繪畫、印章等。由於無家者普遍教育程度較低，從事的工作類型也以體力勞動為多，平時書寫文字的機會非常少，也連帶影響閱讀與口語表達能力，進而在各項福利制度的申請中遇到困難。難以用言語去敘述自己的情緒、感受與經驗時，無家者的主體經驗就無法被訴說，進而限制了他們在福利制度上權益的爭取。他們的經驗時常需要藉由其他專業人員（例如社工）代為轉達，在轉譯的過程裡有可能會出現偏誤，表達的機會也受到限制。這兩個方案的第二個目的便是「社群連結」，這兩個方案都希望在他人面前揭露自身的創傷、負面經驗的同時，與其他無家者產生共鳴，進而建立社群連結，創造令人安全舒適的同儕關係。在社區工作上，小家電方案邀請小家電維修達人帶領維修志工替民眾現場檢修小家電，再進一步培力有意願的無家者成為小家電故障排除與修理人員，創造一般民眾與無家者的接觸和連結，也讓無家者在維修過程中累積成就感，進而重拾生活動力。石頭湯計畫則是由志工帶領社會大眾烹煮料理，再將餐盒帶到街頭發放。這兩個方案在設計上，雖然都希望能夠促成無家者和社會大眾的互動，但是實際上互動的時間相當短暫，未能有深度的交流。事實上，是否應將重修舊好視為一個無家者與大眾接觸的空間，一直是人生百味內部待解決的問題。在 2021 年末，重修舊好欲招募新店長時，工作者就曾經針對新店長提出期待。當時的店長們並不擅長及沒有意願從事大眾接洽、對外關係的相關工作，因此希望新店長能夠負責這塊的內容。雖然重修舊好最初的空間定位是一個讓無家者與大眾能夠安心相遇的空間，但是這件事情發生的頻率其實不如預期中那麼高，這也導致無家者並沒有建立足夠對外的連帶（bridging），而更多是無家者內部的凝聚（bonding）。

2021 年重修舊好的方案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前兩年的經驗讓工作者理解到原先空間成立的目標（空間作為一種無家者培力商店）在實際運作上因為業務繁多難以進行，部分方案（小家電與石頭湯）也未能達成預期連結建立的目標。因此 2020 年與 2021 年新的工作者加入後，開始調整重修舊好的空間規劃與方案內容。



在工作培力的向度上，因為重修舊好的商品形式改變，培力也開始轉往手工品、裁縫商品，而非是原先的餐點。在團體工作上，新增了「重修班會」與「重修菜園」這兩項內容。重修班會是重修舊好體現其關係導向及主體性建立的重要方案，該方案內容為每兩個月舉行空間討論會，針對空間公共事務邀請無家者進行討論，由工作者帶領討論。這個方案不將無家者視為單純的受助者，而是將其視為空間的使用者，與工作者位於平等的地位，有機會去決定空間內的事務。另外一個「重修菜園」的方案，則是讓無家者們在頂樓種菜，提供生活中的消遣。

在社區工作上，小家電方案停止了，石頭湯雖然仍舊進行，但是不納入重修舊好的方案之中，而是回歸到人生百味的專案。重新調整後的社區工作專案，加入了靜態講座（講座、展覽）以及動態講座（市集、擺攤），無論是靜態還是動態的講座，都會培力無家者成為分享者，例如講座以真人圖書館的形式，邀請無家者分享自身的生命經驗、市集也邀請無家者成為擺攤的工作者，主動向民眾介紹重修舊好這個空間以及販售的商品。在講座之外，也增加了「重修大客廳」方案，開放民眾報名參加，讓民眾進入店內共煮、共享餐點。這個專案由無家者擔任活動規劃者，設計菜單與互動活動，讓他們從被動的活動參與者變成了參加者，藉此培力無家者籌備活動的能力。2021 年重修舊好方案調整後，雖然最初的餐廳訂位消失了，但是社區工作專案中無家者參與的比例提高，更能達成「讓無家者與大眾交流」的目的。

年份	工作向度	方案內容
2019	個案服務	
	工作培力	出餐店員
		空間打掃
	團體工作	寫寫字工作坊
		藝術創作療癒工作坊
	社區工作	小家電
石頭湯		
2020	個案服務	



	工作培力	出餐店員
		空間打掃
	團體工作	寫寫字工作坊
		藝術創作療癒工作坊
		人生萬事屋
	社區工作	小家電
石頭湯		
2021	個案工作	
	工作培力	空間清潔
		小幫手
		裁縫修補
		自製手作品
	團體工作	寫寫字工作坊
		藝術療癒工作坊
		重修班會
		重修小菜園
	社區工作	靜態講座
		動態講座
		重修大客廳
	場館經營	

表格 四、重修舊好專案列表

#### (四) 來到這裡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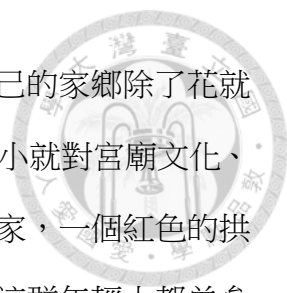
相較臺北車站整體而言，來到重修舊好的無家者年紀較輕、流浪時間較短、女性與具有精神狀況比例較高。身心障礙者佔無家者群體的一部分，根據李盈姿（2019）的調查，218 位無家者中約有 50 位有身心障礙福利身份，占比約 22%。同調查顯示近一年曾有精神科就診紀錄者為 17 人，然實際上精神狀況者比例應為更高。在具有鑑定身份之外，還有一些人有可能疑似有精神障礙狀況，但因為本人未有意願就醫而未有該福利身份。這群具有精神狀況的無家者，因為其記憶跳躍、思覺失調的情況是研究上難以碰觸的一群人。然而這群人在無家者中佔有一定比例，應該要納入研究範圍。在重修舊好 2021 年個案清冊之中，在案者 20 位之中有 2 位領有中度精神障礙手冊，8 位疑似有精神狀況，總共有精神狀況者為 10 位，占



比為 50%。結案清冊之中，29 位之中有 2 位有智能障礙、1 位有極重度精神障礙，3 位疑似有精神狀況，共 6 位，佔比為 20%。不過在重修舊好的精神狀況者多數為女性。

此外，這些人對於社會福利組織的接受程度較高，他們可能藉由其他社福組織轉介而來，或是自己主動尋找資源而來到這裡。而且他們從事非法或失序行為比例較低。重修舊好並不會邀請有藥酒癮的人進入到店裡。只要聞到個案身上的酒氣，對方通常都會被社工拒於門外。在重修舊好除了酒醉之外，人際關係複雜者通常也不會被邀請入內。所謂人際關係複雜，是指可能有從事非法犯罪工作者，抑或是可能與黑道有所糾葛、時常進出監獄者，這些人被車站的無家者認為是「鬧事」的人們。重修舊好對於置之於門外人們的想像，正是符合社會對於街頭失序的看法，充斥著暴力、犯罪、賭博、藥酒癮等，而這些行為之所以「失序」正是相對應著法律所訂定的罪名標準而生。

進入的重修舊好的人裡面，我大致按照年紀以及身心狀態分成三類人：年輕男性、中老年男性與女性及精神狀況者。第一，年輕男性是一群原先睡在二二八公園的男性無家者，年紀約落在三十歲上下。他們通常在相當年輕時就離開家中出來工作，因為豐富的社會經驗讓他們易於和不同類型的人打交道。不過年少就離家與離開學校的他們，並沒有相應的學歷讓他們找到穩定的正職工作，且和家中關係早已經因為出社會許久而脫離。阿明是一位在我田野期間始終有保持聯絡的男性無家者，27 歲的年紀卻因為未刮的鬍子和稍長的頭髮而顯得較同年更蒼老一些。阿明是一位幽默風趣的人，時常會和社工開開玩笑，或是分享與我們生活圈相近的話題，例如有一次他和我分享自己看了 youtuber 小玉的頻道到三點，那天小玉邀請觀眾一起到其他直播主的房間拜訪，因為同時間大量觀眾湧入，讓其他直播主受寵若驚。他呵呵地笑著分享這件事情，顯得因為這件事情樂此不疲，就這樣熬了夜。阿明的話題時常圍繞著 3C 產品，會在我拿起手機或是藍牙耳機時，詢問我是不是某個型號，或是這個耳機多少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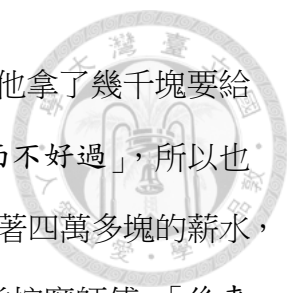


阿明的老家在彰化縣大村鄉，他曾在接近花季時告訴我，自己的家鄉除了花就沒有其他東西，好山好水好無聊。家裡是開宮廟的，也因此他從小就對宮廟文化、陣頭文化感到相當熟悉，他也曾用 google 街景開給我看自己的家，一個紅色的拱門上面印著宮廟的名字，紅瓦磚牆，有著臺灣鄉村地區的風景。這群年輕人都曾參與過陣頭文化，也都自述自己是乩身，有些人是「虎爺」有些人是「關公」，也有些人是其他神明。我曾詢問工作者，是否有真正看過這些人起乩？工作者表示並沒有真正看過，但是在每次土地公拜拜時，有些人會感受到身體不適而需要遠離拜拜的地方。這些年輕人在經過宮廟時，也多會停下來雙手合十拜拜，他們說這是尊重神明的表現。當偶爾去出陣頭時，他們也會說這並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服務神明」。阿明說到他在十四、十五歲時，有人曾問他要不要賺錢？他答應後就加入了幫派，在幫派時混的不錯，手下曾經有四五百人，到了組長的位置。後來他做一做發現「景氣不好」，於是就退出了幫派。手下有非常多人在他離開時跟著離去，他也向其他人勸世希望大家離開這一行。他說小黑也曾經是他帶的人，這是為什麼有時候小黑叫他「老大」。藉由這些話，阿明嘗試告訴我他曾經混的很大尾。當工作者們聊起這群年輕人與黑幫的關係時，工作者成茂曾經這樣說「這些人應該是已經被黑道淘汰了，他們是連地下社會都不要的人」。

第二，中老年男性。這群人囊括重修舊好內年輕力壯以外多數的男性無家者，因此這群人內部差異並不小，主要的差別是依據身體狀況、年紀、教育程度而略有差異，其中我將「智能障礙者」也納入進來<sup>8</sup>。雖然差異大但就結果而言，他們的處境相對類似因此被歸納在同一類。身材胖胖的木木是典型的中老年男性，他總是挺著自己圓滾滾的肚子，體重目測約有近百公斤。因為教育程度不高，從出社會至今都是從事體力勞動為主。木木來到街上的原因是因為和哥哥不合，一氣之下離開了家門。他並沒有告訴親戚自己在街上過生活，逢年過節會返家。在 2022 年的農曆新年後，我詢問他有沒有回家？他說有，原先哥哥叫他在家中過夜，還留了一個

---

<sup>8</sup> 在此我將智能障礙者與精神障礙者區隔開來，這是因為重修舊好智能障礙者的污名並不那麼外顯。反而是精神障礙者吼叫、不清潔、幻想等症狀，帶來他們互動上的污名。



房間給他，但是他並沒有過夜就離開了，並不想打擾哥哥一家。他拿了幾千塊要給姪女當紅包，但是他哥哥叫女兒不要收，因為覺得「弟弟在外面不好過」，所以也沒有包成功。木木出社會時在一間三溫暖擔任櫃台人員，原先領著四萬多塊的薪水，哥哥嫌木木的收入太少，勸木木辭掉工作，改去學習一技之長當按摩師傅。「後來我就想說去玩玩看吧，按摩可以跑全台灣。吼，不好學真的不好學，還要看書，師傅做的時候要在旁邊看，沒生意時還要按師傅看有沒有按對。後來學半年就沒學，師傅跟我哥說你弟好幾天沒來，那時候我哥就去罵我，罵一罵我我就把東西拿一拿就走了。那時我是還有錢，然後就是去車站那邊。」木木敘述著從按摩工作到車站的過程，到了車站後木木大多從事零工為主，至今以逾 10 年。

第三，女性與精神狀況者。需特別說明的是，我的研究對象裡只有一位男性有精神障礙，其餘精神狀況者都為女性。而將女性與精神狀況者並存，原因是因為在重修舊好有超過半數的女性有精神狀況，而這也與台中撒瑪利雅協會的調查、工作者在街頭的觀察一致。(黃怡菁 2017) 雖然有些女性並沒有精神狀況，可能只是偶爾疑似幻想、幻聽或情緒低落，但是她們在其他無家者眼裡與精神狀況者無異。這群人在身心資本作為兌換經濟資源的底層場域內是相對弱勢的人。中年女性原先是重修舊好鎖定的一群服務對象，這些女性年齡落在 45 歲至 65 歲不等，大多經歷過家庭暴力、離婚。這些女性時常會形容自己「逃」出家中，離開家庭帶來的束縛。這些女性在更早年的時候，通常還具備工作能力，依舊健全的身體還能夠在就業場上尋得一絲機會，因此還不會落入經濟困窘的處境。除了經濟原因之外，家庭責任、孩子的年紀也是她們並不會在三十歲的階段落入街頭的原因。這些女性通常在孩子大學或是就業後，撫養責任大幅減輕。他們的孩子不再需要母親的收入作為經濟來源，抑或是這些母親有比較多的理由請孩子養活自己。孩子具備經濟能力之後，原先與母親的衝突張力有可能因此擴增，因為他們可能不願意照顧開始有健康狀況的母親。這種親子關係的衝突，雖然在男性無家者身上也會發生，但是女性無家者更容易面臨傳統婚姻觀念的束縛而不敢離開家中，直到孩子成年後因為完成




了照顧責任才「逃」出家中。

鍾姊是這些中年女性之一，只是她的年紀稍微大了一些，今年已經 65 歲，但是外表看起來卻像是四五十歲那般年輕，這可能和她會固定染髮有關。一頭烏黑及肩的短髮，讓她看起來像是老小孩一樣。大約在二十初頭歲時，鍾姊的母親、阿姨都著急著要將鍾姊嫁掉。在阿姨的慫恿之下，鍾姊嫁給了一位阿姨的賭友。鍾姊回憶起這件事情，認為是因為阿姨欠對方錢，才把自己給賣掉來還債。「我先生又不負起責任愛賭博，他一年賺不到一個月，妹妹（鍾姊的女兒）給人養，奶粉生病都是我的錢啊，都是我的錢啊！」講起這段經歷，鍾姊充滿怨恨，丈夫不只是不養家、賭博成癮，而且還會對她施暴。鍾姊後來離婚了，女兒跟了她，卻因為她當時在日本工作，將女兒託付給自己的媽媽照顧。「阿嬤就是太寵她了」鍾姊講起女兒的事情時，第一句總是這樣開口，「重點就是女兒跟我不同心……雖然她現在有房子，我是聽她說的，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既然她也不要讓我知道，生寶寶也沒有給我知道，那你看我心會不會痛，我心真的很痛的痛，講不出來的痛，不是錢的問題，我的自尊的問題。」鍾姊的女兒將高雄的房子賣掉後，她從日本結束工作回來台灣時，便失去住所。後來輾轉在嘉義租了房子，為了逃離壞人所以來到臺北。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以重修舊好成立的社會制度背景，來回答「為什麼重修舊好要介入無家者的社會連帶建立？如何修復？」本章作為本論文的第一個分析章節，試圖讓讀者理解重修舊好建立無家者社會連帶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工作方式，它與臺灣無家者社福體制過往以就業為導向、解決個人物質層面貧窮有相當大的不同。這個特殊性奠立了本文欲分析重修舊好工作方式與成果的基礎。第一節藉由回顧 1991 年至今臺灣無家者社福體制的演變，來說明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將看待無家者貧窮處境的視角由個人的道德問題轉向社會結構的觀點，看見個人在社會結構轉變下遭到制度與社會文化的排除。而這樣的觀點轉向是在全球的「社會包容」概念浪潮下形成。



第二節說明了兩股影響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的力量。首先，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理解無家者的方式受到「社會包容」概念影響。社會包容的出現是為了解決「社會排除」，而社會排除是人們意識到貧窮者之所以窮，不單純只是因為物質匱乏或是經濟弱勢而已，而是在全球產業結構的變化底下，遭到多面向的文化、社會關係、就業、居住等排除。面對多面向且動態的社會排除，社會包容被提出作為解方。只是，所謂的社會包容應該是要納入所有人進入社會整體，並且不再出現因為個人特徵、社會身份而受到的排除，但在實務上卻偏重「就業」的納入而忽略了其他面向的影響力，導致實際仍將人們推入原子化的社會。其次，具有結構視角的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是因為「社會福利民營化浪潮」，才得以進入到社福體制內。這些制度變遷替民間團體進入無家者服務工作裡開了大門。在這些背景之下，2019年人生百味才有機會承接台北市政府委託經營重修舊好。然而委託經營是一種在社福體制民營化下遷就的合作方式，雖然非營利組織有機會藉此去影響社福體制政策，但實際而言政府的社福體系仍能夠在預算、人力編排、空間配置或是形式邏輯上干預服務輸送。因此，重修舊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會局的規範與檢核。所以它無法完全切割社會福利體制，也必然在實務上或是形式邏輯上會受到影響。所以本章提及臺灣社福體制以「個人化的社會想像」來規範受助者，仍發生在重修舊好並且產生危機。

第三節進入到實務經驗層次的說明，本節講述了人生百味工作者經由實務經驗的反思，決定從社會連帶的角度切入處理無家者議題。對於他們而言，社會連帶具有兩種意涵，其一為社會規範，其二為可累積的社會資本。他們期待藉由「修復社會關係」來促成社會融合。他們認為無家者受到的社會排除包含社會關係的排除，因此介入建立無家者的社會連帶是一種消弭社會排除的方式。

### 第三章、包容性連帶：重修舊好連帶的內涵



五點，大胖下班回來，提著一大袋社工要他帶回來分享的物資。三人暫時擱下手邊的事，一起把物資放到架上歸類。期間，大胖分享著均均最近挑食的事情，要均均針對浪費食物一事，自己提出一個解決辦法。「雖然我們賺得不多、沒有辦法照顧其他人，但至少我們可以餵飽自己。如果便當裡面的食物你沒辦法每一樣都吃完，那以後我們就請照彥不要拿便當回來了，我們自己出去買、自己煮自己敢吃的。**只要你肯，我就陪你。**」大胖摟著均均的肩，語氣中有種大哥的威嚴，但又不是強迫。他希望均均自己做決定。(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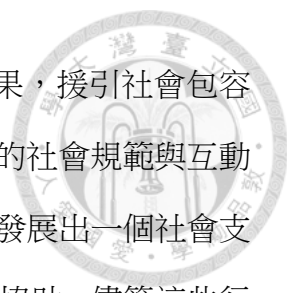
——直接服務組工作者日誌

底層貧窮者的社會關係具有不穩定、不信任且充斥風險的特質，他們多半表示不願意與彼此「牽連」，避免惹上麻煩<sup>9</sup>(Desmond 2012; Smith 2005; Raudenbush 2016; 黃克先 2021a)。然而在重修舊好延伸的住宿據點「百味家屋」裡，大胖似乎已經和均均建立起信任關係，而且也願意在大家面前表態相互協助。本章藉由我在田野中的觀察及經驗層次的疑惑：為什麼重修舊好得以讓無家者發展出具有信任、相互尊重、互助的社會關係？他們從中又獲得什麼？來提出本章的核心研究問題「**重修舊好建立的社會連帶是什麼？具有什麼樣的內涵？**」

社會連帶是指行動者在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 裡建立起的連結，儘管在多數的狀況下，社會連帶帶來的資源、資訊以及社會支持是正面的，但其他研究發現底層貧者的社會關係未必帶來全然正面的效益，傳遞資訊、交換資源也有可能帶來負擔 (Offer 2012)。本文以「**包容性連帶 (inclusive ties)**」<sup>10</sup>指稱工作者欲在重修

<sup>9</sup> 儘管研究者發現，他們嘴巴上不願意與其他人發生牽連，但實際上他們仍舊存在著互惠互助的社會關係 (Desmond 2012; Smith 2005; Raudenbush 2016; 黃克先 2021)。

<sup>10</sup> 在貧窮者相關的研究裡，有眾多稱呼貧者間社會連帶的方式，不同稱呼強調了連帶的不同面向。



舊好建立起的社會連帶，這個詞彙強調這種連帶的理想正面效果，援引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的概念來建構這個連帶的內涵。它具有特定的社會規範與互動模式，用以建立無家者的社群。藉由建立包容性連帶，重修舊好發展出一個社會支持網，讓無家者練習修復對人的信任，並且學習互相尊重、相互協助。儘管這些行為實際運作上有著限制（參見第四章與第五章），但它依舊使無家者得以重修舊好內累積社會資本。

本章討論的社會連帶，涉及組織內三個行動者<sup>11</sup>：無家者與組織的連帶（組織連帶）、無家者間的連帶、無家者－助人者間的連帶。透過包容性連帶，無家者不僅在物質匱乏的街頭生活中獲得經濟資源以生存下來，同時也從原先被貶斥、受挫的社會關係經驗裡感受到愛、信任與尊嚴。本章分成五個小節，第一節說明何謂「包容性連帶」。第二節說明包容性連帶的社會規範在重修舊好內如何落實。第三節闡述重修舊好內的社會連帶如何帶入經濟資源與資訊，進而協助無家者度過日常生活的困難。第四節將說明這樣的關係帶來的社會支持，讓無家者得以脫離傳統助人關係裡習得的無助。第五節小結統整本章內容。

### 第一節、「建立」包容性連帶

包容性連帶是一種重修舊好工作欲建立起的社會關係，是一種理想型的社會連帶。它不僅被視為一種可累積的社會資本，同時也涉及一套新的社會規範，背後有著鮮明對關係的預設，期待人們能夠藉由這樣的連帶形成平等且相互尊重的社群。包容性連帶欲達成的關係特質可以從社社會規範、社會資本角度切入，欲促成三點：作為一套新的社會規範，它期待（一）在制度上不排除任何人、（二）在

---

Desmond（2012）以免洗連帶（disposable ties）來稱呼貧窮者間宛如免洗餐具，隨用隨丟、快速組成卻又快速崩解的社會關係；黃克先（2021）以豐而危殆的連帶來稱呼公園裡無家者雖然豐富，卻飽受各種危險因子而無法預測何時斷裂受損的關係。Small（2009）以組織連帶（organizational ties）來詮釋人們與組織、組織連結到的延伸組織（external organization）、組織內成員的關係。Mazelis（2017）以永久性連帶（sustainable ties）來指示社會連帶時間上的持久性，並對比前述作品的短暫崩解關係。

<sup>11</sup> 雖然空間內其他行動者（如大眾），但因為實際接觸程度不多，且本文研究限制難以接觸到參與活動的社會大眾，因此並未討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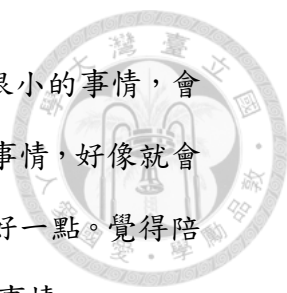




互動上多元包容、尊重差異。作為一種可累積的社會資本，它預期達成（三）資源上的互助互惠。

包容性連帶重視的並不只是行動者與行動者之間「是否」有產生關聯，還有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如何」進行。我們可以從「社會包容」的定義重修舊好計畫書的說明來理解何謂包容性連帶。就概念而言，社會包容對立於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而生，它的基本理念是不因任何社會特徵而排除任何人，透過充權（empower）弱勢者，來提高他們參與社會的程度，並且打造尊重差異、多元接納的社會環境，以此消弭社會不平等。從田野的在地語彙而言，2021 年重修舊好的計畫理念寫道「我們也看見許多人在沒有任何支持網絡及人際連結的狀態下，身心是如此破碎。因此，本會團隊認為「如何與人重建並維持好的連結」是個很重要的課題。..... 另外，我們觀察到服務對象若要在脫遊後能維持一個穩健的生活，狀態不再擺盪的話，會**需要先累積一些資本**，除了經濟上之資本外，也包含了能與他人建立並維持良好關係之能力，對於**社會道德與規範有所理解**及適應、獨立處理自身事務之能力等。而在去年試行之班會中，不僅是個大家彼此確認想法，也是個**互相理解、傾聽**的機會，基於對空間之歸屬與認同感，也希望此空間能永續經營下去，大家對於公共事務皆能踴躍發表意見，且彼此形成**互相督促、扶持**之關係.....」引文提到的包容性連帶的幾個要素，它帶來經濟上的餘韻以及心理空間的餘韻，而且它需要相互尊重、容許多元且不同的意見，也需要賦權無家者發聲，促使互助、互信的社群產生。

在理解包容性連帶的定義之後，我們需要理解為什麼重修舊好的工作者認為無家者需要建立包容性連帶。人生百味團隊從事無家議題以來的反思，促成了修復關係的社會工作方式：「我們發現：其實動力的來源都來自於「關係」，來自於「我關心誰，我想要幫助誰」的心意。」（人生百味臉書貼文）。在工作會議中，我詢問工作者「修復連帶」為什麼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工作者如此回應我：



工作者昱琪：一部分是工作中看到，可能大哥們因為一些很小的事情，會覺得全世界都與自己為敵。修復關係這件事情，好像就會讓大家能夠把過去挫折的經驗翻轉、感受好一點。覺得陪大家修復關係，就是練習好好生活的這件事情。

工作者雨橙：選擇重修舊好這個名字，與北車接觸經驗有關，掉落過程中曾經求助多處，但受到很多挫折，他也因為挫折對自己沒有自信，或對人不信任，因此想像若這個空間邀請大家來，工作者若可以和大家練習人跟人之間好的互動，可以讓他感受到社會中仍有值得信任的關係存在，也希望無家者彼此間是好的互動聯結，若能形成好的同儕關係，對回歸社會是有好的影響的。

在進入包容性連帶更詳細地討論之前，我希望在此先說明為什麼我選擇用「建立包容性連帶」而非「修復社會關係」。重修舊好的理解是「修復」關係，他們的店名就是用「修復」來取名的，而在上述的計畫書與說明之內也都可見他們是以修復的概念來期待無家者的復原。然而，修復一詞有著一種預設，它會讓人以為原先的關係是「壞」、「缺漏」的。而這個「壞掉的關係」又指涉什麼？工作者的理解是「對自己沒有自信」或「對人不信任」，進而導致他們失去了生活的動力、與人的連結。無家者的身份對於他們的自我認同有著負面的影響，且他們對與自己同身份者也會採取貶損的態度。類似的經驗在貧窮者的研究裡也時常被發現，由於貧窮者在生活的地方不斷地感受到苦痛與威脅，也讓他們不願相信身邊的人有能力改變現況，進而降低了彼此的社會融合，這些刻板印象與苦痛會負面地影響他們看待彼此的方式。(Desmond and Travis 2018)

可是重修舊好其實不是在「修復」大眾想像中無家者壞掉的關係，重修舊好並沒有想要鼓勵無家者回到原生家庭，或是與流浪前的朋友重新聯絡。當然如果無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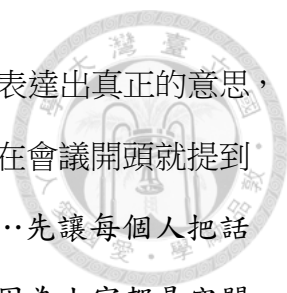
者願意這樣做他們並不會反對，但是他們更希望無家者因為「修復對人的信任」因此長出「新的關係」。因此，重修舊好在做的事情更貼近「建立」一套新的社會連帶。包容性連帶是為了將無家者「推」向工作者理想的包容性社群，而不是「推」回原本的生活。

## 第二節、包容性連帶作為一種新的社會規範

本節討論包容性連帶作為一種社會規範，它希望在（一）在制度上不排除任何人、（二）在互動上多元包容、尊重差異。而實質內容與機制在本節整理如下：其一，工作者創造制度性的不排斥，以引導無家者採用特定的互動模式達成「包容性連帶」欲促進與建立的社會關係。其二，讓無家者訴說自己的故事，藉由創作與發聲讓他們開始練習表達自己的經驗並與他人產生連結，進而達成多元接納、尊重差異的互動。其三，鼓勵無家者尊重彼此的差異、接納所有人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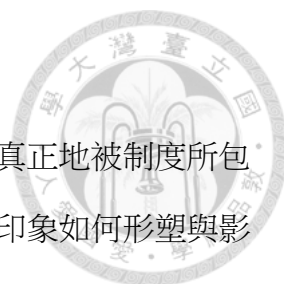
### （一） 創造制度性的不排斥

重修舊好有別於無家者生活的街頭，在這個新的空間裡工作者試圖透過制度性的設計創造不排除人的社會規範。首先，重修舊好在正式會議上有著明定的會議規則，將所有人的意見與需求納入決策考量之中。無家者過去與公權力互動中受傷的經驗，讓他們選擇不表達自己的需求，但是不表達需求可能會讓他們消極地離開被服務的狀態，或者服務無法滿足他們所需，進而被體制排除。為了改善這樣的處境，重修舊好的工作者積極讓無家者練習表達，尤其是在正式的會議之中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參與會議、發表意見，讓他們不再被排除於服務設計之外。例如工作者成茂會在班會課開始時，先詢問每個人「最近過得如何」以讓每個人有會議參與的感受，並且在討論事情時，用點名的方式詢問每個人對於事件的看法。過去社福機構傾向將受助者視為毫無能力的個人，習慣命令或是專斷地給予受助者服務的方案，這樣的方式容易讓受助者習得無助，也漸漸失去表達自我的能力。重修舊好藉由會議設計，讓無家者得以從中練習起「不排除他人」的互動方式。



在會議上，除了保障每個人的發言權之外，也需要鼓勵大家表達出真正的意思，而不是被情緒遮掩了真正的訊息。如萬事屋會議時，工作者昱琪在會議開頭就提到「今天我們會議希望大家有一個小默契，就是不要批評別人……先讓每個人把話說完，不要打斷人……」另一次班會課時，工作者成茂也說到「因為大家都是空間使用者，而每個人意見都很重要。因為大家意見都很重要，所以大家都可以說，也要尊重其他人發言。」這些會議的互動規則是為了讓與會者能夠先聽取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生活處境，再發表自己的感受。工作者成茂提到無家者原先習慣的表達方式，可能會讓會議討論變成一種責罵他人的過程，「(這些方式)是幫助他們回到原本的意思。因為他們很憤怒可能在表達憤怒，但不是本來意思。像是我覺得很不公平啊，變成他偷懶啊、油條啊，(幫助他們)從講他的訊息變成我的訊息。」工作者發現無家者在批評他人的背後其實是為了表達自己的需求，但是他們不懂得如何表達，以至於最後溝通的過程裡只剩下相互謾罵，進而破壞了彼此的信任，讓社會連帶變得不穩定。

在會議之外，重修舊好的服務也會盡量納入每個人的需求。田田是一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女性無家者，她平常動作緩慢，尤其是在洗澡更是需要花費比一般人更多的時間。由於她洗澡時間過長，導致下一位要洗澡的人沒有辦法洗，或是沒有充足的時間洗澡，而引發了抱怨。工作者在了解過後，得知是因為她習慣洗澡前先刷地板，並且將衣物帶入澡間洗，才花費那麼久時間。工作者在了解情況後，將她的洗澡順序調到最後一位，讓她盡可能不會耽誤到其他人的洗澡時間。重修舊好的督導嘉宇曾言：「重舊這裡是否會維護人的個別需要，就算影響到其他人的生活？這是你們對人的柔軟，因為你們同理他的需要。而這跟這裡其他同學的想法不一樣，甚至也跟社會大多數人不一樣。」為了保障弱勢者的需要，工作者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服務。弱勢的無家者們在此都得到了優待，以更多的機會與時間來完成社福機構的要求，他們不會因為個人特殊的需求而遭到社群遺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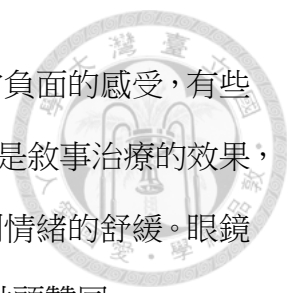


## (二) 發聲與賦權

在正式會議之外，無家者也需要在日常被鼓勵發聲，才能夠真正地被制度所包含，否則容易淪為形式上的納入而已。作為被社會汙名者，刻板印象如何形塑與影響他們的自我認同成為了無家者研究重要的一部分。Goffman(1963)污名(stigma)的概念能夠說明臺灣社會裡對無家者以遊民、流浪漢等稱呼，都暗指了這群人在街頭漂泊、遊手好閒、骯髒、惡臭等負面印象。這些負面刻板印象裡也包含社會對無家者的誤解，認為他們因為性格、道德或工作倫理上有缺陷才淪落至無家可居的處境。Snow and Anderson(1987)的經典文章，便以民族誌材料來呈現無家者如何管理形象並且形成自我認同。在無家者建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如何處理與詮釋這項負面的身份狀態關鍵性地影響他們與他人互動的策略。有些人會逃避與否認這個負面認同，有些人則是擁抱與賦權，還有些人會選擇虛構的敘事來迎合他人期待並從中獲得道德正當性。

無家者難以信任他人、與他人建立起社會連帶的原因，一方面是對他人抱持不信任與懷疑，另一方面是對於自己感到挫折，而不願意與他人接觸。無家身份及其「習得無能」的連鎖效應，都讓無家者對自身能力有著高度質疑，漸漸在接受社會福利的過程裡被形塑成無自主性的個體。建立社會關係的起點，不但需要對他人抱持開放的態度，也需要重新相信自己、肯認自我。尤其是無家者這群帶有負向經驗的群體，更需要化解他們內心對於自我的不理解。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將這個賦權的過程視為一種創傷修復的過程，它讓無家者得以從過去關係與流浪的經驗中復原，並且重新詮釋自己無家的狀態，使它變成一種具備能量、啟發的經驗。當貧窮經驗被訴說、被一般大眾認識，才有可能化解污名與歧視，進而讓這群人的生活被改變。

重修舊好舉辦的活動之一——寫寫字工作坊，是一個以街上人們的生活經驗為主題的創作工作坊。在這個工作坊裡面，工作者會引導無家者畫下與該詞彙相關的故事，並且在最後創作出一句話。在某一次以「台北」為主題的寫寫字工作坊裡，眼鏡仔分享了自己來到街上的故事。他說第一次走進社會局的那天，他感到很難堪。




大部分的無家者回想起自己開始睡在街上的那一天，通常是相當負面的感受，有些人甚至不願意提起這個回憶。而眼鏡仔在寫寫字的分享，帶來像是敘事治療的效果，給予他一個機會梳理及講述貧窮經驗，並且在這樣的過程裡得到情緒的舒緩。眼鏡仔的分享並不會得來其他人的尷尬與難堪，而是有些人默默地點頭贊同。

眼鏡仔講到對台北的印象的時候，他畫了大樓跟小屋子，把自己畫在中間，他說：「你看這個人又哭又笑，就像我，住不起大房子也住不起小房子，被夾在中間」，然後說自己從台中上來，看到很多在街上的朋友，很辛苦，然後頓了一頓，就說沒想到自己也成為在街上的朋友，你知道那天我要走進社會局，我的感覺有多難堪嗎，他在講這句話時找不到適合的詞去描述他難堪的感覺。最後就跟大家說，還是要加油啦，才能找到房子，什麼工作都要去試試，你不去試就不能說他難，然後很感謝這裡的「社會工作者」幫助像我這樣的人，他講完這句話，孟穎接著說「謝謝眼鏡仔跟我們分享了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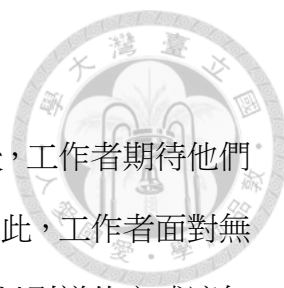
人生百味串聯其他組織舉辦的「貧窮人的台北」系列展覽，是組織內的年度盛事。這個展覽以貧窮者的生命經驗為主題，認為貧窮者的生命經驗也應該被社會大眾注意到。該展覽以孫大川的一段引言作為展覽的成立背景：「從某種角度說，今天繁華的台北，不單是成功的人、有錢人的台北，也應當是挫折的人、貧窮人的台北。」這個展覽從 2017 年起至今（2023 年），已經為期六年。2020 年以〈缺席者的發聲練習〉為名，邀請不同經驗的貧窮者，以創作的方式，敘述自己的故事、心聲。重修舊好以「創作歌曲」的方式來投入這次的展覽，他們邀請無家者們發想、創作並且請來音樂製作人來製作歌曲，並誕生《我欲離開台北街頭》與《流浪的日子》兩首曲目。工作者說「在工作坊過程，流浪的同學們說出了過去不好聊、不好說的往事，才發現彼此儘管曾經歷不同的人生，此刻卻共有著寂寞心情。」

2020 年展覽期間，無家者音樂創作展區擺放幾張課桌椅讓觀展者坐著聆聽歌



曲，抽屜與桌面上擺放著幾個紙本，讓觀展者可以隨意留下他們的回饋。某日重修舊好工作者帶著無家者前去展區觀展，大光翻了翻這些紙本，並且注意到觀眾留下的疑問。有些人表示自己在台北也有著同樣寂寞的感受，有些人詢問為什麼這些人會來到街上？大光詢問工作者自己能否回覆這些觀展者的疑惑，而後，大光慢慢地在本子上書寫：「我是大光，我來到台北車站的原因……」。當他返回重修舊好後工作者卷卷問了他對於展覽有什麼想法？大光一開始顧左右而言他地說：「(在展覽宣傳片上)方琳話很多，除了方琳之外，潘敏出現次數最多。」卷卷問有沒有這個以外的感想？大光說沒有。後來我私底下詢問大光，你真的沒有別的想法喔？大光默默地說「是不敢想，不是沒有感想。」對他而言，流浪、無家與原生家庭的衝突依舊是內心的傷痛，但是藉由展覽與互動的過程，讓他開始訴說自己的無家經驗，也從中重新理解了這些看起來負面的無家經驗，帶來自我修復的可能。大光在貧窮人的台北後，也開始願意擔任真人圖書館的分享者，他總是以幽默歡笑的口吻，道出那些他難堪的故事。

社會包容的一項要旨，是讓在原先制度下缺乏資源、管道的弱勢者，有充權與發聲的機會。藉著讓他們能夠說出故事、表達自己的意見，讓他們的聲音不再從社會上消失。從社會制度的改革與設計上容納進他們的需求與意見，使他們不再受到社會的排除。儘管弱勢者仰賴獨自力量掀起變革的可能性相當低，鮮少有弱勢者最後真的能夠靠自己的力量推翻體制，但是重修舊好工作者從讓無家者練習發聲、表達意見，成為了構成包容性連帶的要件。他們不再視自己的無家狀態、生命故事為淒慘且羞恥的，而是從這些故事裡找到與其他人連結、對話的可能。藉由讓無家者發聲與賦權，他們的聲音不再被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並且獲得了發聲的管道，以此建立起主體性、獲得尊嚴。這些效果不只發生在無家者與社會的關係，也對無家者與他人建立包容性連帶產生作用，因為他們能夠成為網絡裡具有主體、主動選擇權的行動者，他們願意開始與他人建立關係、表達自己想要建立的關係。




### (三) 多元包容、尊重差異的互動方式

當無家者被制度納入了，並且嘗試表達自己的經驗與想法後，工作者期待他們能夠以多元包容、尊重差異的方式去理解不同人的生命經驗。以此，工作者面對無家者間的衝突時，他們並不會以責罵的方式批評無家者，反而是以引導的方式讓無家者說出自己的需求與感受，讓彼此能夠理解對方多元的需求，而非將別人的行為以「自私自利」或是「搞破壞」等理由去詮釋。

無家者小黑是個約莫三十歲的男性，他有輕微的智能障礙，但是因為與其他年輕男性共享校園時期的幫派經驗，讓他融入進重修舊好年輕男性的社群。不過，小黑在日常生活裡有其他會令自己與他人困擾的事情。例如小黑容易嗜睡而且有尿失禁的困擾。小黑有點在意自己尿失禁的問題，這讓他感受到不堪，因此工作者會希望當這件事情發生時不要直接地點破他。有次我帶著小黑進行萬事屋的打掃，中途發現他的褲襠處有一小塊的污漬，原先我沒有太在意，但過了幾分鐘污漬慢慢擴大與變深，我才意識到小黑尿失禁了，但是本人沒有察覺。在詢問工作者阿童後，她告訴我提醒小黑「褲子髒了要不要去處理一下？」，後來小黑進到廁所處理。該打掃處的屋主見狀，在小黑從廁所出來後，默默地走到廁所裡面「巡一巡」，我像是擔心小黑把廁所弄髒。所幸如此傷人的舉動，小黑並沒有看到。作為對比，某日重修舊好的午後，小黑坐在門口的紅色絨布沙發上睡著了。過了沒多久小黑醒來，並且發現自己尿失禁，紅色沙發有著一塊污漬。在他處，所有人必當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嫌棄尿的髒、臭。但是意外地，當下小包、大元等人都紛紛遞上水、衛生紙協助擦拭。接著，大家開始討論起來這個沙發也久了、髒了，剛好也需要清洗。於是大家便打算將它搬到三樓頂樓做清潔。當時大元先嘗試搬了上去，但發現樓梯太窄上不去，小包便轉了方向，用一股巧勁將沙發台上樓梯。大家發現小包搬東西的技術，在一旁替他喝采。最後小包、小黑與工作者雨橙一起清潔沙發。這整個過程令我印象深刻，沒有人責怪小黑尿失禁的問題，大家甚至把它當成一個有趣的任務，一起思考怎麼洗沙發、怎麼搬上樓梯。






在另一次卡牌創作課程裡，無家者藍弟以一張「一個趴著的女人旁邊有太陽」的卡牌來說明自己最近發生的一件好的事情。他說有一次他和小花吵架，吵的很嚴重，因此他朝小花丟東西，但沒有丟中小花。工作者潘敏知道這件事後約了藍弟私下聊聊，但她不是去指責藍弟，而是去詢問他的狀況怎麼樣，和他說哪裡是不對的，最後也很親切地問他要不要去洗澡了。藍弟覺得雖然自己做錯事，但潘敏還是很溫柔很親切地對待他。在潘敏詢問的過程裡，藍弟一方面感受到工作者的關心與愛，也理解到面對爭執時，應該要先理解自己的負面情緒來源。另一位無家者周姊擔任重修舊好內的清潔員，某天潘敏發現洗手台下面有很多積水，請她協助清理。她清到一半時變發了脾氣，「一定是小花弄的，因為她中午叫我幫她丟垃圾我沒幫忙」。不過那攤積水並不是小花用的，待潘敏解釋完畢後，周姊開始抱怨店內的其他人。潘敏便耐心地跟她解釋，店內所有人的生活習慣並不相同，周姊聽完後回覆，「好啦好啦，我知道自己脾氣不好，今天心情也不好」。

工作者藉由人際互動的牽引與模仿，是一種試著「捲動更多人參與的共同作伙修補」的過程（黃克先等 2023）。工作者希望能夠建立重修舊好多元納入、尊重差異的互動氛圍，讓這樣的互動形式成為組織內的文化。為了形塑該氛圍，在制度設計上需要納入大量的會議與討論環節，且工作者需要以身作則，與無家者間建立起包容差異的互動，也需要在無家者無法以此方式互動時，引導無家者做出這樣的互動，並且向無家者解釋為什麼需要採用這種互動方式的原因。

重修舊好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包含身心照顧的課程（健康照護課程、心輔犬、瑜珈等）、生命敘事療癒活動（藝術創作、寫寫字工作坊）、重修舊好事務討論與實作（重修班會、重修小菜園）。在這些活動之中，無家者得到了理解他人的機會。在生命敘事療癒活動裡，參與者給予彼此回饋是這個活動相當重要的一環。社工們會比較積極地去引導無家者給予回應，例如主持人孟穎會詢問大家「你聽到 XXX 說的話，有什麼感受呢？」例如某次明仔在以「節日」為主題的「寫寫字工作坊」裡寫了「過年是全家人最快樂的時光，相聚的機會隨著小孩的成長過程越來越不容



易」他提到離婚後，多年奮鬥的房地產皆歸前妻所有的經驗，並告誡大家即便在婚姻當中，仍要記得保護自己。小黑聽到明仔的經驗，也默默以同理的嘆氣聲及「好慘」等簡短語句回應。在另一次以「大人」為主題的「寫寫字工作坊」裡，藍弟說當 18 歲有獨立能力後，決定離開家，到台北車站過了很辛苦、很痛苦的 18 年流浪生活。他努力的堅持直到遇上協助自己的社工，並去做了以工代賑的工作，有能力可以靠自己的力氣賺錢。在下重大決定的時刻，和做了決定之後也努力承受了自己選擇的結果，直到現在能工作，都是藍弟覺得自己像是大人的時刻。秋秋給了回應，建議藍弟可以到就業服務處問看看工作。重修舊好工作者欲建立的包容性連帶，不只注重個體的復原，它也期待個體與他人之間會形成相互包容、互助互惠的關係，多以信任作為基礎。因此工作者希望藉由這些設計過後的活動，能夠增加無家者對彼此的信任。

在這樣的互動方式之下，無家者也開始改變他們理解同儕的視角。合合姊曾說「……就覺得這些人也有故事，這些人也有原因。有些在流浪的人很可憐，衣服是髒的，也不洗澡，你經過他們的時候味道是很重的。你們也包容他們一下，他們不是故意，他們是心靈有障礙，心靈有障礙所以跨不出來。也不用給他們錢，走過去就好了。」在某一次公開分享後，有觀眾提問為什麼合合姊願意站到台前講這些一般人認為「難堪」的故事，她說「每個人的角度不同，我看你是一邊，你看我是另一邊，但每個人都是圓的，所以我們看人的眼光要試著『圓柔』一點，而不是從上面的眼光去看，是從謙卑的角度去看。這是我的生命經驗，所以我想分享。」

### 第三節、包容性連帶提供的經濟資源

第三節與第四節將說明包容性連帶作為可累積的社會資本，如何帶入資源。本節將以眾多小故事來說明包容性連帶如何帶入經濟資源，這些資源一方面成為包容性連帶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體現互助互惠行為的存在。



### (一) 無家者間的社會連帶：小尺度的日常互助

重修舊好內的無家者們有時候會進行手工藝的交易、工作的轉介或是親職照顧的建議。這些互惠的行為看似微小，卻得以讓貧窮者維持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他們透過交換、互惠與相互照顧，滿足生活所需、解決生活中遇見的難題。在重修舊好內最常見的日常互助，便是借菸與借錢。由於香菸的花費較低，向他人借菸並不會引起太大的爭端，也是向彼此釋出善意的一種方式。有吸菸習慣的無家者們會在重修舊好門口抽菸，如果偶遇有人身上沒菸的時候，他們會跟其他人借菸。借錢也是常見的互助行為，但是金額如果太高也可能會引發後續的衝突。無家者大元是一位年輕的男性無家者，年紀約三十多歲，曾有一段時間工作不穩定加上他自身的消費習慣，有時候會面臨身上無錢的窘迫。大元曾和鍾姊借錢，金額大約是一兩千元。其實大元和鍾姊並不熟。鍾姊是一位年約六十歲的大姐，而年輕人們並不那麼喜歡鍾姊，他們認為鍾姊相當嘮叨、甚至有點煩人。因此當我知道大元和鍾姊借錢時相當意外，但似乎大元認為鍾姊身上有金錢的餘韻，鍾姊也認為大元時常出現在重修舊好，也算是可以信任的人，因此借錢給他。只是，我曾目睹鍾姊提醒大元要還他錢，而大元當下表示自己身上沒有多餘的現金可以還她，而後鍾姊向我抱怨他積欠許久。

無家者間的互助行為也包含小型的勞務交易。阿青姐是一位女性無家者，年紀大約五十歲上下，平常以手工藝為生。她考取了街頭藝人證照，會在熱鬧的捷運站口販賣她的串珠商品。她聽見我在研究無家者時，曾經告訴我「你不用研究我，你應該去研究他們（指著其他在座位上的無家者們），我是特例。」她的自我認同似乎已經不是流浪的人，但她並沒有固定的居所，平常是睡在旅館內。某次阿青姐跟我聊天到一半，小花拿著她的手環走了過來希望阿青姊能協助修補，兩位隨即進行了簡單的交易。此種簡單的交換行為在重修舊好時常發生，例如拿兩三根香菸換得縫補褲子破洞的協助。社工並不會阻止這樣的交易行為，認為只要無家者們雙方都同意即可。



小花「我這個手鍊斷掉了，可以幫我裝嗎？」

阿青「可以，我看一下。」

小花「兩個禮拜再還我就可以。」

阿青「今天幾號？」

阿童「4月8號。」

阿青「那16號我過來，再給你。但我會意思意思收50塊，因為我們這邊認識有緣，這個平常我要收100塊。」

小花「我先給你好了，我怕你不幫我弄。」小花一邊拿出50元給阿青

阿青「不會啦！」

另一個例子是合合介紹工作給福福。那天合合在重修舊好聊起自己最近的洗碗工作，是在臺北市知名飯店裡擔任服務生，合合說著宴會餐廳的碗盤非常笨重，端盤子很疲累，並且細數她的排班與薪資。這時候合合突然轉頭問福福「你有沒有確認要去工作？」福福追問了集合時間和地點。合合回覆「4月16日五點半工作，你四點到，不然沒有飯吃。」我問合合這個工作是她自己找的吗？合合說是朋友介紹的工作，只是假日打工而已，目前已經去了兩次。合合跟我說到有些是獅子會的聚會，我問這樣盤子很重嗎？合合說湯都是小鍋的，還喝不完。我問能不能打包？合合說飯店管很嚴，都不能拿，而且進去要換證件跟制服。後來合合給我看工作的line群組，是「XX飯店餐飲團」，人數有45人。福福在一旁補充之前的工作經驗，有些宴會廳廚師上菜速度很快，就比較累。因為廚師希望趕快上完，這樣就可以休息。

合合和其他男性無家者的關係不錯，時常有互惠的行為。而其他女性無家者通常都和男性無家者沒有太多的交集。合合和家人的關係緊密，她有五個小孩，都一直保持聯絡，偶爾她也會帶小孩來重修舊好串串門子。這些小孩裡有些人成年了，




也知道如果要聯絡媽媽連絡不上，可以聯繫重修舊好的社工。有次合合帶著年紀最小最令她頭痛的男孩來到重修舊好，我看見小孩與一位無家者大元坐在外面。合合走進門內，她嬉笑地跟我說「我叫大元跟他講話，我趕快來收東西。」我笑鬧著請她趕快收拾，店內要關門了。合合這時臉色變得些微嚴肅，告訴我「我要請大元告訴他怎麼『轉大人』啦！讓大元教一下，不然我很頭痛。」以表示希望我可以多給她一點收時間的時間。意外地在服務無家者的組織裡，出現了成員之間協助親職照顧的場景。事實上，在美國貧窮者社會網絡的研究裡，親職照顧是相當頻繁出現的互惠行為。許多單親貧窮媽媽會照顧彼此的孩子，單親母親們就有機會外出工作賺錢養家。然而在無家者社群裡鮮少會有原生家庭成員出現，因此親職照顧的相互協助就極少出現。

雖然無家者之間有經濟互惠的行為，但是這些互助能夠提供的協助有限。這樣的結果最大的原因在於無家者貧乏的經濟資源，使得他們並不能夠給予彼此太多的經濟支持。即便是借現金，金額也常常在幾千元以內，不太可能是太大一筆錢。雖然這樣的協助僅侷限在小尺度之內，但是無家者間在經濟上的互助行為，便能夠呈現他們之間並非是毫無相關的個體，而是在機構內與彼此串連起互助的網絡。

## (二) 無家者與助人者的社會連帶：跨越專業的協助<sup>12</sup>

當社會工作者欲保持專業倫理，助人者與無家者之間鮮少會發展出職務以外的救助行為。助人者應該與個案之間保持專業關係，是社會工作者最基本的認知與理解。所謂專業關係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是基於專業服務需要所建立的工作關係，這種關係的建立是以一個特定的目標為基礎，是社工與案主在互動過程中，

<sup>12</sup> 我欲先區分「組織連帶」與「無家者與助人者間的社會連帶」之差異。關注正式福利機構中的社會連帶有以下兩種：其一，Mario Small (2009) 與 Watkins-Hays (2013) 關注「組織連帶」，意旨人與組織間的連結。他們認為這些社區機構 (neighborhood institution) 作為貧窮者社會網絡的中介者 (broker)，替行動者帶入經濟資源與資訊。其二，Mazelis (2017) 關注的是組織內的「社會連帶」。她強調的是「成員與成員間」的連結，只是這個連帶建立的場域在組織內。Mario Small (2009) 提到組織連帶有可能轉變成社會連帶，組織連帶也涉及人與人的層次，但是它是因為位置 (position) 而非個人 (personality) 而產生關聯。若是組織成員與工作者產生私下的情誼，那以社會連帶稱之會更為妥當 (p. 251-52 N4)。因此，組織連帶與社會連帶是並存在組織內的。




一種情緒與態度交互反應的動態過程，所形成的一種雙向交流與互動的經驗。(潘淑滿 2000)《社會工作師倫理守則》中也規範「社會工作師應與服務對象維持正常專業關係，不得與服務對象有不當雙重或多重關係而獲取不當利益。」雖然借錢給個案並沒有被明訂在社會工作的規範之中，但是社工師與個案間若有金錢往來，則有跨越專業關係的風險。因此，傳統且正式的社會福利機構可能會規定社工人員不得與個案有金錢借貸的行為。

然而，重修舊好內的助人者一個案間的關係，並不像是傳統助人者與無家者間的關係。重修舊好工作者的背景未必是社會工作專業，因此並不會受到傳統專業倫理的局限。而且人生百味並不倡導一個規範性、清楚的工作者與個案關係，他們認為助人工作的基礎便是個人與個人間的互動。在我進入人生百味擔任實習生時，工作者就曾經說到「因為這裡是一個注重人的地方，每個人一定都會有喜歡的人和討厭的人，我們認為人跟人的關係本來就不會都一樣……」。事實上，傳統的社會工作專業近年來也受到質疑，過度強調專業關係的社會工作方式，也可能帶來負向的效果。強化社工做為助人者的形象，同時也僵化案主必須是受助者的他者形象；雙方角色固著的結果將原本助人關係的雙向流動變成單向的給予，否定也剝奪了社工在助人關係中也受助的事實(王增勇 2013)。

由於重修舊好打破了傳統助人者與受助者的界線，工作者也與無家者建立起包容性連帶。兩橙是一位長老級的工作者，重修舊好內許多無家者是由她的介紹而來到這個空間。她對於無家者的關心與照顧，受到許多無家者的認同與讚賞。兩橙曾經以個人名義，協助一位無家者申辦個人手機門號。然而，由於無家者的收入並不穩定，有些時候可能拖欠門號費沒有繳，有時候工作者甚至找不到人討回這筆錢。由於申辦門號牽涉到個人信用的問題，一般人可能根本不會冒險，但是兩橙認為她與個案已經建立起足夠深的信任關係，她也相信她協助的個案不會人間蒸發讓她需要承擔過多風險，抑或是這樣的風險也是她能夠承擔的。

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偶爾也會借無家者現金，幾乎在重修舊好的工作者都有借




現金的經驗，組織也留給工作者一定的空間，自行進行評估是否願意借錢或是其他形式的擔保。某次無家者眼鏡仔向我詢問能不能協助他繳電話費，我詢問潘敏她個人的經驗，她先向我解釋了若協助眼鏡仔繳電話費，可能會發生的風險：「我不確定他需不需要這支手機，應該只是怕違約金，但我請他先用線上客服問他的違約金會怎麼算，他一直沒有去做這件事……這次繳了之後每個月可能都要幫他繳，加上他之前還欠我五千房租錢沒有還，回來也還有罰鍰要繳，我自己是覺得先繳的話要不回來機率比較大……」當我詢問工作者潘敏「這是否會有工作上的疑慮？」潘敏告訴我「我覺得工作上還好，可能他會把這個互動結果歸屬於你，所以你可以自己拿捏。」由此可見，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將工作者與無家者間的互助關係視為一種個人的行為，而從這樣的借貸關係之上，發展出的是個人間的信任以及後續開展的社會連帶。

相較於組織提供的資源，工作者提供給無家者的經濟協助屬於工作者的個人行為，它需要仰賴兩個人間的交情、信任與社會網絡，並不像是福利機構只要具備機構成員的資格就能夠享有福利。因此這樣的關係更能夠體現重修舊好內具備互助的組織文化。雖然在經濟資源的輸送上，因為雙方經濟資源的落差，多是工作者單向協助無家者。然而，相比其他機構多遵守社會工作倫理的規範，重修舊好內出現工作者－無家者個人間的互助行為，打破了傳統社會福利機構建立起的助人圖像，也證實了無家者與助人者之間建立起超越專業關係、位置（position）而來到個人間的社會連帶。

### （三） 組織連帶：福利資源的入口

社會福利組織提供個案經濟資源，與前兩種個人間的連帶不同，組織連帶不只是讓無家者度過生活難關而已，更預期讓無家者脫離貧窮的經濟狀態。非營利組織、社區據點作為社會網絡的中介者（broker），將福利接收者連結到更大的福利網絡之中。原先無家者可能只和單一的福利機構有接觸，然而建立起組織連帶後，他們更容易接觸到其他福利資訊，也會被轉介到其他福利單位，進而享有更多資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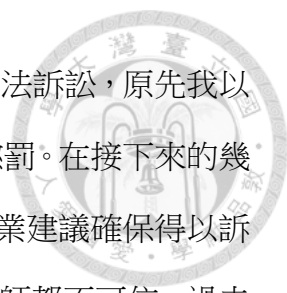


有機會建立起與其他社會經濟地位者的弱連帶而脫貧。社福機構作為福利資源的入口，除了引介更多的資源外，也可以更具規模性、穩定地輸出資源。社福機構相比單一位助人工作者更能夠凝聚社會福利資源，並且以制度性的方式管理，使得資源匯聚與發放變得更具有效率與規模性。首先，社福機構能夠向企業或是政府申請經費、承辦計畫進而引入大筆的資源；其次，社福機構能夠向社會大眾宣傳、招募資源，由組織作為善心人士與受助者間的中介角色，確保資源為受助者所需要，並且降低民眾捐贈資源的門檻。最後，社福機構內的資源不會僅限於基本生存物資，也包含需具備專業知識的資訊，例如社會福利申辦資訊、醫療資訊。當社會福利機構匯集這些資源與資訊，無家者僅需要前往單一個定點，就有機會能夠獲得這些物質資源與福利資訊，尤其是後者更有可能協助他們向上流動。

重修舊好內的社工也會提供無家者專業的社會福利建議，例如工作者兩橙協助多位無家者進行扶養義務認定的訴訟，待通過這個認定之後，與子女長期不具備撫養關係無家者才有可能獲得中低收入戶的申辦資格。當面臨到無家者們官司纏身，重修舊好的社工們會尋求法律扶助基金會（法扶）的協助，透過和律師討論當時犯案時的困境，以此爭取減刑或是緩起訴。此外，無家者也可能因為受傷、身體狀況不佳等需要住進安置機構，而重修舊好的工作者會將他們媒合到風評較佳或是較適合的安置機構內。雖然機構轉介是社會福利系統內常見的作法，但若沒有專業工作者的指引與協助，福利接收者其實很難知道相關的資訊。在我田野期間，很常發現許多福利資訊其實並沒有對外公開抑或者很難注意到，如果沒有機構作為橋樑，實在難以和福利網絡進行連結。

同時，誠如上一章所述，無家者過去與公權力、專業人士互動往往是負面的經驗，這樣的結果也讓他們不太願意接觸專業人士（尤其牽涉司法與警政系統），進而可能失去原先應有的權利。境姊因為兒子的家暴行為而不願返回家中，她長期睡在街頭上，但是會回家洗澡。某日她帶著傷返回車站，當我與工作者兩橙去街訪時才知道她的兒子再次對她施暴。工作者兩橙氣憤地替她抱不平，同時提出申請保護






令的方式制止兒子的暴力行為。然而，境姊卻百般不願意進行司法訴訟，原先我以為是她不想和兒子鬧上法院，但是她卻頻頻表示想讓兒子受到懲罰。在接下來的幾週，工作者雨橙幫境姊約了法扶的律師，希望能夠由律師給予專業建議確保得以訴訟成功。然而，境姊卻屢屢爽約，在我詢問之下她才氣憤地說律師都不可信，過去曾經在官司裡受挫、被律師欺騙的經驗，類似的經驗與感受，讓她習慣在公權力面前做一個失語者，選擇放棄自己在公權力系統上的權利。社福機構常常是貧窮者接觸公權力體系的一個入口，也是他們相對更可以信任的窗口。因此，若能夠與社福機構有所連結，他們便更有機會接觸到廣大的福利系統。

不僅是福利資源，重修舊好提供的經濟資源包含：餐食、衣物、電子設備、社會福利資訊、工作機會。在餐食的部分，重修舊好空間內有一個開放式的鐵櫃，固定擺放社會大眾捐贈的乾糧，有時候是一些餅乾、罐頭，有時候是泡麵、拌煮麵。除了乾糧之外，有時候冰箱會有社會大眾捐贈的菜餚，有時候是前幾天舉辦活動剩下的食物。從 2021 年五月疫情肆虐至我離開田野的 2022 年三月，人生百味固定會在臺北車站發放便當，重修舊好的工作者通常會一同詢問有哪些無家者們當日也需要便當。若是當天便當有剩，則會提供給詢問時不在場的無家者。這些食物看似微薄，卻是無家者生存的重要資源。在疫情尚未爆發之前，重修舊好並沒有每天提供便當。雖然當時偶爾會有善心人士到臺北車站發放便當，但因為時間與數量太不固定，並不能保證無家者們的溫飽。有一段時間，無家者大元並沒有固定的工作，加上他個人的消費習慣，導致他偶爾身上沒有現金能夠買飯。碰巧那段時間，有位網紅捐贈了兩三箱的乾拌麵到重修舊好，數量相當充足，他便每天都拿取鐵櫃上的乾拌麵或是泡麵來煮，以此度過那段艱苦的時間。重修舊好工作者也會張貼社會福利或是展覽資訊在公布欄及門口，讓前來使用空間的無家者們可以得知這些資源。除了定點公布之外，工作者也會在一季一次的空間會議(重修班會課)上宣布資訊，例如工作者就曾經說明半夜緊急的醫療資源、租屋補助等資訊。

重修舊好提供的另一項經濟資源是工作機會，這項資源是無家者們最重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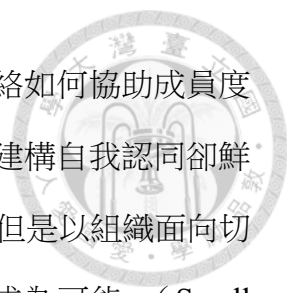


資源，因為他們有可能透過工作存錢進而脫遊。重修舊好內的工作機會可以分成兩種：其一為重修舊好內的培力計畫，以簡單的手工藝為主，工作收入相對較低，多交給工作能力較差的無家者們執行；其二為「人生萬事屋」工作隊，此為人生百味零工媒合的計畫，由工作者媒合清潔與粗工的工作，並不收取佣金，由工作能力較佳的隊員執行，工作收入高。這兩項工作機會都需要由組織引入資源才得以進行。組織帶來的經濟資源因為較具有規模性，對於無家者的幫助較大，也更有機會協助無家者擺脫當前的貧困狀態。無家者方哥就曾說「這個（工作機會）才是實實在在幫助街友，有一點收入，雖然不是很多但慢慢累積，日子也慢慢過，當然越累積越多。」雖然無家者並不是有了這些經濟資源就能夠脫離街友身份，但是這些經濟資源確實帶來了他們生活上的一大改變，讓他們得以維持在較佳的經濟水平。

無論是無家者間的連帶、無家者－助人者的連帶，還是組織連帶，它們都提供了經濟支持。而這種藉由交換技能、互相協助的經濟模式，需要仰賴成員間的信任。包容性連帶的出現，促使成員之間信任的提升，進而也願意在日常生活中協助彼此。當成員的經濟資源變多、經濟能力提升，它更有可能消弭成員間因為經濟條件落差而產生的排除狀態。藉由經濟資源的流通，包容性連帶企圖帶起所有成員經濟條件的改善，並且從互助的過程裡再次增加彼此的信任。

#### 第四節、包容性連帶提供的社會與情緒支持

社會連帶的功能不限於滿足物質需求、帶來經濟上的資源，社會連帶也提供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與情緒支持（emotional aid）。人們透過社會網絡取得了各種物資與勞務的物質資源、情感交流與支持的心理資源、如尊嚴、名譽與道德感的象徵資源（Duneier 2018[1999]; 黃克先 2021a; Reitzes, Crimmins, Yarbrough and Parker 2011; Koch et al. 2020）。Duneier（2018[1999]）發現街頭上的社會網絡帶給底層黑人小販們愛與尊嚴；黃克先（2021a）研究臺北無家者在街上的生活，同樣說明了無家者的人際網絡在協助彼此的過程裡如何帶給他們「尊嚴」，但這樣的連帶卻容易因為街頭上的突發狀況而危殆（precarious）。Halpern-Meekin（2019）批



評過去社會資本的研究，多強調這些在組織內建立起社會網絡如何協助成員度過經濟上的困難，但是對於這些人際網絡如何帶來心理支持與建構自我認同卻鮮少著墨。儘管社會連帶的情緒支持在貧窮研究裡逐漸受到重視，但是以組織面向切入的研究多未能更進一步描繪這些心理支持是如何在組織內成為可能。(Small 2009, Watkins-Hays 2013, Mazelis 2017) 在本章第一節已經說明重修舊好得以建立這種連帶的機制，在本節將會以故事來刻畫他們如何在這樣的連帶裡獲得社會與情緒支持。

### (一) 從共煮中獲得尊嚴

傳統慈善單位多以發放食物、物質資源為救助無家者的方式，許多無家者也仰賴這些資源過生活。然而，其中的缺點之一就是不能夠自己選擇想要吃的東西，且總是會產生「拿人手軟」的感覺而損害了無家者的尊嚴。當無家者有錢能夠購買自己想要的食物時，他們感受到的情緒是非常正向的。在重修舊好最常出現的互惠行為，即是「共食」。無家者彼此之間會分享食物，也會一起煮飯，就如同在家一同共用餐點。無家者們自己煮飯、料理，一方面肯認了生活自理能力，也透過「煮飯」這件事情成為有能力給予的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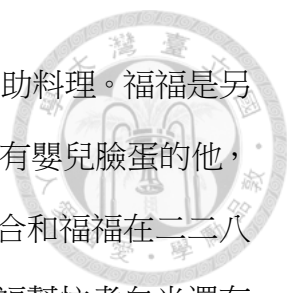
在萬事屋的訪談內，昱琪問了小 K「每次工作完心情怎麼樣？」，小 K 回答「很開心，因為跟以前比，現在要吃什麼就可以吃。」決定自己的三餐看似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但是當這件微小的事情反覆發生時，就有可能影響到一個人的自信以及對自身能力的認知。藍弟也認為重修舊好讓他生活變得穩定，他可以在這裡好好休息，不需要去教會拿飯，這裡就有便當吃。在重修舊好生活的無家者們，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有工作、三餐吃外食，但是透過回收業、大眾捐贈的物資，或是社會福利補助所獲得的微薄金錢，讓在這裡生活的無家者們得以去菜市場買菜，並在重修的廚房裡煮飯菜。他們料理的三餐並不是什麼美味佳餚，而只是很單純的一鍋料理。有時候是煮熟麵條，配上一些青菜，抑或是加上乾拌辣油、麻醬去拌炒；有時候是將前一天的剩菜重新料理；更多時候是罐頭的拼拼湊湊。無家者們在重修舊好日日



相見，長久下來也累積起對其他人的熟悉感，而他們「一起吃飯」的事實，讓彼此的關係更為緊密。

田田、小欣和均均就像是一群小朋友一樣，會幼稚地好奇彼此的生活過得如何，也會簡單地協助彼此的生活所需。田田因為思覺失調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均均有中度智能障礙，小欣因為抗拒就醫，雖然有明顯地精神狀況事實，卻未有相關身份。小欣曾經在某次以「朋友」為題的繪畫過程裡，畫了一個小男孩與小女孩掛著笑臉地盪鞦韆，她說這是弟弟，是她印象中的朋友。小欣平日和均均的互動，就像是她照顧弟弟那樣，會詢問均均要吃什麼，順便協助他煮飯。某日在大約傍晚五點的時候，重修舊好的無家者逐漸從午覺中甦醒，抓緊時間在關門的六點半前料理完晚餐。那天，小欣依舊有煮均均那份餐，但是均均跟小欣說自己想吃米粉，請小欣煮一包下去。小欣「改天好不好？你又沒有配料，沒有香菇那些」，均均回答「洋蔥就是配料啊」，小欣「那我們等一下配咖哩，配咖哩好不好？」，均均點頭表示同意，小欣又說「你去添飯，咖哩好了再倒給你」類似的互動時常在他們身上發生。他們因為重修舊好而開始有了互動，廚房設備給予他們互動的契機，漸漸發展出相互依持、共同生活的互動模式。後來均均住進了人生百味的住宿據點——人生家屋，也比較少在重修舊好活動。某次活動均均返回重修舊好參加活動，田田遇見了許久不見得均均，露出難得開心的微笑，眼睛眯成一條線。田田問均均「你現在搬出去了喔？」均均笑著點頭說是，田田又問「過得好嗎？」均均又再次微笑點頭，後來他們簡單地交換了彼此的生活，因為太溫暖的問候，惹得在一旁的無家者與工作者都暖心地笑。

合合的老家在花蓮的原住民部落，育有五個小孩，時常因為孩子的事情一個頭兩個大。儘管露宿街頭，卻仍需要工作賺錢，負擔兩個未成年孩子的生活費。雖然生活苦不堪言，但她樂觀開朗的個性，總是喜歡開玩笑逗樂大家。合合的人緣很好，能跟幾乎所有人說上幾句話，大家都曾和合合有良善地互動。某次合合從花蓮老家回來，攜帶著家人給她的食材：有家人自己採的野菜、在外購買的豬肉，以及家中



的米。那天下午合合和福福一起煮菜，合合一如往常地請福福協助料理。福福是另一位中年的男性無家者，年約 40 歲左右。雖然年紀不小，但是擁有嬰兒臉蛋的他，視覺年齡比真實年齡小了不少，就像是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合合和福福在二二八公園相識，兩個人活潑樂觀地個性讓彼此結成了朋友。合合請福福幫忙煮白米還有顧豬肉，自己則跑去整理東西。福福顧豬肉到一半，想要還給合合，回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是福福有點不敢直接跟合合說，擔心自己答應的事情沒有做完。這時候工作者卷卷就告訴福福，要如何委婉地表達自己的需求。當福福向合合說出這件事情時，合合的另外一位好友軒秀姐自動說願意幫忙。在一旁的大光大哥看見這些食材，也參一腳想要共同料理。結果最後演變成大家一起煮飯，合合、福福、軒秀、大光四個人共同完成這個料理。

工作者看見大家那麼喜愛煮飯後，也時常籌備一些共同煮飯的活動，或是準備食材讓大家可以料理。有一陣子方哥非常喜愛煮雞湯，偶爾會自己花費金錢買雞肉來煮給大家吃。方哥會在雞湯內加入鳳梨還有苦瓜，變成鳳梨苦瓜雞湯。某一次他煮好雞湯，將雞湯分成小碗先給了工作者一人一碗，另外我詢問他還要給誰，他先分送給了工作隊的成員，平常有在互動的合合、福福，最後再拿給其他在重修舊好時常出現的無家者。方哥煮雞湯煮了非常多次，後來大家比較沒有那麼熱衷在喝雞湯，他還是會希望大家要「捧場」。對他而言，煮雞湯給大家喝是一種對重修舊好店內的付出與回報。

今天早上有人送來兩袋食材，一袋半熟的雞肉，另外一袋是小菜。工作者雨橙請方哥看一下食材，選擇要怎麼料理。原先方哥以為是要怪他把食材留在冰箱裡，便臉很嚴肅說「那不是我的阿」但是後來方哥得知是要請他料理，便非常開心。與其他人討論要如何料理。後來煮了雞肉、泡菜還有飯，給大家吃。方哥看到我買飯，便說他有煮我還買飯是不給他面子，會一直說「捧場一下啦」、「吃一下」。煮好後，大家開心地吃飯，如果有稱讚他，方哥便會非常開心。當方哥一直問工作者卷卷要



不要吃、捧場，但是工作者卷卷不想吃。後來工作者潘敏便說「人家不想吃就不要勉強人家」才終止這個邀約。(田野筆記 2020.08)

共煮是在重修舊好提供廚房、食物以及廚具設備才得以發生，這些資源也讓他們相對於在街頭上有一個更有尊嚴的生活。工作者就曾說道，街頭上的生活是一個辛苦、艱辛的生存環境。不僅在睡眠的時候可能時常被打擾，更容易有意外發生，例如暴力事件、性騷擾等。每個人在街頭上偏好自保的策略（黃玫玲 1995），或是基於自利的心態出發，協助他人完成某件事情。然而，無家者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之下，卻又想協助別人、成為幫助他人的人（黃克先，2021）。在這樣的互惠過程裡，他們不再是先前需要等待他人協助的個體，而成為了有尊嚴、給予的一方。方哥曾提到「昨天有老師帶小朋友來發便當，小朋友發餐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很落漆，不想拿」工作者追問了為什麼，他回答「因為覺得自己很難過，覺得自己很弱，小朋友沒有工作還要拿小孩的便當，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很弱、沒有尊嚴。不希望自己被當作弱勢。」對方哥而言，共煮、互惠的過程裡得到的尊嚴是他最在意的事情，有別於受助狀態裡的感受。

在不同文化脈絡的貧者社群裡，「共煮」與「共食」都別具意義。Reitzes et al. (2011) 研究公園內的無家者社群，發現分享食物是一種非正式展現關心、提供支持的方式。周上智（2019）更發現在華人世界裡，弱勢組織透過「共食」來打造擬家的空間，共食具有的情感意義出現在每一個成員的交際網絡中，建立並強化彼此的關係。漢人對於「家」的想像包含共財、共住與共食，雖然無家者在重修舊好並沒有達到共財與共住，但是在共食的面向卻也勾勒出一種親密、互助與共享的社會關係。

## （二） 無家者間的羈絆


無家者在機構內建立起的社會連帶，替他們帶來了相當大的情緒支持。對於彼此而言，這些人就是他們的朋友，甚至是像是家人一樣的存在。這些人給予彼此生



活上的情感支持，從中感受到了同儕的歸屬，抑或是帶來生活上的指導。在同儕有來有往的互動之中，他們陪伴了彼此渡過一段艱困的時光。

重修舊好一群二十到三十初頭的年輕男性，小 K、阿明、眼鏡仔、力翔、大元還有小黑。小黑雖然領有中度智能障礙手冊，但是共享的神明信仰以及隨和的個性，讓年輕人接受與他一起玩樂與生活，尤其是小 K 和阿明跟他最好。這群年輕人最常一起吃飯、打網咖，就如同一般要好的朋友那樣。在我進入田野的初期，這群年輕人剛好來到重修舊好快一年的時間，慢慢地也開始有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力翔碰巧遇上了手工藝老師的重視，而在 2020 年中就前往另一個社福機構生活，便較少和其他人相處。小 K 說自己原本生活在臺北車站，來到重修舊好後認識這群人才開始移往二二八公園休息。這群人平常會一起娛樂，力翔、阿明與大元就曾經一起去一間東區的酒店消費，看著火辣的美女跳舞。他們笑呵呵地提起這段往事，說如果只點酒的話並不會花費太多錢，也因此能夠彌補在街頭未能被滿足的性慾。他們最常一起在網咖休息、打遊戲、吃飯、去年輕人逛街的地方晃晃，或是一起出陣頭。小 K 認為彼此的關係是「朋友」，但相處起來他們還是比較像「哥哥」，因為其他人偶爾會對自己說教：「大元會叫我看開一點，我心情不好他看的出來，大概也知道我為什麼心情不好。」小 K 說自己和力翔也會對大元說教，因為大元錢花得很兇、有錢就每天跑網咖，力翔會比較認真地勸大元要留一點錢在身上，小 K 則在旁邊開玩笑說：「你錢不知道花到哪，要不要幫你花？」

在 2020 年九月左右，阿明因為官司入獄服刑，這幾位年輕人身上有著大大小小的官司，大多是輕罪為主，例如偷竊、詐欺、傷人等等。在街頭的生活讓他們反覆地在司法體系內流轉，工作者提起無家者經常遭遇的司法處境，「車站的無家者們常違反的法律事件多是詐欺、偷竊與侵占遺失物，其他如傷害、重傷害、毒品甚至殺人或殺人未遂則是少數無家者會碰觸到的。而詐欺、偷竊和侵占遺失物，大多都跟「匱乏」有關，尤其是金錢匱乏。因為己身無分文，連基本生存求一餐溫飽都沒辦法達到時，當遇到有人提出任何可以馬上獲得金錢的提議時，很容易有豁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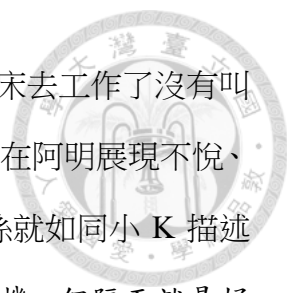


的心態，即使心裡明知道那是違法的。不過也有的人是因缺乏社會經歷 / 學歷知識不高，或是有精神障礙 / 智能障礙，致無法判斷，才會被人以話術誘騙。但當他們因這些事件被起訴到法院開庭時，檢察官及法官常以以一般常理，有一定智識及社會經驗者，都知道身分證、存簿、提款卡及密碼等關乎個人隱密重要之資料不能隨意交給陌生人，在這個前提之下，還將這些資料交付出去的話，一定是為了要得利而故意做的。因此，除非是有精神障礙、智能障礙狀況的人，才有機會不被起訴或判刑。」大元身上的官司是因為販售人頭而被起訴，當時的他在車站身無分文，才因此販售自己的身分證；阿明則是因為竊盜而入獄服刑；小 K 因為傷人的案件而經歷幾此的司法偵查。

在阿明剛進去的那時候，昱琪問小 K 阿明被關是否對他們造成什麼影響？小 K 回答，「覺得很安靜，因為他最吵，他是我們這邊的開心果。他都會講一些很好笑但其實又不好笑的話，但我們會裝笑。大元教我們的，說『你覺得不好笑就假裝捧場一下。』我之前不笑的時候就會感覺很冷場，怪怪的，沒人理阿明的感覺，大元就教我們幾個。大元這次還在說，阿明回來的話要怎麼惡整他，要『歡迎他回來』。」因為彼此相近的年紀和精力，他們有一套彼此熟悉的互動模式，最常聊天的話題是宮廟文化或是手遊，而這群年輕人在店裡不是睡覺就是在玩手機，除了小 K 會玩線上遊戲之外，其他人比較常玩單機的手機遊戲，或是看 YouTube 的影片。

小 K 和阿明年紀最相近，而且在田野中後期，大元住進了家屋、眼鏡仔到國外工作、力翔持續在大水溝，只剩下他們兩個，他們會一起出去遊玩，也比較容易發生爭吵。有次在重修舊好遇到阿明，我問他在做什麼？他說「要等小 K」我問他為什麼？他說稍晚他們要一起去士林夜市，我有點驚訝，也很開心聽到他們的休閒娛樂。他們說週二去士林夜市時，剛好看到有格鬥天王的機台，店家說如果打贏店家，會有商品折價券，所以他們決定再去一次。而後來有一段時間，阿明和小 K 一起住在旅館，那段期間小 K 從物流包裝的工作，薪水還沒下來，於是吃穿用度都是阿明花錢。阿明告訴我這件事情時，驕傲卻帶有抱怨口吻地說「都是吃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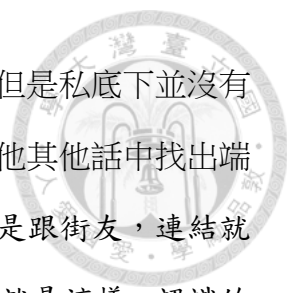




餒！」又曾有一次，阿明請小 K 睡網咖，但是小 K 白天自己起床去工作了沒有叫阿明，令阿明相當不爽，而打算一週不和他說話。雖然如此，但是在阿明展現不悅、不想理他的態度過沒多久後，他們仍舊一起玩手遊。他們的關係就如同小 K 描述的，遇到不開心的事情「那天結束之後就是不講話，滑自己的手機，但隔天就是好哥們，看到我們又走在一起。」


中老年男性方哥和木木的互動，也體現了他們從這些社會連帶內獲得的關愛與尊嚴。滿口工作倫理並辛勤工作的方哥，是木木眼中會照顧人的大哥。憨厚聽話的木木，也是方哥身邊得力的小助手。兩人時常一起搭配著在萬事屋工作，抑或是同進同出地在重修舊好生活。木木曾經這樣提起方哥：「我跟方哥是比較聊得來，你看他這把年紀都要六十四，但工作還是排在第一。其他朋友就是愛做不做那種，輕鬆的才去，困難的不要。方哥去年鼓勵我去舉牌，又來萬事屋打掃，錢存的滿多的。」木木時常提起方哥對他的鼓勵，不僅是從事舉牌工作，方哥也曾經勸木木一個禮拜至少花一天去旅館休息「所以木木現在都睡賓館啦，他兩個人合租，一天 800、一個人 400，他睡車站，但是我叫他每個禮拜四有洗地板的時候，地板比較濕，去找一個合夥人睡賓館……這樣比較舒服一點，就像我以前禮拜四、五，那時候我就去睡三溫暖，880，六百啦然後吃一餐 280，就慰勞自己一下，這樣不是很舒服嗎？（社工：所以你也鼓勵他這樣做？）對啊，因為你做得要死要活的，然後睡地板，這邊也痛那邊也痛，你乾脆去睡有冷氣的就不會痛了，還是要自己有一點收入啦。」在方哥的鼓勵之下，木木維持了這樣的生活大概幾個月，後來因為腳傷而收入變少，就不再去旅館住宿了。

方哥總是鼓勵木木，也給予他一些生活上的幫忙，當我詢問「那你現在有可以信任的人嗎？」，木木回答「我信任方哥，因為我看他是不會害人家，他會幫助別人去打工，他講的話我會相信，別人講的話，我一半一半而已。你說車站附近，是有朋友啦，有幾個比較好，其他就比較是講話說出口但沒真的做到。」木木對方哥如此信任，但是方哥卻曾經在社工面前展演出另一套說詞。某次工作者照彥向方哥



詢問起重修舊好內的朋友，方哥說雖然表面上和木木處得不錯，但是私底下並沒有很喜歡木木。雖然他並沒有對於這樣的厭惡多做解釋，但可以從他其他話中找出端倪，來理解為什麼他會展演表面上這套說詞。「現在在火車站就是跟街友，連結就是跟流浪漢，啊不要說我是流浪漢、也是半個流浪漢，我交往的就是這樣、認識的也是。(粗體為筆者所加)」方哥在當次的訪談並沒有認為自己是個街友，或許先前因為租房事實而被排除於街友福利之外的經歷，讓他感受到自己在制度上並非街友，而在自我認知上他也認為自己的工作態度以及生活景況，和街友不完全相同，所以是「半個流浪漢」。這樣的認知差異，或許是他想和木木區隔開來的原因。木木並不是一位和重修舊好工作者關係非常密切的無家者，憨厚老實的他不會和社工多加攀談，談論的話題也圍繞在萬事屋的工作。相較年輕人總是惹的工作者呵呵地笑，木木顯得較為樸實一些。方哥是一個相當會辨識場域內權力關係的人，最初他認為在重修舊好內工作者是分配工作機會、福利資源者，因此認為展演出厭惡木木的態度，能夠與工作者更親近一些。不過，過了將近一兩年在重修舊好的時光，方哥逐漸發現重修舊好的權力運作邏輯並非上對下的管理關係，而也讓他逐漸少了對社工阿諛奉承的展演，也不曾再展示自己對木木的不喜愛。

2021年中木木的生活裡產生了變化，他向工作者提到自己要去關渡當廟公後，就人間蒸發於這個世界上。然而，他當時並沒有和方哥說到這件事情，方哥在那段期間提到木木，總是會露出擔憂的臉，說道「人就不見了，都沒有一絲消息。」在木木離去那段期間，方哥形單影隻，沒有這位夥伴陪伴身旁。經過了兩個月左右，工作者照彥前往關渡尋找木木希望知道這個人的下文，不料關渡宮廟卻說明沒有這個人在這邊工作。後來照彥偶然在大稻埕遇見這個人，他向木木說到如果木木在外面不太方便過生活，可以回來重修舊好，又再下一次在臺北車站後站遇見了他，木木才正式返回重修舊好。在木木回到重修舊好的那一天，他並沒有像從前一樣直接走進店裡，反而是坐在店外面的台階上整個下午。方哥對於這件事情並沒有發表什麼意見，只默默說了一句「回來就好」。照彥三番兩次邀請木木進入店裡，木木




都沒有太搭理，直到方哥走出去叫木木進來，木木才起身進入店內。當天傍晚，方哥按照慣例要離開店裡去西門町、車站走一走，但是他想了一下，繼續待在店內。工作者潘敏問他為什麼這樣做？方哥回答道，「木木回來了，多待一下。」方哥對木木的關心，展露在非言語的陪伴之中，兩人相互陪伴形成的友誼關係，至我離開田野後依舊存在。

底層世界時常被描繪成險惡的生活環境，因為環境匱乏且四處隱藏風險，而導致底層人們對其他人的不信任，並且試著明哲保身、避免被牽連 (Raudenbush 2016, Smith 2005)。雖然上述的描述真實發生，但並不代表街頭上沒有真摯的情感與關係。底層人們在街頭上共築的社會網絡，成為了他們尊嚴的來源，在與彼此互動的過程裡，肯認對方的存在，以此打造他們的自我認同 (Duneier 2018[1999]；Anderson 1987；黃克先 2021a)。他們與彼此建立的夥伴關係，並不單純是為了獲得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源而存在。對於他們而言，彼此就是在街頭生活時的夥伴，日復一日的陪伴、共同的貧窮生活經歷，都讓他們感受到關愛與尊重。對於在街頭生活的他們而言，這些人是當下生活的重心、帶來羈絆的所在。

### (三) 工作者的關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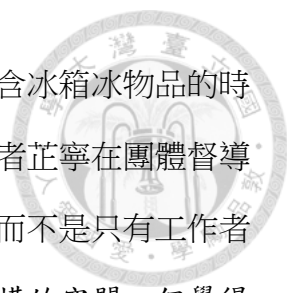
重修舊好相對於街頭而言，還多了一個角色存在，即是工作者。工作者與無家者們的互動，與無家者建立的社會連帶，大幅影響無家者在這個空間的感受，並且也創造了這些關係與街頭的社會連帶不同之處。對於許多無家者而言，重修舊好像是家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這裡的工作者和無家者互動的方式總是令他們感到溫暖、真誠且受尊重。木木認為重舊像一家人，因為社工會幫他洗衣服，還會邀請他參加活動，他曾說「這樣很溫暖，像一家人」。又如小包所言「(重修舊好)店長待人真誠又不會讓人有壓力。」這種真誠又沒有壓力，讓無家者們感受到被尊重。重修舊好的社工說話總是輕輕柔柔地，會用邀請的方式提醒無家者應該要做某些事情，例如「要去洗澡囉！」「衣服洗好囉！」「店要關門囉！」。相比傳統社福機構以嚴厲的口吻規訓無家者們完成日常生活中的工作，重修舊好的工作者更傾向以「陪伴」



而非「管理」的方式進行社福工作。小花也說到「重修舊好像一家店，這裡的人特別友善。」某次工作者兩橙陪藍地找房子三個小時，結束後藍弟說「兩橙謝謝你」，兩橙回覆「不會，我希望你真的住進可以住的久、住起來舒服的房子」。更深層而言，這樣的真誠與親切來自於重修舊好的社工們讓無家者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大的決定權，並且相信助人者與受助者之間是相互陪伴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建立在尊重對方的主體性之上。

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多數並不是專業社會工作領域出身，沒有嚴謹地社工專業訓練，進而也不會被傳統的社工倫理給綑綁。工作者阿童就曾表示，她和無家者的關係更像是朋友關係：「我覺得蠻多時候都是交了一群朋友這種感覺，然後我也希望大家用輕鬆的方式看待我，所以當他們需要找我討論事情的時候，就是朋友之間我們互相討論，那我只是剛好可能知道他需要的這一部分知識，對，但我不一定是他的社工或是什麼，就是一個他可以一起討論事情的朋友這樣。」在重修舊好的社工，並不會過度專注在助人者與受助者間的界限，有時候他們會協助他人的私生活。這些社工的積極協助，也讓無家者們更信任這裡的社工。

重修舊好體現的助人者－受助者的關係，有別於其他單位上對下的管理關係。社工傾向用陪伴的方式，陪著無家者找到解決事情的方法，同時帶動其他無家者以真誠、包容的態度對待社群裡的其他人。Paresell and Clarke (2022) 提到受助者被動地接受救助，會令他們感到羞恥。作者提及雖然助人者與受助者的積極互動能夠消滅這種羞恥感，但是最重要的是兩者間需要有互惠關係，讓受助者也能夠給予和付出，才能夠改善這種羞恥感受。在重修舊好裡，工作者與無家者的互動方式，並不會過度強調專業倫理與助人－受助間的距離，而是將所有人水平式地看待。重修舊好的工作者會提供許多機會，讓無家者們同為這個空間出力，例如每月一次的大掃除，讓所有人共同維護這個空間，進而感受到歸屬感——每個人都需要維持這個空間的環境整潔，讓他們找到自己投入這個空間的切入點，而不單純是使用者而已。此外，重修舊好每季會有一次「班會課」，召集成員們共同討論、決定空間事務，




翻轉受助者僅是被動接受協助的常態。班會課內決定的事情，包含冰箱冰物品的時間長短、行李放置的規則、空間內是否要設置公共電腦等。工作者芷寧在團體督導時就曾分享，她希望這個空間是一個大家一起建構出來的空間，而不是只有工作者擔任管理者個角色：「我想建構一個能跟哥姐（無家者）一起建構的空間，但覺得不太可能。我覺得大家一起管理這個空間，就代表尊重大家的主體性。」儘管如此，芷寧也談到了這種水平關係的困難性：「雖然我聽到質疑時，真的滿不爽的，但這是我要處理的，我不該期待聽到人的意見時又感到煩躁。困難的是，這裡每個人的狀況都很不一樣。」

合合曾經提起過重修舊好社工和其他社工的差異，她說「彩虹組織社工態度比較衝、比較直。」原先合合住在彩虹組織的據點內，彩虹組織的社工定期關心她存錢、找工作的情況。某次彩虹組織的社工只是想和合合確認一下她最後官司狀況的決定，但是說話的方式令合合感到不悅。

合合說請彩虹組織下班後不要再傳訊息了，一直叮咚叮咚。她請潘敏告訴彩虹組織，為什麼她要被管？她寧願睡二二八。合合姊看起來非常生氣，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氣。她那天甚至因為太煩躁，不小心摔了手機。我後來詢問潘敏，潘敏轉述彩虹組織那邊似乎只是詢問法扶、存錢的事情，也很尊重合合的決定。潘敏沒有很確定合合跟彩虹組織的衝突來自於什麼，但是她和那邊的社工見面時也很 ok。後來我走出去跟合合姊聊天，她表示彩虹組織社工態度比較衝、比較直，所以感受很差。（田野筆記 2020.10）

合合在彩虹組織感受到的不適，不僅僅是社工對待個案的方式，還有個案之間的相處方式。工作者雨橙推測這些組織間的差異，可能來自於機構型態的不同。在彩虹組織的住宿據點，期待大家能夠自己解決問題，而重修舊好的社工則會引導個案有那些解決事情的方法。工作者雨橙這樣說到，「主要是不同組織的模式相差太遠，



重舊 carry 大家的生活狀態，但轉介過去彩虹組織，和社工討論的氛圍很不同，大姐們難以適應。差別例如：社工可近性（重舊一開門就可以找到社工），其他地方會期待大家能夠透過自行解決問題來練習自立，重舊偏向陪伴大家去嘗試方法。據點和重舊的目標和功能性本來就不相同。另外據點也會有室友的磨合問題。」

方哥說到重修舊好工作者這種對待他們的方式，讓他感受到被尊重。在某次訪談，方哥多次稱讚重舊，他有提到「這裡沒有一種讓人被瞧不起的感覺」。因為他去其他單位領便當或物資時都要排隊，而且「大家會很嚴格，社工都很嚴厲。去那邊被施捨，還要看人臉色的感覺。在重舊都沒遇過這樣的狀況」。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在這個空間裡創造出水平的助人關係，它扭轉了傳統由上而下的助人—受助者階序，並且不以助人者專業知識自居，而是以夥伴的方式，陪伴無家者們找到最適切的生活方式。

## 第五節、小結

本章提問「重修舊好建立的社會連帶是什麼？具有什麼樣的內涵？」我將工作者欲建立的社會連帶命名為「包容性連帶」，包容性連帶並不是一種自然生成的關係，而是需要工作者透過多樣的機制帶動無家者建立起的關係。包容性連帶欲達成的關係特質可以從社會資本、社會規範角度切入，欲促成三點：作為一套新的社會規範，它期待（一）在制度上不排除任何人、（二）在互動上多元包容、尊重差異。作為一種可累積的社會資本，它預期達成（三）資源上的互助互惠。

在本章第一節討論了重修舊好的在地語彙「修復關係」與本文採用的「建立連帶」兩者間的差異。所謂「修復」暗指著原先的關係是壞掉的、不好的，因此才需要修理。而在重修舊好工作者的經驗上，他們認為無家者在進入重修舊好前的人際關係模式是不信任、不穩定、自保、具傷害性的，因此需要被「修復」。然而，我認為他們並不是真的「修復」成他們來到街上前的人際互動模式，也不是想重新建立他們與家人或是舊朋友的連結，而是打造了一種新的、特定的社會連帶，「創造」了理想的社會連帶。



包容性連帶替無家者的社會關係帶來三種改變：其一，新的社會規範；其二，經濟資源；其三，社會與情緒支持。首先，新的社會規範包含了在制度上不排除人與互動上的多元包容、尊重差異，詳細而言工作者規定無家者會議上須聆聽他人發言、鼓勵無家者表達貧窮經驗與想法、告訴無家者發生衝突時需要思考他人的需求等等。而確實在成果上有部分無家者轉換了對於其他人貧窮原因的理解，不再以謾罵的方式評論他人的行為。其次，經濟資源是他們建立包容性連帶的基礎，同時也是他們建立包容性連帶後所得到的資源。在經濟資源傳遞的過程裡，可以看見無家者之間形成不分群體互助的社群，同時重修舊好也打破過往助人－受助者明顯的社會界線（Rogers 2017），建立起助人－受助者個人的社會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最後，社會與情緒支持則讓他們感受到關懷、愛與尊嚴的關鍵，包容性連帶帶給他們的社會支持，讓他們建立進一步的認同與歸屬，也讓他們在這個社群裡獲得在主流社會難以獲得的尊嚴。只是無家者間的羈絆侷限在與自己同性質的群體之中，而比較難跨越群體建立起深刻的關係。這樣的結果也是後續在面對福利資源時，他們跨群體建立包容性連帶的困難之處。

本章藉由說明包容性連帶的內涵，回答重修舊好介入無家者建立社會連帶所造成的影響：新的社會規範與可累積的社會資本。而包容性連帶也回答一開始的經驗現象謎題——為什麼他們能夠在這裡建立互助互惠的關係呢？因為工作者刻意在這個空間裡建立包容性連帶。本章藉由區分「社會規範」與「可累積的社會資本」兩個層面，突破過去文獻在描繪貧窮者社會連帶時多關注「可累積的社會資本」的偏誤。在討論社會連帶時，研究者較少注意到的連帶內涵（content），但是這個內涵會影響到行動者如何想像彼此的權利義務及行動，因此連帶是如何規範行動者應被納入討論。在下一章，本文會以「社會規範」的角度切入，以討論為什麼包容性連帶會失敗？



#### 第四章、衝突、調適與回應：包容性連帶的阻礙

今日陪阿明去萬華的新富市場工作，和阿明閒聊的過程裡他先說了青伯的事情。他說昨天在店裡，小K發燒，青伯想知道阿明是不是也被傳染有發燒，就用手指彈了阿明的額頭。阿明那時候在吃東西，很不爽，於是就噓了青伯。青伯後來回一句「修督欸丟」，阿明就更不爽，接連著噓回去。阿明覺得自己跟青伯沒有那麼熟，為什麼對他可以開這種玩笑？後來他們在外面抽菸時，兩個人就對噓，直到大元找工作者照彥來勸架，兩人才平靜下來。阿明說他跟工作者照彥解釋後，工作者照彥也沒有多說什麼，阿明覺得工作者照彥的反應是他也認為青伯不對，不然他一定會有更多回應。他緊接著反問我「如果是你不爽嗎？」我跟他解釋，青伯應該只是想開玩笑。阿明覺得青伯很不會看人臉色，而且自己的年紀幾乎都可以當阿明的阿公，竟然還這樣噓年輕人。(田野筆記 2021.01)

為什麼包容性連帶被建立了，但是仍會有這些衝突、較勁或是排除呢？本章藉由民族誌材料，回答「**為什麼包容性連帶的建立會遇到阻礙？行動者如何回應與調適？**」本文考量社福組織內部無家者之間、無家者與工作者間的權力關係之後，欲勾勒出包容性連帶建立的動態過程，以討論包容性連帶作為社會規範遇到的阻礙。包容性連帶內涵一套由工作者預設與想像的互動方式與社會規範，無家者並不是全然地接受採納，而是經由衝突引發行動者調適、協商這套互動規則，但是在這個動態過程裡卻浮現包容性連帶在意識形態與實際運作上的衝突。踩在這之中的行動者並不是只有工作者－無家者兩造雙方的對立，而是不同無家者群體以及工作者之間都秉持著不同的立場。此動態過程呈現出影響無家者互動的因素，來自對社福體制下個人應如何行動的理解差別。

本章分為三個小節。第一節〈衝突〉以三起發生在田野地的事件，描繪無家者們發生爭執並進而無法採納包容性連帶的衝突現場。第二節〈根本性矛盾〉解釋為





什麼會出現上述的衝突，本文點出工作者與無家者有著相異的社會福利體制的目的預設與合格的福利接收者樣貌想像，才導致包容性連帶在社會規範層面的失敗。第三節〈矛盾下行動者的策略〉則是解釋在這樣的衝突與矛盾之下，不同行動者採取何種策略來回應包容性連帶建立的衝突。

## 第一節、衝突


本節以兩起重修舊好班會課的衝突事件，以及萬事屋裡的工作衝突，來凸顯包容性連帶在建立與運作時遇到的問題。

### （一） 重修舊好班會課：不守秩序的人們

班會課是一個重修舊好討論地方（place）事務的場合。重修舊好將個案稱為「同學」或是「大哥大姐」，前者多在討論集體事務時使用，例如班會課、發布空間使用公告等，後者則是在日常互動裡方便的叫法。同學的稱呼讓重修舊好就像是一個沒有「老師」權威的班級，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同學，能夠共存、共學，而班會課即是討論這個班級、這個空間公共事務之所在。公共事務涵蓋的範圍很廣，包含空間使用的規則、影響到所有人的事件、舉辦的活動等等。重修舊好之所以會舉辦班會課，是受到第四世界運動「平民大學」以及「開放式對話」這兩者的啟發，期待讓無家者也能夠參與這個地方的決策、能夠表達自己的看法。班會課雖然賦權（empower）了無家者，讓他們不只是服務的接收者，也能夠成為握有決策權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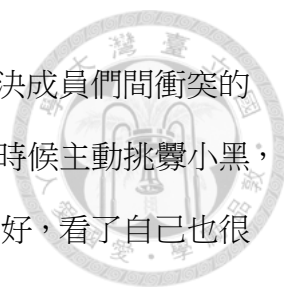
在我田野期間裡，重修舊好總共舉行了四次實體的班會課。次數較少的原因是因為 2021 年中開始，因疫情而暫停至 2022 年初。在四次的班會課之中，有兩起明顯的衝突。第一次是在 2021 年一月份的班會課裡，大家針對福福的酒醉事宜進行討論，第二次是在 2022 年二月份的班會課裡，小包和鍾姊因為鍾姊說話的聲音而發生爭執。這兩起事件是針對空間內不守規矩、有精神狀況者的排除。接下來，將先以福福酒醉的事情進行討論。

福福是一位年紀約四十歲的男性無家者。雖然年紀已經老大不小，但因為他擁



有一張嬰兒臉，讓他視覺年齡大約落在三十歲左右。他來到街上的原因是因為哥哥會對他施暴，讓他即便有家也回不得。或許因為從小到大的主要照顧者是姑姑，他與女性長輩總是很親近。睡在二二八公園的他，在街上認了一個「乾媽」，乾媽的工作是公園的清潔員，偶爾會聽到他提到要幫乾媽打掃一下。在重修舊好內，福福也和鍾姊很熟識，鍾姊會像姊姊、母親一樣督促福福，但是兩人並沒有建立起什麼樣的擬親屬關係。福福有大學學歷，從事護理專業，他常常引以為傲，而這個文憑也讓他更難以接受自己因為「無家」的身份被主流社會貶斥。

我進入田野的 2020 年，每日走進重修舊好都是以福福當天有沒有喝酒作為開場話題。那一年福福酒醉的問題充斥著重修舊好的整個空間，其他人對他的不解與怨恨已經燃燒到最高點。2020 年暑假的某天，我一早抵達重修舊好就聽工作者工作者兩橙提起福福早上喝醉，拿著刀子在店門口揮舞。工作者兩橙提到福福最近的情緒非常不穩定，家庭內的問題沒有解決，又與街上的人們起了口角爭執。鬱卒的他借酒消愁，愁更愁。工作者兩橙露出疲憊的神情告訴我，當早除了福福還有另一位大哥也在重修舊好門口，聽說當時是和福福一起來二二八的，大元說福福會叫他「大哥大哥」，這位大哥一直想要進來重修舊好，但因為喝醉了，所以被工作者兩橙阻擋在外。那一陣子提起福福，工作者兩橙總是露出為難的神情。作為社會工作者，她必然很想服務對方，但是另一方面，酒醉的福福無法溝通且影響到店內的其他人，因此只能將宿醉的他「請」在門外。那一陣子每日早晨，工作者都要從福福微紅的臉龐、身上的氣味，來「聞」出福福到底當日早上有沒有喝酒。如果有喝酒，便不能進入店裡。雖然福福屢屢因為喝酒而鬧事，但是清醒時候的他卻又相當熱心，與工作者們關係良好，起起伏伏的狀態讓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們難以「放下」這個個案，取消他的受助資格。雖然福福偶爾會被禁止進入店內，但是會坐在門外的階梯上，偶爾因為想上廁所所以進來，偶爾要點水，但偶爾卻又大聲嚷嚷要工作者出去跟他談。這些舉動在別的無家者眼裡，成為了工作者們太「寵溺」的結果，其他人不懂為什麼不直接勒令福福不准出現在重修舊好周圍，而要允許他可以藉



著生理需求為藉口進到店內。當早，工作者潘敏和兩橙聊起了解決成員們間衝突的方式，小黑在一旁聽到也加入討論。小黑說昨天福福來拿垃圾的時候主動挑釁小黑，並說「你是不是很想打我？」他嘆了一口氣說福福最近狀況很不好，看了自己也很難受。

身為事件要角的福福，在清醒的時候會和工作們分享自己是因為家庭還有人際的困擾而選擇飲酒。雖然每每答應工作者要少喝酒，但再次出現時依舊是微醺的模樣。有一次福福又因為喝酒而被禁止進入店裡，當我外出買晚餐時他抓住我開始跟我訴苦。

福福看著我，叫出我的說「怡菁....」，那瞬間超級感動的，因為被福福記得了名字，而且也是店裡第一個把我名字叫對的人！福福大致說明了來龍去脈，他說他的東西被偷了，原本以為是小欣。但是下午的時候，他放在行李箱的兩袋塑膠袋被拿出來放在店外，小欣今天沒有來店裡，所以福福想應該不是她。接著他覺得是合合，然後一直咒罵她。其實我沒有很清楚為什麼他覺得是合合？但是他提到先前在公園時，合合喝完酒瓶亂丟，導致別人來抄他。我自己不太懂他們之間更複雜的紛爭，所以乍聽之下覺得蠻沒道理的。福福接著講到店裡的工作者，他突然開口「**我和你們都一樣是大學畢業，只是沒有家而已。**」他表示我們對他的態度，讓他覺得很不被當人看待。我向他說明工作者兩橙和阿童都有嘗試要幫忙他找他被偷走的東西，可是現在一時也無法裝監視器。他講的過程中哭了，我說「我知道你很苦」，他就抓著我說「**對，我真的很苦**」然後一直流淚。前幾天他在公園被反同人士毆打，現在還在吃止痛藥，他覺得自己很委屈。後來我說我得去買飯，他塞了六十塊給我，叫我拿著。後來我給工作者兩橙請工作者兩橙還給他，他晚上再見到我時，告訴我為什麼要跟工作者兩橙講？那是要給我的錢。（田野筆記 2020.11）



福福的話語中帶著怨恨與不甘，他屢屢表明自己也和我們一樣是個有唸大學的人。原本有著自己的專業，可以過上有展望的生活，但卻因為家裡狀況較為複雜，沒有了家失去了住所，才淪落到街頭。他的話語裡表露對於自己因為無家，而遭到世人不平等對待的痛苦，雖然當下的他是因為酒癮而非無家而被禁止進入店內。

那一陣子重修舊好內的無家者對福福都產生了抱怨，並且責怪工作者們沒有採取較為強硬的措施。某次方哥和工作者潘敏說道「男人就是不能寵，他就會乖乖的」、「如果有人喝酒，就一個禮拜辦辦……看他還敢不敢喝酒」潘敏問到如果不來重修舊好福福要去哪裡？方哥說「人是生存的動物」他們會自己去火車站、公園找活路。方哥說重修舊好就像監獄，只要是機構都要有規範。潘敏回答「可是這裡不是監獄。」方哥回道，「監獄也是一個機構嘛。你越寵他，他就會產生依賴的心態」方哥講這些話時，程哥在旁邊一直笑表示贊同。

其他人對於福福的抱怨，最終被搬上班會課處理。在 2021 年一月份的班會課裡，大家提出了對於工作者處理福福酒醉行為的期待。從這樣的期待裡面，可以看見大家多想採用最傳統、直接的懲處的方式處理這樣的衝突。而在這樣的衝突裡，顯見的是放逐這些「不守秩序」的人離開社群。這樣的衝突有礙於社群內連帶的形成，並且與重修舊好工作者期待的包容性連帶的內涵相互牴觸。當天班會課討論完物品堆放的事情後，阿明接著開口，表明了他的不滿。「請福福喝酒後不要進來，進來都是一直盧。他還是會進來，在門口。」因此在班會課時，眾人決定臨時討論這個問題。比起實際解決這項問題，工作者成茂更想知道福福喝酒醉這件事情，帶給其他人的感受是什麼。

工作者成茂：他有暴力嗎？

大元：我想打他。

阿明：他會言語挑釁，會讓人想打他。希望他喝酒後不要在重修附近徘徊。



小黑：不然他就跑去 228 音樂舞台鬧我，昨天在睡覺也來叫醒我  
工作者成茂：他欠揍拉！不過福福情況對我們來說也是難題啊。  
工作者卷卷：我覺得他喝酒也不好，但我的工作也只能盡量不要影響到其  
他人。

青伯：他最近有工作，會慢慢改變。

小黑：他好幾天工作沒去了。

大元：他工地也在喝啊，他跟我說的。

阿明：去戒酒中心。

工作者成茂：去有用嗎？

阿明：有，這個法律上有成立的。

大光：慶仔有去過，去三個月一滴酒都不能喝，接觸不到酒。

工作者卷卷：回來後有改變嗎？

大光：回來後……也沒辦法。那種酒鬼。

工作者成茂：你們覺得他是惡化還好轉？

大元、阿明：惡化。

大光：我覺得工作反而助長他喝酒，以前沒錢可以買酒，現在可以自己買。

每個社工不是只有負擔他一個，平日可能人夠，假日呢？

工作者照彥：其實輕聲細語後，他有比較容易離開。


大光：之前禁止他兩個禮拜不能來，他就慌了。要有懲罰性的，讓他知道  
會有懲罰，你們也是在乎這件事情的。

大元：我覺得就一兩個禮拜不能進來。

阿明：店外的行為干擾人，應該要警告或是勸阻。

大元：勸阻他沒用，不能干擾到店裡。動用到其他權利，禁止他飲酒。

福福酒醉事件的討論最後衍伸出重修舊好的一大規則——「飲酒或是宿醉的人（身




上有酒味)不得入內使用服務」,後來工作者轉告福福大家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福福表示道歉和說明他的無奈。接下來一段時間,隨著福福腳受傷休養、搬回原生家庭入住,酒醉事件就漸漸落幕了。不過從班會課的過程裡,可以看見無家者們對於破壞規則者的處理方式是直接排除。不只是酒醉者,其他如物品隨意堆放、冰箱食物放置到過期等行為,總是有人提出各式各樣的懲罰作為嚇阻的手段。然而,重修舊好的工作者一直認為懲罰是消極的處置手段,並沒有辦法改善個人的行為。

面對不守秩序的他人,重修舊好內的無家者希望透過直接排除來建立秩序與規則,並保障遵守秩序成員的利益、懲罰破壞規則者。這樣的規則看起來相當理性,也是一個組織常見的經營方式。藉由白紙黑字的規範,訓練成員按照明確的行為準則形式,進而達成場域內的社會化。然而,這樣的處理方式雖然相對簡單容易,但是卻有可能忽略了每個成員的異質性。工作者工作者成茂認為,採取單一、暴力的處理守則雖然短時間內解決了問題,但是並沒有解決長期、根本的問題。重修舊好的工作者認為解決長期問題的方式是培養無家者社群對彼此包容的能力,能夠在事件發生的當前練習表達個人的情緒感受、體諒他人的作為,理解他人,看見他人從事這些「不守秩序」行為背後的原因。然而,無家者面臨到的實質威脅是生存資源的有限、生存空間潛在被破壞的風險。面對實際的物質資源匱乏,他們要建立包容性連帶相當困難。

## (二) 重修舊好班會課：精神狀態不佳的人們

重修舊好內身心狀況健全的無家者們,對於空間內有精神狀況的無家者難以產生包容同理之心。事實上,來到重修舊好空間的無家者少有嚴重至不能自理的精神狀況。反之,他們仍具有日常行為的能力。他們有時候能夠具有現實感地與工作者及其他無家者對話;但有些時候可能完全無法進行對話。因為這樣的時好時壞,讓其他身心狀態較好的無家者沒有相信是疾病導致他們的行為。

小令是一位三十幾歲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無家者,他的狀況在兩三年內有著極大的變化。我進入田野的 2020 年,他是位幽默風趣、有工作能力、精神談吐也相



當有精神的人，中間曾有半年至一年間，他消失地無影無蹤，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待他回來後，整頭頭髮變得蒼白、鬍鬚橫生、雙眼無神、衣衫襤褸，實在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再也不喜歡與人交談，整日靜靜地坐在椅子上趴睡，抑或是坐在門口的階臺上。到我快離開田野的那段期間，小令不太洗澡，在營業時間或是晚上工作者開會時，他也會躺臥在店門口阻擋了人們進出，需要經過的人叫他一聲，他才會讓開。這些事情引起了店內其他人的不滿，認為他實在太誇張了「活得不像個人」，或許也因為先前曾有「正常人」的樣貌，其他人認為頹廢的行為舉止是「他的選擇」而非疾病所致。方哥說到，小令有次告訴他，自己在重修並不會餓死。這句話令方哥相當生氣，不斷地說就是工作者太寵他，才造成這般社會福利依賴的景況。

眼鏡仔談到小令的情形時，他說「可以理解他需要休息，但是也不要休息那麼久吧。同樣都是年輕人，都應該會受不了被別人看待的眼光。就是穿室內拖鞋在外面走來走去，不會打扮自己，不懂為什麼要把自己過成這樣。如果可以會想要有正常生活跟正常社交吧？」方哥有一次告訴我，他認為這些身心障礙者都是「裝」的，尤其是智能障礙者更是如此。當下我詢問他為什麼這樣說？他告訴我「那個龍龍不是說失智，都忘東忘西嗎？那應該什麼都不記得吧？我上次就跟他說，你欠我一千塊沒有還我，他就說沒有，他很清楚記得。你看，如果是錢他就記得，為什麼其他事情不記得？他就是裝可憐，讓你們幫他。」這般測試顯現了方哥對其他身心障礙者的不信任，認為社會福利身份只是讓他們獲得政府的救濟、社工的協助，以及不需要勞動的名義，「你看低收入也好、殘障也好，只要有申請政府補助的都過的真爽，表面上好像拉哩拉雜的，私底下要什麼有什麼，不是你們正常人一般看到的那樣，有的都會裝啦，都會假仙。看起來好像很可憐，實際上你比我還可憐，只要它們申請補助下來了，都不一樣了。」儘管按照臺北市政府身心障礙補助的規定，這些身障者的生活補助僅有三千元至九千元不等，根本不足以讓他們在北市過上最低生活水平，但是這筆金額對於街上的人而言，有可能是一整個月的收入，也因此



引來不滿與不信任。

大光也時常表示對於精神狀況者的不解，而大光身強體壯的外型，讓他責備起他人的不辛勤顯地更有正當性。某次大光和我聊天，問了我「你以前大學的時候會翹課嗎？」，我說「會阿，如果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會翹課。」他便分享自己從以前到現在都不太翹課，唯一一次翹課是因為沒翹課過，所以去翹課看看，但是翹課後發覺也沒什麼好玩。他認為，學生上課是學生本分，員工準時上班是員工的職責，這是應盡的義務也是規矩。接著，話題轉到了田田和秋秋，他說今天秋秋在要上班的時間還是硬在誠品那邊躺著，不去工作，後來是工作者阿童跟就業服務台的承辦請假，她才不用工作、不會被記點。大光說「不理解他們的腦迴路到底是怎樣」。大光常常在聽到其他人工作又缺席或是犯錯時，轉向來向我搖搖頭，然後開始說是不是社工太寵這些無家者，才讓他們失去了紀律。

班會課的第二起重大衝突，便與廣義的精神狀況有關，這次衝突的主題是小包認為空間內有些人太常發出噪音吵到他人。原先小包只是針對這個情況做出全面性的說明，但後來鍾姊在聽到小包的說法後，認為小包是在指責自己，因此發生衝突。下述為班會課的紀錄：

小包：有人睡覺在講話，講不聽

鍾姊：請社工講

小包：講不聽。

大光：像是程哥玩手機會幹幹叫，就請社工講，就會小聲一點。

工作者芷寧：我跟大家說，如果大家處理不了，請社工處理，我們覺得很好、很好、很好。可能有些時候，我們覺得其實影響不大，可能是因為你坐他旁邊。我們評估後，如果覺得還好，會建議你換個位置。

合合：有時候是累得時候，旁邊有人講話聊天。累的狀況，每個人身體





狀況不同。

大光：就是圖書館啊

工作者芷寧：這裡不是圖書館

合合：講話溫和一點

大光：沒有禁言，請大家輕聲細語

合合（稍大聲）：……………

工作者芷寧：你現在也沒有輕聲細語

工作者芷寧：如果被吵到，你可以跟當事人說

合合：我沒有習慣（跟別人直接說）。

小包：如果有累犯，一天來了三次……

工作者芷寧：你覺得可以怎麼辦？

小包：所以我才問你們啊

大光：就像以前福福的事情，可以停權。

在這次的討論裡，有比較多不常發表意見的人說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先是合合，她在小包說出自己被吵到的困擾後，開始說到自己也有相同的困擾。當她聲量慢慢地提高、開始有了情緒，便被工作者制止。工作者希望討論的過程裡，大家可以和平理性的討論，而非帶有情緒化的批評字眼。大光和小包在這次的討論裡，同樣提出了懲罰性的方法，對他們而言懲罰是最有效的手段。大光也提到，他認為重修舊好就像是圖書館一樣，使用者應該要輕聲細語避免打擾到他人，但是工作者緊接著提出，這裡並不是圖書館，使用者有權利在裡面說話。小包接著提到鍾姊的情況。

小包：她在抒發自己心情，可是我沒有必要聽，我只是想稍微清淨一點。

可以看你們要不要單獨找社工，聽他講。她心情故事，造成困擾。



工作者芷寧：你剛剛說你需要清淨空間休息

小包：就是你沒必要相同抱怨，每天聽相同事情，就變成垃圾。

鍾姊：我拿不動，給他們（註：不知道說什麼）

小包：她（鍾姊）周遭話語影響到人

鍾姊：我從今天開始就不來，也不管，也不要做那麼苦。

工作者芷寧：你（小包）可以講講看，我們想不到方法

小包：可以請他們去外面冷靜，或是誰比較有空去聽

鍾姊：你們在外面講一天，我也沒說你吵到我們啊！

小包（生氣並大聲說）：這是室內空間，室內跟室外沒差嗎？

鍾姊：不要那麼大聲，只會講人。

小包：我自認我很守規矩

工作者兩橙：鍾姊，我們在討論室內空間的事情

鍾姊：我趕快找房子拉，我也不想在這裡。（站起來想要離去）

小包（大喊）：逃避啊，那就逃避

工作者兩橙：小包（警告小包不要這樣說話）

小包：對我很衝，我就是這樣，開會本來就是有紛爭，有些事情明著講出來比較好一點。沒人跟她講過嗎？有……………你們很有耐心，很有愛心，可是對方心態是怎麼樣？柔性勸導很有用，但是要針對某些部分、某些人，沒辦法一種藥治療全部的人，你要對症下藥。某些人可能需要強制的。

工作者芷寧：那如果我們沒辦法提供強的藥呢？

小包：沒辦法就算了，你們是管理者，我們是來這邊給你們管。可是我有這種，對你們一些基本尊重、對環境基本尊重、對人互相尊重，我會去站在你們立場去考量，我也會站在別人立場去考慮。

鍾姊：真的嗎？



(鍾姊生氣上樓)小包細數自己的遵守規矩

小包：我在意這裡的形象，因為別人客訴，那我要去哪裡？這裡環境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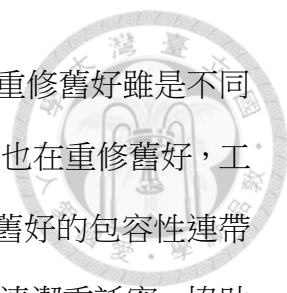
我來講，相對安全、相對舒適，我很珍惜這裡。

鍾姊習慣對其他無家者、社工或是空氣抒發自己的心情，多數時候是說自己生活過得相當辛苦、心裡很委屈，或是回顧自己艱辛的成長經歷。鍾姊有時候會抱怨重修舊好的其他人，有時候會抱怨租屋環境，有時候抱怨其他機構的社工。因為鍾姊重複性的發言，小包提出了他長久壓在心裡的怨言，他認為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對於其他人太有愛心、太尊重，選擇以柔性勸導的方式告訴其他人遵守規矩，但是他認為這並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他再次重申了懲罰性的手段，並且作出病理化的類比。他認為不守規矩的行為，需要透過強制的手段禁止。

在鍾姊與小包的衝突事件裡，「講話太大聲吵到其他人」成為了一個不體面的行為。小包認為鍾姊每日重複的抱怨「很嘮叨」，打擾了自己的休息時間。事實上講話太大聲並不是什麼違法的行為，甚至也不違背公共規則，但就像是一個沒有讀清楚空氣的行為，在不洽當的時間點出現。這樣的行為被連結到患有精神疾患，在重修舊好有很多，例如小花具有妄想症，因此會喃喃自語；程哥玩遊戲時習慣大聲地講話，也是喃喃自語。這些行為在大眾社會裡，會被認為是精神狀況者的異常行為。像是鍾姊自顧自地說起她的經歷，儘管話語有邏輯性，仍被認為是精神狀況者的表現。事後，工作者也針對這個衝突進行討論，工作者潘敏說「有人因為分享自己的遭遇、碎碎念而被請離開空間，自己覺得心裡有點過不去。如果有明確可見的造成的影響，例如分貝、時間，比較好跟她討論。」可以看到工作者的態度是並不能因為鍾姊的行為就驅逐她離開。

### (三) 人生萬事屋：工作能力的較勁與排除


人生萬事屋（下稱萬事屋）是人生百味團隊在 2019 年開始的專案，主要目的在協助無家者們進行零碎時間的零工媒合，運作模式是由人生百味的工作者擔任



工作窗口的角色，帶領無家者（隊員）前去工作地點。萬事屋與重修舊好雖是不同專案，但因為成員多是由重修舊好的無家者挑選而來，開會地點也在重修舊好，工作者也是流通的，更重要的是萬事屋同樣也希望能達成同重修舊好的包容性連帶建立，因此納入分析。萬事屋主要是承接公家單位（社會局）的清潔委託案，協助弱勢家戶在搬家前後的清潔、家具搬運。如何分配萬事屋的工作機會成為了隊內主要的衝突來源，從中也浮現出包容性連帶遇到的阻礙。隊員們大致依照勞動能力區隔成多個不同的小群體，其中年輕男性通常體力、身體能力較好，中老年男性則相對較差。群體之間有著工作能力的較勁與排除，會質疑為什麼其他人能獲得較多的工作機會？在爭執的過程裡，他們以自己的價值觀來貶抑他者並且強化自身的工作倫理，與其他人較勁誰工作比較認真、誰做了比較多工作、誰工作態度不佳。萬事屋的衝突之中，成員間對他人的能力與工作資格產生了高度的懷疑，而這些不信任也導致他們試著排除他人在這個工作隊之中。

疫情肆虐之前，萬事屋每週開一次全體會議，工作者主持會議、隊員參與：工作者會先簡介當週的工作機會，通常四至七個工作不等，並附上薪資、工時、工作時間的簡介。接著由隊員將工作志願撰寫在紙條上，交給工作者工作者昱琪，再由工作者工作者昱琪分配。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更公平地分配工作機會，避免在會議上直接詢問誰想做某份工作，會有搶工作或是有人不敢舉手表態的問題。在工作者昱琪分配工作的時候，通常會有其他工作者詢問隊員們上週的工作狀況，例如上週工作的感受如何、有沒有發生什麼問題等等。雖然這樣的工作分配方法已經盡可能公平，但是依舊會有許多狀況發生。

首先，隊員之間會因為彼此的工作能力而相互較勁，並且形成小團體排斥他人。在某次的工作會議上，工作者孟穎介紹了一份需要刷油漆的工作。這份工作前一週就有了，但是前一週是力翔自己一個人去。大元詢問「油漆清潔的工作是不是有壁癌？」力翔回答「對，而且很多東西不能動」，並說到「上次去做太累，所以有跟屋主提到希望可以兩個人去做」。工作者昱琪介紹完其他工作之後，便請大家寫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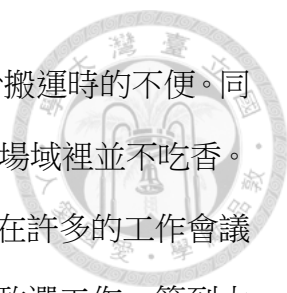


自己想要的工作。大家填寫的差不多時，便開始閒聊。工作者昱琪問大元「表單上面出現什麼樣的工作會比較吸引你？」大元回答「最近沒什麼心情工作。」力翔聽見自己的好夥伴大元可能沒有填寫工作志願時，說到「如果沒有人陪我去（油漆工作），我也只能硬著頭皮去」天天坐在小 K 旁邊，便說「小 K 有選刷油漆的工作」。力翔一聽到這句話，便以半嘲諷的語氣提到「小 K 你確定你會刷油漆？」小 K 當然不甘示弱的反擊，說自己會刷油漆。在一陣吵雜的來往後，力翔說「小 K 不會刷油漆啦」接著，小 K 氣憤地把紙條拿回來，並且塗掉刷油漆工作的志願序，然後說「力翔不讓我去啊」。窗外響起救護車的聲音，小 K 突然對力翔說一句「救護車要來載你了」小黑在一旁默默說著「你們兩個很愛鬥」。那一週雖然是力翔和小 K 去刷油漆的工作，但是力翔回來後一直抱怨小 K 根本不會刷油漆，拖累他的工作進度。而再下一週，便改由大元跟力翔去了。工作者昱琪後來補充說到，雇主提到工作時，力翔會一直說小 K 不會刷油漆，而雇主自己可能也這樣覺得。工作結束時，雇主只問了力翔的名字，下次想再找他來幫忙，但是雇主並沒有問小 K 的名字，把小 K 冷落在一旁。這樣的舉動讓力翔工作結束回來後，洋洋得意地證實小 K 不會刷油漆這件事情。

在另一次會議上，剛好隊員們只有大元出席。工作者們便順勢聊起大元對其他成員的看法。大元提到：


跟小 K 出去（工作）都覺得他在偷懶，常常我們三個人去做，他一個人跑出去抽菸休息，我就覺得蠻不公平的。像宏哥（某一位工作雇主）也不喜歡他這樣，他就會覺得奇怪，怎麼就小 K 休息而已？

雖然大元、小 K、力翔、阿明幾個人是玩在一起的好夥伴，但是小 K 因為工作能力不足而與其他人時常在工作上起口角。小 K 當時的年紀不到 20 歲，並不像其他哥哥們有較多的工作經驗，許多工作想仰賴蠻力進行。例如在搬家的工作時，小 K



會想要直接把龐大的書櫃搬起來，而不曉得可以運用拖車來減少搬運時的不便。同時，小 K 的身形相當瘦弱，整個人骨瘦如材，在仰賴體力的粗工場域裡並不吃香。因為上述種種的原因，讓小 K 與其他夥伴的關係充斥著張力。在許多的工作會議裡，其他年輕人們明顯不想跟小 K 一起工作，讓小 K 偶爾會不敢選工作，等到大家選完再「挑剩的」。


不僅是小 K，其他年紀較大或是工作能力比較不佳的隊員們，也會被人排斥與鄙夷。方哥雖然滿口地工作倫理，但因為年紀大體力沒有年輕人那麼好，因此會選擇較為輕鬆一點的工作做。在工作者不在的時候，也會以其他方式應付工作。某次的工作是方哥、阿明、小 K 與福福四人上工，由於福福遲到，一開始只有另外三個人工作。那天上午臺北的溫度大概是 30 度左右，頂樓相當炎熱。我們才剛到幾分鐘，我便開始覺得自己穿得太多而狂冒汗，可想而知接下來幾個小時的體力活一定相當崩潰。一開始我便分配工作給小 K、阿明和方哥三位，我請他們一起打包。阿明從最左邊的地方開始，小 K 則和方哥一組，從右邊開始。阿明一個人的動作比較快，也比較迅速、不拖泥帶水地將要丟棄的物品裝入垃圾袋。小 K 和方哥比較慢，由小 K 拿著袋子、方哥撿垃圾的搭配方式進行。他們清理的時候會讓人感覺不是很迅速，或是有點拖泥帶水。15 分鐘過去，東西約莫清出三分之一。方哥問了一次要不要先將東西拿下去？我說等另一位無家者福福到之後，再開始搬運垃圾。我認為上面要裝袋的垃圾蠻多，如果這時候開始拿垃圾下去，可能留在樓上的人需要做比較多的工作，整體進度推進也會比較慢。所以我希望大家先一起裝袋，再一起拿下去。但是約三十分鐘後，已經裝袋的垃圾堆了許多，看起來方哥和小 K 也因為炎熱的天氣感覺很累。我便請他們開始將垃圾搬運下去，並分配一人三層樓。一開始速度很慢，我在頂樓大概要 3 至 5 分鐘才會看到方哥上來一次（等於結束一趟搬運）。當福福抵達並加入工作後，改成一人兩層樓的方式搬運，我和阿明則在頂樓協助東西裝袋。這時候我發現方哥出現的次數變得頻繁，當我去看他們的時，發現方哥只將垃圾拿到五樓，而不是分配的四樓，再後來方哥幾乎是將東西從



頂樓拿到樓梯口而已。過程中，我有提醒方哥應該要拿到規定的四樓或五樓，不然福福會負擔較多的工作。他說不會，因為他認為頂樓到樓梯口還有一段路，但其實那段路並不那麼長。他們運下去的速度並不快，有一些垃圾堆在三樓的轉角處。這時候方哥就有一些空擋時間，所以看到我在掃地時，便過來告訴我要怎麼掃。等方哥離去後，阿明說「他就是在混時間。」，我沈默地聽他抱怨了一下。然後說「他可能只是很累，他年紀也很大了」。阿明一開始堅持說不是，他是在摸魚。大概過了一下下，他問我「他應該才 50 幾歲吧？」我說「沒有，快 60 了。」阿明說「真假？那為什麼看不出來？他看起來還很年輕。」，然後問我方哥跟青伯誰比較大。我不確定經過這樣的解釋，阿明有沒有稍微能理解方哥一些，但當天並沒有再聽到他的抱怨。

面對其他人對自身工作能力的質疑，年紀較大的青伯、方哥會強調自己工作的勤奮，並重新詮釋工作的難易程度以平衡自己在工作場域裡的地位。例如另一項社區清潔的工作需要四個人上工，三個人負責兩個大樓梯的清掃、拖地，一個人負責十八個小樓梯的清掃。方哥一開始都擔任十八個小樓梯的清掃員，並說十八個小樓梯要爬上爬下很累，大樓梯比較輕鬆。直到他被其他人抱怨都挑輕鬆工作之後，他開始清掃大樓梯，開始改口小樓梯因為不用拖地而比較輕鬆，自己都做比較累的（大樓梯）。青伯是另一位萬事屋隊員裡較年長的無家者，他比方哥年紀更大一些，而且患有帕金森氏症，腳並不方便。其他年輕人並不喜歡和他一起工作，認為他遲鈍的腳有可能拖累了進度。青伯面對年輕人的排斥，總是會在聚會上說些道理，責罵年輕人挑選一些比較輕鬆、乾淨的工作去做，而自己則是「做什麼都可以」，也曾經直接說「希望大家不要挑工作」。

底層工作場域是個陽剛的工作場域，藉由販售體力來獲取勞動報酬，陽剛氣質的展演與互動文化，讓工人更加符合工作場域所期待的勞動者（魏明益 2016）。萬事屋的工作大多是以清潔為主，其次會有家具拆卸及搬運，偶爾也會出現包裝、廚房清潔等工作。然而包裝的工作在萬事屋並不受到男性隊員的歡迎，每次一有包裝




的工作幾乎都沒有人選擇。在一次萬事屋的聚會中，除了方哥、阿岳等大哥之外，也來了凱蒂、田田這兩位女生。當天除了清潔打掃工作外，有一個手工藝品的代工與包裝工作，還有一個在翻糖工作室打掃的正職工作。選完工作後，方哥說：「我喜歡硬的，不喜歡軟的。那些軟的給女孩子。」工作者孟穎回問：「什麼意思？」，方哥回答：「女孩子做比較輕鬆的，手工、零工、工作室的清潔打掃。」這種男性與女性工作的隔閡在年紀較大的方哥、青伯眼裡非常明顯，凡事碰到廚房的工作，都會被歸類在女生的工作。在男性與女性隊員都在的時候，方哥也喜歡透過舉這些例子來區隔了男性與女性的工作能力、適合的工作內容。

透過工作倫理的區分，萬事屋的隊員出現階級的排序。身體功能健全、有穩定工作、在就業市場上有所選擇的年輕無家者在工作場域中比較有話語權，因為他們具備工作技術也更有能力勝任體力勞動。他們會在工作現場「指揮」其他人做其他工作，也更知道如何重新包裝與再定義他們的工作內容，藉由這些詮釋後的勞動成果再次鞏固他們的工作地位。其他年紀較大、體力不佳的無家者，在工作場域裡處於次要的階層之中，像是方哥、青伯會找出自身工作模式的優點，而去貶損年輕人在工作上的疏漏以凸顯自己沒有那麼差。女性以及精神與智能障礙者，則更常被底層勞動市場排除，萬事屋少數持續工作的女性，大多數從事包裝工作，而精神與智能障礙者幾乎沒有能力萬事屋工作。工作場域形成的位階等地，延伸到重修舊好日常的生活以及機構外的人際關係。在重修舊好內，這些較具備工作能力的人有著比較多的話語權，大光憑藉著自身較高的學歷、較流暢的口條，積極發表意見、嘗試定下規矩；年輕人們則是運用自己能夠勞動的身體，位居於自立的高點，不想搭理其他未能自立的人，但因為不善於文字的使用，未能夠流暢地說出一番觀點。

無家者的工作選擇與工作態度，是這群人受到的社會汙名之一。然而，無家者內部不僅沒有貶斥主流社會的工作倫理價值，反而是更加地信奉工作所隱含的道德觀點，同時複製了這套以工作態度及勞動條件來區隔他人的象徵邊界。無家的問題很直觀地被連結到經濟問題，金錢也成為這個群體最努力爭奪的資源。如果個人





能夠努力工作、控管花費、保存收入，就應該有機會能夠租房、脫離街頭生活，這種線性的思維促使他們認為「工作」是無家者能彰顯生存意志、道德與尊嚴的外顯成就。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下，工作能力成為了無家者之間最明顯的象徵界線（symbolic boundaries）。象徵界線是社會行動者對物體、人類、行為，甚至是時間與空間進行分類而做出來的概念區分，它們也是個人或是團體鬥爭以及做出一致定義的工具。研究象徵邊界使我們能夠捕捉社會關係的動態向度，這樣的動態過程體現於群體間生產、傳播與制度化替代系統與分類原則時。象徵邊界也將人們分成不同的群體，並產生相似感和群體成員身份，是人們獲得地位和壟斷資源的重要媒介（Epstein 1992, p. 232, 引自 Lamont & Molnar 2002）。由「工作能力」作為標的的象徵界線，成為了他們連結維繫的一個阻礙。底層黑人並不想在工作場域和自己工作秉性不相似的人成為朋友，更不想要因為這樣的關係而影響到雇主對自己的評價、削減自己未來的工作機會（Smith 2005）。無家者為了避免他人影響到自己的工作機會，才採用上述的象徵界線來區隔我群與他群。這個象徵界線也讓他們對於同事的同理心與忍受度也較低。

## 第二節、 根本性矛盾

前一節呈現的衝突景象，令我對重修舊好無家者關係的真實圖像產生困惑。為什麼他們在日常生活裡會呈現〈第三章〉的互助樣貌，但是卻又有本章的衝突場景？為什麼在一個提倡包容的環境裡，無家者之間仍然會出現排除？

深究前一節出現的衝突，可以發現無家者的衝突來自於他們以身心狀況與工作能力畫出的象徵界線，並且以此質疑「為什麼需要包容比自己能力更差／狀況更糟的人？」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優勢／弱勢」的分界是按照場域有所不同的。在重修舊好裡，優勢／弱勢的區隔是以身心狀態作為區隔，年輕男性與中老年男性為相對優勢的無家者，而女性與精神心智障礙者則是相對弱勢的人。但是在人生萬事屋裡，依照隊員工作能力與態度、身體健康程度分類，年輕男性依舊是相對優勢的無家者，但是中老年男性、女性與精神心智障礙者則成為相對弱勢的人。整體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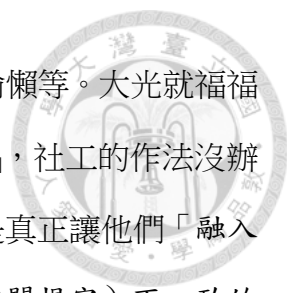
接下來本節所指稱的優勢無家者，多半為在重修舊好場域內的年輕男性與中老年男性。然而在下一節可以發現，中老年男性在萬事屋的會議裡會成為相對弱勢的無家者，進而他們必須起身為自己反擊。

本節將對衝突提出解釋，我認為上述的質疑牽涉到無家者對於「社福體制功能」、「合格的福利接收者」的想像。對於優勢的無家者而言，他們想像社福體制應該是個人化的，人們應該要靠自己度過難關，福利接收者不應該依賴社福體制，體制只是給予暫時性的協助。但是這樣的預設卻和重修舊好的現況有所不同，重修舊好認為他們是協助無家者改善他們的社會關係，不只是物質給予或是提供就業機會，人與人間應該要互相依賴，才能脫離貧困。無家者與工作者的矛盾不只是形式邏輯，還包含經驗實務的矛盾。重修舊好的資源是有限的，導致工作者在實務經驗上沒辦法真的包容所有人，以致於工作者需要鼓勵無家者自立。但是無家者又意識到自立的困難，使得他們最後需要競爭福利資源。在這些條件之下，他們更需要透過象徵界線來捍衛自己受助的正當性，才出現包容環境裡的排除。

本節將分成兩個部分說明其中的矛盾。首先，第一部分藉由相對優勢的無家者對於包容性連帶的質疑，帶出無家者與工作者對於「社福體制」與「合格福利接收者」想像的差異。接著，第二部分將點出重修舊好福利資格的篩選，造成在包容的環境裡仍需要排除掉一些無家者，無家者為了讓自己不要被排除，他們便需要排除掉其他人。因此，無家者與工作者動用不同的社福體制想像，造就了不同的「包容」與「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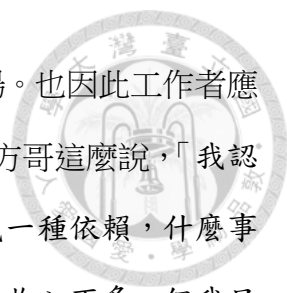
### (一) 形式邏輯的差異：社福體制與福利接收者想像的不同

在班會課的兩起衝突裡，無家者以懲罰的方式來喝止不守規矩的人、精神狀態不佳的人，他們提到這些排除是為了協助這些弱勢者「融入社會」。他們反覆地提到這些造成「困擾」的無家者需要適應主流社會的規則。他們認為主流社會並不會給予人們太多的犯錯機會，而重修舊好既然是一個讓無家者「練習社會化」的空間，就應該透過獎賞懲罰的方式讓他們更有效地學習到主流的社會規範，讓他們學會尊



重他人使用空間的權利、互動上不造成他人困擾、工作時不要偷懶等。大光就福福酒癮的事件，曾多次向我說「你們就是心太軟」、「這樣沒有用」，社工的作法沒辦法協助無家者們。反之，他提倡訓練與懲罰弱勢的無家者，才是真正讓他們「融入社會」的方式。工作者兩橙說道「我有跟一些人解釋過這些（空間規定）不一致的原因。而後來收到的回饋就是『那你們要再更管制、訓練他們啊』『你們這樣（包容）是在幫他還是害他？』對這樣講的人來說，他們覺得幫忙就是訓練他們更融入社會。」大光曾說道「當這裡收掉了，他們到外面是找不到這樣的環境的。因為重修的大家都把大哥大姐服侍的太好，所以造成他們的無能化，或是過度依賴機構。」對於優勢的無家者而言，他們認為社福組織的目的應是幫助無家者「脫遊」，而若要脫遊則應適應主流社會的文化，像是空間的使用者應該要顧及其他人的使用權利、不應該出現不體面的行為、團體工作時應該要平均分攤所有工作等等。因此，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尊重弱勢者的需求、調整空間的使用規範，就是一種「害」。大光認為因為就算不遵守這些規範也不會受到太嚴重的懲罰，所以才讓弱勢的無家者學不會適應空間規範、持續做出違背社會規範的行為。他認為重修舊好應該要訓練這些相對「失能的」無家者，讓他們能夠在日常生活裡更貼近主流社會的期待，在未來離開重修舊好的時候才不會遇到太多的困難。這樣的觀點認為無家者不工作或是精神失序的行為是「不被社會接受的」，所以應該被排除，讓包容性連帶「尊重差異、多元接納、不排除任何人」的理想顯得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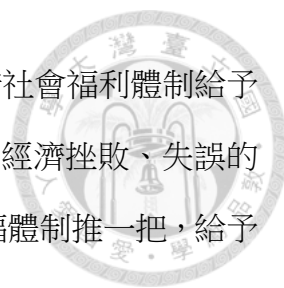
無家者認為包容性連帶是一種「害」，那是因為無家者和工作者對於「社福體制的功能」與「合格福利接收者」想像有所不同。重修舊好的「修復」在無家者眼裡是一種「回歸社會」的意思，他們之所以落入無家的處境，是因為職業訓練不足、教育程度不夠，抑或是街頭的慣習（例如偷懶、不努力）所以沒有工作機會，社福組織要修復的應該是適應團體規範、工作能力與態度，讓他們更接近主流社會裡對「自立」個人的想像。無家者認為社會福利體制的功能，是協助他們回歸個人化的自立社會。社會福利只是個暫時性失能的補充性措施，社福體制是當個人在就業市



場失敗時，給予其有尊嚴的生活，以期待他迅速地回歸就業市場。也因此工作者應該要用「訓練」的方式服務受助者，而不是用「包容」的方式。方哥這麼說，「我認為為社工勦，就像老師一樣，如果太關心像我們這種人，他會變成一種依賴，什麼事情都要找社工，這是我的觀察，所以我盡量自助，所以呢我現在收入不多，但我只要有一份工作就不怕啦，我也不怕沒飯吃、也不怕沒地方睡，你看我那個租屋，我可以申請補助但我就是不申請，為什麼，我知道我還可以，那就是一種壓力，讓我想工作、如果沒有工作繳不出房租，就會被趕出去，這個叫做危機意識，所以我只要有工作、不管兩份三份，只要認為適合的其實我都願意」。這種對社會福利體制規範的想像，讓他們認為有效的社福組織是訓練個人脫離街頭、不再依靠政府的資源過活。所以說，重修舊好順應著這些無家者的需求，尊重差異、多元接納，是與福利體制的功能相違背的。

在無家者的想像中，重修舊好就是社福體制的一環，但是對工作者而言，重修舊好是有別傳統社福體制的空間。因此，重修舊好不認為自己要達成和社會福利體制同等的目的。工作者認為重修舊好是為了「修復」無家者社會關係而存在的，他們要讓無家者對人產生信任、學習與人互動、包容他人多元的特質、尊重別人的需求等等。因此，包容其他弱勢者的需求反而是達成工作目的，何來組織失能之說？更甚者，重修舊好觀察到過去無家者跌落街頭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缺乏工作機會或是訓練，而是在職場與下班後反覆出現的人際衝突讓他們容易因為誤會、爭吵而失去了原有的機會，所以他們認為自己的作法才是「有效」回歸社會的方式。

其次，無家者與工作者對「合格的福利接收者」也有不同的想像。對於無家者而言，社會福利體制應該是一個暫時性的救濟管道，因此個人不應該全面永久地依賴體制，應該展現出自己仍然想要回歸社會、辛勤努力奮鬥的倫理道德。他們認為福利接收者之所以會進入社會福利體制，是因為在工作、道德上失敗了，所以才會掉落貧窮裡。如果在社福組織裡面還尊重這些人的需求、接納他們的不完美，那便是助長了他們的不道德。福利接收者的終點應該要是自主獨立的生活樣貌，例如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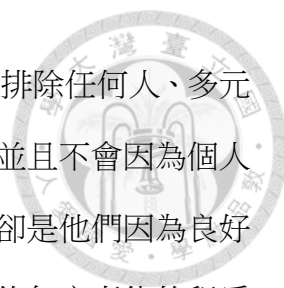
過努力工作賺錢來離開福利體制，並且表現辛勤努力肯做、珍惜社會福利體制給予的資源。這種福利接收者才是「體面的」，他們只是因為一時的經濟挫敗、失誤的人生選擇才跌落街頭，所以他們要如何脫離貧窮？那便是由社福體制推一把，給予工作機會與第二次的人生選擇，他們就可以脫困了。

可是對重修舊好而言，「合格的福利接收者」並不是一個展現自己工作倫理、刻苦耐勞的受助者，而是個受到充權的，因此有能力體諒並幫助他人、察覺自己需求的人。這個能動性包含了他們能夠說出自己貧窮的故事，轉變社會大眾對貧窮者既有的失能想像，還有願意在其他人有需求的時候，盡自己所能地幫助他人度過難關，彼此互助互惠建立一個包容地社群。

在上述差異的想像之下，無家者沒有辦法理解建立包容性連帶對他們生活有何種益處，他們看不見自己依循包容性連帶能帶來的實體改變。對優勢的無家者而言，重修舊好維繫每個人的需求是一種對他人的寵溺。這個寵溺會導致其他人更無法適應主流社會的要求與殘酷。包容性連帶的互助邏輯與無家者感受到的自立邏輯相互抵觸。個人化社會崇尚「靠自己」的生活方式，個人應該努力辛勤地工作，並仰賴自己的能力存錢租屋，過上與一般人相同的、有家的生活。在個人化社會的邏輯之下，無家者之所以會落得貧窮的處境是個人不努力造成的結果，因此社會福利單位重新給予機會之後，個人應該要加倍辛勤工作才行，不應該仰賴社工對個案的照顧，或是過度依賴社福組織的資源。身在重修舊好的無家者，即便在工作者的帶領下建立不排除人、多元包容、尊重差異的互助邏輯，他們仍感受到無法藉此來「回歸社會」。為什麼？因為重修舊好與主流社會所講述的「社會」本質上就有不同的想像。包容互助的社群與個人化的社會有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差別，前者理想的社會是互助的社會，而後者卻是個人分頭打拚努力的社會。如果對社會的想像不同，當然對包容性連帶會有相反的評估。

## (二) 經驗實務的挑戰：福利資格的篩選

包容性連帶的矛盾不僅是在形式邏輯上的衝突，還有在經驗實務層次上讓身



心狀況較佳的優勢無家者感到不公平。包容性連帶的預設是「不排除任何人、多元包容、尊重差異」，工作者要求無家者需要尊重其他人的需求，並且不會因為個人的身心狀況、工作能力而受到排除。然而，優勢無家者感受到的卻是他們因為良好的身體狀況和工作能力所以被「排除」在重修舊好之外。當優勢的無家者能夠租房或是發展出重修舊好以外的機構資源時，工作者便希望他們不要再使用重修舊好的資源，將資源留給需要的人。對於優勢的無家者而言，這種要求就像是一種對他們的排除。一旦無家者進入到比較好的生活狀況，他們就要被踢出在社會福利體制之外，但是真實情況卻是他們仍舊處在不穩定的工作情況與租屋環境裡，根本沒有辦法完全脫離危殆的生活狀態。

為什麼重修舊好明明提倡包容性連帶，卻又會排除相對優勢的無家者呢？這是因為重修舊好沒有辦法完全擺脫既有的社會福利體制，它公辦民營的位置仍會受到國家社會福利體制的影響。一方面，社會福利體制不讓無家者依賴社會福利體制，所以當他們有了其他的資源，就應該要被「結案」或是「終止他們享有社會福利的資格」。這樣的邏輯具體反映在 KPI 的要求以及方案成果的檢核；另一方面，重修舊好就算想要包容所有人的需求，面臨實際人力與空間的不足，他們也沒有辦法讓所有人停留在這裡。

重修舊好能夠容納的無家者是有限的。以空間面向而言，重修舊好一樓能夠容納的無家者就約是 16 位左右。即便工作者嘗試不以空間大小為由限縮無家者的使用權利，但若面臨滿位或時，必然會有無家者無法使用這個空間。空間的有限就代表能夠使用重修舊好資源的人有限，若沒有無家者離開這個空間、不再使用這裡的資源，就不會有新的無家者能夠進入使用。空間的有限性也產生了制度上的排除。重修舊好能夠開案、容納的數量是有限制的，因此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重修舊好服務的個案。為了促使個案的流動性，重修舊好的工作者積極地鼓勵無家者們一但有組織外的資源，就要大幅降低資源的使用。例如曾經有工作，也離開重修舊好一陣子的阿明；或是因身體受傷居住在遊收一段時間，後來返家居住的福福。工作者



認為這兩個人其他地方已經有可以使用的資源，包含洗澡與居住的地方、足夠的食物等，不應再仰賴社工在日常生活中的服務：

……阿明突然說出一句「反正我不是重修的人了」，臉上表情氣憤不已。我問了他幾次為什麼他這樣說？他都不告訴我而且氣沖沖地。過了幾分鐘我又詢問一次，他似乎理解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說，才告訴我緣由。原來是前幾天他腳不舒服，打電話到重修請工作者芷寧幫忙時，工作者芷寧告訴他「你不是重修舊好的人了！」。阿明重申他自己在重修剛開門時就在了，中間只是去網咖工作一下，網咖後來就關門了。他說他理解重修工作者很忙，只是「這樣說很難聽，很讓我受傷」。(田野筆記 2022.02)

上述事件過後，我詢問工作者芷寧為什麼會這樣說？工作者芷寧跟我還原了當時的景況。她並不知情阿明當時腳不舒服，所以才拒絕幫忙。而且在與阿明溝通許久未果後，才說出那句話，芷寧希望能夠讓阿明理解有些事情他應該自己做，而非仰賴社工。工作者芷寧說阿明當時情緒並沒有太激動，只是說好然後將電話掛掉，她沒有理解到這件事情對阿明影響那麼深刻。無論當時雙方的理據為何，這件事情都反映了重修舊好當時的情況：工作者希望已經有其他資源的無家者們，能夠減少使用重修舊好的資源。這裡的資源包含物質資源以及社工服務。這件事情在福福身上也曾發生：

福福立刻湊上前，小聲地跟我說悄悄話「我覺得她不喜歡我」，我問福福為什麼這樣說？他說之前住在遊收的時候，撐著拐杖來這邊拿泡麵。工作者芷寧給了泡麵後說「但我不會幫你泡喔」，福福便覺得不開心然後叫小令幫忙。福福說，工作者芷寧沒看他四隻腳（指坐輪椅），為什麼不

幫他一下。(田野筆記 202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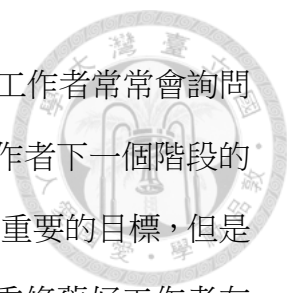


重修舊好則有近七成是由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支出，另外三成才是人生百味自籌。在經費與制度性的壓力之下，重修舊好需要承擔案量的壓力。雖然北市府沒有強制要求重修舊好以脫遊人數作為 KPI 指標，甚至希望重修舊好能夠開發出其他指標來呈現他們替無家者帶來的人際關係復原，但是議會或是市府上層還是習慣以量性的指標來檢視服務成果。同時，儘管重修舊好未必將「脫遊」視為他們唯一的服務目的，但是北市府以「效率」作為績效重點，難以接受「脫遊」外其他緩慢的服務效果出現。這使他們對「重建個案生活的動力」的評量標準，還是以無家者不再使用組織資源作為檢核。

因為其實這個我也跟工作者成茂他們有討論過，就是說這個方案，它比如說它需要階段性的一個發展，那一開始，譬如說好，前兩年、三年，可能重點是在先形成團體，互助團體，無家者的互助團體，讓有固定或更多的無家者願意信任，來到這邊加入。那但是你到第三年、第四年以後，那你可能應該是要在那個個別培力的部分去著地了，你重點應該擺到這裡來，那甚至可能到第五年以後，那個團體的經營這個東西就要出來了，那當然就是倡議還是持續地在做倡議啦，那另外一條線，所以我覺得如果以我的角度來講，好，可能下一個階段，應該要把更多的指標是放在那個培力的績效呈現上面，包含個別的跟團體的部分。(臺北市府社工科科長訪談 2023.05)

重修舊好空間資源的有限性，一方面是必然的物理限制，另一方面也牽涉到服務量能的限制所產生的排除。服務量能的有限不完全是因為工作者所能提供的服務有限，還包含了在「脫遊」以及「遊民服務體制」的想像下，工作者必須要能體





現「服務成果」，而最直接服務成果便是回歸社會。具體而言，工作者常常會詢問無家者是否有找正職的打算？是否有想要租屋？抑或是詢問工作者下一個階段的目標？儘管達到遊民社會福利體制的「脫遊」並不是重修舊好最重要的目標，但是社會工作專業以及大眾社會對於服務成果的想像，卻依舊催使重修舊好工作者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工作。

福利資格的篩選讓無家者常常處在被取消使用福利資源的恐懼裡頭，這使無家者之間需要以「競爭」的邏輯來搶奪資源。這種觀點將福利資源視為一個市場，行動者依據自己握有的籌碼（身心狀態）來爭取資源。在競爭導向的環境內，無家者之間難以合作、互助，更遑論建立不排除他人、尊重與信任他人的包容性連帶。如果無家者在重修舊好面臨這樣的有限性，不難理解為什麼無家者需要不斷正當化自己接受服務的資格。許多文獻已經表明福利接收者需要「表現」或是「展演」工作者預期的模樣，接收者會根據這些預設來調整自己的行為舉止（Hays 2003; Katz 1989; Osborne 2019）。當方哥說自己比患有精神疾病者還要來得「可憐」與「貧窮」，以及小包認為自己「守規矩」來表現自己符合工作者的期待時，這些都是無家者正當化自己符合資格的貧窮者的說法。面對有限的資源，無家者的劃界行為是他們為了爭取資源所採取的一種應對方式。

福利資格的篩選讓無家者更無法建立包容性連帶。在社會福利民營化的浪潮底下，政府委託民間單位辦理社福組織與據點，即便提供的資源越來越充足，社福體制對於績效成果的想像，依舊讓這裡變成一個資源有限的福利市場。儘管工作者知道無家者自立生存不易，但為了讓資源流動，工作者還是設立一套篩選個案的機制與標準，來鼓勵無家者離開重修舊好發展自立生活網絡。然而，自立生活網絡的建立並不那麼容易，許多無家者在找到工作或是租房以後仍需要一段時間的穩定期。他們擔心自己有一天會喪失這些福利資源，被迫推出去組織外生活，他們便需要證明自己有福利資源的需求。而證明自己有此需求的方式，便是與其他無家者競爭、劃界。如此一來，互助互惠的社群就更難以建立。



### 第三節、 矛盾下行動者的策略

包容性連帶作為一種社會規範並沒有順利地建立，無家者以工作能力與身心狀況劃定了象徵界線。透過個人化的社會想像來篩選值得包容的特質與行為。儘管如此，重修舊好內的權力關係卻出現有趣的關係圖像。那些工作能力好、身心狀況良好的優勢無家者並沒有因為這些衝突而離開重修舊好。反之，有些人基於福利資源的使用需求而「調適」工作者對包容性連帶的期待；而弱勢無家者在這些衝突之下，也協商出一套自己「抵抗質疑」的說法。最後，工作者也進行包容性連帶的反思與討論。

#### (一) 調適

包容性連帶的建立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雖然無家者會質疑包容性連帶對於回歸社會的有效性，但同時他們在考慮與重修舊好內部的權力關係後，也會接納包容性連帶的觀點，並調適自己並學習這套社會互動的形式。小包是一個最鮮明體現這種調適的例子。小包是一個身體功能非常好的無家者，他具備了自立脫遊的條件：他的工作態度很勤勞，做事也非常認真，身體健全有力能夠負荷底層的勞動工作。同時，他也相當會判別場域內的權力邏輯，並且清楚地知道重修舊好「包容性連帶」的理想與目標，如下述的引言裡他直言不諱地揭穿了工作者的邏輯「包容功能比較差的人」。這樣的語句揭示了他其實相當清楚場域內的權力與邏輯，因此調適與順應包容性連帶，成為他持續使用這個空間資源的策略。

小包有一次覺得我們跟程哥聊天聊得很大聲，打擾到他休息。我當時是回他「我們這裡沒有規定有人休息的時候大家就要安靜。但我們會觀察他有沒有影響到大多數人，像今天就沒有。」小包回：「但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們偏袒這些人，才不會跟你們說。」雨橙：「那這就是不說的人的選擇，不說我們怎麼知道。」，小包：「但上次程哥玩遊戲你們就有阻止。」雨橙：



「那是因為他有罵髒話。」小包：「你們就是包容功能比較差的人」。

工作者屢屢要求無家者在會議上遵循「尊重他人發言」的會議形式，在經歷多次的會議後，無家者也開始習慣這樣的模式。在某次萬事屋的會議討論當中，小包提出了他對工作現場的不愉快。由於他和其他年輕男性體力較佳、做事勤快，因此對於中老年人拖拖拉拉的工作方式感到不滿。

**小包：雖然知道每個人能力、體力不同，這些我可以理解，他可以做輕鬆一點，但盡量不要差距太大。**

工作者昱琪：**聽起來小包可以理解了**，知道每個人體力不同。其實以往我們要去解釋工作機會分配不均，都會跟大家說每個人體力不同。大家聽了可能覺得很無奈，覺得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感覺小包是可以理解這件事情，可是希望差距不要過大。像這樣差距過大你會感覺怎樣？

小包：會覺得對方是來工作還是混時間？如果有人做比較少，心裡會覺得對方是不是不想工作？當下會有這種情緒發作，當下不會講出來，因為規定就是這樣，當下盡量不要發表個人情緒。當下把事情做好，但事後可以跟社工討論。……之前是有發生過，我跟某個人在忙東忙西的，另一個人就是跟屋主比較聊得來，就比較沒在做，之類的。

工作者成茂：是覺得這樣讓人更累、做太多，還是會覺得不公平？

小包：對啊，這樣會覺得我們好像傻子。

年輕男性認為做事有技巧、快速完成交辦的工作事項才是正確的工作態度。他們從剛出社會就從事零工工作，拆除、裝卸、搬運的經驗豐富，因此善用工具，熟能生巧地他們做起事來總是比較快速果決。在他們眼裡，中老年人總是做事不勤勞、



時常想要休息。就工作者昱琪觀察，中老年人會有這樣的工作習慣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體力不佳，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過去從事零工的工作經驗不足，導致他們不曉得如何善用自己的身體、做事的工具。


不過在這段會議的討論裡，小包並沒有直接對其他人咒罵。而是在提出意見之前說出了工作者期待的理念，即每個人依照自身的能力，應該從事份量不相同的工作。包容性連帶追求的是互助互惠，那他期待這個「互助」應該要是「相互」的，而且彼此能力不應該差距太大。小包以「這些我可以理解，他可以做輕鬆一點」這句話作為開端，讓工作者感受到小包理解了他們的工作理念，而大家可以基於這個基礎再往下談。換言之，小包已經先接受了包容性連帶的理念，而接下來要討論的便是包容性連帶在實作上產生的問題。

小包這樣的做法和前一段落大光提出的質疑有著階段性的差別。大光的說法是並不接受包容性連帶的出發點，他認為追求「立足點平等」式的做法並不足以改善無家者的生存現況，因此應該訓練無家者順應主流社會的社會規範。然，小包的說法先認同了互助互惠形成社群可能成為一種有益的社會規範，但是針對落實到何種程度的互助互惠有著不同的看法。小包接著提到了自己在企圖建立包容性連帶下的感受。他認為一味地協助他人，會讓自己感覺到是傻子。他相當在意工作隊的其他人有沒有「盡力」地完成自己所能做的工作內容。

在另一次萬事屋的工作會議上，方哥責備眼鏡仔等人因為受不了工作環境，就當場離開工作。眼鏡仔在和方哥說明理由時，說道「我今天講出來是我也把你們當一家人」。工作人員一直以來都希望工作隊的成員能夠發展出社群關係，變成相互支持的職場同事，能夠主動地體諒其他人可能體力不佳，或是無法做某些工作，進而主動幫忙。而眼鏡仔的說法也符合了工作者的期待。

方哥：我們賺人家的錢啦，不管好跟壞啦，阿不想要就那個（離開）？

眼鏡仔：（先說明自己昨天的工作狀況，看到某個空間的環境自己實在無法負荷，



覺得在掃下去身體會生病)，我回來後有說我自己的身體無法承受，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工作氛圍，剛剛方哥的意思好像我們放棄就增加他們工作量，但他們還是作兩個人的工作，也沒有因為我們兩個走就要多做我們（眼鏡仔、小 K）的部分。

方哥：沒有啦，我不是那個意思，我也是鼓勵他。

眼鏡仔：方哥你先聽我說，(…)，今天他們有辦法做就讓可以去勝任的人去作，我覺得開會除了認領工作也是要大家互相了解工作狀況，我叫小 K 上來，他也不上來，就我來講昨天的狀況，我覺得工作開會也是在磨合，我今天講出來是我也把你們當一家人。(田野筆記 2020.12)

小包與眼鏡仔之所以敢直接向工作者表示看法，是因為他們知道這裡允許所有人理性地發言與表達建議。因此他們一方面可以告訴工作者包容性連帶可能沒效，或是表達他們對於工作分配結果的不滿，但同時他們也不會抗拒去協助他人、尊重與其他入之間的差異，或是與他人進行溝通。對於無家者而言，工作者才是真正握有這個空間管理權的角色，他們能做的只是給建議，但是在實際運作上仍需要配合工作者的期待，盡量地建立包容性社群。如果不與他人維持包容尊重的關係，則很有可能會被工作者認為不適合待在這個空間，進而喪失了獲得這裡資源的權利。因此，他們在重修舊好裡藉由調適的策略，來適應包容性連帶的規範與期待。

## (二) 抵抗策略

在這之中較為弱勢的無家者又是如何回應的呢？身為互助社群裡受惠較多的一方，他們並不是全然被動地接受包容性連帶。雖然他們看起來因為包容性連帶而受惠，但是在上述衝突的場景以及日常生活裡，他們時常要遭到他人批評與指責。在重修舊好裡，年輕男性與中老年男性會針對女性與精神狀況者不體面或是「失序」的行為進行批評；在萬事屋裡，中老年男性會受到年輕男性的貶損，在工作時也較不願意與他們合作。這些互動都會損害到較為弱勢者的尊嚴，而他們也會採取抵抗



與劃界的策略，來捍衛他們受到的批評。

福福在訪談時跟我分享到他對於當時其他人責罵他酒醉的理解：「……我是覺得每個人都會犯錯……每個人都會犯錯嘛，重修就是給人一個機會……但是你講話這樣臭幹六譙（台）……連我也無法接受」福福理解重修舊好打造包容性連帶的原因是因為所有人都有犯錯的時候，而這個社群便是包容大家，讓大家有一個新的機會去改正過去犯的錯誤。他秉持類似社會保險的概念在思考重修舊好，因為沒有人能夠預估明日是誰有可能犯了錯事、需要包容，因此今日選擇協助他人，明日就有可能是自己受惠。相較於其他身心狀態較好的無家者，福福身為曾經受惠於包容性連帶的人，似乎比較能夠體會到包容性連帶的益處。

鍾姊在前一節提到的衝突內，也曾起身反抗小包對自己的批評。當小包認為鍾姊在室內說話聲音過大的時候，她提到小包在室外說話時也相當大聲，並說「你們在外面講一天，我也沒說你吵到我們啊！」鍾姊認為她自己相較其他人，並沒有比較不守規矩、需要其他人的包容，只是其他人提出了對她的抗議而已。鍾姊認為自己在日常生活裡，也時常協助他人。在某日的午後，大家切了水果來吃，吃完後沒有人將碗拿去洗，於是鍾姊便去洗碗並說「現在夏天，吃完的水果會長蚊子。」鍾姊洗到一半時，小花拿一個碗給鍾姊說「鍾姊，你順便洗一洗（台）」鍾姊便有點激動地說自己洗完了，她太晚拿過來，她要去點眼藥水沒有空。小花有點受不了她的碎念攻擊，便說「好好好，我等等自己洗」。鍾姊洗完碗，碎念了一句「這裡要是沒開，看流浪的人要去哪（台）」後來鍾姊跟阿岳抱怨這邊很多人像大小姐、大少爺，都不自己做事。大光也曾批評重修舊好的人像是「大小姐、大少爺」，有趣的是看起來需要被包容的鍾姊，其實也在日常生活裡包容其他人。因此對她而言，她無法接受自己受到其他人的批評，因為這應當是一個有來有往的互動關係。

在萬事屋的會議裡，儘管面對的是未指名道姓地批評，方哥依舊起身為自己反駁。他認為比起年輕人總是想要做環境乾淨的工作，抑或是對於萬事屋工作福利有過多要求（提供車資、餐食等）。他自己則是有什麼做什麼，從不抱怨。



方哥：我是覺得有工作做就好了啦，在那邊挑東挑西都沒用，我跟你說。自己顧自己，把工作做好就好，在那邊講有的沒得要幹嘛？我在那邊做我的，是有什麼問題發生？自己的人生是自己的啦，今天為什麼會過這種生活，是因為自己不自愛啦，我都反省自己。做事啦，大家都說要做軟的。挑髒的還是挑硬的。大家都要。(全程台語)

工作者昱琪：我聽到兩件事情，方哥有記得我們剛剛的小默契，就是不要批評別人，你是先反省自己。但是我們嗯…你說沒意見，但你還是覺得有人挑硬的軟的。

方哥：今天我們當流浪漢，說難聽一點，要珍惜自己，看要怎樣有工作有生活，我都是這樣。我不會跟別人出去做事，這邊摸那邊摸，那個床很髒，我跟阿岳還是搬下來。(全程台語)

工作者昱琪：為什麼你感覺有點生氣？

方哥：沒有啦，我覺得在那邊計較，說一些有的沒的。不會自己想一些，說難聽一點，這種工作派四個人派三個人，挑工作就好。那天工作者照彥說一些，不就沒在說，在那邊漏氣。那個不是很髒，我不是都用手拉出來，我不珍惜我自己嗎？有工作好好做，在那邊計較東計較西，一定會計較。這邊比較髒、比較乾淨，有人要挑乾淨，我們清髒的，但也是沒在挑。(全程台語)

工作者成茂：我有問題想問方哥，(剛剛在詢問大家萬事屋有什麼地方可以改進的)有人說需要車資、有人要聚餐，那這些需求對你的影響是？

方哥：我說我不敢要求。

工作者成茂：你覺得不應該要求？

方哥：不應該要求，要怎麼要求？你自己要用的東西，要自己準備。人要靠自己。不是公司欠人的。說一句難聽，你自己要工作，飲料有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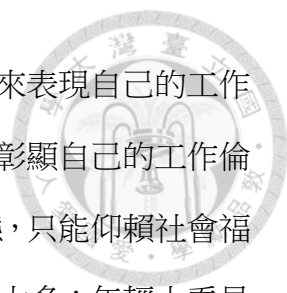
有，不是要公司買給我們。我們今天出來是來賺錢，是來工作的。你知道嗎？（全程台語）



小包與方哥各自對於工作現場的陳述，反應了這兩群人因為自身資本的差異影響到工作機會的選擇權，進而形塑了他們各自的工作價值觀。他們各自憑藉著自身的工作價值觀，在工作場域裡採取行動、與人互動，使他們歸屬於不同的小群體。雖然中老年人在工作上的成果並不如意，不能像是年輕人一樣快速地完成清掃、搬起重物，但是懂得運用自己在社會處事上的眉角多撈到一些利益。萬事屋的工作時常需要到老年弱勢家戶進行清潔打掃，這些屋主通常都會排斥與反抗有其他人進入他們居住的地方進行「打掃」。這時候就需要仰賴伴工人員或是萬事屋隊員的「苦言相勸」，與屋主年近相近的方哥總是擔任這樣的角色，憑著年紀相仿、有相似的話題、聊天能扯天南地北的能力，他總和屋主聊天、把屋主安撫地服服貼貼地。某次在文山區的清潔打掃，方哥看見家戶中留存的大同寶寶，便開始和屋主你一言我一句地緬懷過去的時光，攀談彼此都是同鄉人，讓屋主對他讚不絕口地稱兄道弟。這樣的舉動在小包眼裏卻是偷懶，方哥放著其他人在那邊打掃，自己只需要動動嘴巴和屋主聊天。然而，方哥會和屋主聊天，一方面其實也是他工作的一種貢獻，另一方面其實和他的體力有關。由於家戶清潔常常需要彎腰搬運，對於身體狀況比較差的他而言，蹲著撿垃圾十幾分鐘就已經相當累人，他無法向年輕人們一樣一整理就是半小時一小時起跳。因此，他習慣工作一陣子便藉著聊天、裝水、抽菸休息一下，讓自己的體力得以調適。雖然方哥沒辦法做那些仰賴大量體力的工作，但是他強調自己非常不怕髒，不像是年輕人都要挑環境好的工作。他最常提起的例子，便是有一次去一個髒亂的家戶打掃，馬桶裡因為大便都阻塞。他主動去清，雙手戴手套便將大便都撈起來。他認為這是他非常願意吃苦的案例。

方哥等中老年人抵抗年輕人批評的方式，便是藉由「肯做」來彰顯自己的工作價值。年輕人和中老年人在工作上彰顯工作倫理的方式迥異。年輕人們透過「能






做」，即工作的選擇權、較好的工作能力、完成工作的成就感，來表現自己的工作成果是受人肯定的；中老年人則透過自己「肯做」的辛勤態度來彰顯自己的工作倫理。中老年人看盡自己難以透過銜接正職就業市場擺脫無家狀態，只能仰賴社會福利制度的銜接，因此將「無家」的身份視為受助者，不應該要求太多；年輕人看見自己還有憑藉自身力量脫遊的可能，因此將「無家」的身份視為暫時的，不將自己的認同定位在「無家者」更像是「重修的人」、「萬事屋隊員」或是「做工的」。年輕人們並沒有將「無家」視為單一的、貶抑的標籤，他們認為自己在工作場域上得以選擇。即便身為福利服務接受者，依舊是有自我尊嚴的，可以與工作者協商與斡旋。他們與工作者間的關係，更像是彼此配合的夥伴，而不是施予者與接受者。秉持這樣態度的他們，便難以和將自己視為受助者的中老年人視為一體。這兩群人以各自的工作倫理，來證明自己獲得工作機會的正當性。

在這個部分呈現的三個故事裡，都可以看見弱勢者面對場域裡較為優勢無家者的批評與質疑，都不是全然地接受。他們會起身捍衛自己的尊嚴，並且認為自己也有付出的地方，只是其他無家者沒有看見他們的付出而已。在包容性連帶建立的過程裡，無家者雖然挑戰了包容性連帶的有效性，但同時卻因為要持續在重修舊好裡生存，而調適了新的社會互動形式。相對弱勢的無家者，也在重修舊好裡獲得發聲的權利，不像在主流社會裡當個沈默並飽受批評的人們，而有能動性可以回應這些質疑、替自己發聲，並與其他人進行劃界工作。

### （三） 工作者的反思

在無家者們不斷地批評指教之下，不少工作者也開始反思自己對待這些弱勢者的方式究竟是不是對的。工作者同意自己不會是一個能夠永遠照顧這些弱勢者的人，那麼工作者若能夠協助這些身心狀況不佳的人多適應一些社會規則，那麼他們是不是就能夠適應更多機構的服務？工作者芷寧說道「有些同學就會覺得我們在寵溺人。我自己比較害怕的則是，我沒辦法改變大環境，於是乎這樣的（友善）對待是不是在害他？」，工作者雨橙也有相似的看法「如果我尊重他的選擇，而使他在外頭更




難生存，這樣我是否該在當初多做些什麼？」然而，工作者昱琪則對於「難以回歸社會」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她說到「大家沒辦法跟外接接軌，有兩種原因：一種是他們確實該被要求（訓練）更有效率，一種則是他的受傷經驗使他難以信任不熟悉的人。……有些人不願意積極工作，可能來自於不好的過往經驗，或是不相信人跟夥伴，或是沒有動力與期待，我們比較常做的是去一起找出根本的原因。」因此，昱琪認為要讓無家者回歸社會的方法，並不只有增加效率，找到讓他無法以主流社會期待的方法做事的原因，也是相當重要的。

在重修舊好工作者的討論裡，他們也漸漸意識到此種包容性連帶的想像，對於身心狀態比較好的無家者而言可能也是一種剝奪。只是對於工作者而言，維繫每個人的需求還是一個重要的準則，為了不排除任何人而創造的「例外」，與其他守規則的人之間形成較為衝突的關係是一種過程。方琳曾言「……所謂「創造例外」這件事，是根基於這個社會充滿了使人費解、難以服從的制度與規則，而我們是如何創造例外的。當初在創立重修舊好，我們確實懷抱這樣的想像，若這裡是可包容社會例外的異托邦，它會是什麼樣子？我們也是一步一步來，於是走到了現在，有越來越多不一樣的人聚集。人的聚集帶來所謂常識，這些常識包含規則也好、禮儀也好、期待也好。今天再次被嘉宇提醒，這裡認知的共同價值，與社會中的多數人並非共識。就算是此刻被社會主流排除的人，仍不一定在這裡與我們有共識……在每一階段看到需求時，就會再長出新的工作方法或空間，也因此，會有更多人能被納入。我是這樣相信的。」在這樣的討論之後，重修舊好的工作人員也嘗試透過更為民主的方法來創造空間規範，並在後續的班會課裡試著將決策權部分交給無家者們。

#### 第四節、小結

為什麼包容性連帶的建立會遇到阻礙？行動者如何回應與調適？重修舊好介入建立無家者的社會連帶，強行打造一套新的社會規範，但是他們並沒有成功。工作者與無家者對於重修舊好的功能與目的、合格的福利接收者兩者想像有著根本



性的不同，導致無家者難以接受工作者打造包容性連帶的意圖，也沒有辦法接受這套新的規範。同時，重修舊好對福利資格的篩選，讓包容性連帶並不真的包容所有人。反之，包容性連帶在實作上還是延續了社福體制對福利接收者的分類與想像，嘗試推動場域內較優勢的無家者進入勞動市場、租屋市場，離開重修舊好。因此，所謂的包容並不是真的包容，而是福利體制的政策制定者、社福組織內的工作者以自身的想像在納入與排除。如果當前重修舊好的體制依舊是包容明顯的貧窮者（如老人、身心障礙者、女性），並且排除功能好的無家者，那這還算是一種包容性的連帶與關係嗎？

優勢無家者為了符合重修舊好對於福利接收者的「想像」，會展演包容和脆弱性來配合這套規範。弱勢的無家者則會採取抵抗策略來彰顯自己的工作倫理、自立精神。在不同群體的策略之下，他們呈現出一個相異的結果：原先能夠自立的無家者，為了擔心資格被取消而選擇展現脆弱性；原先需要仰賴福利資源的無家者，為了避免被責罵而展現自立精神。然而這些策略讓無家者進行更多的劃界工作，來伸張自己的受助的正當性、工作的辛勤與恪守道德，而這些展演卻讓他們離互助社群更加遙遠。Lamont（2000）提到群體間以象徵界線進行劃界，以此建立自我認同、獲得尊嚴，並且形成一套可依循的行為準則。這樣的自我認同確保他們在不穩定生活中維持生活秩序、確保生存上的安全。無家者在展演的過程裡透過競爭的手段來搶奪資源，他們不斷地劃出象徵界線來標明自己受助的正當性，這樣的結果讓他們以競爭的方式在社福市場互動而非包容不排除的關係。更嚴重的是，這些衝突會損害原先無家者在重修舊好建立的信任關係，而讓他們之間的連帶變得危殆與不穩定，同時也可能擴張無家者與工作者間的矛盾，讓他們最終選擇離開重修舊好。

## 第五章、限於組織之內：包容性連帶的效果



我覺得就是，沒辦法好好待在一個家裡。因為你待一個家裡太無聊後，你會往外跑，串門子。街友你習慣性遊牧民族了，你習慣這種遊牧民族生活，你要讓他安定下來，除非他有交女朋友，才會想要安定要幹嘛。你讓街友會想到未來？幹你娘搞不好我有未來還不先死了。

（重修舊好無家者福福訪談節錄 2023.03）

無家者的生命並不會在來到街頭後就停止了，事實上更多人期盼的是離開街頭那天。儘管就事實而言，無家者要憑著一己之力離開街頭實為困難。多數研究者因為研究時間的限制，只捕捉無家者的露宿生活，不太關注他們離開街上後的狀態。而無家者時常在租屋、安置機構與街頭三處反覆來回，也讓他們離開街頭時被視為暫時的狀態，不被納入分析。儘管如此，我們仍需關注他們在離開街頭、福利機構的那段時間是如何生活，並且更須將焦點放至在哪些條件導致他們無法完全走出這個反覆的輪迴。根據黃克先（2021b）的研究，真正大宗的脫遊路徑，實來自於消極等待無家者隨年紀增加而取得法定「老人」的福利身分，藉此取得豐富資源以達成另類脫遊。換言之，需要等待無家者「取得低收資格（後依賴穩定福利收入協助租屋）」才能真正離開街上。可是離開後的他們真的能夠維持在組織建立的社會連帶嗎？本節藉由民族誌材料以及訪談離開組織的無家者，回答「**包容性連帶對於無家者的實質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本章分析包容性連帶作為一種可累積的社會資本，發現它具有範圍的有限性。包容性連帶需要依附在重修舊好這個環境，不能脫離組織獨立運行。這個有限性是因為他們在組織外沒有辦法維持包容性連帶，讓包容性連帶資源互惠的效果侷限在組織內。本章分成三個小節：第一節〈離開重修舊好的社會網絡圖像〉以三位無家者離開重修舊好的故事，勾勒他們在組織外的社會網絡圖像；第二節〈包容性連帶

的邊界〉分析三個導致包容性連帶出現邊界效果的原因；第三節〈結果：包容性連帶的效果〉則綜合性地討論三種類型的無家者在來到重修舊好後生活的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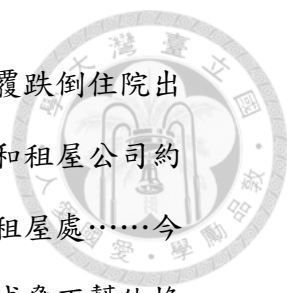
## 第一節、離開重修舊好的社會網絡圖像

在田野結束並進入論文撰寫階段裡，我偶爾會參與人生百味的活動，或是線上與工作者聯繫，更新重修舊好無家者的近況。在田野結束後一年，我與其中幾位無家者聯繫並且簡單地訪談他們的生活，嘗試了解他們在離開重修舊好之後，是否仍有機會與其他無家者保持聯繫、維持互助的關係。我將「離開」重修舊好的人界定在結案的個案以及不再前往重修舊好使用社福資源的人。雖然他們在名義上被結案，但是有些無家者還是會定期去重修舊好走一走，他們去重修舊好的目的變成為了和工作者的維繫關係。

不過重修舊好裡面真正長期離開並且符合大眾想像「自立」的無家者數量很少。一般社會大眾預設的「自立」是藉由穩定工作、租屋，而長期離開街頭，但是無家者礙於就業市場機會有限、薪水低廉、房屋過高等結構性問題，時常難以穩定工作與租屋，進而在脫離街頭沒多久後又回到街頭。在我主要的 33 位田野對象裡，四位無家者維持半年以上的穩定租屋狀態，其中三位是經由重修舊好工作者的協助，包含工作者作為中介與房東聯繫，並且擔保房租的穩定性等。另外三位無家者目前穩定在其他社會福利組織的工作隊受到聘僱，而還有一位無家者目前返家從事工作，另一位在家人的協助下曾長期在外租屋。本節我將以三位無家者的生活故事，來勾勒他們離開重修舊好後的社會網絡圖像。在離開之後，他們分別與同儕、工作者維繫什麼樣的關係？

### （一）青伯：對養護機構來說仍然太健康的人

青伯從無家狀態畢業，租屋滿兩年了。因為帕金森氏症跌倒的頻率越來越高，鄰居的爭執和投訴也沒有停過，租屋公司讓青伯暫簽三個月租約後，才敢在電話中告訴我，接下來房東不會再讓他續租了，請我們盡快




尋找新物件。接著我們看了幾間比爛的物件，接著青伯反覆跌倒住院出院跌倒，年後社福社工總算替青伯安排到機構能去休養，和租屋公司約了點交時間後，委託人生萬事屋，和小包一起去整理青伯租屋處……今天到機構慶生。社工說他被失智的室友吵到要求換房間、威脅不幫他換可能會打人。社工說他相對來說功能還太好，個性上也無法融入團體生活，笑說再換就要換去廁所了。這樣的他，回不去租屋市場，住不下養護機構，排不到社會住宅。這樣的他，看到我出現眼睛還是會笑成一條線啊。……

（重修舊好社工於粉絲專頁〈重修舊好〉貼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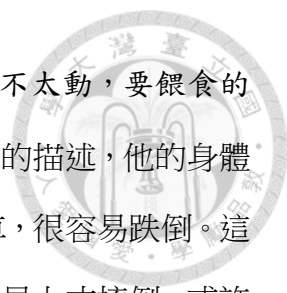
在 2023 年二月時，我看見了重修舊好臉書粉絲專頁的這則貼文。面對這樣的變化我感到意外，我沒有想到青伯竟然會住進養護機構。青伯的身體本來就不太好，大概在 2021 年左右他就因為帕金森氏症幾乎不再能承接萬事屋的工作，所幸撫養官司打得順利，讓他拿到了社會福利身份，進而有費用能支持他的生活。他在 2021 年開始在萬華鬧區租屋，當時其他工作者與我曾經到他家拜訪，大概就是兩三坪大小的房間，一張單人床、一個梳妝台、一個衣櫃，窗戶對的是走道而不是房子外，尚未走入房間內就已經將空間盡收眼底。不過當時的房間還算新，所在的公寓潔白明亮，雖然如同其他隔建的雅房一樣窄小，但是住戶混雜，有上班族、年輕學生以及向他一樣的獨居老人。那時的他剛要開始在外租屋的生活，特地在他的生日請工作者們在家樓下的熱炒店吃一頓，飯局上他拿著酒想與大家敬酒，相對於周圍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女性工作者，真的很像是逢年過節的親戚相聚。

2023 年四月時我聯繫工作者，希望能夠訪談青伯並了解一下住進養護機構的狀況。沒想到工作者那頭傳來的消息，卻是他又搬了出來，住在萬華的另外一角。訪談當天他一幫我打開房子的大門，我便回想起先前跟著萬事屋去打掃的無數個隔間房。這些隔間房大多散落在中萬華與南萬華一帶，老舊狹長的民房改建，好心



一點的會隔個四五間，有些更惡劣的環境會隔上七八間。這些房子總是有一個燈泡半壞、水泥地板，陰暗狹長的走道，而在走道上的是一道道闔上的木門，裡頭住著一個又一個依靠福利金過活的弱勢者。不過青伯住的房間還算好，擺的下一張加大型的單人床、一個書桌、一個電視、一個小矮櫃，還有衛浴以及三個對外窗。我看見乾淨整潔的床鋪，我想他應該在我來臨之前稍微整理環境一番。青伯說這個房間七千塊，是他向養護機構院長提出要離開時，重修舊好工作者潘敏緊急幫他找的房子。三月六號，青伯向院長說自己想要搬出來，三月九號當日他就離院了。我驚訝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是如何找到這個房間？他說剛好另一位長期和人生百味有接觸的無家者是這裡的住民，他告訴工作者這裡有空房，於是就立刻看房、簽約。一開始還在商擬這件事情時，工作者潘敏問他如果沒有房子，搬出來要住哪裡？青伯說可以先回北車睡一陣子，潘敏說「不要啦，不要回去啦……你是重修的表率餒！」我想對於工作者而言，談到表率只是一種說詞，更擔心的是好不容易支撐起的生活，卻又因為回到街頭而跌落。

他是在一月初住進養護機構的，青伯自己的說法是稱呼那裡為「老人院」。在住進去之前，他在原本的租屋處總是坑坑碰碰，時常跌倒受傷，醫生評估過後建議他住進有人 24 小時照顧的養護機構，於是便協商工作者潘敏與他當時名義上的主責社工，住入了養護機構。接下來的狀況就像是前面引述的文字所述，青伯在養護機構過著極度不適應的生活。「那邊就每天早上給你一碗稀飯，放一點肉鬆，這樣就是一餐。中午也是一樣，配樣菜跟一個湯，晚上五點再一餐，然後就睡覺。」回想起養護機構的生活，他提到的那邊的生活作息說明。因為其他養護機構的住民多半沒有生活自理能力，若院方提供大魚大肉這些住民大概也沒有牙齒或是能夠抵抗油膩食物的腸胃能夠食用這些食物，可是對於青伯而言，他的身體還沒有退化到這個地步。「那裡都是『大條（台語）』的啦……退化、傳染病……一個房間擺六張床，班長說你還是搬出去，住太久的話會被傳染（退化的生活）。」我接著問他在那裡生活的感受，他說「不喜歡，也不會討厭啦。但是吼……能夠走，走兩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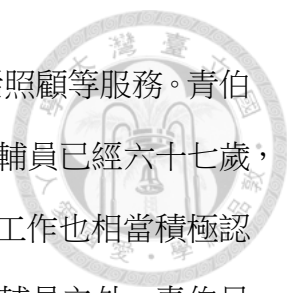


話，就不要待在那邊，因為那邊都是躺著。就像電影上看到的，不太動，要餵食的那種……」帕金森氏症是一種慢性神經退化的疾病，具青伯自己的描述，他的身體與頭腦反應時間會有落差，所以走路偶爾會向前爆衝來不及煞車，很容易跌倒。這樣的他，又露出手軸上紅腫紫青的傷口，說自己在訪談的前一天早上才摔倒。或許他的疾病確實需要有人從旁協助打理生活，才不至於因為跌倒發生危險，但是相對於養護機構的其他病患而言，他還太年輕、身體太健壯，並不應該過上那般沈悶而無力的生活。

在台北市政府的統計資料當中，每季都有一百人次左右的無家者受到轉介至其他單位，包含精神療養院、老人機構、護理之家、遊民收容單位等，然而無家者長期待在養護機構的比例卻相當低。因應不同對象、階段與需求所設立的庇護所、中短期安置或自立支援中心，礙於冗長入住規定和多樣性的居住模式不足，總與不自由劃上等號。(蔡佳勳 2022；吳瑾嫻 1999；吳秀祺 1995) 各類型的安置與養護機構，通常對於出入有嚴苛的限制，也會規定住民的作息時間，並且要求住民需要配合團體生活活動。在這些規定之下，住民時常感受到不自由。若非本身已經有工作，需要一個能夠安穩休息的地方，無家者通常沒有意願入住這些單位。此外，這些機構往往會要求個案需要存入一定比例的薪水，並且研擬就業與租房計畫，這些硬性的規定通常也讓無家者感受到被約束、不自由，並且限縮了原先金錢使用的空間。青伯離開養護機構的原因，除了因為本身功能仍算健全之外，無法適應團體生活，不想要被社福機構約束也是相當重要的原因。雖然這些機構多以醫護、療養的功能作為出發點，但是他們對於住民的規定與管理，時常令人聯想到監獄式的管理方式，只是依照機構設立目的，對於個案的管理與拘禁由程度上的差別。

青伯的案例揭示了養護機構銜接上的不足，雖然他需要他人照顧，但卻又因為本身狀態不夠「糟」，而無法持續在機構生活。這樣的狀況反應了即便在養護機構繁盛的當代，機構的多樣性仍舊不足。所幸當前臺灣社會福利制度逐漸走向去機構化、社區化(王增勇 2005)，而青伯在租屋期間也是由社區照輔員進行關照。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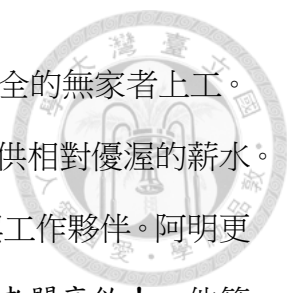


在離開養護機構後，他申請了原先的照輔員持續進行送餐與生活照顧等服務。青伯對該位照輔員讚不絕口，當我詢問他對方的年紀時，他說該位照輔員已經六十七歲，甚至比他大了兩歲。年紀相仿的他們有著相似的話題，對方對於工作也相當積極認真，是目前青伯在日常生活裡最稱得上「朋友」的一位。除了照輔員之外，青伯目前會持續到夢想城鄉上藝術創作與戲劇課，週日也會上教會見見老朋友。在他描繪的日常生活裡，看見他持續藉由社會福利組織與教會，搭建起屬於自己的社會安全網。雖然他與這些朋友們相處的時光並不算多，夢想城鄉認識的其他朋友們約每個月來拜訪他一兩次，而教會的朋友們則約每週見面一次，但是在這個兩三坪大的房間裡，他還算是能與其他人聊上幾句。只是當我詢問他是否有和其他重修舊好的無家者聯繫時，他表示並沒有，彼此沒有聯繫方式，只是偶爾回去重修舊好時仍會搭上兩句話。「我學到的是虧，人生會有一個朋友陪你走到最後……」他講著講著，嘴巴略略上揚，但卻又說不上是開心，而是一種語重心長的說。在停頓後他揭曉答案「是寂寞，哈哈哈哈哈。」這句話，他在訪談後的一個禮拜，又打電話給我說了一次。

## （二） 大元：展開新的生活

訪談大元那天，我走進南機場的小巷，遠遠地就看見力翔在洗車。我看見他並且大叫打招呼，雖然力翔可能不記得我是誰，但是他依舊熱情地招呼我並告訴我大元在哪裡。我走進斜對面的倉庫，第一眼看見的是阿明而不是大元，幾句招呼喧鬧之後，大元邀請我進入他們現在公司（非營利組織）的工作室。當天並沒有預料到他待的新單位訪談，不確定是因為一直有人進出，或是他本身就對訪談保有戒心，他並沒有說太多他自己的感受。話題停留在客觀的生活事實，例如他現在的生活、工作的描繪等等。

「那你現在過得如何？」我問「很好啊！賺得比以前多」他回答。訪談過程裡他常常稱讚現在單位的工作，並以薪資來衡量新舊生活的差別。他目前在一間新創的非營利組織工作，該組織原先是以社會企業的模式經營，培力貧窮者從事清洗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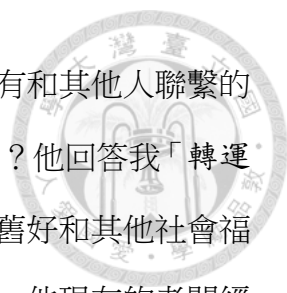


搬運的工作。這個組織相較於萬事屋的模式，更適合身心狀態健全的無家者上工。由於工作時長較長，所需要的體力與技術門檻也較高，該組織提供相對優渥的薪水。創辦人主打自身與無家者間的關係比起僱用關係，更像是朋友與工作夥伴。阿明更自豪地告訴我，他已經被選為該協會的理事，「我的得票數還比老闆高欸！」他笑著談論理監事會上票選的場景。

環顧在該組織工作的無家者，多半是萬華地區新型態團體原先就已經服務的個案，有些是熟面孔，有些是我原本就聽過的名字。這個組織和其他新型態團體的服務模式像是個漏斗，經由幾個單位進行外展工作或是由社會局遊專小組介紹，篩選了特定的對象進入此新型態服務系統後，個案通常持續在這個服務系統接受一條龍式的服務，多數的個案會一次接觸多個單位，或是在不同單位之中受到轉介。這些單位串連起來成為一種無家者服務工作新型態的服務網絡，不只是個案在之中流動，就連工作者常常也是在這幾個單位轉換工作。此現況也讓新型態團體受到批評，如服務個案有選擇性、案量長期來看就是特定人、無法開拓更多的個案等。

（黃克先等 2023）這樣一條龍式的服務在另一個層面揭示了無家者「回歸社會」的困難性：在租房系統上原先有社福組織推出中短期的中繼居住空間，而後發現無家者還是難以銜接到一般租屋市場，因此開設了較為長期的租屋宿舍方案，而租屋宿舍方案又不夠，便開拓了再下一步、更長期的租屋計畫；在就業方面，無家者無法從公部門就業服務站媒合的工作中立即上工、穩定生活，這些社福組織便往回推，由社工陪伴工作並進行零工媒合，但是這兩者的銜接仍舊出現問題，因此其他組織推出了逼近一般就業市場的全職工作，但是由非營利組織經營，來擔保友善就業環境。這些案例都展現了無家者生活的環境與一般社會的租屋與就業市場之間的鴻溝，以至於社會工作者需要在這兩者之間開創更多更細緻且多樣的計畫，來打造一個回歸社會的水管，讓無家者不至於在這兩者間掉落。只是，這兩者之間的銜接是否有盡頭？目前仍無法得知。

我詢問大元他目前的人際網絡，他表示自己目前沒跟什麼人聯繫，除了現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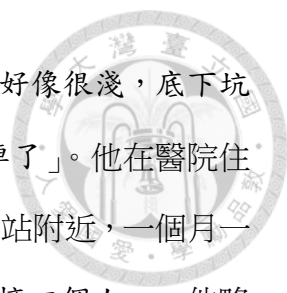


起工作的幾位同事。他目前和阿明一起工作與租屋。我詢問他沒有和其他人聯繫的原因，他只說自己個性使然。我問他重修舊好對他來說像是什麼？他回答我「轉運站」。一開始我從他的回答以及整體的反應，揣測對他而言重修舊好和其他社會福利組織沒有太大差別，只是眾多幫助他的組織的其中一個。這時，他現在的老闆經過告訴我，他將他自己工作時使用的機器取名叫做「重修號」。我驚呼地詢問他這麼做的原因，他沒有說話，他的老闆說「可能要紀念這是最初幫助他的地方吧」。我想起以前總是坐在重修舊好角落的大元，會默默地飄過來，關心我早餐吃什麼、今天怎麼素顏、為什麼穿拖鞋上班。我也想起 2021 年貧窮人的台北系列活動，原本只有一首無家者創作歌曲，但是大元某天半夜突然自發地寫好傳給工作者另一首他自創的歌曲，才讓歌曲從一首變成兩首。這樣的他可能不太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抑或是表達情感對他而言是不安全的。但是，他沒有選擇將那台機器以現在工作的組織取名，圓滑地建立起與當時雇主的關係，反而是取名紀念重修舊好，那麼對他而言重修舊好想必在心中有所份量吧。

我詢問他那他是否有和重修舊好的社工有所聯繫？他告訴我最常聯繫的是工作者阿童。雖然在 2021 年底，因為對於工作方案的想像有所不同，導致大元最後離開了人生百味的住宿據點百味家屋。但是大元 and 家屋主責之一的工作者阿童仍舊維持著良好的關係。大元目前的工作是阿明介紹他進來的，但是這份工作需要一位社工擔保，阿童就成為了他的擔保人。「阿童有時候會追蹤我的狀況，後來沒多久就結案啦，我現在也要買機車了……現在的生活，就跟一般人差不多了啦。」大元望著遠方說道。


### （三） 福福：重修舊好之外的大客廳

在這之中比較特殊的對象是福福，他就是那位在重修舊好班會課上因為酒癮而受到抨擊的對象。他在 2021 下半年他幾乎在重修舊好消失。我後來才得知，他在 2021 年下半因為腳受傷而住院，在出院後長時間居住旅館養傷。腳受傷的那晚台北下著雨，他行經二二八公園水池上的拱橋，一群學生經過，人潮擁擠、路面狹



窄、大雨影響視線，不料讓他跌落水池。他說「不要看那個水池好像很淺，底下坑坑疤疤，我腳卡進一個坑洞，想要拔出來時，啪地一聲腳就斷掉了」。他在醫院住了五天後，表姐就資助他長期住在旅館。那個旅館正好在台北車站附近，一個月一萬六的租金，對於一般上班族而言都算昂貴。「我的床很大可以擠四個人。」他略帶自信地笑著點頭。當我詢問他在旅館住了多久，他說七個月，我驚呼並緊接著詢問「你住那麼久都不會無聊嗎？」一開始他只是說自己在練習走路，或是看看電視與臉書的小短片，直到我後來詢問他有沒有跟人聊天後，他才說「不孤單，我那裡很熱鬧」。接著他像是演起了電視劇一般，高潮迭起地講述了他的旅館如何作為街友們的大客廳。

福福住的旅館鄰近台北車站與二二八公園，而這些地方正是他與他的朋友們生活的地方，他們前去那個旅館相當的方便。許多人會聯繫福福詢問他在哪裡、過得如何，得知他住在旅館後便會過去找他。其中，合合是他在重修舊好結識目前交情最好的無家者。他說有時候合合會過來睡，因為床很大他們可以一人睡床的一側也不會相互打擾，合合有時候也會將重修舊好發的便當拿一個過去給他。我詢問為什麼他人這麼好？還要白白讓別人過來睡？福福說「他們沒地方睡，或是比較冷。我也知道街友哪時候比較冷。阿我們自己曾經流浪過，我自己腳也是比較好了，願意跟大家聯絡。」他接著越講越起勁，說自己每天都有三四個朋友來找他，有些人是重修舊好認識的，有些是原本就認識的朋友。我問他「那重修認識的人，和外面認識的人有什麼差別嗎？」他說「重修進來的街友是挑過的，所以品行比較好，不會有太……太誇張的事情出現」。我隨意提到幾位重修舊好的無家者，想知道還有誰去找過福福。當我提到阿明時，福福想了起來並說「阿明有來我那邊睡幾天。阿明是因為跟小 K 吵架（才過來跟我住），他來講說小 K 做一些事情……」我驚呼地問福福，他平常會跟阿明吵架，怎麼私底下有這層關係。福福接著提到「但他那時候被我趕，是因為旅館合約要到。……阿明那時候經濟不是很好，我搬去 OO 街後，我們前面因為旅館一些事情吵架。那時候我有喝酒，然後因為阿明在我旅館那邊，



有一個走道，可以打開去抽煙地方，晚上他們就在辦事情……辦一些，他本身是乩身，帶一些朋友來，就……有一些是我認識的還好，我跟大元本身比較少聊天，但有一些我不認識。」福福說那次阿明帶了太多不認識的人來，而後來又遇到福福喝醉，因此有了爭執。不過接下來我又提了幾個對象，發現他們並沒有和福福有私下的聯絡。多數只有在來到重修舊好巧遇時、一起工作時會打個招呼，其他時間就沒有交集。我問福福為什麼沒有和這些人聯繫呢？福福說他們也沒有彼此的聯繫方式，也不會特別想要去聯絡。

後來的福福從旅館離開，由親戚代出房租，住到了離原本家庭相近的北市一角。在那個空間裡，合合以及其他外面的朋友偶爾會去找他，他的租屋處延伸旅館繼續成為大家的大客廳。不過最近他與鄰居起了一些爭執，搬離了原本親戚代租的地方。從旅館離開後，福福回到了萬事屋繼續從事一些簡單的零工，加減賺一些錢。當時的他手上有其他收入來源，我詢問他為什麼要回到萬事屋工作？福福笑著說「就多一道菜啊」。回到萬事屋工作的他，也重新和重修舊好的福利資源連上線，而在後來搬離親戚代租的租屋處時，也是工作者昱琪協助找房。

## 第二節、 包容性連帶的範圍邊界

青伯、大元與福福的故事裡，大致可以綜合出一個概況：離開重修舊好的無家者，與多數人沒有聯繫，但是會和少數幾位友人保持聯絡。不過當他們回到重修舊好時，依舊會和其他還在重修舊好的無家者聊聊近況。在工作者的連帶方面，他們基本上都沒有中斷與重修舊好工作者的聯絡，並且持續仰賴重修舊好社工提供的福利服務與資源。從這樣的結果裡，我認為無家者在重修舊好建立的包容性連帶有其邊界，基本上無家者們難以脫離重修舊好並且建立起一個足夠大的同儕支持網絡，而他們與工作者建立起的社會關係，多是仰賴在福利服務關係下的結果。因此，「包容性連帶」是一種在重修舊好的特殊連帶，它需要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底下才會存在。在本節，我想要討論為什麼「包容性連帶」難以在重修舊好外維持？而為什麼無家者在脫離社福組織後，難以自行建立與發展社會關係以打造自立生活的支



持網？

### (一) 難以在外維繫的包容性連帶

在我田野期間，我一直相當好奇無家者在重修舊好之外的生活，尤其是那些消失一陣子的無家者，我想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在社福組織外的生活又是如何受到支持？於是，我藉由訪談、閒聊與詢問社工得知他們後續的狀況。當我詢問他們時，多數人說他們沒有和其他人有聯繫，在我進一步詢問為什麼沒有和其他人聯繫時？他們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只是含糊地說著「也不會想去聯絡」、「沒有聯繫方式」、「我本來就比較習慣自己一個人」。不過這樣的結果並不能在一開始就全盤接受，生活在底層貧困生活的人們對於他們的生活世界有著多重的認知框架，即便是在個人身上，也有可能出現相互衝突的理解方式。(Harding 2010; Lamont and Small 2008) 而底層生活環境充斥的不信任以及被牽連的風險 (Smith 2005)，抑或是他們希望能夠向外展演自立的狀態 (Desmond 2012, 2017[2016])，導致他們易於宣稱自己過著個人主義式的生活。(Raudenbush 2016) 因此我試著經過多方的檢驗與確認，確認他們並沒有言行不一致的情況出現。多數無家者不是真的過上「獨立」的生活，他們會和熟識的朋友有聯繫與接觸，但是和那些在重修舊好才結識、偶爾見到面的無家者則沒有近一步的接觸。透過社會網絡的語言，我們可以藉以區分前者為強連帶，後者比較像是弱連帶。然而，這樣的結果似乎與一般社會大眾沒有太大差異，我們從學校畢業後也難以和所有同學都有所接觸。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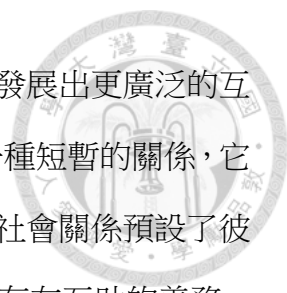
我所觀察到的無家者相對於社會大眾，在離開社福組織之後的弱連帶運用上遇到的問題便是他們**難以維繫這些連帶**。組織連帶預設組織作為橋樑 (broker)，能夠促使行動者建立社會連帶，並得以擴展個人的社會網絡，進而達成資源共享或是更廣泛的社會支持。然而，無家者在社福組織內建立起的社會連帶卻因為他們在離開社福組織後難以維持，而低程度地擴充了他們的人際網絡，他們經由這些弱連帶獲得的社會支持比例也較低。這樣的成果似乎與先前研究者的預設背道而馳，貧窮者藉由社會組織建立起的連帶並沒有他們想像中的如此好使用。(Small 2009;



Mazelis 2017)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希望能從下列三個面向進行分析與討論：其一，科技設備使用的不發達；其二，缺乏相聚的空間；其三，受到組織內象徵界線的影響。

首先，無家者很難聯繫上其他人。社會連帶的建立需要相遇及互動兩個要件，而社會連帶的維繫同樣也是如此。然而，無家者在離開社福組織後，時常因為缺乏媒介而在日常生活中中斷了與其他人的聯繫。現代社會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多半仰賴科技媒介，例如手機、社交軟體等。無家者可能因為自己沒有手機，或是對方沒有手機，抑或是自己或對方頻繁更換手機、社群軟體帳號，所以沒有進一步的聯繫。福福曾向我說道「流浪的吼，手機很常不見，有時候是自己弄丟，有時候是被人摸走」，而因為這樣有時候就容易跟朋友沒了聯繫的方式，在不確定對方在哪裡的情況下，就漸漸地失去了消息。當我問大元跟阿明是否和小黑有聯繫時，大元說「我沒有他的聯絡方式。聽說他手機跟 FB 都常常換啊，也找不到人。」手機與社群軟體成為了無家者間保持聯繫的物質基礎，如若沒有這樣的物質條件，要私下維持社會連帶則相當困難，而他們因為生活環境不太穩定，導致他們的關係也不太穩定。相對地，如果有穩定的收入可以繳納電信費用、有足以維繫科技設備的費用，他們與其他人的數位落差因此能減少，也較能夠維繫社會關係。

其次，如果沒有線上的聯繫方式，線下的相聚則成為了維繫社會連帶的要件。在此我想先撇除社福組織與街頭，並探討其他相聚空間。大眾在離開日常組織（學校、公司、教會）之後，若要持續與朋友維繫關係，時常會相約進行休閒娛樂或是在家相聚。而對於脫離街頭、在外租屋的無家者而言，這樣的相聚條件對他們而言是相對困難的。一方面是他們雖然脫離街頭，但是經濟狀況依舊危殆，通常賺取的收入與日常開銷就幾乎打平，遑論在外相聚進行休閒娛樂的費用。另一方面，他們的租屋處通常狹小且狀況差，多數是擺放一張床和一張桌子與電視的雅房或是套房，一個人居住都已經略為窄小，遑論邀請朋友來家裡作客。若又要省錢、他們也要熟悉的空間，最後時常回到車站、公園或是社福機構相見。



最後，無家者的社會網絡受限於在組織內的小群體，而沒有發展出更廣泛的互助團體。無家者在重修舊好建立的包容性連帶被他們預期只是一種短暫的關係，它是基於重修舊好空間而存在、具有特定互動模式的連帶。這樣的社會關係預設了彼此的交集是空間的使用者，而一但離開了這個空間，彼此間就不存在互助的義務。他們原先在重修舊好就因為彼此相異的社會身份、特質、生命經歷，而出現了排除的現象，形成不同的小團體。這些小團體之間原先就容易出現意見的相左，在離開重修舊好後要轉化成為友誼關係更相當地困難。重修舊好內的無家者彼此間依舊異質性相當高。雖然都有著「無家」的經驗，但是他們無家的原因各自不同，基於各自的身體狀況、流浪經驗、原生家庭的經歷，他們也有著相異對於無家及貧窮的詮釋。此外，無家群體尚未有足夠長的時間去建立起無家與貧窮的敘事，也不熟悉這些工作者試圖建立起的敘事與連結。在群體認同尚未完備之下，工作者企圖建立的社群會有著混在一起（lumping together）的風險，意即工作者過於強調群體內部的相似性，而忽略群體間的差異性。除此之外，有些無家者也認為過去在街上交到朋友是一些狐群狗黨，當自己脫離街頭後便希望不要再和他們產生瓜葛，因此刻意保持距離或是斷聯。福福雖然與多位無家者保持聯繫，但他也提到「租房子了就不想跟他們那個（保持聯絡）……街友都講那些五四三，那是耳朵被強姦耶。每次都說那些，也沒有進步……」。若要能夠建立起更濃厚的社群感，必須持續建構社群內共同記憶與敘事，並且持續互動、共同生活才有可能發展出互助的社會連帶。

## （二） 新關係發展的困難：自立生活的阻礙

工作者期待結案的無家者不要再回到既有的組織裡使用資源，可能是因為想像了他們在自立生活裡能夠發展出其他社會關係。不過，本文發現無家者在脫離街頭後的生活環境其實難以讓他們建立起多元的生活支持，以至於他們需要回到舊有的服務網絡。無家者時常經歷街頭與租屋的反覆循環，除了因為經濟狀態不穩定導致租屋不穩定之外，另一個被提出的原因是因為缺乏足夠的生活支持。（洪譽文 2020；陳姿宜 2019）無家者在脫遊後的生活處在貧窮線邊緣，但是缺乏社會福利





制度支持的他們，反倒比擁有福利身份的人們更為艱困，例如鍾姊就曾經抱怨自己因為租屋失去遊民身份之後，不能再請社會局遊專小組協助開設掛帳單，需要自行負擔看醫生的費用。在貧窮線邊緣的他們，需要仰賴社會網絡給予生活支持，才有可能維繫住好不容易的自立生活。接下來，我將從租屋環境與工作兩個面向，來討論他們自立生活的阻礙，以及為什麼難以開展新的社會關係。

首先是租屋。在重修舊好田野前後期間，一直都有無家者租屋，然而真正穩定租屋的無家者並不多，如同前面所述青伯因為穩定租屋才能夠成為重修舊好的「表率」。租屋不順利者最經典的案例是鍾姊，約在 2021 年底前後鍾姊總共搬了三次家。每次租屋找房都耗費了社工龐大的心力，但總是住的不久。無家者因為能夠負擔的租金有限，通常承租的都是隔間的雅房。雅房內空間窄小、生活環境不舒適，他們多半不喜歡待在那個空間，或是待久之後容易失去與人交涉互動的能力。而且無家者的惡劣住宿環境，容易讓他們與鄰居起爭執，如隔音不佳所以他們容易受到左鄰右舍走路、洗衣、講電話、開關們的聲音吵到，而讓他們因為生活瑣事與鄰居起了爭執。因為他們的生活有很長時間待在租屋空間，但是和鄰居卻又沒有過多的交集，使他們容易感受到在都市裡生活的孤獨感。

接著是工作環境。Small (2009) 提到，組織一直以來是人們建立社會連帶的場所所在。一般人建立社會連結的方式是透過日常機構，例如學校與工作機構。這些場合讓人們能夠與不同背景的人相遇，並且創造互動的場合與機會，進而建立與維持這些社會關係。然而對於無家者而言，他們生活裡的日常機構非常稀缺。這些無家者大多已經脫離求學階段，不會有學校讓他們建立社會連結；而這些人的工作多是以清潔工作為主，多數是政府機構轉介的清潔工作，通常是一人負責一整個區域。例如清潔公共市場的廁所、公家機關的辦公區域等。在從事零工的過程，可能只會和上司、客戶互動，而他們與這些人的社會地位落差過大，也難以建立深度的情感。與之相反，在萬事屋工作團隊裡他們會有工作同事，在重修舊好裡他們有與自己生命經驗相近的人，重修舊好的社工也願意與他們互動和連結，進而造成了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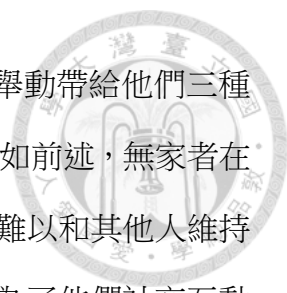
兩者之間的差異。

最後則是社福資源。離開重修舊好過上自立生活的無家者之中，青伯是少數透過社福資源成功建立社會支持網的人。青伯從重修舊好離開後，主責社工轉換成萬華社福的社工。他們替青伯請了一名生活輔導員，那位生活輔導員照顧青伯照顧地很細心，也和青伯建立起親近的情感。青伯的案例是特例，多數人並沒有辦法在自立生活後建立起一個社會支持網，這個問題也和現有的社會福利制度設計有關。台灣政府現有的社會福利制度，側重於物質資源的給予，多數的救濟與服務以福利津貼為主，其次是法律資源的協助。然而針對弱勢群體的社會工作，無論是老人、婦女或是青少年，幾乎不見協助這些群體建立群體連帶的社會工作方案。此外，在社工人員幾乎是一對一的個案工作之下，服務個案所能仰賴的對象僅有社工一人，進而才會形成「福利依賴」的誤會。事實上，並不是這些個案選擇福利依賴，而是別無選擇才依賴福利。

在現有的社會福利制度之下，無論是非營利組織或是公部門，都需要增強組織與社區間的互助關係。在形成完善的社區支持網之後，才有可能減輕現有社會工作者的負擔。正如雨橙所說，「如果有很多個重舊，我就覺得沒問題。但現在只有一個的話，我就覺得不太行。……如果未來 XXX 增設了個案服務，那會讓我覺得壓力更小了。」

### （三） 社福組織作為一個社會資本豐富的節點


雖然無家者難以在組織外維繫包容性連帶，但是包容性連帶並未完全消失。包容性連帶的維持反而是在重修舊好這個空間持續發生。例如已經在外工作的大元與阿明，曾有一次到重修舊好附近工作時，拉風地攜帶著他們洗地的工具回來給社工「看看」，自信地分享他們的生活。青伯也表示如果自己有到重修舊好附近，一定會進去走走。福福因為回到萬事屋工作，目前也會在重修舊好出現。除了這三位之外，離開家屋目前成功租屋的均均與小黑也會定期到重修舊好。均均在每日下班後會去重修舊好，小黑則是在週末才會出現。



無家者在發展自立生活時依舊定期回去重修舊好，這樣的舉動帶給他們三種益處。首先，重修舊好提供空間讓無家者們能夠相遇與互動。誠如前述，無家者在離開社福組織後可能因為租屋空間狹窄、缺乏相聚的空間，而較難以和其他人維持關係。因此原先前往的社福組織或是他們習慣的街頭與公園，成為了他們社交互動的場所。正是因為如此，許多人才會發現公園、車站等公共場所在白天聚集了許多人，誤以為這些人都是街友，直到晚上才會發現真正睡在街上的人並不多。

第二個益處是他們能夠與工作者維繫關係，以應付突發的狀況。無家者在脫遊、租屋之後通常仍會面臨到各式各樣的困境，這時候就需要仰賴工作者追蹤後續狀況。中央現行規範中並未明定追蹤服務，臺北市的遊民服務相關補助中也少見對於追蹤服務社工的人力需求重視，但根據實務經驗與研究發現，可看到離所、租屋後的個案仍可能有其他困境需要協助。(陳姿宜 2019)對於結案並已發展自立生活的無家者而言，定期與先前的社工聯絡可以避免脫遊生活又因為微小的困難而再次崩塌。例如青伯就因為潘敏的協助，而得以順利租屋不需要在住所轉換期間再次回到台北車站。不過，重修舊好的社工並非總是歡迎無家者回來的舉動。離開重修舊好的無家者回到重修舊好時，可能會說自己要回來「洗澡」。他們真實的目的可能不是為了洗澡，而只是希望能夠回到這個空間走走，並且和工作者閒聊兩句、維繫關係，「洗澡」只是他們回來的藉口而已。然而，這個藉口卻帶給社工壓力，社工認為他們回來使用資源可能會排擠到其他真正需要資源的人，因為一天能夠洗澡的人數就這麼多、位置就這麼大而已。工作者潘敏曾說「這些人的狀態已經不在我們服務的範圍內，資源也重覆，沒有期待他的連結要一直掛在這裡，也希望能服務更多人，他下個階段的社工也希望能夠不總是透過我們來跟個案溝通。」工作者兩橙則說道，「『連結』和『服務』可以分開，但目前還不太知道怎麼跟大家說明，大家現在的認知還是：想要維持連結就要來使用服務。」

第三個益處是他們能夠維繫在重修舊好的歸屬感。對於離開重修舊好的無家者而言，重修舊好是最初協助他們的地方，他們就像是畢業生一樣。不過，已經畢



業的無家者們要以什麼樣的名義重返這個空間呢？如同第二點所述，他們目前想像得到、現存的方法是回來「使用服務」。雖然在「使用服務」之餘，工作者嘗試開拓新的方式以維繫無家者的歸屬感，但是目前都尚未實行。工作者成茂曾說「連結還在，例如方式是可以加 LINE，偶爾聊天。但進來空間可以有活動時以另一種身分進來，例如講師、學長姊、主廚等等，也可以趁離開的會談時和他一起回顧在這裡的經驗，減少離開的失落感。有點像學校的畢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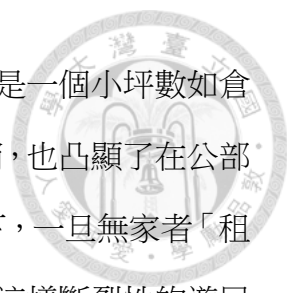
對於已經離開的個案而言，社會福利組織是一個他們得以相遇與維繫連帶的空間節點，他們能夠在這裡與先前結識的朋友及社工保持關係。然而當前的服務設計尚未考量到已經脫遊的無家者的關係需求，因此仍將空間的服務使用者限縮在街頭的無家者。工作者應注意的是，一旦無家者們難以回到原先的社福組織，他們與多數人建立的社會連帶很有可能難以維持並且消失，那麼先前組織打造包容性社會網絡的努力很有可能消失為泡沫。

### 第三節、 結果：包容性連帶的效果

這篇論文最終要面臨的問題：無家者在重修舊好建立起的連帶有什麼樣的效果？若以「生存」或是「減緩貧窮」的角度而言，互助性的社會網絡有沒有發揮其功能？本節將分成三個群體進行討論，分別是：中老年男性、女性與精神狀況者及年輕男性。這三個群體分別在重修舊好建立程度不一的社會關係，而這些社會關係導致了他們現今程度不一的社會生活。對於不同群體而言，他們在可累積的社會資本層面復原的面向不一，但是最終幾乎沒有人獲得足夠的資本以大幅度地改善生活條件。

#### （一） 中老年男性：維持稍有餘韻的生活

六十幾歲的方哥在我田野的期間，經歷幾次工作的轉換。原本兼任城市導引員與萬事屋工作，後來就業服務台的承辦人員發現他有租屋的事實，因此在資格認定上不符合「遊民」，被取消了城市導引員的工作。當時的他氣憤地與承辦人員大吵，



他說他自己的情況並沒有比無家者「好」到哪裡去，即使租屋也是一個小坪數如倉庫般的房間，為什麼這樣就被剝奪了資格？方哥工作資格被取消，也凸顯了在公部門福利身份界定下的僵化與不健全。在既有的遊民服務體制之下，一旦無家者「租屋」或是「有正職」就立刻失去了福利補助與專業人士的服務，這樣斷裂性的遊民服務體制容易導致剛脫遊的無家者再次因為不穩定而跌落街頭。幸好人生萬事屋並非公部門計畫，人員聘用資格沒有特別的限制，因此能讓方哥持續留在隊內。後來，方哥在加入了「浪人食堂」的團隊，在饒河街夜市販賣鯉魚燒。原先「浪人食堂」的團隊由慕哲人社工作者營運，後來因為團隊經營的問題打算終止營業。原先在「浪人食堂」工作的方哥與另兩位無家者，願意接下這個攤位，改以自行運營。方哥在饒河街夜市擺攤了一段期間，其中生意並沒有太好，大多時間扣掉成本後僅有微薄的成本。他時常會請我們去幫忙「捧場」一下。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在班會課或是社區活動、團體活動等需要食物的活動時，會向方哥叫幾份鯉魚燒來替他捧場。直到後來攤位生意不好，實在經營不下去，才將鯉魚燒攤位收了起來。在我離開田野之後，曾在臉書貼文上看到方哥擔任咖啡廳的兼職工作。可見在他仍舊持續努力工作，貫徹他對於工作的信念。

藉由這幾份工作，方哥的生活狀態確實比來到重修舊好以前要好一些。他說他剛開始流浪時期其實生活過得渾渾噩噩的，白天就在車站附近閒晃，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事情，只能隨便走走打發時間。到晚上十一點時他就會到重慶北路上的三溫暖洗澡、過夜休息。那時身上只剩六到八萬塊，最後的一點點錢。每天都過著一樣的生活。白天閒晃，晚上找個地方洗澡睡覺。重複了好幾天。他唯一想的事情就是我這些錢花完了怎麼辦，但他也找不到方法。要找工作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找。那時也不認識任何的社福單位。是一直到要過年前，車站附近的人問他說要不要去做十天工。就是在車站附近舉牌，舉十天，之後會領到一筆薪水。他就想說可以去試試看，因為他不排斥工作。後來也因為這個機緣，才擔任城市導引員、認識重修舊好。方哥說在上工前，他身上只剩六百到八百塊。剛好有銜接上。對他來說好像接觸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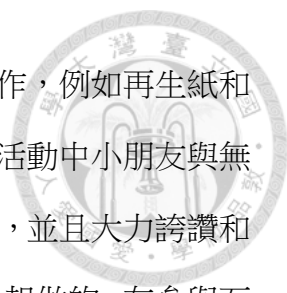


重修舊好對他來說是一個生活狀況的轉換的開始，至少開始有工作了，有資源可以進來了。整個來說生活動力和穩定度都慢慢變好。來到重舊後他也接觸到萬事屋，他的錢也慢慢越存越多，後來才去租房子的。

雖然他自己已經租房，但是生活圈並沒有脫離重修舊好。在萬事屋的訪談裡，他自己提到每次來這邊勾了要洗澡之後就會先離開（不會真的洗澡），不一定會在店裡面休息，對他來說這是一個慢慢脫離重修舊好的過程。他也曾多次提到，自己每天來這邊報到的原因是為了「讓你們知道我還活著」、「感恩惜福」，重修舊好的每個活動他也會參與。對他而言，與重修舊好保持聯繫一方面是因為情感上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是維持著經濟與福利資源的輸入。無論是方哥或是工作者，都曾經開誠布公地提到依照方哥這個年紀，實在難以透過自己的努力回歸到主流的就業市場。這樣的他需要持續憑藉著組織資源，才有可能繼續生存下去。

重修舊好帶給無家者生活品質些微提升的案例，還有時常在方哥旁邊出沒的木木。在離開田野前夕的 2022 年三月，他向我說就業服務台的承辦人說他舉牌兩年了，承辦人希望他可以進入一些正式的就業市場。我聽到後也鼓勵他，我問他目前一個月薪水多少？他說一萬多。我說那承辦人推薦的清潔工月收兩萬六，是現在的兩倍。但是他仍然很猶豫，回答不出來不喜歡的點是什麼。我問他目前對賺錢、租房子有什麼計畫嗎？木木沒有什麼回答。我說「如果不想租房子也沒關係，可以說。」他靦腆地笑笑說也沒有啦，但是也沒有要租房子。我問他舉牌跟萬事屋的工作，他比較喜歡哪個？木木說「喜歡萬事屋，舉牌的時候不能跟別人講話，雖然換了承辦人抓比較鬆，但還是不太能講話。萬事屋可以跟大家一起，比較喜歡。」木木在城市導引員與萬事屋的雙邊兼職下，已經存了幾萬塊錢，確實可以拿這筆錢去租屋。但是木木一直對於租屋有著恐懼，他前後幾次不斷提及希望自己有份正職工作再去租屋。不過比起金錢上的餘韻，或許木木在重修舊好收穫最多的是關係上的復原。

木木是重修舊好就業培力活動的固定班底，雖然名為就業培力，但是因為收入



微薄更像是一種「創作課程」。由工作者帶領無家者製作手工勞作，例如再生紙和手工皂。木木曾和工作者提到他和小朋友一起做再生紙的經驗：活動中小朋友與無家者互動的環節，他覺得小朋友對無家者的認識蠻多，蠻懂事的，並且大力誇讚和他一起工作的小朋友們，而且還蠻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和小朋友一起做的。在參與石頭湯的經驗也是如此，他認為參加的高中生、大學生都會很親切地和木木哥聊天，有人還會問他怎麼煮菜。從和大眾互動的過程裡，他感受到自己備受尊重，並且能夠擔任指導、教學的角色，扭轉了原先單向的受助關係。

在方哥與木木之外，阿岳、程哥也是相似的處境。他們在重修舊好裡獲得的經濟資源與情緒支持，都讓他們的生活相比來到機構之前稍微好一些。這些資源與支持也讓他們能夠維持稍有餘韻的生活。然而，這些資源並不足以讓他們能夠獨立於重修舊好建立的社會支持網之外，他們無論是在經濟上或是情感上，都仍主要仰賴重修舊好提供的支持。

## （二） 女性與精神狀況者<sup>13</sup>：安全的避風港？

女性無家者的復原面向，是我認為所有無家者裡面最具啟發性的。在重修舊好，她們不再需要仰賴街上的男性以換得穩定的生存條件，而是依靠自己與非營利組織提供的物資，便能夠過上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這樣的結果讓她們更有機會與資源擺脫傳統父權體制下的受男性宰制的關係。無論是國內外，女性無家者往往需要仰賴男性才得以存活。Rowe and Wolch (1990) 提到，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進入一段伴侶／戀人關係，以回應他們感受到的身體的脆弱性。街上的女性無家者與男性無家者形成一段戀人關係，其中或許有浪漫愛的成分，但是卻也有著實際利益交換的成分：男性提供感情與保護，女性出賣情緒勞動、再生產勞動或是肉體（吳瑾嫻 1999; 吳秀琪 1995; 黃怡菁 2017）。尤其是當社會福利緊縮，國家大幅地削弱社福資源並強調個人需要努力工作以換得相對應的福利補助，更讓貧困且受暴的女性需要仰賴對她們或是孩子有害的伴侶關係以維持生存（Scott, London and Myers

---

<sup>13</sup> 由於本文之研究對象僅有一位男性精神障礙者，故在本節不另外分類討論之。



2002)。

女性無家者需要找尋一位男性依附，他們的關係很可能是伴侶、兄妹、姐妹抑或是父女。這些擬家的關係確保了他們之間互惠、共生的關係基礎，消滅女性無家者在街頭或是收容所生活的危險性。根據李盈姿（2019）的調查，女性無家者在街頭上時常遭遇偷竊、性暴力、性騷擾等。在 2019 年的調查資料裡，女性無家者在流浪經驗中有「被性騷擾」的約占全體的五四%、有「被人勒索」的約占三〇%、有「被人辱罵」的約占二六%。高比例的負面經驗呈現了女性無家者在街頭生活的困難性，她們身處隨時被人身威脅的街頭環境裡，擔心他人錢財與性的掠奪。居住在二二八公園的合合與軒秀姐，就曾經跟我分享他們的遭遇：

今天下午約五點，合合看到軒秀在外面。

軒秀向合合詢問「阿你現在睡哪？228？」

合合「怎麼可能睡 228，睡馬路」

我「為什麼不睡 228？」

合合「228 很恐怖。228 涼亭都是八角形，因為我都很淺眠，我沒有安全感，睡不著。有一個阿伯過來，我以為是下雨來躲雨，因為他拿雨傘，結果看到我在睡覺就往另一邊，小黑那裡，塞一個東西給他。」

我「什麼東西？」

合合「下面那根啊。後來我就說『幹什麼』，他就跑去另一邊。」

我問軒秀「那你現在睡哪？」

軒秀「台北車站啊」

我問合合「為什麼不去台北車站睡？」

合合「那裡更雜」

軒秀「我現在都睡誠品那邊」

合合「你看他也說北車很雜」






街頭上危機四伏，讓她們需要睡在較為安全的地方，並且時時刻刻保持警覺。為了讓自己能夠比較安心地過生活，女性無家者通常會依靠另外一位男性過生活。男性相伴在側，可以替女性帶來人身安全的保障，其他男性也不會貿然靠近及騷擾。同時，男性的存在也有經濟上的好處，例如在簡姨旁邊的男性，就曾經每日幫簡姨留下便當。

然而，在重修舊好的女性幾乎沒有依靠男性過生活，她們不僅是在機構內沒有依賴男性，以街訪與聊天的過程裡得知她們在街上也沒有「鬥陣仔」。以伴侶為名的擬家關係，在重修舊好內幾乎沒有出現過，也解放了女性無家者對於家庭關係的想像。在我田野兩年期間，僅聽過一位男性無家者與女性無家者發生過性關係，並維持了短暫（不到一個月）的親密關係。重修舊好提供的安全環境、物質資源以及情感照顧，使多數女性無家者不再需要向其他男性尋求支持。

這樣的結果有賴重修舊好提供的兩點支持。其一，重修舊好空間本身即是隔離風險的所在。雙北地區在重修舊好成立以前，沒有任何一個空間是專為女性無家者設計。女性無家者在街頭承擔的人身安全風險並且受到福利資源的排除，讓她們的處境更為弱勢（黃怡菁 2017）。在 2019 年重修舊好成立之初，預計設計成為一個女性無家者專屬的空間。人生百味團隊注意到女性無家者空間的缺乏，因此希望提供她們一個安心的環境能夠休憩、盥洗，不需要擔心有人會闖入、偷拍，或是東西遭到偷竊。小花就曾經在訪談時說「重修舊好讓我感到很有安全感」。重修舊好的安全環境，讓女性無家者能夠放心自在地在這裡生活。在重修舊好對外開放以前，這裡乾淨、舒適的環境，曾像是「世外桃源」。工作者雨橙分享「我想到的是之前重舊剛開始時是以女性無家者據點為主，只有女性進來，我們會在這裡看電影，大姐們在地上坐著躺著。這裡就像世外桃源一樣。」這個替女性而開的空間，確實撐開了女性的安全網，讓女性能夠遠離獨自生活或是街頭生活的危害。儘管梅姊有一處社會局協助租屋的房子，但是她平日都習慣來重修舊好休息，而不願意回去。當



詢問她為什麼時，她說「我都很少去睡欸，現在我都來這裡睡覺，都在外面睡。我對房間沒什麼印象，因為我住的地方，窗戶都被拆了……（有人）刻意搞破壞的。我有監視器，兩橙曉得。為了這個監視器我也是存好久的錢。」梅姊租屋處遭人破壞，這讓她對於生活在那裡感到不安心。除了梅姊之外，小欣、小花、鍾姊、軒秀、田田等女性無家者也是重修舊好的常客，她們或多或少都分享過在街上被騷擾的經驗，而這些經驗也讓他們對於街頭的人身安全風險感到畏懼。

其二，重修舊好不僅是提供空間也提供資源，而這些資源讓她們可以不再需要依賴男性即可獲得生存支持。相比男性無家者在重修舊好內物質條件僅是微幅提升，女性無家者在重修舊好展現出更大的能動性，也有著遠高街頭生活的物資提件。在重修舊好營業的時段裡，女性無家者們在這裡滿足了生活所需，能夠洗澡、拿便當吃、煮飯、存放物品與換洗衣物，她們相比男性更善用在重修舊好的傢俱設備，例如冰箱、廚房等。幾乎我每次去重修舊好時，都可以看見田田、小花、小欣一整日煮了 3-4 次的東西，有可能是因為她們想在關店以前吃飽一整日所需要的食物量。小花會去附近市場買菜，並且分成好幾天烹煮。小欣、合合也會從教會或是家人手上拿到一些食物，帶回來重修舊好食用。相較之下，男性無家者使用廚房的比例就低得多，這有可能是在性別分工的想像以及性別養成之下，所習得的成果。男性無家者通常傾向在外購買食物。

女性無家者在重修舊好獲得的工作機會，也讓他們有著更多經濟能力。街頭招募的零工工作多半需要仰賴體力，例如粗工、搬運、陣頭，女性無家者比較可能從事的工作像是耗費體力較少的舉牌與派報。根據社會局委託芒草心協會的調查，雖然男性與女性無家者有工作的比例差距並未太大（55%vs.48%），但是女性無家者月收入平均數則少於整體。（李盈姿 2019）重修舊好希望能夠提高女性無家者的工作機會與收入，因此在重修舊好的就業培力上多以女性為主，並且開發女性無家者感到有能力且願意做的工作，例如清潔打掃、餐飲、裁縫、包裝與手工藝。女性無家者也偏好有工作者在場的工作環境，例如重修舊好本身或是友人陪同的包裝工作。




若有工作者陪同，女性無家者的工作狀態也相對更穩定一些。

這些經濟資源解決了女性無家者生存資源相對不足的問題，無論是物資還是工作機會都幫助她們在外生存。機構提供的經濟資源是女性無家者脫離男性無家者生存的首要關鍵，儘管她們賺取的收入依舊微薄並且仍舊比男性無家者來得少，但是比起毫無收入並仰賴回收過生活，她們在重修舊好獲得安全的遮蔽所並有機會依靠一己之力賺錢。在傳統的住宿據點、收容所裡，社工人員雖然會協助女性無家者找工作，但並不會直接提供這些工作機會與物資，而且在傳統的住宿據點、收容所內，空間相對大、收容人數多，社工人員並沒有辦法時時刻刻干涉無家者間的互動，因此無家者間的互動狀態與街頭較為相似。

其三，重修舊好改變了女性無家者對家庭關係的想像。根據遊民生活處境調查，女性有較高的比例因為「家庭因素」來到街頭。經歷家庭關係的挫敗、受暴，女性無家者特別感受到關係裡「情感支持」的匱乏。然而，重修舊好幾乎全女性的工作者組成，一方面讓女性無家者在與工作者互動時感到放心，另一方面也讓她們增加從非親屬關係獲得情感支持的經驗。鍾姊曾說，「原本想說你們為什麼要做這種活動？後來想覺得也是很有意義、意思。就是對我們的愛、關係，連自己人也不一定這樣，我姊姊對我也不是」。

在經歷家庭上的挫敗，來到街頭上的女性無家者，開始轉變對於原先家庭的觀念。有一兩位女性無家者曾在工作者詢問「妳還會想交男朋友、結婚嗎？」回答，「我就是被男人害慘的，還談什麼男人」。凱蒂也曾說「我沒有生活，只有一個人。所以手工藝自己一個人，比較好。生活對我來講是有家人，兩個人共同生活。如果說生活會有壓力，因為我現在確實就是一個人，可以一個人快樂、一個人精彩。」重修舊好體現出一個安全的空間對女性的意義——確保人身安全，並且有資本能夠脫離具有階序的性別關係。工作者方琳也於訪談提到女性無家者在當代社會、歷經重修舊好空間的改變：「吳瑾媽在訪那個遊民收容中心的女性的時候，很多人提到她未來的願望是回到她的子女的能夠一起生活的這個家庭裡面，或者是再組一



個新的家庭。可是此刻的街上的大姊（女性無家者）她們講的不是這件事情，她講的其實是她希望能夠過好自己的生活，然後她人生可以安心一點，然後她現在也有累積出一些她的興趣跟她看到的不一樣她想做的事情了，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時間的軸線跟旁邊的周圍的環境跟空間跟制度不斷地在改變的那個過程。」

然而，這樣的避風港雖然確保了人身安全，但是女性在重修舊好建立與其他人建立社會關係卻是相當有難度的。生活在街頭上的女性，很容易因為緊繃的生活狀態而造成精神狀態的影響。重修舊好不少的女性無家者，都有精神狀況的問題，有些人有明顯的妄想或幻聽症狀，有些人則是情緒起伏比較大。精神狀態及過去受傷的經驗讓她們本身就更不願意相信人，或是偶爾失去與他人溝通的能力。而外顯的精神狀態又讓多數男性「不信任」這些女性的能力，進而避免與他們有更近一步的人際關係。

阿明在與秋秋姐工作時，就曾經質疑秋秋姐的工作能力。當時秋秋姐和阿明一起到一個家戶進行打掃，需要將紗窗拆下並清洗。阿明身強體壯，在看到洗窗戶這樣的工作後，便自己開口跟秋秋姊說讓她去洗窗戶，他負責擦鐵架。秋秋姐年約五六十歲，略顯蒼老，身體狀態也不適合爬上紗窗進行清潔。因此阿明的分工我也認為是相當洽當的。在清潔的過程裡，阿明和秋秋姐的分工是典型的性別分工意涵——男性做粗重的，女性做輕的。那個家戶的主任看見阿明爬上爬下認真的模樣，讚許有加，但是對於秋秋姐比較緩慢、不仔細的清潔工作，則是有所批評。家戶的主人不只一次指導秋秋姐應該如何清理窗戶。整個過程裡，秋秋姐感受到整體環境的不友善，因此獨自蹲在浴室洗窗戶時碎碎念了幾句，而這樣的舉動也讓家戶的主人誤會秋秋姐精神狀態有問題。在收工時，阿明突然表示秋秋姐的工作「很輕鬆」，他原本不知道要如此仔細擦拭鐵窗，不然她就叫秋秋姐來幫忙自己。他還提到，下次希望能夠跟力翔一起工作，因為他和力翔比較有默契，知道彼此該如何分工。雖然我質疑他「這樣的分工是你自己安排的？」他只說和他原本想的不同。女性無家者的身心狀態，成為他們不被男性無家者信任的主因。若以修復人際連帶作為這個空



間的目標，這裡修復出的關係是非常性別化的。雖然女性無家者脫離了原先性別關係的拘束，但是卻無法與其他男性建立平等互惠的關係。

此外，待重修舊好慢慢開始服務男性無家者之後，原先願意來重修舊好的女性無家者就減少了。大約在重修舊好正式營運的半年之後，參與活動的男性人數已經超越女性。即便面臨這樣的轉變，重修舊好的工作者並沒有辦法要求男性無家者不要前來使用服務，而慢慢地調整原先的服務設定。在 2021 年的計畫書中，重修舊好將「女性」從服務對象的描述中移除，改以更廣泛性的「具有培力需求及自立生活動機之失業無依者」稱呼。對於一些女性無家者而言，男性無家者進入這個空間開始讓他們感受不自在，進而不願意那麼頻繁的前去。儘管自 2019 年起，台北市陸續多了幾個專門設計給女性無家者的空間，例如芒草心慈善協會於 2021 年開設的女性無家者住宿據點潭心園，但是整體而言專門設計給女性無家者的空間仍舊不足。

### （三） 年輕男性：非營利組織的遊牧生活

年輕男性看似是重修舊好無家者群體內最有資本脫遊的一群人，他們體力充沛能夠負擔大多數體力勞動的工作，並善用網際網路能夠快速掌握資訊。在遊民福利體制裡，這群人被期待藉由「工作－租屋」路徑脫離遊民身份。然而，這些人實際的情況卻是在非營利組織、短期住宿據點、租屋、街頭來回輪轉。年輕且身心狀態良好的男性若不具備任何福利身份，幾乎難以藉由公部門資源而脫遊。國家是以一種殘補且斷裂的方式在協助貧窮者，唯有家庭與市場失靈時國家才會介入管理，而且這些政策往往是不連續的。以無家者服務體制而言，儘管國家設有無家者租屋或是就業相關補助，但是補助期短而無法支撐到無家者進入穩定生活的情況。此外，租屋市場也出現銜接斷裂的情況。雖然公部門與民間團體提供多樣的「友善租屋」提供無家者銜接到正式的租屋市場，但是這些租屋據點多設有三個月的居住時限，待他們離開友善租屋據點後，正式的租屋市場房租多要兩到三倍以上難以承擔。國家處理貧窮者的方式，先以福利資格化為救助門檻，而一旦失去了福利資格、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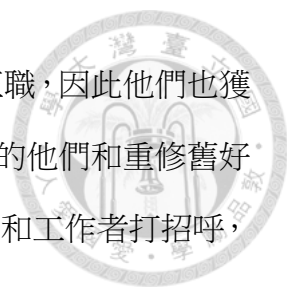


在貧窮線之上，所有的福利與服務瞬間抽離，而難以陪伴貧窮者度過生活最不穩定的時光。儘管他們的生活「好」一點了，但是貼近貧窮線卻又毫無支持的生活，反而比生活在貧窮線以下還要難受。

於是，年輕男性身處在一個容易脫離貧窮狀態，卻又容易掉落的處境裡。這樣的他們時常快速累積脫遊所需的經濟能力，待有一定的能力後，非營利組織會鼓勵他們脫離組織的服務網絡。不過離開機構的他們卻又快速地消耗掉存下的積蓄，然後需要再次回到非營利組織的救助系統內。這樣的生活就像是「遊牧生活」，一但這個組織沒有辦法提供他們資源讓他們生存時，或是他們已經「用盡」該組織的資源時，他們就需要遷徙至他處尋找糧草與水源，不停逐水草而居的他們卻從未在一個定點長期地生活。非營利組織的遊牧生活仰賴年輕男性與社工交際、適應不同組織文化的能力，這些年輕男性因為生活狀態與成長背景與社會工作者最為相近，能夠與社工分享網路話題、以時下流行的詞彙與伏筆溝通，快速地拉近與社工的距離。他們與社工建立起的關係，讓他們相當快速地就能夠運用與掌握該組織的資源，也容易獲得社工的信任，並憑著組織連帶連結到其他組織，獲得更多的資源。

重修舊好的年輕男性大多熟悉臺北地區 2010 以後的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他們的遊牧生活也多座落在這片草原之上。如同先前提到的，阿明與小包在來到重修舊好之前，其實就曾住過芒草心的短期住宿據點。他們兩位知道芒草心的方式，都是自己上網搜尋而找到這個福利機構。在進入芒草心後，他們開始認識了重修舊好的資源，也因為重修舊好而去了夢想城鄉的藝術創作班。這三個組織共享相近的無家者服務理念，多提倡以陪伴的方式協助無家者離開無家處境，也因此年輕男性可以相對容易地進入與熟悉這些組織的運作模式。

大元約在 2021 年末住進了人生百味成立的短期住宿據點「百味家屋」，但是後來因為無法與工作者達成一致的儲蓄計畫，而最後離開了百味家屋。離開後的他正巧與疫情後遭到網咖解僱的阿明，在社工轉介之下進入了另一個協助無家者就業的社會企業。據工作者照彥分享，阿明與大元在該社會企業工作相當順利，也受到



創辦人的賞識擔任了管理者。由於該社創提供的工作機會接近正職，因此他們也獲得更多的收入，期待他們能透過這份工作開展出新的生活。當時的他們和重修舊好的工作者並不保持頻繁的聯絡，但是有次經過重修舊好仍開心地和工作者打招呼，並自信地展示他們工作的工具。

眼鏡仔在 2022 年初拋出震撼彈，他前往杜拜工作。期間他曾因為電信通話費用與我聯絡，偶爾也會向重修舊好工作者聯繫、處理一些金錢的問題。事實上在 2022 年中以前，我一直對於他這份工作抱持很高的遲疑態度，儘管他偶爾會從通訊軟體發給我一些生活照片，例如超市裡印有阿拉伯文的泡麵包裝，或是他在當地的新朋友。我不理解這份工作是從何而來，也不確定他的工作內容是什麼。後來工作者告訴我，這份工作有點類似去賭場擔任外場服務員與清潔員，是經由仲介公司找到的工作。2022 年尾震撼臺灣的柬埔寨人頭案也讓我再度擔心眼鏡仔的海外生活，不過他告訴我一切平安，至今他仍舊在外工作，並期待回來能夠租一間像樣的房子。2022 年尾回到重修舊好參與活動時，工作者告訴我小 K 返家了。在 2022 年初經過幾份不穩的正職與兼職工作後，小 K 在年尾因為父親身體不適而決定返回老家。而力翔從 2020 年中至今，一直在另外一個非營利組織活動。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提問「包容性連帶對於無家者的實質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並分析包容性連帶作為可累積的社會資本的效果為何。本章發現包容性連帶提升的社會資本難以在組織外維持，進而無法大幅度地改變他們的生活。無家者因為不再被重修舊好服務而較少享受到組織連帶帶來的福利資源，但是他們與工作者維繫著相對良好的關係。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在結案後依照個案情況會定期關心，多數時候是因為無家者仍有社會福利的需求，因此會與工作者保持聯繫。而無家者之間的連帶在組織外是相當難維持的，原因包含缺乏聯繫管道、相聚空間與共同交集，而且他們也因為生活環境的限制難以發展新的社會連帶。因此，包容性連帶就結果面而言似乎沒能促成無家者生活上太多的進展。他們雖然藉由發展包容性連帶提升了生

活水準，但是他們減緩貧窮的程度並沒有大到使他們脫遊。







## 第六章、結論：受限的包容性連帶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結論與討論〉綜述本文研究發現，並且說明我對於修復關係工作方法之看法；第二節〈研究限制〉說明本研究的限制；第三節〈研究建議〉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建議。

### 第一節、結論與討論

#### (一) 受限的包容性連帶

過去研究認為組織有助於增加貧窮者的社會連帶、提升社會資本，進而改善他們的生活。本研究以貧窮者最常接觸到的組織類型——社會福利組織作為研究對象，發現社福組織雖然能夠提升無家者個人的社會資本，但是這些資本在離開組織之後不易維持。另一方面，這些連帶並沒有使無家者形成更廣大的互助社群，及改變原先群體習慣的社會互動方式，使得無家者群體的社會資本也沒有提高。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重修舊好，是一個特別的組織。它帶著修復無家者社會關係的願景，照理而言應該更能夠達成增加無家者社會連帶的成果，然而我卻發現結果上並不是如此，而是呈現一個複雜的圖像。

本文核心研究問題為「社會福利組織作為一個外力介入社會連帶的建立，如何影響無家者的社會關係？」我以重修舊好的田野經驗，先綜合性提出我的回答，再分章節說明研究成果：重修舊好的工作者欲打造包容性連帶，提倡在制度不排除、在互動上包容多元特質的社會關係，並期待藉由這樣的關係達到資源的互助互惠，改變無家者原先因為缺乏信任而危殆的社會連帶。然而，包容性連帶沒有成功建立新的社會規範，而包容性連帶促成的資源互惠也僅局限在組織內才發生。本文認為這是因為無家者社會福利體制沒有進行根本性地變革，導致無家者依舊以自立個人化的方式來想像福利體制的功能、體制設計與福利接收者。他們只願意與符合自己想像的合格受助者建立連帶，難以跨越群體成立真正不排除人的社會網絡。同時，因為重修舊好公辦民營的角色，工作者需要達成市府對計畫成效的效率要求，所以




針對福利資格進行篩選來促成受助個案的流動。此舉讓身心狀態良好的無家者被排除在資格之外，這個潛在的排除讓無家者需要競爭受助資格而不是以合作的方式互動。因此，原先應該包容所有人的包容性連帶最後無法真正無差別地對待所有人，欲達成的資源共享效果也受限於組織內的範圍。

所以，包容性連帶應受到的批評，如同社會包容、多元文化近年常常受到的攻擊一樣：只談差異不談社會不平等。其實把包容性連帶擴大一點談，它便是期待行動者與行動者之間能夠有平等的關係，看見彼此的差異、尊重彼此的不同。這個平等關係可以是無家者與社會大眾，也可以是無家者內部不同小群體間的關係。但是真正將「差異」同等視之的前提，是行動者以同等權力現身，否則這個差異終會導向不平等的結果。當各方的行動者實際握有不同的籌碼，卻又在表象被等同視之，反而會掩飾結果上的不平等。在重修舊好，無家者的籌碼是符合「合格受助者」的程度，越符合的人越有資格留在社會福利體制。雖然重修舊好的工作者翻轉了受助正當性的詮釋，從原先符合工作倫理、自立生活轉變成包容不排除他人的特質，可是這個轉變卻讓無家者處在矛盾的狀態，他們需要花非常多的力氣去爭取、調適、扮演重修舊好工作者想像的合格受助者，反而造成包容性連帶建立的困難。接下來將分章節說明本文研究成果。

首先，在〈第二章〉我回顧了無家者社會福利體制的演變，並分析出社會包容概念的興起、福利體制民營化浪潮，提供了人生百味等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的機會窗口。在這兩股力量的影響之下，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企圖創造有別於傳統的服務邏輯，他們將看待貧窮的視角轉向社會結構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權利不平等，並試著在「社會關係」的面向著力。重修舊好便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2019年人生百味承接台北市政府委託經營，主打將「修復關係」作為一種社會工作方式。他們藉著鼓勵無家者發聲、團體活動等，想創造一種新的無家者間的關係。

接著，在〈第三章〉我將他們想要創造的社會關係概念化成「包容性連帶」，這種連帶具備三項特質：在制度上不排除人；在互動上同理他人、包容多元特質；



在資源上互助互惠。在〈第三章〉裡頭，我以重修舊好的日常故事呈現工作者如何創造不排除的制度，以及無家者如何在資源上共享。在重修舊好裡，工作者藉由會議規範、活動設計，鼓勵無家者發聲、分享經驗，讓每個人都能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參與社群，同時學習尊重他人多元的社會特質與需求。在資源的互惠上，無家者會藉由共享或是交換經濟資源來滿足日常所需。他們也因為一起煮飯、分享食物，不需向外拿資源，而感到自己的生活是體面的。他們也會在朋友有難時，給予社會與情感上的支持。而重修舊好的無家者和工作者之間，相較其他福利機構有更為平等的關係。無家者認為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很關心人、像是家人一樣照顧他們，同時工作者也會以個人名義協助無家者的經濟所需。因此，無家者在重修舊好內的個人社會資本是提升的。

然而，在〈第四章〉裡卻畫風驟變，我們看見無家者間種種的衝突以及想要排除人的心態。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兩章呈現的相異成果？第三章無家者的互助是一種假裝，還是第四章的排除是一種展演呢？我認為應該要細緻地去檢視他們排除人的面向是在什麼時候出現，又是誰對誰的排除。若是將無家者按照工作能力、身心狀況簡單地分成相對優勢的無家者和相對弱勢的無家者兩群，可以看見優勢的無家者對包容性連帶比較反彈。對優勢的無家者而言，他們的身體資本、生命經歷都讓他們追求「個人化社會」。他們想像社福組織是要幫助人「回歸社會」的，而回歸是藉由恪守工作倫理、改善壞習慣、培養獨立自主的生活態度來達成。因此包容性連帶鼓勵彼此互助是不道德的，更是一種對他們工作成果的剝削。可是優勢的無家者並沒有因為不滿意包容性連帶就離開，他們反而是留下來調適工作者的期待，或是彰顯自己的脆弱性來並重新劃界出「值得受幫助」的人。他們以幽微且聰明的手法，展現在體制裡的能動性。他們的行為揭露了「社會包容」未被完善討論的核心——所謂的包容是包容誰？要如何考量群體間的權力並分配資源？另一群人——相對弱勢的無家者，他們看待包容性連帶的方式就相當不同。他們認為包容性連帶是一種社會保險，它是在每個人突然地失敗或是受挫時給予幫忙。因此包容


性連帶對他們的生活是一種助益。但是優勢無家者對他們生活態度的歧視、道德上的辱罵，讓他們感到憤怒或羞恥，因此他們也會反擊來彰顯自己的道德。

最後，在〈第五章〉我回到了社會資本的面向進行討論組織的效果。在〈第三章〉呈現無家者能夠藉由組織進行經濟資源的互惠與社會情緒的支持，但是在〈第五章〉我卻發現離開組織後這些資本難以維繫。因為他們缺乏組織作為節點，也沒有機會聯繫與互動。他們離開組織後，多從事的底層工作如保全、清潔員，這些工作與他人互動的機會並不多；他們居住的空間多是隔板房，住戶被隔成一個個狹小的原子個體；他們的生活或有社福體制持續介入，但是相較於重修舊好，社區化的社福體制也多是一種單點式的服務，難以串接起他們與其他人。無家者群體的社會資本並沒有提升，因此「回歸」社會看起來好像是一種成就達成，但其實是落入缺乏連帶的生活裡。

## （二） 研究貢獻

這本論文是一本講述理想與現實落差的論文。工作者想要建立包容性連帶，將無家者帶往一個理想的世界，但是將這些理想落地需要被實際操作運行時，遇到了重重阻礙與困難。我認為藉由重修舊好的故事，我們一方面可以重新評估社福組織介入無家者社會連帶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重新反思社會包容的概念。綜合上述，我想提出本文的三項研究貢獻。

其一，在社會連帶的效果上，組織中介連帶的效果並沒有辦法延續到組織外。這樣的結果帶出了我對於組織連帶的挑戰——當學者提出建立組織連帶作為一種減緩社會孤立的方式，我認為組織的擴充反而會讓貧窮者更需要仰賴組織作為增加社會資本的方式，會讓貧窮者更依附在社福組織之上，進而受到社福體制更大的影響或排除。我認為更好的做法應該是要擴充在社福組織外的社會資本，包含日常生活裡鄰里的照顧、社區化的社福模式，這些才是在社會關係上突破社會排除的可能模式。總結而言，本文認為不是讓貧窮者進入到社福組織後他們的孤立就會降低，如何在他們在社福組織建立社會連帶後還能維繫下去才是關鍵。



其次，本文認為社會連帶的規範面與資源面可以脫鉤，研究結果顯示包容性連帶在社會規範的層次難以完全落實，但是卻在組織內帶來社會資本。這樣的發現揭示即便在一個分化、有排除的環境裡，無家者還是會進行資源的交換。重修舊好的工作者可能會擔心當無家者出現一個個小群體及排除他人的情況，就會嚴重損害到他們之間資源的互助互惠。然而本文發現並不是如此，即使無家者之間出現權力不均等的關係，但是他們在「組織內」的資源交換仍然會進行。

最後，本研究提出對社會包容概念的反思。社會包容／社會融合是為了對抗社會排除所提出的政策性措施，而在臺灣的運作脈絡下放入社會福利綱領，期許社會福利體制成為一個不排除人、多元包容、尊重差異的制度。這幾年「包容」一詞變成一個政策上流行的名詞，從聯合國到各國政府，從國家政策到各級部會，全部都廣納使用「包容」、「多元」、「共融」等等的詞彙。但是，我們應該更細膩地去檢視當社會包容落實到實作層級會變成什麼模樣，並且看見在這個聲稱是包容所有人的理念之下，又有誰是真的被包容進去？誰又被排除了？而本文在〈第四章〉藉由材料指出，工作者希望能夠包容、保護的是弱勢者的需求和權益，不要讓他們的需求被追求效率的社福體制吞沒。這些弱勢者大致符合既有社福體制認為需要幫助的人，如老年人、女性、精神與心智狀況者。而在這種不平等的包容之下，重修舊好內出現張力與衝突，無家者在這個張力之中展演特定的行為模式來爭取福利資格。福利資格的爭取最後導致他們的關係趨向於社福市場的競爭者而非合作者。我無意否定工作者的努力，本文也點出這個工作方法的正面成果，只是我們需要去檢視它帶來的影響是否足夠長遠。包容弱勢並排除優勢的結果，可能會造成優勢的無家者感到自己的資源被剝削，進而降低群體的信任。這個剝削感來自於「他們雖然弱勢但不夠弱勢」，他們不符合工作者對弱勢的想像，但同時卻又沒有足夠的資源能夠擺脫貧窮。故社會包容不應該只是將受助者納入福利制度的保障就完事，也絕非是讓受助者進入就業體系內就能夠解決貧窮，而是要看見他們進入的「保護傘」下的權力關係是什麼樣子。仔細檢視保護傘下是以什麼樣的標準在分配資源，而分

配資源的工作者、基層官僚對於自身的裁量權是否有所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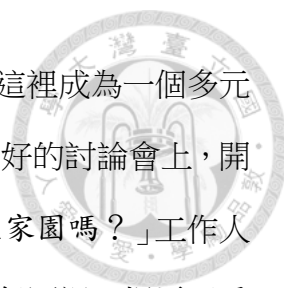
### (三) 例外之地與想像

包容性連帶在社會規範的層面，真的沒有落實嗎？這篇論文像是一把刀，橫斷地切下去，檢視一個還在持續變化的田野。因此，暫且而言或許還沒有成功，但是字裡行間仍可見一些微小正在發芽的可能。〈第五章〉裡紀錄了一些相當細節的變化，像是青伯參與了另一個組織開始交了一些新朋友、大元把機器取名叫「重修號」。這些看起來很細微的變化，雖然還難以論述成文，但或許在幾年後的回過頭檢視，會看見它們已經長成大樹。

包容性連帶看起來未能將人送回主流社會，那也或許是因為它的終點並不是那裡。在田野的過程裡，我也不斷思考著所有無家議題工作者都會遇到的問題——除了脫遊並自立租屋以外，無家者有沒有其他的終點？如果無家者難以脫離社福組織去開創一個新的生活圈，那這裡可以成為他們的「家」嗎？重修舊好當初成立的宗旨，並不是要讓這裡成為一個永久性的終老場域。所謂的永久性終老場域，是指機構成立時就預設機構使用者會在這個場域到老，例如養老院。在臺灣也有少數的機構以「共生家園」為名，期待該處成為被服務者真正的「家」。在重修舊好田野期間，我曾經帶領無家者至「新巨輪服務協會<sup>14</sup>」的共生家園裡進行打掃。當時新巨輪協會正搬遷至新的據點，他們租下了廠房重新裝潢成五六層樓的宿舍，未來將提供成為協會內成員居住。在與新巨輪工作人員閒談的過程裡，我得知新巨輪協會的營運方式是「共生家園」，即讓成員們在這個協會居住、共同生活。該家園的目的與成立宗旨，便有可能讓機構成為成員們永遠的「家」。在周上智（2020）以新巨輪服務協會進行的民族誌田野當中，指涉共生家園「成為家之前，新巨輪先是一個營利團體」，並且發現並非所有成員都認可共生家園是一個家，有些成員受到傳統家庭觀念的網綁，認為親屬關係應建立在血緣之上，因此否認成員間的情誼是

---


<sup>14</sup> 新巨輪服務協會成立於 2016 年，是行動不便者的街賣團體。該協會旨在提供街賣者互助共生的團體，成員多為年老者、身障者。



「家人」。但是若從成員間的社群性以及共食共住的事實而言，這裡成為一個多元家庭想像之所在。在認識新巨輪服務協會後，有次我曾在重修舊好的討論會上，開玩笑地詢問「當初有想過重修舊好變成像新巨輪協會那樣的共生家園嗎？」工作人員成茂回答我「沒有」，並且詢問我「想做嗎？」在這樣的玩笑氛圍裡，揭露了重修舊好的成立宗旨並不是讓重修舊好成為無家者的「家」。

事實上，在整個雙北市的無家者服務據點內，都沒有一個能夠讓無家者永久停留的場所，這些地方最多只能是「像是家」的服務據點，而不能成為他們的「家」。在社會工作越專業化的趨勢之下，助人者與受助者間涇渭分明，更難參雜家人間的情誼。若要有一個據點在實際意義上成為永久陪伴無家者之處，或許更可能是由無家者自身發起才能實踐，然而現實考量上有許多的困難度。如果我能夠對於這個例外之地有著美好的幻想，我希望這個世界真的存在一個不受到空間與制度限制的地方，讓這些人能夠在這裡永久共好。不過現實一點的考量之下，我認為這個社會需要更多像是重修舊好的空間。包容性連帶的效果要能持續，需要同時打造一個「不排除人的社會」，但是這個社會建造的實在太緩慢了。這個社會若要有更激進的變革，或許需要仰賴越來越多的組織去作為連帶建立的基礎設施。就如同萬華區在疫情期間能夠快速集結成資源網，我們已經看見了非營利組織的合作如何促成社區的韌性。(Marwell 2004; Satio 2012) 那麼要打造「不排除人的社會」，不僅是在非營利組織部門，社區、租屋市場、就業市場也需要同樣的基礎設施進入，才有可能打開更多的空間。

接續著上述的結論，我想提出一個既是理論也是經驗實務上的問題：建立社會連帶是目的，還是改善無家者經濟生活的手段？在理論上而言，如果社會關係只是物質貧窮的附帶效果，那社會排除根本性而言並不是「多面向」的，而是在經濟貧窮單一面向之下的併發症而已。在經驗實務而言，我們評估一種社會工作的效果，最終只需要以「脫遊」作為唯一的指標。然而，無論是田野內的報導人、近年來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甚至我自己，都認為社會關係面向的貧窮是獨立於經濟面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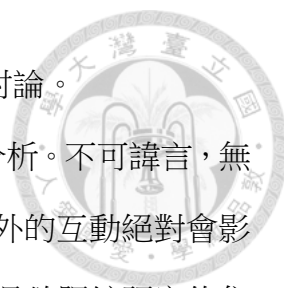
在。即便有這樣的想像，我卻發現在實際上社會關係難以和物質切割。在學界與實務界，其實都沒有找出社會關係影響的核心層面，以至於最終人們還是只能用經濟面的改變來想像社會關係。我認為這是接下來要持續努力的方向，辨識出足夠有效益的指標來解釋社會關係的影響。

##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文因研究者的研究位置，面臨著下列兩點的限制。其一，本文沒有辦法進一步討論到無家者「社區參與」的面向；其二，本文對於無家者在社福組織外的街頭生活，沒有更近一步的討論與參與。

首先，讀者應會發現這本論文少了相當重要的行動者——社會大眾。我相信讀者會十分好奇這個原先開給無家者與社會大眾互動的空間，實際結果到底如何？而且，若要改善無家者的社會關係處境，他們如何與社會大眾應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層面。就大眾用餐而言，重修舊好本就採取預約用餐制，因此實際到訪的客人數量並不多，而在 2021 年 5 月疫情肆虐後就停止供餐。因此就以簡餐店而言，無家者與大眾接觸並不普遍。在用餐之外，重修舊好也有舉辦幾場無家者與一般大眾互動的活動，如我曾參與的「街頭野一下」邀請大眾與無家者一同野餐、「萬聖節遊行」或是相對常態的幾場「重修大客廳」。然而在撰寫論文的過程，我評估這些民眾與無家者的互動其實相當短暫且淺層，而且這些民眾多是本就對無家者有所了解的特定人，他們的經驗可能難以真實地反應無家者的社會參與。在活動的過程裡，好奇的民眾通常會聆聽無家者的生命故事。而在事後的調查裡，民眾多半表示這些活動讓他們對無家者的認識更加豐富且多樣。不過，這樣的認識並沒有造成後續更近一步的互動，我也難以蒐集到無家者與大眾更近一步的關係樣貌。當然，無家者的社會參與並不只在這些活動裡。萬事屋時常會帶無家者去打掃，打掃的家戶多是社會底層弱勢，無家者和這些住戶也有一些互動。不過同樣的，這些住戶是特定的一些團體，而且他們在打掃過程裡未必會和住戶有直接的互動。我認為若要分析無家者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應該要有更多且更全面的資料，才不會以管窺天。因此





本文並沒有處理無家者與社會大眾的關係，留待後續研究進行討論。

其次，本文並沒有對於無家者在組織外的生活進行太多的分析。不可諱言，無家者的生活與關係樣貌應該是包含組織內與外的，他們在組織外的互動絕對會影響他們在組織內的關係想像。但本文受限於研究時間的限制，並且欲限縮研究的焦點，因此沒有觀察他們在組織外的生活。然而我認為這並不影響本文的論點，事實上我也以訪談的方式補齊無家者離開組織後的生活，我認為就探究「組織介入無家者的社會關係」而言，以組織內的資料已可以給出足夠的分析與解釋。

### 第三節、政策與實務建議

對於本研究之田野地與相關政府部門，本文提出下列政策與實務建議：首先，對於重修舊好提出兩點建議。

第一，建議重修舊好應更頻繁舉行離開後的無家者的聚會。本文發現社會福利機構是無家者重要的社會連帶節點。本文認為重修舊好可以開設更多元的方案，讓離開後的無家者得以回到該空間聚會與交流，讓原先建立起的社會連帶得以延續。

第二，建議重修舊好工作者可以給予優勢無家者更多助人的象徵資本。我認為包容性連帶在社會規範層次難以被完整落實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無家者看不見建立包容性連帶對他們的好處。我認為工作者可以給予助人的無家者更多的鼓勵與肯定，或是讓無家者在一些場合分享自己助人的經驗，以讓無家者意識到助人對於該社群的意義。

其次，對於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提出兩點建議。

第一，我認為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應該以其他非「脫遊」的指標來評估無家者福利機構的成效。當前以脫遊作為績效指標，容易讓無家者爭奪福利資源，破壞無家者之間的社會關係，進而減損原先福利組織的工作成效。我認為政府應協助開發一套新的評估指標，讓無家者的助人工作有「脫遊」以外的評估可能。

第二，我認為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應該設立更多元的無家者服務據點，讓離開街頭的無家者在社區內有其他社會關係聯繫、維持的空間與機會。同時，應該增加社區的支持系統，而非單點式地輸送社會福利服務。






## 後記

論文口試完成後，我和人生百味的工作者約好要去辦公室向他們分享研究成果。說真的，這一天比起口試當天還令我緊張。我擔心「他們」不理解我帶有批判性地詮釋。但是在分享前，工作者方琳就告訴我，百味的工作者具有異質性，不應該被單一樣貌的「他們」所畫約。這樣的精神貫徹了人生百味重視多元、允許多元存在的鮮明特質。儘管人生百味的工作者都懷有相同的議題關懷，但是內部卻允許多樣的詮釋與觀點存在。

工作者成茂在我分享完後，擔任第一個舉手發言的人。他先詢問我最初寫這份論文的目标？做完論文有沒有覺得開心？在我回答完第一輪後，成茂說「我來給我的回饋，我看完後超不爽的」。在場的大家都笑了出來，連同我也是。我很感謝成茂這麼直接的表達。我深信是對彼此深厚的信任，才能夠讓我們如此坦率溝通。成茂認為「它作為一種檢測機，檢測下去會漏掉一個東西。有些很微小的東西，我覺得是很巨大的東西，甚至可能是唯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愛。」隨著這句話我們展開了第一個重要的討論。工作者方琳認為，重修舊好最初的目标就不是為了讓人「脫遊」與「自立」，而在論文末卻仍以無家者的物質經濟水準是否有提升作為判準，是一個不正確的檢驗。所以，論文結果說對無家者「沒有用」是必然地，因為一開始的檢測方向就錯了。


我回答以無家者的物質經濟水準作為評斷標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要回應過去組織連帶文獻的論點——貧窮者經由組織的中介，社會連帶增加，進而得以社會流動、擺脫貧窮處境。我想要回應這些文獻，指出組織的影響力未必如此深刻，貧窮者離開組織後可能還是回到社會資本低的社會裡。但是不可諱言地，這樣的選擇可能忽略了非物質層面地改變。我的論文可能沒有更好地捕捉到無家者經過重修舊好，他們的身份認同、尊嚴有什麼樣的變化，他們如何重新理解社福工作者、職場



上的雇主，他們是不是對人都增加了信任？這些也許更能體現包容性連帶的意義。所謂社會連帶，未必只有個人層次的連帶（ties），還包含集體層次的信任程度、社會團結（solidarity）。期待未來我還有機會，能夠以集體層次再次分析這些人離開組織後產生的變化，去捕捉這些在論文裡有記錄到卻沒有分析到的小細節。

當日第二個重要的討論，是我們要如何創造社會上更多的節點，讓包容性連帶能夠在社會上延續。如果當前無家者只能在重修舊好維繫包容性連帶，那工作者可能遲早會難以負荷這樣的工作量，或是包容性連帶的影響力無法延伸。工作者方琳認為，目前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的擴充是一個緩慢搭建地過程，她看見越來越多人被捲動，創立了更多組織。而我原先期待的是，這個社會上能夠有更多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節點，讓這個包容的網絡搭建地更遠更廣更快速。但是在這次的對話裡，我對於「如何創造更多節點」有了新的理解。我原先想像的節點，是從「貧窮狀態」連結到「主流社會」的小踏板，目前越來越多元多樣的直接服務計畫，都是在這兩個狀態裡的階梯。那麼，我希望這個踏板的建立不是只有社會福利單位在搭建，而是就業單位、居住單位都可以共同建立這個小踏板。但是，這些新型態無家者服務組織建立的小踏板可能從來就不是為了讓人回到「主流社會」，而是在開闢一個新的世界與可能，這些踏板是幫助人逃離那個正在崩毀的資本社會。那麼，這些踏板的搭建當然是一步接著一步、一塊接著一塊，而不是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了。

工作者成茂以冰山與熱源來比喻人生百味想要做的事情。他說「主流世界是一個寒冷的冰山，山壁非常陡峭，一不小心就會滑死。主流社會非常寒冷也危險，人為什麼沒辦法顧及別人？因為自顧不暇。即便是非常成功的人，都會擔心自己隨時會跌落，而跌落的時候是沒人會救你的。包容性連帶是這個冰山裡面的一個熱源，它要去撐開這個冰山。包容性連帶不寒冷，是有生命力、有溫度、有愛的。所以它當然會呈現論文寫的結果，在熱源之外溫度是難以延續的。問題可能不是溫度為什麼擴



不出去？而是溫度從哪裡來？我認為溫度是從一群人的內心而來，這些溫度超過個人所需，所以可以給別人。人生百味的工作者是自己先有溫度，才散發給別人。很多時候我們會切斷（與人的關係），不是因為不能把溫度給別人，而是這個人太冷了，冷到我受不了，我會失去我的溫度。工作者的排除是為了創造更大的包容性連帶而存在的。……很多人沒有習慣包容性連帶這個文化，不見得是包容性連帶對他們沒有效，而是它需要去習慣。工作者在這個過程也在學習如何調節溫度，怎麼讓這個東西不燙手，也不失溫。這個東西如何擴展？溫度擴展本來就是一層一層，雖然看起來很絕望、很慢，但是這種溫度傳遞像是點燈，千年暗示一燈即明。每個人都是火種，只要被點到就會燒起來。當一個人具備這樣的能力時，就可以消除痛苦。……這本來就是從凍土長出來的植物，但是這個植物卻要改變這個環境。我反而覺得是很有趣的過程。因為一但有人被點燃了，就回不去了。」

在這個精美的比喻後，我表達我的看法。我認同這樣的觀點，只是我們總是容易描繪冰山，卻沒有語言去指出這個熱源所點燃的世界長什麼樣子。所以對於還在冰山上攀爬的人，固然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相信。我想接下來的任務，是要找到更多語彙與可能，去指出那個不只是烏托邦的世界。

在這些討論之外，不同工作者確實也發表了相異的看法。工作者阿童和孟穎說，「我沒有被罵的感覺」，阿童也說自己目前正在苦惱的事情被描繪了出來。工作者昱琪非常感動，「一些很棒的地方也被如實呈現了」其他新進來的工作者，也詢問了更實務地工作建議、脫遊指標的修正等。工作者昱琪補充，在我離開後的重修舊好，曾經嘗試用劇場及其他方式促進不同無家者群體間的理解。

最後，這篇論文想要獻給青伯。在我前往百味報告的那一天早上，青伯過世了。先去訪談的時候，我答應他在我出國唸博士班之前，要帶我男朋友去給他看一看。


青伯，很抱歉這個約定竟然永遠無法達成。在訪談後的一個暴風雨的晚上，您曾打電話給我，又向我訴說了一遍「人生陪到你最後的朋友，是寂寞。」希望在天上的您，有很多人陪伴您，讓您不會再感到寂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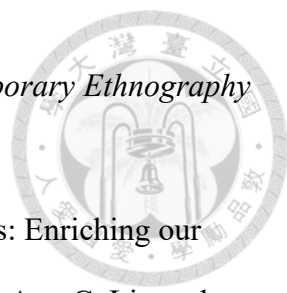
## 參考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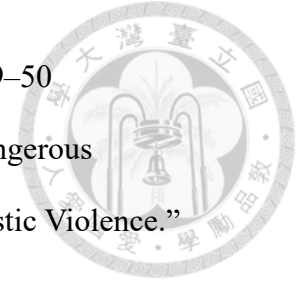
- Aldrich, Daniel P , 2018[2012] , 《重建韌性: 災後復原的社會資本》。林經桓、李仰桓、蘇薇方、楊詠翔譯。台北: 五南。
- Bert, Ronald S. 1997. The Contin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2): 339-365.
- Brady, David. 2019. Theories of the Causes of Pover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5: 155-175.
-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skin, Robert J., Prudence Brown, Sudhir A. Venkatesh, and Avis Vidal. 2001.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Chan, Cheris Shun-ching. “Invigorating the Content in Social Embeddedness: An Ethnography of Life Insurance Transactions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3): 712-754.
- Cheal, David. 1996. *New Poverty: Families in Postmodern society*. London: Greenwood press.
- Cooper, Marianne. 2014. *Cut Adrift: Families in Insecure Tim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smond, Mathew , 2017[2016] , 《下一個家在何方》, 胡訢諄、鄭煥昇譯, 臺北: 時報。
- Desmond, Matthew and Travis, Adam. 2018.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urvival Strategies among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5): 869–896.
- Desmond, Matthew. 2012.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5), 1295–1335.
- Domínguez, Silvia, and Celeste Watkins. 2003. “Creating Networks for Survival and

- 
- Mobility: Social Capital among African-American and Latin-American Low-Income Mothers.” *Social Problems* 50(1):111–35.
- Duneier, Mitchell , 2018[1999] , 《人行道》, 黃克先、劉思潔譯。臺北：游擊文化。
- Durkheim, Emile. 1964[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 Edin, Kathryn and Laura Lein. 1997.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Edin, Kathryn and Maria J. Kefalas. 2005. *Promises I Can Keep: Why Poor Women Put Motherhood before Marri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ffman, Erving , 2010[1963] , 《汗名》, 曾凡慈譯。新北：群學。
- Halpern-MeeKin, S. 2020. Social poverty: A new view of relational resources. *Contexts* 19(2): 40-45.
- Harding, David J. 2010. *Living the Drama: Community, Conflict, and Culture among Inner- City Boy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senfeld, Yeheskel. 2000. “Organizational Forms as Moral Practices: The Case of Welfare Departments.” *Social Service Review*, 74(3), 329–51.
- Hughes, Cayce C. 2019. “From the long arm of the state to eyes on the streets: how poor African American mothers navigate surveillance in the social safety ne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48(3): 339-376.
- Headworth, Spencer. 2019. “Getting to Know You: Welfare Fraud Investigation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Social 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1): 1-26.
- Katz, Michael B. 2013. *The Undeserving Poor: America’s Enduring Confrontation with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ssane, Rebecca Joyce. 2012. “Poor women’s moral economies of nonprofit social service use: conspicuous constraint and empowerment in the hollow stat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5(1), 189-211.
- Koch J, Scherer J and Kafara R. 2020. “Structural Inequality, Homelessness, and Moral



- 
- Worth: Salvaging the Self through Spor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49(6): 806–831.
- Lamont, Michèle and Mario Luis Small. 2008. "How Culture Matters: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In *The Colors of Poverty*, edited by Ann C. Lin and David R. Harris. New York: Russell Sage.
- Lamont, Michèle and Molnar, Virag. 2002. "The Study of Boundaries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167-195.
- Lamont, Michèle. 2000. "Introduction: Making Sense of Their World." In *The Dignity of Working Men: Morali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Race, Class, and Immig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evine JR. 2013. "Organizational parochialism: "placing"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ties." *City Community* 12:309–34.
- Levitas, Ruth. 1998. *The inclusive society and New Labour. 2nd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Liebow, Elliot. 2009[1967] 《泰利的街角》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臺北:群學。
- Lubber, Miranda J., Small, Mario L. and Garcia, Hugo V. 2020. Do networks help people to manage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fie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689: 7-25.
- Marwell NP. 2004. "Privatizing the welfare state: nonprofit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as political actors." *Am. Sociol. Rev.* 69:265–91.
- Mazelis, Joan Maya. 2017. *Surviving Poverty: Creating Sustainable Ties among the Poo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Nan, Lin. 2002.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Newman, Katherine S. 1999. *No shame in my game: The working poor in the inner city.*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edition.
- Offer, Shira. 2012. “The burden of reciprocity: Processes of exclusion and withdrawal from personal networks among low-income families.” *Current Sociology* 60:788-805.
- Oliver & Barnes , 2021[2012] , 《障礙政治：邁向消弭歧視的包容社會》。紀大偉、張恆豪、邱大昕譯。台北：群學。
- Osborne, Melissa. 2019. “Who Gets “Housing First”? Determining Eligibility in an Era of Housing First Homelessn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48(3), 402-428.
- Parsell, Cameron and Clarke, Andrew. 2022. “Charity and Shame: Towards Reciprocity.” *Social Problems* 69(2): 436–452.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audenbush, Danielle. 2016. “I stay by myself”: Social support, distrust, and selective solidarity among the urban poor. *Sociological Forum* 31 (4): 1018–39.
- Reitzes DC, Crimmins TJ, Yarbrough K and Parker J. 2011.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etwork ties among the homeless in a downtown Atlanta Park.”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9(3): 274–291
- Rogers, Laura E. 2017. “‘Helping the Helpless Help Themselves’: How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Create a Moral Identity While Sustaining Symbolic Boundaries within a Homeless Shelt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46(2): 230–260.
- Rowe, Stacy and Wolch, Jennifer. 1990. “Social Networks in Time and Space: Homeless Women in Skid Row, Los Angel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2): 184-204.
- Satio LT. 2012. “How low-income residents can benefit from urban development: the LA



- Live community benefits agreement.” *City Community* 11:129–50
- Scott, Ellen K., London Andrew S. and Myers, Nancy A. 2002. “Dangerous Dependencies: The Intersection of Welfare Reform and Domestic Violence.” *Gender and Society* 16(6): 878–897.
- Shipler, David K. , 2016[2004] , 《窮忙：我們這樣的世代》。趙睿音譯。台北：時報出版。
- Small Mario L., Adler L. 2019. “The role of space in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ties.” *Annu. Rev. Sociol.* 45:111–32
- Small, Mario L. 2006. “Neighborhood Institutions as Resource Brokers: Childcare Centers, Inter-Organizational Ties, and Resource Access among the Poor.” *Social Problems* 53:274-92.
- Small, Mario L. 2009. *Unanticipated Gains: Origins of Network Inequalit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all, Mario., Harding, David J. and Lamont, Michele. 2010. “Reconsidering Culture and Pover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29: 6-27.
- Smith, Sandra Susan. 2005. “Don’t put my name on it”: Social Capital Activation and Job-Finding Assistance among the Black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1), 1–57.
- Snow, David A. and Anderson Leon. 1987. “Identity Work among the Homeless: The Verbal Construction and Avowal of Personal Ident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6): 1336-1371.
- Soss, Joe, Richard C. Fording, and Sanford F. Schram. 2011. *Disciplining the Poor: Neoliberal Paternalism and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R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ack, Carol. 1974.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Standing, Guy, 2019[2011], 《不穩定無產階級》, 劉維人譯。臺北:臉譜。
- Stretesky, Paul B., Defeyter, Margaret A., Long, Michael, Satter, Zeibeda and Crilley Eilish. 2020. "Holiday Clubs a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689: 129-148.
- Venkatesh, Sudhir Alladi. 2006. *Off the Books: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of the Urban P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tkins-Hayes C. 2013. "The micro dynamics of support seek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utility of institutional ties for HIV-positive women." *Ann. Am. Acad. Political Soc. Sci.* 647:83–101.
- Wellman, Barry, and Scot Wortley. 1990.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558–88.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son, William Julius. 2012. "Afterword: Reflections on Responses to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I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51-289.
- 公益責信協會, 2021, 《公益觀察 2021 暨臺灣捐款人行為調查》。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i5RKetbZ6tlasWV5ZBnApMKuhhYpUXT/view>
- 王悅, 2020, 〈「他還會繼續睡在街頭嗎?」無家者的脫遊預測分析—以臺北市遊民工作暨生活重建方案參與者為例〉。臺北市:臺北市府。
- 王增勇, 2005, 〈社區照顧的再省思:小型化?規格化?產業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9: 91-141。
- 王增勇, 2009, 〈解嚴後台灣福利運動建制化的過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



407-417。

王增勇、涂沛璇，2019，〈從文化缺陷到反壓迫社工：多元文化社工的再想像〉。《社區發展季刊》165: 329-339。

王篤強、高迪理、吳秀照，2010，〈台灣社會福利民營化的未預期後果:地方政府相關人員「官僚自主性」的初步闡釋的〉。《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4(2): 91-146。

古允文，2014，〈多元包容社會與國家發展〉。《公共治理季刊》2(1): 33-46。

甘炳光等編，1994，〈Ch.1 社區工作的定義與目標〉，《社區工作：理論與實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江睿之，2011，〈「街友每天都在奮鬥，因為流浪時間都被約好的！」——台北市中老年男遊民的生產與再生產經驗探討〉。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江瑩，2001，〈從大台北地區之遊民服務網絡探討遊民賦權之可能性〉。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何明修，2023，〈第 7 章 構框：社會運動的意義創造〉，《社會運動與台灣社會》。台北：三民。

余慧玲，2019，〈沒有遊民的地方？發展性社會工作與居住攷置優先的觀點〉。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吳宗昇，2011，〈教會與社會：台灣儲互社的宗教、社群與貨幣網絡分析〉，《輔仁社會研究》，1:73-104。

吳秀琪，1995，〈底層的社會建構與自我認同〉。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明儒，2009，〈社區多元文化與社會包容之探討：以台灣新移民女性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27: 99-112。

吳瑾嫻，1999，〈女性遊民研究:家的意義與城市生活經驗〉。臺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玫萱，2016，《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台北：游擊文化。
- 李盈姿，2019，《108 年度台北市遊民狀況調查》研究成果，臺北市社會局。
- 李淑容，2016，《105 年度台北市遊民生活狀況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 卓春英，2017，〈社會福利民營化之實踐與省思－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實施為例〉。《社會發展研究季刊》19: 112-140。
- 周上智，2019，《共生家園如何共生？障礙街賣者的社群生活》。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官有垣、杜承嶸，2011，〈臺灣非營利部門自 1950 年代迄今的發展特質、轉型與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33: 65-80。
- 林徐達，2012，〈貧窮的文化反思：三位原住民的生命話語與意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6: 133-177。
- 林萬億，2015，《團體工作：理論與技術(3 版)》。臺北：五南。
- 林萬億、陳東升，1995，《遊民問題之調查分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洪伯勳，2015，《製造低收入戶》。臺北：游擊文化。
- 洪譽文，2020，《製造連結：二十一世紀日本底層社會的自立生活》。清華大學人類學碩士論文。
- 徐正光，1991，〈生產關係的斷裂：關廠的政治經濟分析〉。發表於「勞動市場與勞資關係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台北。
- 徐敏雄、謝宜潔、陳亮君、古明韻、陳秋欣。2021。《歡迎光臨 161 號》。台北：開學文化。
- 高召恩，2003，《性別、勞動與公民權：以國家建構的遊民公民狀態為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晉芬，2001，《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台北：中央研究院。
- 張獻忠，2009，〈臺北市遊民工作暨生活重建方案與社區化遊民工作策略〉。《福利



- 社會季刊》124: 4-5。
- 張獻忠，2016，〈出版緣起〉，出自《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臺北：游擊文化。頁 18-25。
- 許哲韡，2019，《邁向無家者支援網絡: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智偉，2004，《都市遊民研究——台北市遊民與環境的共生機制初探》。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華竿、孔健中、黃千嘉、劉育偉，2014，〈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民」〉。《犯罪學期刊》17(1): 1-37。
- 郭盈靖，2007，《看不見的勞動者--- 台灣遊民勞動權益剝奪的意識形態與建制分析》。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慧明，2004，《我要活下去！遊民的生存策略和生活世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大衛，2000，《台灣遊民問題的結構分析》，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自昌，1995，《遊民的社看生活與遊民服務:臺北市萬華區的遊民研究》。臺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姿宜，2019，《街友租屋歷程之探討：以臺北市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滿麗，2008，《女性遊民、父權意識、規訓權力-以台北市遊民收容所為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燕禎，2011，〈遊民問題管理之探討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34:441-457。
- 游淑真，2017，《浮游天與地》。臺北：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 馮燕，2001，〈從部門互動看非營利組織捐募的自律與他律規範〉。《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 203+205-242。
- 黃克先，2019，〈「迫迫人」、「做事人」與「艱苦人」：臺灣無家者場域內的行動主



體》，《臺灣社會學》38: 63-114。

黃克先，2021a，《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台北：春山。

黃克先，2021b，〈台灣遊民社會福利體制的運作及效果:從基層官僚治理取徑切入〉。  
《臺灣社會學》41:51-94。

黃克先、陳思樺、黃怡菁，2023，〈照護無家者，照護自己：新型態無家議題工  
作者的實作與反思〉。(尚未出版論文)

黃怡菁，2017，〈為什麼他們回不了家？街頭最底層的女性無家者〉，出自《報導者》，  
<https://www.twreporter.org/a/female-homeless>。

黃怡菁，2021，〈A PLACE FOR HOMELESS PEOPLE? : THE PANDEMIC AND  
HOMELESSNESS IN TAIPEI〉，網址：[https://taiwaninsight.org/2021/08/11/a-  
place-for-homeless-people-the-pandemic-and-homelessness-in-taipei/](https://taiwaninsight.org/2021/08/11/a-place-for-homeless-people-the-pandemic-and-homelessness-in-taipei/)

黃玫玲，1995，《台北市遊民生活適應問題之研究》。臺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葉靜倫，2019，〈在這裡重修舊好：全臺首間以女性街友為主體的相聚空間〉。《多  
多益善》。網址：[https://rightplus.org/2019/07/22/homeless-  
2/?fbclid=IwAR0C0592JTmP8CUOO25DTA6zjXVTQamUT0HGCFIuzenVqxs  
YpSAz0HA6HcQ](https://rightplus.org/2019/07/22/homeless-2/?fbclid=IwAR0C0592JTmP8CUOO25DTA6zjXVTQamUT0HGCFIuzenVqxsYpSAz0HA6HcQ)。

葉靜倫，2021，〈【無家十年】人球、傷病、露宿，與夾縫中的照顧網〉系列專  
題。《多多益善》，網址：[https://rightplus.org/2021/12/22/homeless-  
10years/](https://rightplus.org/2021/12/22/homeless-10years/)

葛晶瑩，2019，〈「貧窮人的台北」以故事來對話，以歷史為核心的運動〉。《關鍵評  
論網》。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6613>。

劉淑雲，2010，《從警政到社政：台北市遊民收容政策之變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  
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鶴群，2015，〈社會排除、貧窮與就業：現象描述與政策意涵〉。《社區發展季





刊》151: 163-184。

潘淑滿，2000，《社會個案工作》。台北：心理出版社。

潘淑滿，2009，〈遊民政策與服務的意識形態〉。《臺灣社會工作學刊》7: 49-83。

蔡佳勳，2022，《社會工作者協助女性無家者脫遊之經驗-以台北市非營利組織為例》。

玄奘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怡世、陳玟蓀，2013，〈台灣民間社會福利組織社工人員工作內容與比重之探討：

以聯勸補助的組織為例〉。《聯合勸募論壇》2 (2): 23-50。

戴伯芬，2014，〈底層勞動、消費貧窮與都市漫遊者——臺北市街友田野記實〉，《臺

灣社會學刊》54: 233-265。

謝國雄，2010，《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臺北：中央研究院。

藍佩嘉，2003，〈SARS 與社會不平等：外勞與遊民〉。《中國時報》，網址：

<http://homepage.ntu.edu.tw/~pclan/columns/03-sars-and-inequality.pdf>

顧忠華，1999，〈公民結社的結構變遷——以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為例〉。《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36: 123-145。